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史

## 1883-1929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M.C. 霍华德 J.E.金 著  
顾海良 常庆欣 刘和旺 鲍金红 译

# 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史 1883-1929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微信扫描 (ID: cctohome)



ISBN 978-7-5117-1833-4



9 787511 718334 >

定价：88.00元

F091.9

06

V1

# 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史

## 1883-1929

###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M.C. 霍华德 J.E.金 著  
顾海良 常庆欣 刘和旺 鲍金红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F091.9  
06  
V1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1883~1929 / (加) 霍华德, (澳) 金著; 顾海良等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17-1833-4

I. ①马… II. ①霍… ②金… ③顾…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1883~1929 IV. ①F0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0323号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巍

责任编辑: 邓永标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7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 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 408千字

印张: 22.75

版次: 2014年5月第1版第1次

定价: 88.00元

网址: [www.cctphome.com](http://www.cctphome.com) 邮箱: [cctp@cctphome.com](mailto: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刷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66509618

## 译者前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是M.C.霍华德和J.E.金合著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的第一卷。第二卷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两卷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是20世纪末西方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发展史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出版于1989年。本卷对1883年马克思去世后直到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历史发展作了阐述。本卷第一篇“德国的贡献，1883-1914”，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关系的分析入手，集中对恩格斯晚年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意义，以及恩格斯与当时各种流派的经济学家围绕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型”问题争论的过程及其得失作了梳理和评价。对1895年到1914年间，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伯恩施坦、卢森堡和考茨基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做了展开论述，也对考茨基、希法亭、卢森堡和奥托·鲍威尔等人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金融资本、资本积累、经济危机等问题的讨论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本卷第二篇“俄国到1917年的贡献”，以19世纪90年代到1917年之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俄国的发展为主题，论述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在俄国传播的特点、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和发展的意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粹主义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列宁关于俄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争论、修正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俄国发展的影响及其争论、1905年到1914年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影响、托洛茨基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理论及其影响，以及1914年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和布哈林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影响等问题。本卷第三篇“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1917-1929”，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与新修正主义的兴起及其争论、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演进阶段及其争论、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理论及其影响等问题作了展开论述。

总结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历史发展，霍华德和金在本卷结束语中指出：“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2年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出版，激起了有关价格和利润分析以及危机理论的新争论。就危机理论而言，在大萧条前夕，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在随后的10年间，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推动了德俄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金融资本、垄断、国家

支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还就不同类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问题进行了争论。1917年后，俄国的理论家不得不正视一个巨大的困难，即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以改造，以使其适应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境况，而他们曾经的同志——德国和奥地利的理论家们（现在大多数被视为自己的敌人），则纠缠于西欧和美国的国家管制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重大的缺陷，但到1929年时，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退化’。相反，它已继续进入了新的领域、提出了新的思想、面对了新的对手，并遭遇了新的问题。它的多样性、它的分裂、它的不和谐是它巨大力量的来源。”

在这里，我要重述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当代西方一些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多是以“学术的”、“考据的”视阈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历史和现实的，他们多为我们所说的“马克思学”学者。霍华德和金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两卷本中的历史视角、理论见解和学术观点，总体上是属于“马克思学”范围的。对他们的一些见解和观点，我们未必赞成，但这种“学术的”、“考据的”研究及其理论见解和学术观点，对我们的研究还是有意义的，也有多方面的启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马克思学”学者研究成果的基本原因所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是由我与我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指导的三位博士生共同翻译完成，他们现在已分别在三所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本卷各章初稿翻译分工如下：常庆欣：导言、第一章到第六章；刘和旺：第七章到第十二章；鲍金红：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结束语。我和常庆欣一起，对初稿作了统一校译、修订，最后定稿。应该说明的是，虽然我们尽了努力，但其中不妥和讹误之处依然难免。敬请读者们指正。

两卷本的第二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出版于1992年。该卷中译本由我主持译校，由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期间指导的博士生共同翻译完成，已于2003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该卷出版后，发现译文在翻译上还有多处不妥、甚至讹误。近期我们将重新校订再版。

顾海良

2014年2月

## 鸣 谢

我们非常感谢Robert Dixon, Dick Geary, Ramesh Kumar, David Laibman, Fadle Naqib, Michael Schneider, John Singleton和Ken Stollery的有益的建议和批评。有些章节的早期版本曾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第2章曾发表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3章第4部分曾发表在《剑桥经济学杂志》上；第8章曾发表在《政治思想史》上；第10章曾发表在《苏联思想研究》上；第11章曾发表在《历史反思》上；第14章曾发表在《欧洲史季刊》上；第16章曾发表在《科学和社会》上。还要感谢兰卡斯特大学和滑铁卢大学馆际互借部的工作人员；感谢Christine Flude在德语方面提供的耐心和富有启发意义的指导；感谢Keith Povey高效的编辑工作；感谢Jan Ireland和E. Langkau博士在获取恩格斯和施米特的通信方面提供的帮助；感谢Karen Musselman, Debbie Lucas-Switzer, Sylvia Roberts和Ann Wendt提供的卓有成效的秘书服务，以及加拿大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会一般研究资助提供的研究经费支持。

M.C. 霍华德 J.E.金

# 目 录

contents

## 导 言

### 第一篇 德国的贡献：1883—1914

#### 第一章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遗产：1883—1895 / 5

1. 马克思的智力遗产 / 5
2. 作为编辑者和理论家的恩格斯 / 8
3. 《资本论》第三卷 / 13
4. 对恩格斯贡献的评价 / 17

#### 第二章 恩格斯和价值理论“有奖征文竞赛” / 24

1. 引言 / 24
2. 竞赛的性质 / 25
3. 第一回合：莱克西斯、施米特和斯蒂贝林 / 28
4. 第二回合：沃尔弗、洛里亚、弗里曼和莱尔 / 31
5. 恩格斯的裁决 / 36

#### 第三章 价值理论的第一次争论：1895—1914年 / 44

1. 《资本论》第三卷 / 44
2. 对《资本论》第三卷的早期反应 / 47
3. 庞巴维克和希法亭 / 51



4. 米尔普福特和德米特里耶夫 / 56

5. 冯·博特凯维茨的解决方法 / 59

#### 第四章 伯恩施坦、考茨基和修正主义论战 / 66

1. 德国社会主义的兴起 / 66

2. 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爱尔福特纲领》 / 68

3. 伯恩施坦对正统的挑战 / 72

4. 卢森堡和考茨基的回应 / 77

5. 评价 / 84

#### 第五章 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考茨基和希法亭 / 91

1. 引言 / 91

2.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论帝国主义 / 92

3. 希法亭论金融资本 / 95

4. 对希法亭的反应 / 99

#### 第六章 资本积累、帝国主义与战争：卢森堡和鲍威尔 / 106

1. 罗莎·卢森堡和资本积累 / 106

2. 对卢森堡的批判 / 111

3. 奥托·鲍威尔的积累模型 / 113

4. 卢森堡的《反批判》 / 118

5.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第二次思考 / 120

## 第二篇 俄国到1917年的贡献

#### 第七章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 125

1. 引言 / 125

2. 俄国专制主义的本质 / 125

3.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俄国 / 128

- 4.俄国的民粹主义 / 131
- 5.“晚年马克思” / 132
6. 结论 / 135

## 第八章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 / 142

- 1.引言 / 142
- 2.普列汉诺夫体系，第二国际的正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 / 143
- 3.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明 / 147
- 4.革命的结构 / 151
- 5.结论 / 155

## 第九章 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 / 161

- 1.引言 / 161
- 2.民粹主义的俄国资本主义理论 / 162
- 3.杜冈 - 巴拉诺夫斯基论扩大再生产 / 164
- 4.列宁关于通过扩大商品生产实现剩余价值的理论 / 166
- 5.《19世纪的俄国工厂》 / 168
- 6.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 170
- 7.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 172

## 第十章 俄国的修正主义 / 180

- 1.19世纪9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派别 / 180
- 2.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 181
- 3.消费不足和管理资本主义 / 183
- 4.利润率下降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 184
- 5.价值和分配理论 / 185
- 6.农业经济学 / 188
- 7.俄国修正主义的重要意义 / 189

## 第十一章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1905—1914 / 198

- 1.列宁经济思想的分期 / 198

2.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纲领 / 199
3. 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经济学 / 201
4. 俄国历史和“普鲁士道路” / 202
5.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美国式道路” / 203
6. 列宁主义的力量 / 206
7. 列宁政治经济学中的矛盾和难题 / 209

## 第十二章 托洛茨基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 / 228

1. 引言 / 228
2. 俄国不断革命的政治学 / 229
3. 俄国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 / 231
4. 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 234
5. 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 / 237
6. 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 / 239
7. 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的不足 / 241

## 第十三章 帝国主义和战争：布哈林和列宁论垄断资本主义，1914—1917 / 249

1. 战争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249
2. 布哈林论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国家 / 250
3. 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列宁 / 253
4.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向布哈林的转向 / 255
5. 列宁和“不断革命论” / 259
6. 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经济的评价 / 261

# 第三篇 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1917—1929

## 第十四章 修正主义的复兴 / 278

1. 引言 / 278
2.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新修正主义 / 279

3. 弗里茨·斯滕伯格论帝国主义 / 284
4. 对斯滕伯格的评论 / 287
5. 一个评价 / 289

## 第十五章 向社会主义过渡：1917—1929年的共产主义经济学 / 295

1. 引言 / 295
2. 作为过渡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公社国家 / 298
3. 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 / 300
4. 工农联盟的政治经济学：布哈林的间接过渡理论 / 302
5. 苏维埃关于西方和过渡问题的观点 / 304
6.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二元经济过渡理论 / 306
7.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比较 / 308
8. 一国社会主义或不断革命 / 310
9. 斯大林主义的解决方法 / 314

## 第十六章 亨利克·格罗斯曼和资本主义的崩溃 / 325

1. 引言 / 325
2. 格罗斯曼的崩溃和危机模型 / 327
3. 崩溃理论的政治学 / 332
4. 格罗斯曼的批评者 / 334
5. 评价 / 336
6. 格罗斯曼崩溃模型的代数公式 / 337

## 结束语 / 343

## 附录：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 345

## 导 言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一卷中，我们讲述了自1883年卡尔·马克思逝世至1929年之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1929年既见证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的爆发，也展示了后来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开端，这场革命把苏联转变为了现代超级大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第二卷将阐述自此之后直到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自身标准来判断，似乎可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并不重要。就像今天被广为理解的那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把观念归于上层建筑，而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列入实际的经济范围之内。从而，经济思想的历史就与人类发展的次要现象联系在一起。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立场的完整图景，经济思想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历史中的重要论题。尽管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变种使马克思主义自身倒成了例外，但马克思主义仍然起着启示实践的作用，以减轻历史转变中的阵痛——这正是1883年到1929年间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些年的发展，同实际的政治问题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把理论当成行动的指南，而不是超然的学术思考。本书评价的主要著述者，很少有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相关工作的。差不多所有的著述者，都以政治活动为生：记者、政党组织者、地下活动家和劳工运动中的教师。他们的经济学产生于对具体问题的反思，目标倾向于获取社会主义政权。他们能够接触到成熟的理论体系这一事实，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战胜其他政治激进主义的原因。

19世纪的最后30年，在欧洲几乎所有的角落，都可以找到宣称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团体——马克思主义之星正在冉冉升起。但是，在1929年之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出重要和原创性贡献的，主要是德语和俄语这两种语言。直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才崭露头角；20世纪60年代之前，法国或意大利几乎没有出现什么有重要意义的经济理论。这就形成了这一卷的结构：第一篇（第一章到第六章）考察1914年以前的德国文献，第二篇（第七章到第十三章）讨论1917年前俄国的贡献。虽然德国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有

很大差异，但人和观念的确自由地从东向西流去又流回，我们在对不同的观点的探讨中，会涉及相关的理论上的交流。

德国和俄国之间争论的特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只存在一个政治中心，即第二国际——尽管存在内部分歧和无能，它还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中心。1914年到1920年间，这种不稳定的统一也被打破。接下来的十余年间，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之间已出现了公开而激烈的对立，这种对立同一些属于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团体对理论争论的介入纠缠在一起。同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经济问题，随着国家政权的获得发生了变化。我们将在第三篇（第十四章到第十六章）单独讨论这一问题。

德国的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总是实质性的，这和它们各自国家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14年之前的十年，德国迅速成为欧洲主要的工业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教育和组织逐渐壮大的德国无产阶级，以使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党的理论家们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将迅速来临，从而将理论讨论提上了议事日程。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集中关注同垄断、金融资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密切相关的深刻的结构变革问题，他们把这些问题看作是成熟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对社会革命的本质和继承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同时，必须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那些批判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反对那些把新的发展解释成同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代性的推定正是德国（和奥地利）理论家的致命的弱点，德国社会主义者低估了他们所面临的客观困难。考虑到工人阶级数量上的持续下降和他们的分裂，加之德国政府的强大力量，革命只能在小资产阶级的广泛支持下才能获得成功。而这种支持，从来就不是唾手可得的。获得这种支持的前景，被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取向破坏了。他们认为，中间阶级注定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被消灭，中间阶级的支持作为革命的权宜之计而被排除了，因为他们会阻碍经济的进步。修正主义者提供了另一种观点，他们提倡同那些在爱德华七世时推动英国重要的（虽然是受到限制的）社会改革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结盟，但是这却掩盖了德国资产阶级反自由主义的本质。

在俄国，小资产阶级也是很重要的，在这方面俄国甚至超过了德国。事实上，直到1914年，俄国仍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其特征就是，之前30年资产阶级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几乎没有给俄国极端落后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带来什么变化。这些状况证明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俄国激进主义者必须捍卫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意义。1900年前，民粹主义者声称，俄国资本主义正在人为地形成，并注定

会迅速产生，尽管农民充当了革命变革的真正主体。为了反对这种观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扩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那样关注资本主义的灭亡。在世纪之交，他们稳固地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敏锐地认识到俄国欠发达的本质。他们关心的重要问题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革命将奠定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他们认为这对随后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必要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非常关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形式，关注——通过适当类型的革命——实现资产阶级关系广泛而持续的扩张的条件。

资产阶级关系被证明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因为它既突出农民支持的重要性，也突出获取这种支持的基础。然而，这同时也产生了矛盾。事实上，对几乎所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俄国沙皇制下的资产阶级同德国资产阶级相比，自由更少，而对政权的屈从更多些。从而，无产阶级被赋予了革命领导者的角色。但这种革命的措施被认为应以符合资产阶级的秩序为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造成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分离。但是，这种分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的，因为在经济理论方面，这两个流派实际上还是密切地走在一起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赞同德国主流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分析，并使之更加激进。在考茨基、希法亭和卢森堡的理论基础之上，他们主张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使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到处成熟。在吸纳对方思想方面，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同路人。1917年后，在西方，德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运用俄国孟什维克理论，论证十月革命是早熟的，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

这些相矛盾的观点既影响了行动，也影响了理论。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资产阶级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时，德国和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力图证明只能扩大民主革命。从而，主要关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人，以破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告终；期待资本主义崩溃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却开始与资产阶级合作并维护资本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用德国的理论去证明他们所做的，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用孟什维克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1883年到1929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存在着深刻的问题，也包含了重要的洞见。本书提供的是批判的历史，而不是描述性的或是对思想的简单重建。在很多地方，至少在我们看来，我们的批评不可避免地过于严厉。然而，考虑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不仅承担了政治方面而且承担了学术方面的重大任务，这种批评应当适中。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面对的棘手的政治环境已经强调过了。然而，在纯粹学术的意义上，他们抓住了真正重大的问题。总的看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要么是完全回避问题，要么是完全无法解决问题。理解必然使批评变得

适中，期待也相应地减少了。对于那些翻遍考茨基、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的著作，想要找到适合于20世纪90年代的现成的政治经济学的人们来说，等待他们的只有失望。



# 第一篇 德国的贡献：1883—1914

## 第一章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遗产：1883—1895

### 1. 马克思的智力遗产

卡尔·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3月13日，享年64岁。他留下了大量计划中的尚未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及数量更大的未能出版的著作。自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只把少量的时间用在剩余各卷的创作上，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他感兴趣的其他问题上（相关的讨论，参见以下第七章）。构成《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和第四卷基础的手稿，就像马克思在评价另一部著作时所形容的那样，只能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马克思认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这一观点来看，这种懈怠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即使考虑到他的健康问题，对于他渴望成为导师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对于他终生的朋友与合作者、留下来收拾残局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来说，马克思对自己责任的忽视是难以被原谅的。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只有少量的经济学著作公开出版。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恩格斯是合著者）。《共产党宣言》当然不是一本经济学专著，但概述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共产党宣言》是迄今为止得到最为广泛传播的马克思的著作，仅在1871—1873年之间就以6种语言重印了9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于1859年，刚出版时几乎无人问津，但不久之后就脱销了。马克思逝世时，在1847年仅以法文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已很难看到。《资本论》第一卷首次出版于1867年，五年后出版了德文第二版，1872年被译成俄文，1872—1875年间被译成法文。使马克思多少有点惊讶的是，俄国人对《资本论》的兴趣极为强烈，正在逐渐壮大的民粹主义运动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的观点（参见以下第七章）。然而，俄国民粹主义者把《资本论》看作是论述资本主义工业化存在的危险，以及探寻避开这些危险的道路的指南（俄国的书报审查员自鸣得意地认为《资本论》过于晦涩，不

可能带来什么风险）。<sup>[1]</sup>

同《共产党宣言》一起，恩格斯撰写的有着重要影响的《反杜林论》（出版于1878年），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作了阐述，对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作了概述。《资本论》第一卷是1883年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源头。直到1907—1909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很久以后，《资本论》第一卷仍然是奥托·鲍威尔在维也纳奥地利社会党工人学校演讲时的主要参考文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广泛的工人运动中，对《资本论》的阅读很少超过对法国德维尔以及晚些时候英国艾威林提供的关于《资本论》的摘要，或者对德国考茨基的《〈资本论〉概要》的阅读。这三者之中，考茨基的《〈资本论〉概要》是最受欢迎的。<sup>[2]</sup>在1883年，很少有马克思其他的著作可供使用。认真的学生无法看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或通信；《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仍以手稿的形式存在，论述经济学说史（被称为《剩余价值理论》）的《资本论》第四卷也一样。少数人甚至怀疑《资本论》重要“草稿”的存在，这些草稿最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名出版，它提供了“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研究主题之间的联系。可用的英文材料更是少得可怜，即使是1850年翻译的、刊载在朱利安·哈尼《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的《共产党宣言》，也已脱销许久。在英国，广为人知的是马克思对帕默斯顿外交政策的全面反对，以及他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并同巴黎公社保持联系。下一代人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是通过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或欧洲大陆和美国学者的批判性著作获得的。<sup>[3]</sup>不足为奇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主要来自德国人的努力，或者来自受到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启发的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参见以下第八章）。

《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强调，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资产阶级把整个世界转变为一个无休止地追逐利润的世界，同时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这就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论题。随着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或者转变为资本家，或者（对绝大多数来说）转变为丧失财产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社会日益两极分化。对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要，使资本关系在世界市场上得到广泛传播，使商品化全面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经济危机提供了“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证据，危机产生了“生产过剩的瘟疫”，资产阶级用来克服这些危机的办法存在内在的矛盾。夺取新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无产阶级的贫困的加剧，技能的退化和工人自主权的丧失，使工

人成为“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劳动力的价格由它的生产费用决定。“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共产党宣言》认为，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对新市场的不懈探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猛烈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贫困，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基础。<sup>[4]</sup>

《资本论》第一卷提炼并扩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重要经济思想。在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者的无酬劳动构成剩余价值的理论之前，马克思开篇对商品生产作了较长篇幅的、复杂而又晦涩的分析。马克思讨论了劳动过程、工作日的长度、工厂内的分工、机械化的影响等问题。在工资决定上，马克思修改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立场，用更加辩证的观点取代了早期对最低必需生活资料数量的强调，这种辩证的观点最早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对工人需求的持续增长会提高工人的日常消费水平。除了基本的生理因素外，工资中有一个取决于人类需求发展程度的可变的构成部分。因此，工资受到两个相互冲突的趋势的影响：机械化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迫使工资下降；工人需求的扩张沿着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贫困化成为一个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现象。<sup>[5]</sup>随后，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中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增长得更快的长期趋势。这种“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导致失业工人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加剧了资本的积聚与集中。有点不协调的是，《资本论》第一卷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前资本的“原始（也就是说，最初的）”积累の説明，和对英国殖民地的雇用劳动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重要性的分析作为结语。<sup>[6]</sup>

作为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一本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资本论》只是马克思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它舍略的内容不亚于它包含的内容。根据马克思的计划，《资本论》第一卷强调商品生产，撇开了商品流通及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之间的联系。<sup>[7]</sup>因而《资本论》第一卷中只有两处简短的内容，提及劳动价值和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异，没有对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进行分析，更没有对一般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进行分析。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讨论，虽然有力但却不够正式，不像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分析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时那样严密和繁复。马克思有关经济危机的观点是粗略的和局部的。虽然偶有对萨伊定律的抨击，有对机械化、失业、实际工资和积累率之间关系的有力分析，但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前后一致的周期性波动理论，或者说是对经济崩溃可能性的系统说明。《资本论》第一卷经常提到，即将到来的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但是，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经济基础的理论分析，并没有充分展开。1883年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对《资本论》中包含的基本原理的看法，与现代读者必然不同。

## 2. 作为编辑者和理论家的恩格斯

马克思逝世后的12年间，恩格斯毫无争议地成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知识领袖、马克思著作的主要解释者和所有理论争论的最终裁决人。他不仅负责马克思手稿的出版工作，而且还承担出版这些手稿要求的繁重的编辑工作。马克思糟糕的笔迹，使他所有的手稿都达不到适合出版的最终要求。同时，马克思主义刊物的编辑们缠着恩格斯索要文章、政党领导人征求恩格斯对他们各自宣言的看法、接待社会主义者和友好的访客，占用了恩格斯大量的时间，恩格斯不再只是马克思的副手，而是成为（用奥托·亨德森的话来说）“乐团的指挥”。就政治经济学而言，恩格斯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恩格斯和马克思就两个人的知识上的分工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恩格斯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军事和科学事务上，马克思则把精力集中在经济理论方面。到1883年，恩格斯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他自己的主题。正如随后将看到的那样，他似乎接受了新的职责，但这种接受更多的是出于无奈，而不是基于充分的热情。由于马克思自己的拖延，也由于恩格斯作为政治经济学家在能力上的不足，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段中的发展无可避免地极为缓慢。

幸运的是，恩格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1880年，年轻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在伦敦造访恩格斯时，恩格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些日子里，恩格斯刚过完60岁生日，他强健的体魄、敏捷的思维令我们惊讶。这个高大、瘦削的男子，以比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人还快的步伐，迅速地穿过伦敦长长的街道。我们一起散步时，跟上他的脚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马克思只比恩格斯年长两岁，但他看起来却要苍老得多。

恩格斯直到去世前不久，健康状况才开始急剧恶化（尽管他的视力总是容易出问题）。从许多方面看，1883—1895年是恩格斯创作的高产期。他撰写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本较短的哲学专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不少于22篇有关马克思著作的序

言，其中仅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就有5篇，另外还撰写了大量的报刊文章和信件。<sup>[8]</sup>

马克思没有留下任何书面遗嘱，而只是告诉他最年轻的女儿埃莉诺，她和恩格斯是文稿遗嘱执行人。埃莉诺·马克思对深入地编辑她父亲的文稿，似乎既没耐心也缺乏必需的信心，因此，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恩格斯肩上。恩格斯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出版《资本论》余下各卷，而不是以严格的编年顺序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虽然恩格斯时常受到从事后一项工作的诱惑，但他放弃了，认为这是不切合实际的，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一项工作实在太艰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德国的报刊检查员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在当时，完成马克思的“经济学”看起来有着更为直接的政治意义。因此，一开始编辑《资本论》，就占去了恩格斯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1884年的数月里，他每天为此工作8或10个小时，《资本论》第二卷在1885年初出版。<sup>[9]</sup>

副标题为“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资本论》第二卷，开篇就说明资本是如何围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和交换往复循环的。在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为何变得更加容易产生危机时，马克思深入阐述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萨伊定律的批评。在详细说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后，《资本论》第二卷结束于对简单再生产的较长篇幅的讨论和对扩大再生产的相对简单的、不甚完整的分析。虽然两大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不仅代表了一种非凡的智力成就，而且对危机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sup>[10]</sup>但整体而言，《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一卷相比，缺乏广泛的历史分析和深远的理论意义，恩格斯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恩格斯在1885年告诉左尔格：“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而第三卷则又如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sup>[11]</sup>

《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推迟了差不多将近10年，以下我们将要谈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时，恩格斯正在为出版于1890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做准备工作，并编辑了若干较短的马克思的著作。与经济问题有着直接联系的包括《雇佣劳动与资本》（出版于1882年，早于《资本论》第二卷）的小册子，《哲学的贫困》（1885年）德文第一版。1886年，民粹主义者N. F. 丹尼尔逊（通常使用笔名“Nikolai-on”写作）组织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俄文版，这是19世纪结束前唯一的一个俄文版。再后来，英语国家的读者终于可以读到重要的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了。在恩格斯的监督下，1887年爱德华·埃夫林和萨缪尔·摩尔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自1883年开始，《资本论》第一卷的摘

录就开始陆续出现在社会主义杂志《今日》上），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第二版出版。<sup>[12]</sup>

同样重要的是，恩格斯从1885年到他去世这10年间，是他自己理论贡献的时期。早在1840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就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般称为Umriss）对马克思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分工，恩格斯把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留给了马克思，自己集中关注历史、政治、军事问题和自然科学。<sup>[13]</sup>即使是《反杜林论》，这一“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领导人的启蒙著作”<sup>[14]</sup>，也差不多只是对《资本论》第一卷中少数几个核心主题进行诠释。马克思逝世后，解释马克思的经济学，然后把马克思撰写的东西整理成适合于出版的形式，成为恩格斯的主要任务。此外，19世纪60年代早期和中期，资本主义开始发生变化，为《资本论》准备的手稿大多写于这一时期。因此，恩格斯不得不关注马克思未能完成的理论问题，并就当时的主要经济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时隔40年之后，恩格斯不得不再一次成为政治经济学家。

19世纪80年代，现实中的某些方面看起来似乎和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生动描述相抵触。至少在英国，实际工资不是在下降而是在上升，经济危机正在变得相对温和且不再那么频繁，工会开始对劳动力市场的某些方面产生长期的影响。激烈竞争的市场条件正慢慢地受到卡特尔、托拉斯和大型股份公司增长的侵蚀，经济自由主义正在逐渐消失。与此同时，军国主义逐渐兴盛，以牺牲自由贸易为代价的保护关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国家干预到处在滋长。

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家，恩格斯别无选择地对这些发展带来的挑战作出回应。1885年，他首先就工资问题发表看法，回望过去40年，他发现持续的工资增长只发生在两类工人中——工厂工人和大工会会员，后者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对大多数无产阶级来说，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生存保障上，都没有得到改善。这证实了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恩格斯指出：

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sup>[15]</sup>

在随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恩格斯坚持了类似的立场。1891年，他提醒卢约·布伦坦诺，早在19世纪40年代，他与马克思就认识到工厂立法和工会有益于

英国工人阶级，但这两者的影响极为有限。工会只在繁荣时期才比较有效，在停滞和危机时期则常常失去其作用。布伦坦诺声称，停滞和危机会使失业的产业后备军不能发挥作用是“一个可笑的吹嘘”，他严重夸大社会改革的作用。在为1892年出版的英文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序言中，恩格斯承认书中描述的许多对工人虐待的行为已不复存在。“诈骗和偷窃”工人，已不再有利可图，资本家为了节约时间、减少麻烦，遵循“一定标准的商业道德”已成为一种必须。这解释了为什么实物工资制逐渐衰落，为什么限制过长的工作时间在1845年变得如此普遍。雇主对工会的默许，可以基于同样的原因加以解释：社会和谐是资本集中的另一种手段，因为小资本家承担不了工会要求的让步。然而，只有极少数的工人能从这种让步中获益，工资定律使得工人阶级中大多数人的境况像从前一样差。即使是享有更多特权的工人也会发现，他们的境况因英国的垄断地位的丧失而受到威胁，因为他们参与了因英国的垄断地位而获得的收益的分配。英国社会主义的增长就是这一结果。<sup>[16]</sup>

这些公开出版的著作，明显地缺乏自信并不够深刻。恩格斯无法解释，为什么工厂工人成为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称作的“高工资经济”的唯一受益者，他也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说明其鲜明观点，即工会总是少数人的领地。他没有分析马克思描述的劳动力价值中“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对实际工资的意义。虽然有关的理论解释仍然缺乏，但在私人信件中，恩格斯还是显示了较大的灵活性。恩格斯在1891年写给奥本海姆的信中指出，雇主憎恨工会，在萧条来临时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收回对工会的承认。但是工会组织通过棘轮效应，确实增加了实际工资：在每一次随后发生的危机中，工资从来没有低于前一次危机中所达到的最低点。<sup>[17]</sup>在评论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要的《爱尔福特纲领》的最初草案时，恩格斯反对纲领无条件地坚持资本主义制度中无产阶级贫困必然增加的观点。他指出：“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加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种遏制。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没有保障。”<sup>[18]</sup>不久之后，在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批判的过程中，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利用的正是这一点（参见以下第四章）。

恩格斯对当代资本主义重新评价的第二个重大主题，涉及经济危机性质的变化。马克思在1878撰写的被恩格斯用作《资本论》第二卷第20章和第21章基础的手稿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后一次讨论。从这些材料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马克思有关经济波动规律性的观点，并没有因他对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现实体验和他无法（或不愿）提供一个系统的商业周期理论而动摇。恩格斯在对当时的经济事件进行解释时，很大程度上运用的是自己的观点。他在1884年初的一封信中

告诉倍倍尔，至少在英国，马克思分析的10年周期在德国和美国的竞争压力下已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持续的萧条。1885年，恩格斯认为，1876年是转折点，这一年之后，“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的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种持续存在的过度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口，最终将导致大规模危机的爆发。<sup>[19]</sup>

市场疲乏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

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伯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

来自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竞争，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英国的工业产出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其市场只能以算数级数增加。“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sup>[20]</sup>

恩格斯似乎认为这种现象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不需要什么论点或论据去支持它。1892年，他重新回到这一主题时，严重的危机仍然没有成为现实，但他仍充满期待：

1868年以来之所以没有出现危机，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是一个原因。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的、从而欧洲的过剩资本，就以交通工具投资等等的形式分配于全世界，分配于许许多多的投资场所。因此，在铁路、银行等等方面，在纯属美国的投资场所，在印度贸易方面的过分兴盛的投机活动，就使得危机没有可能发生，而同时小的危机却是可能的，例如已历时三年的阿根廷危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特大的危机在酝酿中。

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表的段落，来自恩格斯为新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导言早先准备的草稿中。他放弃了早先坚持的持续萧条的概念，代之以对英国经济状况独特性的详细说明。这两种观点都出现在恩格斯出版的著作中，他描述了5年周期（1825—1842年之间）是如何让位于10年周期（1842—1868年之间），以及如何让位于1885之后的长期萧条出现之前那段不那么容易分类的时期



的。然而，后一时期只适用于英国，这是由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而造成的。在这一文本中，恩格斯没有说明全球资本主义停滞的存在。<sup>[21]</sup>

### 3. 《资本论》第三卷

恩格斯在撰写《资本论》第二卷序言时，对不久之后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充满信心。事实上，恩格斯对洛贝尔图斯及其追随者的挑战，揭开了著名的价值理论“有奖征文竞赛”的序幕（参见以下第二章），恩格斯承诺在几个月后出版《资本论》第三卷。<sup>[22]</sup>然而，恩格斯私下却对迅速出版《资本论》第三卷表示怀疑，他在1884年之后的信件中，充满了大量的对手稿情况的抱怨和对迅速完成《资本论》第三卷工作敷衍式的承诺。比如，1884年8月，他写信告诉伯恩斯坦，除非他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否则《资本论》第三卷将在1885年完成。而到1885年6月，他又告诉左尔格自己誊清的稿子只有一半左右，而且四个月之内还无法开展真正的编辑工作。到1887年时，他实际上只完成了涉及三篇的初步工作。接下来的一年，因为视力的下降，他每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此后，事情再没发生什么改善。“暑假休养后”，他告诉康拉德·施米特，“将加紧完成第三卷”。<sup>[23]</sup>但说这话时，已经是1891年的暑假了。又过去了三年，可付诸印刷的最终工作才完成。《资本论》第三卷最终在1894年11月恩格斯逝世前9个月出版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恩格斯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准备《资本论》第二卷，而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却耗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恩格斯的健康状况在后来的确是恶化了，加之总是存在的“许许多多的工作和大量书信往来”，转移了他本可以放在编辑工作上的精力和时间。他参与了马克思其他著作的再版工作，并完成了他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两部著作。恩格斯所做的工作中，有一些极有价值，其他一些则并非如此。在1890—1891年间，他花费了整整三个月时间撰写了一个由39页的论文、52页的文献、以及一些注释与翻译构成的小册子，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对布伦坦诺的指责进行回应，并为马克思进行辩护，布伦坦诺指责马克思伪造了从当时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来的一句话。<sup>[24]</sup>事实上，恩格斯看起来已经失去了对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最初具有的热情。他激烈地抱怨各种各样使人分心的事——也许可以认为这些烦心事来得正是时候。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探讨了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关系。随后提出了著名的“转形问题”：如果不同

的资本有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但却有相同的剥削率，那么它们就会产生不同的利润率，这与自由竞争是矛盾的。马克思认为均衡价格（马克思称之为“生产价格”）会系统地偏离商品的劳动价值，但总的来看价值规律仍然会发挥作用。既然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所有价值的总和等于所有价格的总和，那么在价格和利润确定下来之前，作为物化劳动数量比率的一般利润率就已经被决定了下来。随后，马克思阐述了一个基本规律，即利润率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趋于下降：不变资本的增长快于可变资本的增长，考虑到只有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那么很有可能总利润的增长要远远慢于总资本的增长（马克思也考虑了一些“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在名为“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这一章中，马克思把利润率下降解释为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sup>[25]</sup>《资本论》第三卷的其余部分，关注了剩余价值在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之间的分配。其中包括论述信用的影响和股份公司的增长的一章，虽然不成体系，但却相当重要。<sup>[26]</sup>

《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比恩格斯最初预想的要艰难得多。虽然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卷准备的手稿数量巨大，存有重复，且缺乏清晰的结构，但是需要更改和修订的地方并不多。“我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总共还不到10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sup>[27]</sup>然而，对《资本论》第三卷的修订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论述信用的部分给恩格斯造成特别的困难，理解这部分内容需要非常熟悉图克和富拉顿的著作，因此需要加入许多解释性的注释。<sup>[28]</sup>恩格斯不得不增加整整一章的内容，论述资本周转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马克思自己没有进行充分分析的技术性问题。恩格斯还不得不纠正马克思对地租的数量分析。<sup>[29]</sup>另外，恩格斯就劳动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问题，增加了他自己撰写的两个长的段落，对马克思逝世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作了综述。<sup>[30]</sup>最重要的是，恩格斯觉得十分有必要撰写一系列脚注和插入语，撰写一个重要的增补，以便更新并扩展马克思对贸易保护、垄断、危机和金融资本等问题的简单和零散的分析。<sup>[31]</sup>莫斯科版《资本论》第三卷总共886页，差不多共有80页是恩格斯的而不是马克思的成果。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增加的内容，加上他在刊物和通信中撰写的相关内容，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恩格斯对转形问题的讨论，将在本书以下第二章和第三章研究。在更具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稳定性问题上，恩格斯并没有追随马克思，后者把利润率下降看作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一个相对较长的脚注里，恩格斯把危机本质的变化与资本积聚和集中采取的新形式联系起来：

我曾在别的地方指出，自上一次大规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转变。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迄今10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营业稍许好转和比较持久的含混不振这两者之间较慢性的和拖延时日的互相交替现象。但这也许只是周期的持续时间拖长了。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5年一个周期；自1847年至1867年，周期显然是10年一次；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有许多征兆好像在预示这一点。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而后退，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英国以外的一切大工业国都用这个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实行而受到限制。但是，这种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sup>[32]</sup>

在这个充满启发意义的段落中，恩格斯把垄断的增长、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现和重大危机的迫近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在几个重要产业中，有时甚至是在世界范围的产业中，卡特尔已经建立。但是由于卡特尔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卡特尔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如果卡特尔崩溃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激烈的竞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资本家越来越趋向于进行合并，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联合制碱托拉斯。<sup>[33]</sup>

恩格斯认为，这些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相对于产业资本的金融资本的崛起。与金融资本崛起相伴的是交易所的作用迅速增大。“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有一种趋势，要把全部生产——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以及全部交往，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土地被转移到金融家的手中，一切国外投资都采取了股份形式，而殖民地，纯粹是交易所的附属物。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法国人征服了突尼斯和东京。非洲已被直接租给各个公司（尼日尔，南非，德属西南非和德属东非）。马绍纳

兰和纳塔尔也为了交易所的利益而被罗德斯占领了。

金融操纵与生产性活动相比，成了更加可靠的利润来源。金融托拉斯的运作特别值得注意，这些新的企业形式代表了“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它们能够以比单纯的市场增长更快的速度扩大生产，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为了避免与国外（尤其是英国）资本家的竞争而坚持保护关税，这只是“人为地提高了本国的生产能力”，从而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sup>[34]</sup>

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保护关税的论述都不多，但在1880年和1888年，恩格斯有两次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分析。在1880年的文章中，恩格斯认为，1873年危机后保护关税的引入，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通过迫使劳动和原材料的成本上升，它将会破坏德国工业所依赖的“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的商品的出口市场。后来，恩格斯对支持保护关税的“幼稚产业”论做出了小小的让步。英国通过武力把自由贸易渗透到世界的其它地区，使这些地区成为“从属的农业区”。没有哪个“大国”能够只处于纯粹的农业状态，虽然与自由贸易相比，保护关税为产业最初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道路，但马克思认为，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的推论是正确的。一旦幼稚产业成熟了，保护关税就应当被废除。在德国、法国和美国，由强大的利益集团推动的保护关税的设立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卡特尔的出现，是“是一种最可靠的标志，表明保护关税制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它保护工厂主，已经不是为了对付外国进口商，而是为了对付国内消费者”。<sup>[35]</sup>

恩格斯在论述贸易保护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一致之处。1888年，在对以正统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自由贸易观点的支持中，恩格斯认为，自由贸易将会使资本主义矛盾得以迅速发展，而他在《资本论》中则主张，隐藏在关税壁垒背后的垄断更容易导致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这也不是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的，保护关税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要表达的明确含义。和下一代人中的布哈林与列宁不同，恩格斯没有把军事冲突看作是经济竞争不可避免的后果。他似乎对殖民地扩张没有多大兴趣，在有关军国主义的著作中，他集中关注的是日益增加的军备开支在财政和政治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意义。恩格斯认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对欧洲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场灾难，而不是一个机会。战争将增强沙文主义的力量，削弱了和平才是其可靠盟友的革命运动。<sup>[36]</sup>在《欧洲能否裁军？》中，恩格斯警告说：

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

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么，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我打算证明，这种改组，在现在，甚至在目前的各国政府和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就已经是可能的。

恩格斯认为，民兵是构成防御常备军的有效组织形式，和平可以通过国际条约来维护。俄国对西欧而言，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军事威胁。这里不存在科布登自由主义者可能反对的内容。事实上，正是约·阿·霍布森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不久以后对恩格斯没有发现的军国主义和经济矛盾之间的联系作了分析。<sup>[37]</sup>

#### 4.对恩格斯贡献的评价

作为编辑者的恩格斯，经常会受到批评，因为人们认为恩格斯把自己根据大量无序的手稿编辑而成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当作马克思本人知识创造的最终成果。这种批评过于苛刻。恩格斯显然十分清楚自己编辑工作的性质和范围，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放在和第一卷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与其说对编辑者还不如说对读者更有意义。到现在为止，只有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尝试根据最初的手稿重新编辑《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在他最近被翻译成英文的一本著作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是必要的。<sup>[38]</sup>

与上述指责相比，过度拖延《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更应该受到批评。事实上，这种拖延不仅影响了价值理论的发展（这种后果将在以下第二章考察），而且在更一般意义上，耽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整十年的发展。此外，恩格斯积极地（最后是成功地）劝阻了康拉德·施米特在马克思观点出现以前，根据自己的兴趣对信用制度和货币市场、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学进行的研究。<sup>[39]</sup>到底有多少青年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研究因为同样的原因被中断，已经无从知晓。但恩格斯拒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上争取外部援助的做法，多少有点令人费解。在伦敦，恩格斯有一个范围广泛、受过良好教育且极具政治修养的朋友圈，况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知识资源也在他控制之下。这可能是因为他，他在编辑工作方面获得外部协助的一次尝试被证明是一场灾难的缘故：在被委托誊写和出版《剩余价值理论》时，卡尔·考茨基比恩格斯更善于拖延。直到1905—1910年，才有一个（难以令人满意的）版本出现。<sup>[40]</sup>很难相信，除了恩格斯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分辨马克思的笔迹，或者说日常的手稿誊写的担子不能从恩格斯的肩上移开。

还有一个比延迟《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更大的问题，就是马克思的大量的著作未能出版。看起来，无论对早期著作还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似乎都不怎么感兴趣。有关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是否构成独特的“恩格斯主义”的争议仍然很激烈。在“恩格斯主义”中，恩格斯的决定论色彩以及在人类历史研究中对自然科学推理方式的应用，和马克思的哲学和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着分离和对抗。<sup>[41]</sup>当然，如果能够及时出版《巴黎手稿》或者《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异化和拜物教概念重要性的忽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sup>[42]</sup>可以想象，恩格斯（直到19世纪80年代）不太赞同马克思具有的人道主义倾向的著述，也许恩格斯是在有意地拖延这些著作的出版。不管怎样，无法及时地看到这些著作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

1883年以后，恩格斯从事的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工作，其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改变了下一代社会主义者对待马克思经济学的方式，无论是从他编辑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还是从他留下来没有出版的马克思著作的角度看，都是如此。其次，恩格斯撰写了论述成熟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命运、不成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价值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本身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除了编辑工作，恩格斯发起了有关价值理论的“有奖征文竞赛”（参见以下第二章），增加了把转形问题视为一个历史现象的分析（参见以下第三章）。更具有一般意义的是，恩格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释了马克思的思想。最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和表现在当时的变化做出了重要的陈述（这里用“断言”会显得有些刻薄），这些陈述的全部意义，在本书以下第四至第六章中会得到详述。

做个事后诸葛亮，我们可以认为，恩格斯的经济学著作存在的缺陷是明显的。他对工资的讨论过于谨慎，同马克思一样没有能够提出一个连贯一致的经济危机理论。事实上，由于忽略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他甚至放弃了马克思危机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线索。在这一点上，在1929年以前，差不多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追随了恩格斯（参见以下第十六章）。恩格斯没有正式研究过垄断对价格和利润率的影响问题，没有认真地分析（相对于描述）金融资本。没有提出任何接近于帝国主义理论的东西，他有关军国主义的著作令人惊讶地缺乏远见。最后，我们将在本书以下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看到，恩格斯对转形问题的说明，完全无法纠正《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解决方法中的缺陷，甚至在某些方面增添了新的混乱。即便如此，恩格斯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巨大的。他处理了许多马克思可以避免但他自己却无法回避的棘手的难题。在这样做时，他也为他逝世后二十多年间德国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争论设定了议题。

---

## 第一章注释：

[1] E.J. Hobsbawm, 'The Fortunes of Marx's and Engels's Writings', in Hobsbawm (e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Volume I: Marxism in Marx's day* (Hassocks: Harvester, 1982) pp. 327-44; M. Rubel. *Bibliographic des Oeuvres de Karl Marx avec en Appendice un Répertoire des Oeuvres de Friedrich Engels* (Paris: Rivière, 1956); A. Rexis, "Das Kapital Comes to Russia", *Slavic Review*, 29, 1970, pp. 219-37.

[2] J. Braunthal, *In Search of the Millenium* (London: Gollancz, 1945) pp. 80-1, G. Deville, *Résumés du Capital de Karl Marx, Accompagné d'un Aperçu sur le Socialism Scientifique* (Paris: Priol, 1883) K. Kautsky, *the economic doctrines of Karl Marx* (London: Black, 1925; first German edition 1887); E. Aveling, *The Student's Marx: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Karl Marx's Capital*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1892).

[3] K. Willis, 'The Introduction and Critical Reception of Marxist Thought in Britain, 1850-1900', *Historical Journal*, 20, 1977, pp. 417-5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7-38、46页。

[5] E.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pp. 140-53; R. Rowthorn, 'Marx's Theory of Wages' in Rowthorn, *Capitalism, Conflict and Inflati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0) pp. 182-230.

[6] 参见A. Brewer, *A Guide to Marx's Capi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其中逐章对三卷《资本论》的内容作了精彩的概括。

[7] 有关《资本论》的各种写作计划和最终出版的著作之间的结构上的论述, 参见M. C. Howard and J. E.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 2nd edn, pp. 54-9; A. Oakley. *The Making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a Bibliograph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ch.5; R.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 Pluto, 1977); and M. Rubel, 'A History of Marx's "Economies"' and *The Plan and Method of the "Economics"*, in J. O'Malley and K. Algozin (eds): *Rubel on Karl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82-229.

[8] W. O. Henderson, *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Cass, 1976) Vol. II, p. 657; E.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London: Parsons, 1921) pp. 153-6; M. Kliem, H. Merbach and R. Sperr (eds) *Marx Engels verzeichnis: Werke, Schriften, Artikel* (Berlin: Dietz, 1966) pp. 174-201

[9] Rubel, 'A History', in O' Malley and Algozin, *Rubel on Karl Marx*, p. 177; Rubel, *Bibliographie*, pp. 24-5; Henderson, *Life of Engels*, p. 659. Bismarck's anti-Socialist laws, Introduced in 1878, remained in force until 1890.

[10] 特别参见《资本论》第二卷,第20章第4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458页。

[1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5年6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页。

[12] Hobsbawm, 'The Fortunes of Marx's and Engels's Writings', pp. 329-30; Rexis, 'Das Kapital Comes to Russia'; Willis. "Introduction and critical Reception of Marxist Thought", pp. 420-1.

[13] G. Claeys "Engels's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3)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arxist Critique of Capitalism',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6, 1984, pp. 207-32; Mandel,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ch. 1-3; T. Carver, *Marx and Engels: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righton: Wheatsheaf, 1983) p. 48; D. McLellan, *Engels* (Hassocks: Harvester, 1977) pp. 22-4.

[14] G. Stedman Jones, 'Engels an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in Hobsbawm (ed.) *History of Marxism*, vol. I, p. 293.

[15] 恩格斯:《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9页。不那么教条的陈述,可参见恩格斯:《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99-303页。

[16] 《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7-213页。

[17] T. Brassey, *Work and Wages Practically Illustrated* (London: Bell & Daldy, 1872); K. Marx, *Capital*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61) vol. 1, p. 171 (ch. VI:《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由于不同版本页码之间差异很大,对于参考《资本论》的地方,除了给出页码,我们给出了章节和可以应用的细节

---

1、建议不很熟悉转形问题的读者,可以先读第三章,然后再来读这一章。



所在的位置；Engels to Oppenheim, 24 March 1891, in Letters on 'Capital', pp.255-6. 《恩格斯致麦克斯·奥本海姆（1891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页。

[18]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页。H.Heimann, 'Die Aktualität Eduard Bernsteins', in E. Bernstein, Texte Zum Revisionismus (Bonn-Bao Godesberg: Verlag Neue Gesellschaft, 1977) pp.10, 18.

[1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4年1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0页；恩格斯：《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9页；《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5页；《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85年11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页。

[20] 恩格斯：《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30页；《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5页。

[21] 恩格斯：《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个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4-385页。

[22]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2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84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4页；《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5年6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535页；《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5年6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6页；《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87年1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04页；《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88年1月5日、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8、103页；《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1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5页。对于《全集》的这一卷，我们偶尔参考我们自己对信件的翻译。最初的德文版本是K. Marx, F. Engels, Briefe Über Das Kapital (Berlin: Dietz, 1954)。

[24] 《恩格斯致麦克斯·奥本海姆（1891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页。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5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296页。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7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3-500页。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28]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89年7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4页;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25、26、28、33、34、35章及《资本论》第三册增补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9] 论“资本周转”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4、8章;论“地租”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42、43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0]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版出版以后完成的增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6页;第1006-1027页。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6章注释16;第27章、后来的增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第1028-1030页、第493-500页。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0章注释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6-497页;第136页注释16,第1028-1030页;第493-500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559页。(来自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很可能是由他修订《反杜林论》中的摘录)。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8、1030、496页。

[35] 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1-194页;《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1888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7页。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前文已经引用过的注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4页。N. Levine, *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els* (Oxford: Clio Books, 1975) pp.206-7.

[37] 《欧洲能否裁军?》,写于1893年,以德文出版于1895年,英文版参见Henderson, *op. cit.*, vol.11, pp.810-32, the cited passage coming from p. 810. On Hobson see J. Allett, *New Liber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 A. Hob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1)ch.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5页。

[38] Oakley, *Making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ch. 6.

[39]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1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5页

[40] Rubel, *Bibliographie*, pp.25-8;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K. Marx, *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3) vol. I, pp. 20-4; cf. Oakley, *Making*, pp. 124-5.

[41] 卡弗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辩护Carver, *Marx and Engels*,尤其是莱文Levine *Tragic Deception*; 相反的观点参见Stedman Jones, 'Engels an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42] 例如, 参见Kautsky, *Economic Doctrines*, 其中包含一个简短但不怎么有启发性的对拜物教的讨论, 完全没有涉及异化问题。cf, G. Haupt, 'Marx and Marxism', in Hobsbawm, *History of Marxism*, especially, pp.272-82.

## 第二章 恩格斯和价值理论“有奖征文竞赛”

### 1.引言

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在对洛贝尔图斯的驳斥中，对马克思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洛贝尔图斯认为马克思从他那里剽窃了剩余价值理论。这种有关马克思剽窃的指责，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没有中断，主要是由洛贝尔图斯和他的学生鲁·迈耶尔做出的。<sup>[1]</sup>对这种观点进行驳斥成了一件紧迫的事情，19世纪8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主导地位（尽管从来都不特别稳固）受到迈耶尔领导的强大的“洛贝尔图斯运动”的攻击，这种运动对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这种运动威胁并引诱党采取与俾斯麦政府相妥协的政策，这正像拉萨尔早先做过的那样。<sup>[2]</sup>恩格斯的门徒卡尔·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和C.A.施拉姆进行的争论，把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拯救了出来，恩格斯和考茨基的通信则满是对洛贝尔图斯阴谋的讨论。<sup>[3]</sup>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公开捍卫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恩格斯指出，在1859年前后，马克思在差不多已经完全形成自己观点时，还从来没有读过洛贝尔图斯的著作。<sup>[4]</sup>其次，有关剩余价值的见解，在早期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早已存在，正是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的思想从模糊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只是这一点不为洛贝尔图斯所知而已。<sup>[5]</sup>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马克思的分析在逻辑上优于洛贝尔图斯，这在于：

按照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价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么，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如李嘉图学派所说的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因此，这就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李嘉图已经发现了这个矛盾，但是他的学派同样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洛贝尔图斯也不能不看到这个矛盾，但是他不解决它，却把它作为他的乌托邦的出发点之一（《认识》第131页）。马克思在《批判》手稿中，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按照《资本论》的计

划，这个问题要在第三册来解决。第三册的出版，还要过几个月。因此，那些想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马克思的秘密源泉和把洛贝尔图斯看作马克思的一个卓越先驱者的经济学家们，在这里有机会可以表明，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如果他们能够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那么，我们就愿意同他们继续谈下去。不过他们最好是快一点。这个第二册的卓越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仅仅是第三册的内容的引言，而第三册，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最终结论。等到这个第三册出版的时候，洛贝尔图斯这个经济学家，就用不着再提了。<sup>[6]</sup>

为了应对洛贝尔图斯的挑战，恩格斯发起了著名的价值理论“有奖征文竞赛”。恩格斯承诺，他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肯定将对这个问题的有关争论作出总结。<sup>[7]</sup>然而，第三卷的出版，被推迟了将近十年，而不是最初预想的几个月（参见以上第一章第2节）。因此，一直持续到1894年的竞赛，吸引了来自不同流派的参赛者。虽然罗纳德·米克在1978年去世前不久对他们进行了分析<sup>8</sup>，但是最初的参赛作品很少被详细研究过。

## 2. 竞赛的性质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竞赛的参与者只有少量的马克思的著作可供利用。《资本论》第三卷表明，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使得个别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它所获得的利润之间发生了系统的偏离，从而商品的劳动价值和它们的长期均衡价格（或“生产价格”）之间也发生了系统的偏离。马克思声称，尽管如此，总利润还是等于总剩余价值，并由总剩余价值决定，价格的总和还是等于劳动价值的总和。产业资本有机构成的大小，和生产价格与劳动价值两者之间差额（负的、零或正的），以及资本家的利润和他们的剩余价值之间的差额，存在着明确的正相关关系（参见以下第三章）。<sup>[9]</sup>我们现在知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了一般利润率的问题，并指出根据资本量的大小，剩余价值存在从一个资本家向另一个资本家转移的必要。我们还知道，马克思在1862年同恩格斯的通信中，在后来被作为《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册出版的手稿中，他通过“生产价格”的概念和生产价格对劳动价值的偏离，第一次全面地阐述了他的解决方法。<sup>[10]</sup>但是，上面提到的文献，没有一个是世纪之交前出

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迟至1913年才能看到，《剩余价值学说史》出版于1905—1910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直到1939年才出版（而且直到1953年才开始被广泛使用）。<sup>[11]</sup>

马克思论述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著作中，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前两卷，可供有奖征文竞赛的参赛者利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于1859年，然后长期脱销，该著作简短地提及了价值、交换价值和市场价格之间差异：

商品的市场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低于或高于它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实际上，在这种奇怪的结论中不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与交换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是如何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更正确地说，交换价值规律如何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实现。这个问题将在竞争理论中解决。<sup>[12]</sup>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说明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生产价格是如何不同于劳动价值的，暂时性的过度供给或过度需求的存在，又如何使得生产价格区别于短期市场价格的。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这两种差别明显地被混为一谈，这表明马克思自己还未能清晰、系统地阐述转形问题，更不要说找到转形问题的解决方法了。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说明。在第四章论述资本“总公式的矛盾”的一个脚注中，马克思注意到，价值理论预先假定了等价物的交换，从而“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像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sup>13</sup>在第九章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马克思把几个不那么严密的结论结合在一起，说明剩余价值量是如何由剥削率和使用的可变资本量决定的：

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每个人都知道，就所使用的总资本两个部分各占的百分比来说，纺纱厂主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变资本较多，不变资本较少，但前者获得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并不因此就比后者少。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就像从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0/0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

项一样。尽管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表述过这一规律，但是它却本能地坚持这一规律，因为这个规律是价值规律本身的必然结果。古典经济学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法把这个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拯救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李嘉图学派是怎样被这块拦路石绊倒的。“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的庸俗经济学，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各处一样，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它与斯宾诺莎相反，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论据”。

在一个脚注中，马克思提醒读者“详见第四册”（即《剩余价值理论》）。<sup>[14]</sup>

上述三个段落，就是1894年之前公众能够看到的马克思著作中论述转形问题的全部内容。恩格斯用于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对这个问题只字不提，而且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编辑完成之前，坚决拒绝透露马克思对这个问题分析的细节，无论是对直接要求看到相关分析的康拉德·施米特，还是对明显可以从相关内容中受益的N.F.丹尼尔逊都一样。施米特写信告诉恩格斯，无论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还是外部，对这个问题的兴趣都在逐渐增加，并且建议在《新时代》上预先发表《资本论》第三卷的有关章节：“我想，它将对（社会主义）初学者产生良好的影响，并可以让越来越放肆的教授们闭上嘴巴”。<sup>15</sup>恩格斯明确地拒绝了这一请求，“单独刊印关于利润率的那一篇，而不得其余各篇，当然不行。您知道，马克思的东西都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从中单独抽出来”。<sup>[16]</sup>这是不折不扣的回避，假如这是一贯的观点，那么除了作为最终完成的马克思全集的组成部分外，没有任何一部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出版，进一步说，恩格斯就资本主义不同现实频繁发表的声明，也是不能被允许的。

他对丹尼尔逊（使用笔名Nikolai-on写作的民粹派经济学家）——一个受尊敬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和恩格斯的定期通信人——的做法同样是一种回避：“您第一封信里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断非常有意思，并且毫无疑问，对于统计材料的分类很有价值”，恩格斯告诉他：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作者用来解决问题的途径。您的公式的前提似乎是每个企业主都得到从生产过程中攫取的全部剩余价值。但是，在这种前提下，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就不能存在，因为它们不会产生任何利润。可见，企业主的利润不可能是他们从自己工人身上榨取的全部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您的公式可能对于在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的条件地大概地计算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各种资本的构成是有用的。我说可能，是因为我现在手头

没有材料能够让我检验您所推断的理论公式。<sup>[17]</sup>

我们还无法找到丹尼尔逊的信，它不在阿姆斯特丹，也不在东柏林的档案馆里。丹尼尔逊似乎是向恩格斯发起的竞赛提供了自己的参赛作品。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从恩格斯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恩格斯是在故意设置障碍吗？如果是，那又是为什么呢？或者是他真的忘记了马克思在1862年给他的信中告诉他的解决方法的要点吗？可能是直到1888年，恩格斯还没有开始处理《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转形问题的文稿，就我们所知，恩格斯从来没有完全掌握《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相对稳妥的结论：在解决转形问题上，没有哪一个征文竞赛的参与者（甚至包括值得信任的同志）从恩格斯那里得到过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 3.第一回合：莱克西斯、施米特和斯蒂贝林

第一个参赛作品，是由德国著名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威·莱克西斯<sup>18</sup>在1885年评论《资本论》第二卷过程中提出来的。<sup>[19]</sup>莱克西斯指出，他已经批评了洛贝尔图斯无法解决的一个矛盾，即在存在均等利润率的经济中，“李嘉图—马克思价值规律和实际价格形成”之间的矛盾。无论《资本论》第三卷是什么样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允许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存在偏离，而且这种偏离，是以剩余价值从使用相对较大数量劳动力的资本家向使用较少数量劳动力的资本家转移的方式完成的：

对我们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点是，当两个生产者交换既定数量的不同商品时，作为资本利润的（也就是利润率）均等的结果，一个生产者从交换中得到劳动数量和另一个生产者从交换中失去的一样多……但是由于在资本家阶级内部所得和所失的相互抵消，如果所有的价格和商品的真正价值成比例，剩余价值总量将保持不变。<sup>[20]</sup>

莱克西斯以这样的方式，专门论述了价格和价值之间存在的系统的偏离，以及这种偏离和不同产业中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联系；总剩余价值和总利润之间相等。即使只是暗示，马克思解决转形问题方法的基础，已经出现在莱克西斯早期对转形问题简短的讨论中了。<sup>[21]</sup>



下一个参赛者是积极的社会民主党人康拉德·施米特，他放弃了早期对洛贝尔图斯的热情，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激进的一翼，19世纪90年代后期最终成为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康德主义的支持者，1908—1930年间是修正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的社会科学编辑。<sup>[22]</sup> 19世纪80年代后期，施米特还是一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参赛作品出版于1889年，实际上是他的博士论文。<sup>[23]</sup> 写作这篇论文（承受了来自父母的一些压力），是为了尽力获得大学的教职，最后由于政治原因在波恩、霍尔和莱比锡遭到粗暴拒绝后，最终在苏黎世谋得教职。<sup>[24]</sup> 从施米特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无论是在论文写作还是在著作出版中，施米特绝对没有得到恩格斯提供的任何帮助。事实上，恩格斯后来非常愤怒地否认，他曾经秘密地告诉过施米特关于马克思的解决方法。<sup>[25]</sup> 施米特著作在内容方面的瑕疵、令人畏惧的晦涩文风，使得恩格斯的否定更加可信。

施米特从把总产品分为两个部分开始：一部分是生产所需的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代表的产品；另一部分是剩余产品。关键问题是确定剩余产品的出售价格。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使每个资本家剩余产品的价格必然和预付资本成比例，从而价格必然不等于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数量。施米特认为，这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矛盾。只有社会必要劳动创造价值，剩余产品中的物化劳动不是社会必要劳动，从而它无法决定商品的价值。<sup>[26]</sup> 这种出发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既误解了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概念，也混淆了价值和价格。没有证据显示马克思把奢侈品和积累品的生产看作是非生产性活动，但马克思十分明确地坚持剩余产品的劳动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区分。施米特注定要遭到两个方面的批评，既有来自恩格斯的批评，也有来自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后者包括施米特在苏黎世大学的系主任尤里乌斯·沃尔弗。<sup>[27]</sup>

和恩格斯不同，沃尔弗开始时似乎不太关注这个问题。从对施米特的批评来看，沃尔弗对施米特著作的阅读不会超过开头的20页。在一时偏离主题后，施米特确实重新回到了这个问题上，并以更具辩护性的方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先，他把平均利润率定义为：

$$\frac{\sum m}{\sum (c+v)}$$

$\sum m$ 是总剩余价值， $\sum (c+v)$ 代表使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总和。然后，施米特说明，个别资本家获得的利润，是由一般利润率和他使用的资本总量的乘积决定的。可以被写为：

$$\frac{\sum^m}{\sum(c+v)}(c+v)$$

这确定了剩余产品的交换价值，从而也确定了它的价格，即用货币形式表示的交换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格是以不同的方式确定下来的，尽管施米特认为它们各自的价格等于物化在它们中的劳动。<sup>[28]</sup>

施米特用一个数字例子说明了他的观点。假定生产了100单位的商品，其中50单位代表资本家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上的支出，其余的50单位是剩余产品。第一部分的价值（用黄金表示）是500英镑，或者每单位产品10英镑。施米特进一步假定，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是400英镑（这意味着平均周转期不足一年），平均利润率为20%。从而资本家的利润为400英镑的20%，即80英镑。这也是代表剩余产品的50单位商品的价格；从而每单位剩余产品的价格为1.60英镑。全部产品售出时得到 $(500+80)=580$ 英镑，小于其价值 $(100 \times 10=1000)$ 英镑，同样的，每单位商品的价格（5.80英镑）小于单位商品的价值（10英镑）。<sup>[29]</sup>然而，“一旦考虑到年度总产出——所有个别商品的总和”，这种偏离就“消失了”。施米特声称，构成产出的第一部分产品的价格和价值是相同的，它们代表了资本家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上的支出。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也相等。施米特坚持认为，从总量上看，所有商品的价格之和等于它们的价值之和。<sup>[30]</sup>施米特通过对两个反对他观点的见解的反驳结束了讨论。个别资本家没有意识到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从而无法用它去决定自己产品的价格，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竞争是以“一种纯粹机械和无意识的方式”决定了利润率的相等。施米特声称，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投入是以均衡价格而不是以它们的劳动价值被出售的，来反对他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合理的。从总量上看，它们总是相等的：“从而，总预付资本的价格必然等于它的价值。上面提到的两种反对意见，是不合理的，因为无论总预付资本，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商品资本的形式加以考察，利润率水平 $\frac{\sum^m}{\sum(c+v)}$ 总是保持不变的”。<sup>[31]</sup>

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充满混乱和洞见的结合物。无论是在为物质上相同的同类商品赋予不同的价格（在他的数字例子中）上，还是在孤立地分析一个产业、凭空得出一般利润率上，施米特的观点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事实上，到1892年，他放弃了他著作中的基本原理。<sup>[32]</sup>但是，他的转形问题解决方法，是独立于他之前的错误主张的（他并没有明确放弃），即物化在剩余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施米特的解决方法中，包含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提供的解决方法中的三个核心要素。首先，施米特认为个别资本家的利

润，由他所使用的资本和一般利润率的乘积决定；其次，施米特认为，总价格和总价值、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是相等的；最后，施米特似乎主张（尽管不是很清晰），价值量在计算一般利润率时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无法像把产出的价值转化为价格那样把投入品的价值转化为价格，成为施米特的主要错误，在这一点上他和马克思是相同的。<sup>[33]</sup>

对施米特作出最大量批评的是乔治·C.斯蒂贝林，他是纽约的一位医生，1890—1894年他出版了三本论述转形问题的小册子。<sup>[34]</sup>斯蒂贝林经常为德国（他的祖国）的社会主义报刊撰稿，<sup>[35]</sup>他的著述除了有些古怪的创意之外，还是很真诚的。斯蒂贝林认为，有机构成不同的等量资本，无法产生等量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有机构成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从而剥削率也就越高。通过剥削率的非均等化，不同的有机构成，可以带来平均的利润率。<sup>[36]</sup>随后，斯蒂贝林对自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第一个系统地使用统计资料研究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人，他用了1880年美国生产普查数据说明有机构成高的产业具有较高的剥削率，反过来也是成立的。他用了两个有相同利润率（约9%）的产业作为例子：有机构成为6.53、剥削率为0.58的粗盐业，有机构成为1.56、剥削率为0.14的造船业。接下来，斯蒂贝林按照有机构成（定义为总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的大小，对全部29个产业进行排序，并把它们分为两组。前14个产业的平均有机构成为5.50，平均剥削率为1.38，平均利润率为25.1%；后15个产业的相关数据分别为2.58、0.57和22.1%。<sup>[37]</sup>斯蒂贝林分析中存在的明显问题是，只有价格的数量而没有价值的数量。在这里，斯蒂贝林潜在地假设个别商品的价格和价值的相等，正是这个潜在的假设表明，斯蒂贝林对整个转形问题存在着根本性的误解。根据他的定义，他对均衡情况的计算是正确的：斯蒂贝林没有解决转形问题，而是取消了这个问题。

#### 4.第二回合：沃尔弗、洛里亚、弗里曼和莱尔

尽管尤里乌斯·沃尔弗并不了解斯蒂贝林的工作，但他却作出了与斯蒂贝林极为相似的论证。<sup>[38]</sup>沃尔弗是在苏黎世大学讲授卡尔·门格尔边际效用理论的经济学教授。1891，他反对康拉德·施米特到系里任教的意见，在全体教员会议上被否定了，三年后他复仇成功，不过这次他反对的是对施米特的解雇。“你可能已经听说过这个家伙”，施米特告诉恩格斯，“除了其它事情，他发现了危机带给工人的好处——危机把价格降了下来。他还不到30岁，一个奥地利犹太人，

他行为举止中普鲁士后备军官般的沉着冷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up>[39]</sup>

沃尔弗首先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是齐头并进的。商品(包括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是负相关的,剩余价值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因此,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根据马克思自己的理论,甚至是用马克思自己的话:不变资本的增加预先假定了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剩余价值的增长和总资本中不变资本份额的扩大之间存在的直接联系出现了,因为生产率的提高引起了(通过使工人的生活资料变得更加便宜)剩余价值的增加。<sup>[40]</sup>

沃尔弗的数字例子见表2.1中。在表中,资本II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劳动生产率较高,剩余价值更多,剥削率也较高,并和资本I有着相同的利润率,对它们来说,相反的情况也一样。商品的价值仍然取决于物化在它们中的劳动数量。沃尔弗认为“价值规律并没有被破坏”,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

“恰恰相反,它(解决方法)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据,证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体系,是深刻且富有远见的”<sup>[41]</sup>沃尔弗的结论声称整个问题是个伪命题,这一混乱部分地是由恩格斯造成的,恩格斯试图使先前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都无效,并(沃尔弗隐晦地暗示)推迟了《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sup>[42]</sup>无论如何,和斯蒂贝林一样,沃尔弗是回避而不是解决这个问题。

表2.1 沃尔弗的数字例子

	不变 资本 (c)	可变 资本 (v)	剩余 价值 (s)	总价值 (c+v+s)	剥削率 ( $\frac{s}{v}$ ) %	利润率 ( $\frac{s}{c+v}$ ) %
资本I	5	5	1	11	20	10
资本II	10	5	1.5	16.5	20	10

来源:沃尔弗,‘Das Rätsel der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bei Marx’,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57, 1891, 第358页。

意大利学者阿基尔·洛里亚<sup>[43]</sup>的参赛作品缺乏实质性内容,关注他只是因为恩格斯对他作出了尖刻的回应。<sup>[44]</sup>1884年,洛里亚把利润率相等和有机构成不等之间无法解决的矛盾,视为整个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重大缺陷。<sup>[45]</sup>但是,到了1890

年，在对施米特的著作进行评论时，他提出了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打算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表2.2对洛里亚的解决方法作了概括。三个产业资本家（A、B和C）有着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相同的剥削率，在不存在非产业资本介入的情况下，他们将有不同的利润率。存在借贷资本家时，他们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支付货币资本家D的利息。自己留下的产业利润与他们使用的资本量成比例。从而形成了统一的产业利润率，而且这个利润率和货币资本家D的利润率相同。<sup>[46]</sup>洛里亚没有对他奇怪的假设进行任何合理的说明，这个假设认为产业资本家A、B、C支付的利息反过来和他们使用的资本数量成比例。正如恩格斯在他的批评中提到的，通过把资本家D看作是索取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的地主，而不是索取利息的货币资本家，也许可以从洛里亚的例子中挽救出某些有用的内容。<sup>[47]</sup>但是，这并不是洛里亚的观点，从洛里亚的例子中不可能得到一个一般性的解决方法，因为在没有地租支付的情况下它就不适用了。

表2.2 洛里亚的数字例子

	不变 资本 (c)	可变 资本 (v)	剩余 价值 (s)	总资本 (c+v)	$(s/c+v)\%$	利息 支出	产业 利润	产业利 润率 (%)	货币资本家 的利润率 (%)
资本家 A	0	50	50	50	100	40	10	20	
资本家 B	100	50	50	150	$33\frac{1}{3}$	20	30	20	
资本家 C	200	50	50	250	20	0	50	20	
加总	300	150	150	450		60	90		
资本家 D				300		60			20

来源：Loria, Review of Schmidt,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in Conrads Jahrbücher, 20,1980,第274页。

更有意义的贡献来自彼·法尔曼，施米特称其为“优秀的小伙子、移居美国的俄国犹太人、职业化学家”。<sup>[48]</sup>和许多同时代的俄国人一样，法尔曼受到李嘉图理论的强烈影响。他区分了商品价格中的两个因素：由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

数量决定的商品价值的“构成因素”，以及代表资本家和地主对产品份额索取权的“分配因素”。法尔曼主张，由于社会财富是由人们生产的商品中所包含的人类劳动的总量构成的，因此，总的来说，价值必须等于价格：“两种商品相交换时，一种商品的价格高于它的价值的大小，必然等于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的大小，反之亦然”<sup>[49]</sup>，价格和价值之间差异的产生是分配因素造成的。法尔曼驳斥了施米特的解决方法，认为施米特的方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施米特的解决方法拒绝把价值规律应用于剩余产品。他也反对沃尔弗的结论，因为沃尔弗认为价值量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这和马克思的观点是矛盾的。法尔曼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每个部门的价格、价值和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关系：

如果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怎么能够认为在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工人数量的同时，利润量似乎是独立于工人的数量的呢？仅仅因为投资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和投资在工资上的资本之间的比率（或者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不变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 $c:v$ ）最大的产业部门，其商品以高于它们价值的价格出售，这意味着，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最小的产业部门，其商品以低于它们价值的价格出售， $c:v$ 的大小代表着明确的平均水平时，商品才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出售。

这同价值规律并不矛盾，因为总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个别商品的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差异只是竞争引起的波动造成的。“但是在严密的科学中，人们从来不把可精确计算的波动理解为对规律的否定”。<sup>[50]</sup>

最初，施米特并没有对法尔曼的贡献有什么深刻印象，他认为法尔曼的分析只是不必要地削弱了价值规律：“Le roi règne, mais ne gouverne pas”。恩格斯对法尔曼的工作较为赞许。在同恩格斯通信后，施米特对法尔曼的批评也变得较为温和了，但他仍然否认这个俄国人在莱克西斯的开创性工作之外，做出过什么新的贡献。<sup>[51]</sup>对这种评价，还是要做一些说明。法尔曼通过强调总价格和总价值相等（莱克西斯强调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相等）对莱克西斯的工作做出了补充，但是他对于有机构成与价格和价值之间偏离关系的分析更为严密一些。和莱克西斯不同，法尔曼用一个简单的数字例子讨论转形问题，同时对自己的解决方法进行了一般化处理，以使之能够包含地租和利润的支付，<sup>[52]</sup>但是这两点并没有被很好地加以展开，法尔曼对利润率和所用资本关系的分析，表现得并不比施米特更好。

有奖征文竞赛的最后两位参与者，逃过了恩格斯和时常保持警惕的施米特的注意。米尔普福特·沃尔夫冈是最后两位参赛者之一，下一章将对他进行介

绍，因为沃尔夫冈的贡献出现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的1895年。另一位参赛者是慕尼黑的教授莱尔博士，莱尔在1886年写了一篇批判《资本论》第一卷的长文。<sup>[53]</sup>六年后他转向了对《资本论》第三卷的前景的关注。<sup>[54]</sup>莱尔驳斥了施米特的分析，认为它不仅存在矛盾，而且令人困惑；他也反对沃尔弗的观点。沃尔弗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生产率不同的劳动创造出不同的价值。莱尔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是他对转形问题的代数表述，这些代数表达式预见到了后来德米特里耶夫和（尤其是）博特凯维兹的数学分析。他用  $k_1, k_2, \dots$  和  $v_1, v_2, \dots$  分别表示产业 1, 2, ... 中使用的不变和可变资本的价值，用  $m_1, m_2, \dots$  表示剩余价值。对整个经济而言，相应的加总分别为  $K, V$  和  $M$ ，他采用了和马克思相同的立场，用  $M/(K+V)=r$  表示平均利润率。“各单位商品的交换价值”用  $t_1, t_2, \dots$  表示（这事实上等同于博特凯维兹的价格—价值比率，即生产价格和劳动价值的比率）。

然后，莱尔写下了下列等式：

$$m_1 + m_2 + m_3 + \dots = M \quad (2.1)$$

$$t_1 m_1 + t_2 m_2 + t_3 m_3 + \dots = M \quad (2.2)$$

$$k_1 + v_1 + k_2 + v_2 + k_3 + v_3 + \dots = K + V \quad (2.3)$$

$$(k_1 + v_1)r = t_1 m_1 \quad (2.4)$$

$$(k_2 + v_2)r = t_2 m_2 \text{ 等等}$$

$$(k_1 + v_1 + m_1) = (k_1 + v_1)(1+r) \quad (2.5)$$

$$(k_2 + v_2 + m_2) = (k_2 + v_2)(1+r) \text{ 等等}$$

等式 (2.1) 和 (2.2) 一起表示总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等式 (2.3) 纯粹是定义性的，而等式 (2.4) 和 (2.5) 是试图把每个部门的剩余价值同利润，价值同生产价格联系起来的不成功的尝试。因为它们假定在单个部门内部，价值量和价格量是相等的，这样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然而，虽然莱尔没有明确说明，但他实际上通过方程 (2.2) 和 (2.5) 设定了一个有  $n+1$  个方程和  $n+1$  个未知数 ( $t_1, t_2, t_3, \dots$  和  $r$ ) 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约束条件和内生变量的数目是相同的。这和博特凯维兹的方法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sup>[55]</sup>事实上，莱尔唯一直接的推论是

$$t_1 = t_2 = t_3 = \dots = t_n = 1$$

这个等式，只有在所有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相同的情况下才成立。莱尔再次没有能够说明马克思的原理，即  $t_i$  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单位值，因为不同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可能超过或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资本有机构成，但是莱尔的确提供

了一个隐晦地表达了这种观点的算术例子。<sup>[56]</sup>

令人惊讶的是，莱尔没有把他的分析继续推向深入。假如他尝试解出了 $t_i$ 和 $r$ ，他就会明白，他的方程错误地设定了价值量和价格—利润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将提醒他在方法上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进。那么，他就将更加接近博特凯维兹的解决方法。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他缺乏必要的数学能力。但我们猜测，更重要的可能是他缺乏一种动机。作为一个自称为“庸俗经济学家”的学者，莱尔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十分认同，不大可能有太多的热情为马克思主要的分析性问题作出解答（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做了）。<sup>[57]</sup>莱尔的文章充满了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其中的一些内容有着强烈的现代说法。莱尔反对只有在不存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历史的物化劳动和实际的必要劳动才相等的观点，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技术进步降低了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投入。可供选择的其它生产方法的存在（比如使用肥力存在差异的土地）使得“必要劳动”的定义变得含糊不清；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就维护人类生存的体系而言，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必须的，因此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视角看，所有劳动都是必要的，不存在什么剩余劳动。<sup>[58]</sup>这些观点中，没有任何一个和转形问题直接相关，但它们的含义远远超过了当代新古典主义对马克思的批判，<sup>[59]</sup>并且他很早就预见到那些在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出版后才出现的思考。<sup>[60]</sup>很明显，莱尔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原创性的马克思理论的批判者，恩格斯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他的忽视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 5. 恩格斯的裁决

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三卷撰写的序言中，用较大的篇幅对参赛者进行了评价。虽然他没有颁发奖品，但是对莱克西斯、施米特和法尔曼进行了赞扬。莱克西斯是“一个伪装成庸俗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看到”，恩格斯对莱克西斯的文章评论道，“问题在这里远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已经含糊地、肤浅地，然而大体上正确地被提出来了”。恩格斯认为，这已经是可能从莱克西斯那样背景的人那里得到的最多的东西了。法尔曼“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关键”，恩格斯说，“但是，他这篇如此重要的论文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冷遇却证明，……仍然需要有许多中间环节，才能完全地、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至于施米特，他是第一个真正试图解决（与叙述相对）这一问题的人，但是他没有成功；认为剩余产品价格的决定区别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格的决定，事实上等于



抛弃了价值理论。施米特发表在《新时代》上的论文同样是错误的。在恩格斯看来，施米特的真正成就是他分析利润率下降趋势、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内容。<sup>[61]</sup>

另外三个参赛者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恩格斯看来，沃尔弗只是愚弄了他自己。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有上百处，说的正是和沃尔弗“解决方法”的基础相反的话。“说什么马克思认为在可变资本减少时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不变资本的增加成正比，而这个断言令人如此吃惊，足以使一切议会辞令相形见绌”。沃尔弗同样大胆地宣称施米特的著作受到恩格斯的直接怂恿，从而在有奖征文竞赛中，给了施米特一种对其他人而言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像我们已注意到的，这的确不是事实。阿基尔·洛里亚的分析也好不到哪里，他断言商业资本具有“一种魔力，能够在一般利润率确立之前，就把超过一般利润率的全部超额剩余价值吸取过来，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地租，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需要有任何的土地所有权”。恩格斯对洛里亚进行了最猛烈的攻击，一个“从内心深处瞧不起全部经济学的写作冒险家……诡辩家、谬论家、吹牛家和江湖骗子”。相比较而言，恩格斯认为，斯蒂贝林的用意是非常好的。他只是无法胜任这个工作而已，他的解决方法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赋予马克思一个固定的利润率的理论），并产生了误导。<sup>[62]</sup>

恩格斯在序言中对整个竞赛裁决的结论就是：“全部研究的结果是：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有马克思学派才取得了一些成就。如果法尔曼和康拉德·施米特读到这个第三册，他们就会对于他们各自的那部分工作感到完全满意了”。<sup>[63]</sup>在恩格斯的裁决中，对莱克西斯过于严厉，对施米特过于宽宏大量，这两种情况（可以合理地假定）都是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造成的。人们可能很想知道恩格斯会对莱尔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莱尔把对马克思价值理论不足的分析上的感悟和对社会主义的公开的敌意结合在一起了。很可能恩格斯由此而对莱尔置之不理。在他自己和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阐述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就不允许“庸俗经济学家”对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起到有贡献的作用。直到1942年，保罗·斯威齐重新强调了博特凯维兹的贡献，马克思主义者才开始允许资产阶级学者介入他们对转形问题的讨论。<sup>[64]</sup>

这个奇怪的“有奖征文竞赛”引起了我们的新思考。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自己的意见保持着神秘本质、在恩格斯差不多是故意不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分析，莱克西斯、施米特和法尔曼事实上到底预见到多少。尽管莱克西斯和施米特都写下了较长篇幅的对《资本论》第三卷有利的评论，<sup>[65]</sup>但是，1895年之后，三个人中没有任何一个重新回到这个问题

上，去解决马克思自己的解决方法中仍然存在的困难，这一点令人十分遗憾。

第二，马克思解决方法中的缺陷，是恩格斯评判各种贡献时使用的标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恩格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马克思存在缺陷的解决方法。事实上，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解决方法存在的不确定性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或者是做出评价。他发起的竞赛，不像是为了解决一个真正的分析性问题，更像是为了努力评价其他社会主义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仿效马克思。一个重要问题的相对不重要的方面，给整个竞赛蒙上了阴影。

第三，在解决转型问题时，参赛者采取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解决程序，不怎么富有成效的程序占据了支配地位。首先，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值规律中的矛盾”可以用“不变条件”的术语进行思考：通过对特定的价值量是如何等于特定的价格、利润量进行分析，可以把利润率表示为剩余价值和资本价值之间的比率。其次，仍然和马克思的思想保持一致，转形问题可以被概念化为，一个从外生给定的价值量得到内生的价格、利润变量的问题。后一种程序是描述转形问题更好的方法。一旦以这种方式解决了转形问题，解决第一种情况下的问题就成了相对简单的事情。此外，后一种程序突出了在何种程度上价值可以被合理地视为是外生的，而且有助于对与此相关的“价值逻辑的优先性”问题进行研究。<sup>[66]</sup>但是，只有莱尔一个人以这种方式分析了转形问题；其他人受限于第一种程序。然而，恰恰是莱尔的工作受到最少的关注。因此，他的方法以及他的具体结论，并没有立即产生它应有的影响。

第四，正如本章第1节提到的，1894年之前，马克思的公开出版的论述转形问题的著作非常少，而且没有给参与讨论的学者提供什么帮助。但是那时有李嘉图的著作，事实上，在一些关键的方面，李嘉图的著作作为解决转形问题提供了较多的指南。李嘉图正确地指出，价格和价值的偏离取决于“资本构成”和社会平均资本构成之间的差异。然而，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评意见，有些不合道理的苛刻，这可能使得很多作者，法尔曼可能是个重要的例外，在转形问题上低估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重大意义。

最后，就像在第一章看到的，恩格斯作为文稿遗嘱执行人、马克思著作的编辑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理论争论的最后裁决人，其行为方式不够好。这正是为什么有奖征文竞赛持续了整整十年而不是恩格斯最初打算的“几个月”的原因，对马克思转形问题解决方法进行的批判性考察开始于1895年，差不多已经是这个问题形成33年之后的事情了。

---

## 第二章注释:

[1] 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2] V. L. Lidtke, *The Outlawed Party: Social Democracy in Germany 1878-18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71. 很明显,在恩格斯和迈耶尔之间不存在个人恩怨,19世纪80年代,迈耶尔在伦敦经常拜访恩格斯。参见E.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London: Leonard Parsons, 1921) p. 196.

[3] K. Kautsky, 'Das "Kapital" von Rodbertus', 'Eine Replik', 'Schlusswort', *Die Neue Zeit*, 2, 1884, pp. 337-50, 385-402, 494-505, and 3, 1885, pp.224-32; C. A. Schramm, 'Karl Kautsky und Rodbertus', 'Antwort an Herrn. Karl Kautsky', *ibid*, 2, 1884, pp. 481-94, and 3, 1885, pp. 218-23; B. Kautsky (ed. 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mit Karl Kautsky (Vienna: Danubia-Verlag, 1955) pp.98-163.

[4] 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关于转形问题,这种观点的第2节并不完全正确,参见以下第2节。

[5] 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3页。J. E. King, 'Utopian or Scientific: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Ricardian Socialist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5, 1983, pp. 345-78.

[6] 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恩格斯在这里提到J. K. 洛贝尔图斯, *Zur Erkenntnis Unsrer Staatswirtschaftlichen Zustände* (Berlin: Neubrandenburg & Friedland, 1842)。根据推测,《批判》应该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5-427页。

[7] 恩格斯:《资本论》第3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参见以下第4节。

[8] 与罗伯特·迪克森的个人通信。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8-12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23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425-42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 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第446-447页;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2年8月2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85-190页。A. Oakley,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Sources and 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vol. I, pp.185-8, vol. II, pp. 81-8.

[11] E. J. Hobsbawm, "The Fortunes of Marx's and Engels's Writings", in Hobsbawm (e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Volume I: Marxism in Marx's Day* (Hassocks: Harvester, 1982) pp. 327-32.

[1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52页。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194页注释1。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55-356页。

[15] 《施米特致恩格斯(1892年7月13日?)》。我们感谢社会史国际研究所的G. Langkau博士提供的该信件的复印件, 感谢Jan Ireland的誊写。

[16] 《恩格斯致施米特(1892年9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54页。

[17] 《恩格斯致丹尼尔逊(1888年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103-104页。

[18] 论莱克西斯参见M. Blaug (ed.) *Who's Who in Economics* (Brighton: Wheatsheaf, 1983) p. 233.

[19] W. Lexis, 'Die Marx'sche Kapitaltheorie', *Conrads Jahrbücher* 11, 1885, pp.452-65.

[20] *Ibid*, p. 464.

[21] 不过, 在莱克西斯的分析中, 的确包含有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的错误, 即在任何交易中, 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完全源于参与交易的不同部分的生产条件。然而, 这也许可以被解释为是一种解释性的简化, 或者是对只存在两个生产部门这一隐含假设的反映。

[22] P. Angel, *Eduard Bernstein et l'Evolution du Socialisme Allemand*(Paris: Marcel Didier, 1961) pp.154-5, 192-3, 207; R. Fletcher, *Revisionism and Empire: Socialist Imperialism in Germany 1897-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1984) pp.51; 74; 80, n.8; 112.

[23] C.Schmidt,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auf Grundlage des Marx'schen Werthgesetzes (Stuttgart: Dietz, 1889).

[24] Schmidt to Engels, 19 February 1888, date indistinct, 18 June 1891, 25 October 1891.

[25]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cf. Schmidt,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pp. 2-3.

[26] Schmidt,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pp.11-12, 16.

[27]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A. Loria, Review of Schmidt,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in Conrads Jahrbücher, 20, 1890, pp. 272B4; Schmidt to Engels. 25 October 1891.

[28] Schmidt,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pp. 47-8.

[29] Ibid, pp. 49-50.

[30] Ibid, p. 51

[31] Ibid, pp. 52-3.

[32] Schmidt to Engels, 13 (?), July 1892, date indistinct (1892?); C. Schmidt,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auf Grundlage das Marx'sche Wertgesetz, Die Neue Zeit, 11,1892-3, pp.68-75, 112-24.

[33] 参见L. von Bortkiewicz, 'On the Correction of Marx's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in P. M. Sweezy (ed.)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New York: Kelley, 1966) pp. 197-221 (first published 1907).

[34] G. C. Stiebeling, Das Werthgesetz und die Profitrate (New York: Heinrichs,1890); Das Problem der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Kritik einer Kritik mit Meinem Nachtrag (New York: Labor News Co., 1893);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Raten des Mehrwerths und Profits mil Bezug auf die Lösung des Problems der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New York: New York Labor News Co., 1894).

[35] 早在1878年,他在柏林《前进报》的专栏里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交流了看法。(J. Lehr, 'K.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kulturgeschichte 23, 1886, pp. 1-38, 97-123).

[36] Untersuchungen, p. 23.

[37] Ibid, p. 3,在这里利润率分别被错误地设定为26.2%和21.7%。

[38] J.Wolf, 'Das Rätsel der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bei Marx',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57, 1891, pp. 352-67.

[39] Schmidt to Engels, 18 June 1891.

[40] Wolf, 'Das Rätsel', p. 358.

[41] Ibid, pp. 360-1.

[42] Ibid, pp. 365-7

[43] 论洛里亚参见 Blaug, Who's Who in Economics, p. 241. and S. B. Clough, 'Loria Achille', in 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Macmillan and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pp. 474-5.

[44]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1页。

[45] A. Loria, 'La Théorie de la Valeur de Karl Marx', Journal des Economistes, 1884, pp. 137-9.

[46] Ibid, p. 274.

[47]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48] P. Fireman, 'Kritik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58, 1892, pp. 793-808; Schmidt to Engels, 13 (?) July 1892.

[49] Fireman, 'Kritik', p. 798.

[50] Ibid. pp. 805-6, 808.

[51] Schmidt in Die Neue Zeit, 1892-3, p. 69, n; Schmidt to Engels, 1 March 1895.

[52] Fireman, 'Kritik', pp. 805-7. 这已经被施密特详细讨论过,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pp. 89-95.

[53] 参见以上注释35.

[54] J. Lehr,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auf Grundlage des Marx'schen Wertgesetzes',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Volkswirtschaft und Kulturgeschichte, 29 (1) 1892, pp. 145-74 and 29 (2) 1892, pp. 68-92.

[55] Ibid, pp. 170-1; cf. Bortkiewicz, 'On the Correction', pp. 201-4. 在勒尔的文章中,  $r$  写为  $0,0p$  和  $(1+r)$  写为  $1,0p$ 。

[56] Lehr,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pp. 172-3. 如果  $k_1 = v_1/4$ , 且  $k_2 = 4v_2$  勒尔认为  $t_2 = 4t_1$ 。(这是不正确的: 正确的解为  $t_2 = 16t_1$ )。

[57] Ibid, p. 92; cf. also p. 154.

[58] Ibid, pp. 70-3.

[59] 到目前为止,对马克思的新古典式批判中,做得最好的是庞巴维克。E. Böhm-Bawerk, *Kapital and Kapitalzins* (Innsbruck: Verlag der Wagner'schen Universitäts-Buchhandlung, 1884) pp. 418-47. See Chapter 3 below.

[60] P. Sraffa,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See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 II, 1929-1988 (London): Macmillan forthcoming).

[61] 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参考Schmidt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pp. 54-10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8页

[62] Stiebeling, *Das Werthgesetz*, pp. 15-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4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64] P. M. Sweezy,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first published 1942) pp. 115-25.。

[65] W. Lexis, 'The Concluding Volume of Marx's Capita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 October 1895, pp. 1-33; C. Schmidt, 'Der Dritte Band des Kapital', *Sozialpolitisches Centralblatt*, 22, 1895, pp. 255-8

[66] 对这一观点的技术性说明参见F. Set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4, June 1957, pp. 149-60; M. Morishima, *Marx's Economics: a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s7-8; and J. E. Roemer,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7. 一个更简单的讨论由霍华德和金给出,参见M. C. Howard and J. E.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 2nd edn, pp.134-178.

### 第三章 价值理论的第一次争论：1895—1914年

#### 1. 《资本论》第三卷

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看到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简要提及了自由竞争的存在给其价值理论带来的难题。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篇，他对这个难题作了详细阐释，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劳动力市场的竞争造成所有产业利润率平均化，因为在均衡状态下，无论是工作日的长度还是实际工资的大小都趋于一致，因此，资本家能够从每个雇佣工人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量也将趋于相等。如果不同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没有什么经济机制确保它必然相同——它们就将有不同的利润率。产业*i*的利润率被定义为剩余价值和使用的总资本（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 $r_i = s_i / (c_i + v_i)$ ，把这个分数的分子和分母分别除以 $v_i$ ，得到 $r_i = (s_i / v_i) / (c_i / v_i + v_i / v_i) = e / (k_i + 1)$ ，这里 $e (= s_i / v_i = s_j / v_j)$ 是一般剥削率， $k_i (= c_i / v_i)$ 是资本有机构成。从而，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会有较高的利润率。但是，这与存在竞争的商品市场上的情况不一致，在竞争性商品市场中，资本可以从一个产业向另一个产业自由流动，所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将趋于平均化。因此，在价值规律和自由市场的运行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sup>[1]</sup>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表明，要解决这种矛盾，需要对劳动价值与长期均衡价格之间的有系统的偏离作出清晰的认识。马克思把长期均衡价格称作生产价格，他认为生产价格必须处于这样一种水平，即它必须能够包含资本家的成本和用当前的平均利润率计算的资本家所用资本获得的利润。对个别资本家来说，由于剩余价值完全取决于劳动中活劳动的数量，利润取决于使用的总资本（死劳动加活劳动），因此剩余价值和利润也将发生背离。

就利润来说，不同的资本家在这里彼此只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发生关系，在这个公司中，按每100资本均衡地分配一份利润。因此，对不同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各份利润之所以有差别，只是因为每个人投在总企业中的资本量不等，因为每个人在总企业中的入股比例不等，因为每个人持有的股票数不等。<sup>[2]</sup>

因此，价值向价格的转化同时也是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



表3.1 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

产业	资本		剩余价值 S	总资本 c+v	产业利润率 $s/(c+v)$	耗费的不变资本 ac	商品价值 $ac+v+s$	成本价格 $ac+v$	利润率 22%	生产价格	价格同价值的 偏离	利润同剩余价值的 偏离
	c	v										
I	80	20	20	100	20%	50	90	70	22	92	+2	+2
II	70	30	30	100	30%	51	111	81	22	103	-8	-8
III	60	40	40	100	40%	51	131	91	22	113	-18	-18
IV	85	15	15	100	15%	40	70	55	22	72	+7	+7
V	95	5	5	100	5%	10	20	15	22	37	+17	+17
加总	390	110	110	500		202	422	312	110	422	0	0
平均	78	22	22	100	22%	40.4	84.4	62.4	22	84.4	0	0

马克思使用表3.1中的数字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转形问题包含的内容。<sup>[3]</sup>五个部门分别投资100单位资本，每个部门有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和相同的剥削率（ $e=100\%$ ）。无论是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总量还是利润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之间都是一种反向关系。部门Ⅲ生产的剩余价值最大（有机构成为 $k=1.50$ ），部门Ⅴ生产的剩余价值最小（有机构成为 $k=19.00$ ）。相应地， $s$ 和 $(c+v)$ 之间的比率也因此而不同，分别为40%和5%。在五个部门中，不变资本的耐久性是不同的：在部门Ⅲ使用的60单位不变资本中，在一年期生产过程中耗费了51单位，而投资于部门Ⅴ的95单位不变资本中，只有10单位的不变资本转移到年产品中（这或者是因为部门Ⅴ与部门Ⅲ相比，使用了更多的机器和相对较少的原材料，或者是因为部门Ⅴ的机器有更长的使用寿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每个部门的总生产成本，马克思称之为成本价格，由耗费的不变资本和总的可变资本的总和决定，在这里，马克思假定可变资本每年周转一次。利润获得的方式是，马克思对

整个经济中使用的总资本作了加总， $390c+110v=500$ ；总剩余价值为110，用总剩余价值除以总资本，得到平均利润率： $r=110/500=22\%$ 。每个部门的资本家获得的是按总资本计算的22%的利润，在这个例子中，即每个部门的利润为22。把这个利润和每个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相加，就得到生产价格。三个资本有机构成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部门（I，IV，V），商品的价格超过了价值，有机构成较小的部门II和III，价格低于劳动价值。不同部门的利润和剩余价值以一种完全相似的方式发生了偏离。

然而，总的来看，价格和价值是相等的（等于442），同样总利润也等于总剩余价值（等于110）。这两个“不变条件”<sup>[4]</sup>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使得平均利润率可以被定义为两个价值量之间的比率（总剩余价值除以使用的总资本）。马克思推论，一般利润率必须“从商品的价值引申出来，没有这种引申，一般利润率（从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sup>[5]</sup>马克思认为转形过程存在一个历史的维度。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中，生产者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相互交换他们的商品，劳动价值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交换条件。从而“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把商品价值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sup>[6]</sup>马克思设想，利润率通过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均等化，竞争首先在部门内部展开，接着出现在部门之间，一般利润率只有到资本主义较晚的历史阶段才出现。<sup>[7]</sup>

马克思对这个观点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述，我们随后将会明白，他不这样做是明智的。除此之外，马克思留下了另一个没有解决的难题：

我们原先假定，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等于该商品生产中所消费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但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它的买者来说，就是成本价格，因而可以作为成本价格加入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形成。因为生产价格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包含另一个商品的这个生产价格在内的成本价格，也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总价值中由加到它里面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的部分。必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修正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该商品生产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那就总可能有误差。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sup>[9]</sup>

比如，在表3.1中，五种商品中每一种商品的成本价格，都是按照用来生产

这种商品的商品（不变和可变资本）的价值总和来计算的。但是这些商品是按不同于它们的劳动价值（特殊情况除外）的生产价格被出售的。然而，马克思的“成本价格”完全不是价格，接下来的生产价格的计算也就不正确了。正如上述引文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发现了这个困难，却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它的方法。

## 2.对《资本论》第三卷的早期反应

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分析存在两个重大的难题。假如价值规律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直接应用，而在某些情况下却不能发挥作用，这对价值规律的科学地位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马克思在自己的解决方法中已经意识到、但未能加以纠正的技术性缺陷，能够做些什么呢？恩格斯似乎没有意识到第二个问题的重要性（参见以上第二章）。他被第一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仍然就价值向价格转形的历史问题，同维尔纳·桑巴特和康拉德·施米特保持着通信，并写下了一篇回复马克思批判者的长文（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版的增补中发表）。事实上，这个增补成为恩格斯最后一篇重要的、专门研究价值理论的著述，这个增补也成为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有原创性、也最具争议的贡献之一。恩格斯对价值理论的关注表明，价值理论在所有流派的经济学家中都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讲尤其如此，价值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抗新古典学派时发挥了核心作用。

维尔纳·桑巴特在对《资本论》第三卷的评论中，清楚地说明了价值向价格转形的历史问题。桑巴特写道，马克思事实上是否打算像坚持价值理论在分析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那样，坚持价值理论的形成存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并没有清晰地展现出来。如果马克思的确有这种打算，那么价值理论就包含了逻辑和经验两方面的错误。桑巴特认为，价值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它不必也不可能对应着任何可观察的历史时期，任何试图以这种方式应用价值理论的尝试，都会发现它和历史事实之间的矛盾。早期的产业资本家是那些受到更高利润率吸引，并把他们商业资本的一部分投资于制造业的商人。如果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商品是按照它们的劳动价值出售的，那么资本有机构成最低的产业将获得最高的利润率。但是，桑巴特指出，事实恰好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出现在与活劳动使用相比，使用死劳动的比例最高的产业（比如采矿业）。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率和资本有机构成之间是一种反向变动关系的观点，同样是错误的。事实上与此相反，高利润率存在于诸如化工业、

酿造业和采矿业等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高的产业。资本主义产业利润率是由竞争的程度，而不是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决定的。因此，任何试图从价值向价格转形的角度出发，构筑一个有关价格形成的历史理论，都将是完全错误的，转形问题是智力活动的结晶，而不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桑巴特指出，除非恩格斯使他相信相反的东西，否则他将认为马克思持有和自己类似的观点。桑巴特意思是，如果马克思能够活着自己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就有可能消除这些不确定性。<sup>[10]</sup>

在对《资本论》第三卷进行评论的文章中，勒克西斯对马克思作了较多的批评，认为马克思对一般利润率形成的历史描述完全站不住脚。利润率的相等（除了偶然的例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从来不存在一种社会条件，这种生产条件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由资本有机构成不同造成的利润率不合同时并存。利润率的相等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同它们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很像在胚胎中，血液循环的发展等同于胚胎的形状与形式的发展。

从而，马克思“想象出来的不真实的价值概念”，没有给实际经济经验的知识增添任何新的内容，尽管它同经验是相一致的。<sup>[10]</sup>

勒克西斯的评论，用英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很可能没有引起德国学者的注意。不过，康拉德·施米特肯定是了解桑巴特的批评的。施米特自己对《资本论》第三卷所做的评论，充满极度的热情，但是在与恩格斯的私人通信中，他却表现出极大的怀疑。他担心马克思并没有强调总劳动价值与总生产价格相等的必要性。考虑到这种情况，他告诉恩格斯，“价值规律（如果人们把它当作调节交换的规律而不只是价值的定义）在我看来似乎只是一种虚构，尽管它本身自然不会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必要的虚构，也就是说，它是我们为了得到除此就无法获得结论而必须作出的一种假设”。就像恩格斯自己在《反杜林论》中表明的那样，类似的必要的虚构在数学中经常出现。如果没有总价值等于总价格的虚构，将无法得出一般利润率是由总剩余价值和总预付资本之间的比率决定的这一基本规律。<sup>[11]</sup>

恩格斯在收到桑巴特随信附上的关于《资本论》第三卷评论的概要大约两周后，收到了施米特的信。在1895年3月的接连两天中，恩格斯对两个人作了回复。恩格斯指出，桑巴特认为个别资本家完全没有意识到转形过程的存在是正确的。利润率均等化是如何准确地出现在现实中是另一个问题，（恩格斯承认）这是马克思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它给桑巴特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项目：

在交换之初，当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的时候，交换大致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因此，那时价值曾经有直接的、现实的存在。我们知道，在交换中，价值的这种直接实现停止了，现在不再有这种情况了。我认为，对您说来，不用费什么事就能看出（起码是大致看出）那些从这种直接的、现实的价值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的价值的中间环节……。对这个过程做出真正历史的解释，当然要求认真地进行研究，而为此花费的全部心血将换来丰硕的成果；这样的解释将是对《资本论》的十分宝贵的补充。<sup>[12]</sup>

当然，最后恩格斯自己写下了他提到的“补充”。

对康德·施米特，恩格斯不再像对桑巴特那样世故。恩格斯认为，施米特受到那种存在缺陷的哲学训练的误导，尤其是对康德的研究使他受到“几乎是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思辨”的误导。恩格斯写到，所有自然科学概念都是一种对现实的接近，历史科学也是如此。封建主义是否曾经和它的概念准确地相符合呢？如果不符合，那么它就是一种虚构吗？一般利润率的形成预先假定了所有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消失。这种情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还不曾完成，甚至英国也是如此，“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我们决不会让它发展到这个地步。”接着，恩格斯论述到，总剩余价值和总利润将永远不会完全的相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

您对价值规律的责难，从现实的观点来看，涉及一切概念。……由于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使它得以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毕竟不能把它和虚构相提并论，除非您因为现实同一切思维成果的符合仅仅是非常间接的，而且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就说这些思维成果都是虚构。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视为是友好的批评。恩格斯在信的最后，请求施米特安排一下把为《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评论翻译成意大利文的工作，以便于为同阿吉尔·洛里亚进行论战提供素材，洛里亚对马克思进行了全面的批评。<sup>[13]</sup>

1895年春，恩格斯完成了名为“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的《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sup>[14]</sup>，在对洛里亚进行回击后，恩格斯总结了桑巴特和施米特对价值概念逻辑地位的分析。无论是桑巴特还是施米特，“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

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sup>[15]</sup>不可否认，马克思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只是提供了一个粗略的大纲，毫无疑问（恩格斯暗示），一旦有机会马克思将对此进行深入的扩充。恩格斯在“增补”的其余部分中，对填补这个空白进行了大胆的、但最终被证明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尝试。他论证说，前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从交换中获得的相对较少，他们只购买或交换一些手工产品。

中世纪的农民相当准确地知道，要制造他换来的物品，需要多少劳动时间。村里的铁匠和车匠就在他眼前干活；……花在这些产品上的劳动时间不仅对于互相交换的产品量的数量规定来说是唯一合适的尺度；在这里，也根本不可能有别的尺度。……当时的人——不管是牲畜饲养者还是他们的买主——肯定都已相当精明，他们不会在交换中得不到等价物而把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白白送给别人。

因此，劳动价值“对于整个简单商品生产时期……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一直起作用，直到19世纪初（至少在德国是如此）。并且“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5000年至7000年的历史时期内起支配作用”。<sup>[16]</sup>

随着商业资本的出现，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商人对于从前一切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sup>[17]</sup>商人最初主要是通过海外贸易获得利润，商业资本家最终以包买商的角色进入到生产中，如在外包体系下的成衣制造，并且获得超过和高于他们商业利润的剩余价值。商人之间的竞争使不同产业的利润率平均化。后来，随着工厂生产的出现，不同部门的利润率也被平均化了。这是通过“把一向阻碍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绝大部分障碍清除掉。这样，对整个交换来说，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就大致完成了”的时候实现的。进一步推动这个过程的事实是，“占有超额剩余价值的各生产部门，也就是说，可变资本较多而不不变资本较少，因而资本构成较低的各生产部门，按照它们的性质来说，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经营恰恰是最晚的，而且是最不充分的；首先是农业”。<sup>[18]</sup>

这是一个企图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改写几千年经济史的雄心勃勃的尝试，这种尝试的失败并不奇怪。现代批评者指出了恩格斯分析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价值时代”问题上尤为严重。现代批评者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从来就没有充分发展到按照商品的劳动价值比率相交换的程度。重要的领域完全处于商品生产之外；很少有哪个交易商专门把整个经济活动的时间用于商品的生产；劳动力的流动遇到的强大的体制和文化障碍，

阻止了单位资本收入的均等化；封建主义的剥削关系和商人资本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因此，除了可能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存在过一段短暂的时期外，简单商品生产几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sup>[19]</sup>

恩格斯对劳动价值体制向存在平均利润率体制转形的分析也存在问题，在前一种体制中，商品按劳动价值出售，在后一种体制中，商品按生产价格出售。恩格斯认为，无论他们所从事的贸易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质，激烈的竞争将迫使商业资本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sup>[20]</sup>要是存在一个真正的转形的历史过程的话，不等的利润率必然是后来才出现在资本主义产业的不同部门中的。那么，竞争为什么在商人进入产业生产之前比进入之后更剧烈，就无法作出解释了。

### 3. 庞巴维克和希法亭

第一次（也是很长时间内唯一的一次）认真对待上述问题的尝试，是差不多十年后由鲁道夫·希法亭作出的。这种尝试，出现在希法亭对奥地利理论家欧根·冯·庞巴维克的回复中，庞巴维克在1896年出版的著作中，对劳动价值论进行的新古典主义的攻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国际上，无论是与门格尔还是与维塞尔相比，庞巴维克都更为知名。事实上，到世纪之交，除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庞巴维克比任何他同时代的人都更加知名。庞巴维克是主观价值论的重要倡导者，但他充满原创性的独特的利息理论更广为人知，庞巴维克用这一理论来取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利润的解释。庞巴维克认为，资本的使用扩展了生产的时间结构，使得使用更加“迂回”的生产技术成为可能。由此导致的投入的使用和最终产出的出现之间的时间间隔的增加，既允许（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求利息的支付（资本家对当前消费的偏好超过对未来消费的偏好，在不存在回报的情况下，这会阻止储蓄的发生）。<sup>[21]</sup>

在任何意义上，庞巴维克都不是一位天生的资本主义辩护者，但他的确在奥匈帝国的学术和官方体制中，享有受人尊敬的地位。他有关“迂回”生产的观点影响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布哈林（参见以下第十章和第十五章）。毫无疑问，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因为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日渐增加的影响作斗争的需要而得到进一步加强。早在1884年，他就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是所有对马克思的价值分析进行的正统批判中的第一次，也仍然是最有说服力的一次。<sup>[22]</sup>他认为，无论是在演绎方法上，还是在经验证据方面，劳动价值论都是难以成立的。正如马克思主张的那样，两种商品能够相互交换，它们之中必然

包含了一些共同属性。但是在考察商品交换条件时，马克思在抽象掉商品的使用价值后，错误地否定了效用也可以成为商品的共同属性。这是一个“最粗糙的逻辑错误”，它混淆了从一般属性进行抽象和从这种一般属性的特殊形态进行抽象。即使忽略掉使用价值，商品仍然存在许多其它与交换相联系的共同属性，比如商品的稀缺性、它们都是供求的对象，都被私人占有，也都是自然的产物等等。<sup>[23]</sup>

在庞巴维克看来，劳动价值论也无法被经验所证明。它不适用于那些不能自由地再生产出来的商品（包括土地），也不适用于那些由熟练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论》对熟练劳动的分析是极其不充分的。工资非常低的工人生产的商品有着非常低的价值。此外，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作为（如果成立的话）价格长期波动的中心。在短期内，供求占据支配地位。最后，在1884年的著作中，庞巴维克暗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转形问题——包含同样数量“社会平均劳动”的两种商品，会因为用来生产它们的资本的耐久性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价格。因此，价值理论“对于很大一部分商品是完全不，对于其余的商品总是不、甚至是绝对不”适用的。劳动价值法则与一般价格法则的关系，就同“刮西风便下雨”的法则与“下雨”的一般理论的关系一样。<sup>[24]</sup>庞巴维克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的分析同洛贝尔图斯的分析一样，存在的主要缺陷就是“与事实相矛盾”，这种矛盾源自把“平均利润率规律”和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连接在一起。马克思同洛贝尔图斯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承认了这个矛盾。“但是他犯下的仍然是这个错误，而不是别的什么错误”。<sup>[25]</sup>

十二年后，庞巴维克看到了《资本论》第三卷的解决方法，但他认为这种解决方法是徒劳无益的。“我感到困惑，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对矛盾的解释和调和，而是赤裸裸地暴露了矛盾本身，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同第一卷是相矛盾的”。<sup>[26]</sup>马克思提出的为劳动价值论进行辩护的四个论点，没有一个是令人满意的。第一个论点（总价格等于总价值）与主题毫不相干，因为价值理论涉及的是相对价格而不是绝对价格的决定问题。第二个论点认为价值规律支配价格（而不是价格水平）的运动，也是错误的。马克思证明的只是劳动的量的变化是价格运动的一个原由，而不是物化劳动是价格运动的唯一决定因素。庞巴维克没有注意到另一点，即由于一般利润率被认为是劳动价值的比率，因此生产价格本身是由价值决定的。一旦在物化劳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的变化改变了均衡价格，马克思的第四个论点就崩溃了。<sup>[27]</sup>庞巴维克把第四点当成天大的难事：对马克思来说，实际工资等于工人消费的工资商品中由物化劳动量决定的劳动力的价值。为了证明他对这一点的批判，庞巴维克需要对马克思工资理论作出正面攻



击，但是他并没有作这样的尝试。

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第三个论点——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历史过程有关——的驳斥更有说服力。他认为，马克思在这一点上有点想当然，马克思说明了在应用劳动价值论时交换是如何进行的，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如此。事实上，庞巴维克坚持认为，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说明它应当如此。从本质上看，“对生产者来说，什么时候获得他们活动的回报，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恰恰相反，工作的开始和最终产品的完成之间经历的时间的长短，是价格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马克思的观点被历史经验所否定，历史经验表明农民和工匠的收入，实际上受到他们使用的资本数量的影响。庞巴维克引用桑巴特观点，说明资本主义生产首先出现在有较高（而不是较低）资本有机构成、相对有着较低（而不是较高）利润率的产业部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资本正在从这些产业流出，以寻求更高的利润。这些部门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要高于平均水平。

桑巴特通过把价值描述为一个逻辑范畴而不是经验范畴，从而为劳动价值论辩护。庞巴维克认为这不会令马克思感到满意，因为对马克思来说，价值的确是“一种真实世界的存在，而不只是思想的构建”。然而，结论必然就是，劳动价值论从来就没有被应用过，即使是在原始社会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与在它之前的黑格尔体系一样，是“纸牌堆成的房子”。<sup>[28]</sup>

1904年，庞巴维克的观点公开出版8年之后，鲁道夫·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批判作了唯一一次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答复。<sup>[29]</sup>希法亭的反批判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方法论的，一部分是历史的。但是，在这两部分中，没有任何一部分涉及庞巴维克提出来用以反对劳动价值论的具体详细的批评。这如同后来发生在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争论一样，参与争论的双方都未能深入地解对方的论点，而且缺乏真正的对话。在更为一般性的哲学层面上，希法亭指责庞巴维克总是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混为一谈。

每一种从使用价值出发的价值理论，也就是说从事物的自然属性出发的价值理论……是从物与人的个别关系而不是从人们之间相互的社会关系出发……这种视角是非历史的和非社会的。它的范畴是自然和永恒的。

劳动价值论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对价格决定的分析。“正是因为劳动是把分裂为各个原子的社会联结起来的社会纽带，而不是因为劳动是技术上最有意义

的东西，劳动才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价值的原则，价值规律才具有现实性”。<sup>[30]</sup> 马克思的价值论和主观价值论之间的根本区别，远不像庞巴维克认为的那样，只是两种方法（可以想象两种方法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更像是“互相竞争和互相排斥的观察整个社会生活的视角”之间的区别。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个人主义带来的完全是政治经济学的自杀。<sup>[31]</sup>10年后，布哈林雄辩地重新表述了上述对新古典理论的方法论的批判，并试图表明新古典主义的视角反映了新的“有闲阶级”的观点，这一新阶级是随着金融资本的兴起而产生的（参见以下第十三章）<sup>[32]</sup>。

#### 鲁道夫·希法亭小传

鲁道夫·希法亭，1877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190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有过短暂的执业生涯。在维也纳大学时，他还学习经济学，并在奥地利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1906—1907年被警察驱逐前，希法亭在柏林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虽然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并不抵制战争动员，1915—1918年，作为医生在意大利前线从事服务工作。战后移居德国，在192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合并后，再次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此之前，作为记者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工作。1924—1933年，希法亭成为帝国议会的议员，1923年和1928—1929年，他分别在斯特莱斯曼内阁和穆勒内阁中任财政部长。1933年后，他流亡于丹麦、瑞士，最后到法国，可能在1941在法国被盖世太保杀害。

在希法亭看来，世界观上的差异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历史过程紧密相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概念的发展完全同历史的发展相平行，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历史现实，另一方面也在概念中得到反映。而且这种平行发展同时也为理论的正确性提供了最严格的经验证明。<sup>[33]</sup>庞巴维克对劳动价值论在简单商品生产中适用性的反对，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农民和工匠不可能在不同产业之间自由的流动，利润率的差异与他们无关。在任何情况下，庞巴维克的分析中提到的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重大差异，指的都是资本主义而不是前资本主义经济，这表明庞巴维克的观点是完全无效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最早出现的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吸引了商人向产业生产的转移，是因为“合法的和事实上的垄断”力量，使得他们能够以高于他们劳动价值的价格出

售他们的商品。在希法亭（把注意力转向了桑巴特）看来，事情的发展顺序如下：商业资本家开始在制造业中使用他们“过剩的资本”，然而他们仍然主要是商人。他们从产出数量的增加和生产规律性的提高，从他们有能力占有工匠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中获益。“即使是他们能够保证的，投资在产业中的资本的利润率低于他们可以获得的商业资本的利润率，然而自此以后他们的总利润仍然是增大了”。最后，资本家进一步从更加先进的生产方法中获益，尤其是当特殊的法律赋予他们独占新技术的权利时。“直到垄断终结的那一天……最初极不相同的利润率才有可能平均化”。<sup>34</sup>竞争首先使个别生产领域的利润率平均化，随后，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向另一个生产领域的自由流动，为整个经济确立了统一的利润率。<sup>35]</sup>

庞巴维克对希法亭的答复完全无动于衷。<sup>36]</sup>奇怪的是，希法亭和庞巴维克都没有讨论马克思转型问题解决方法中存在的技术性难题，合理的推断只能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希法亭偶尔提及这些问题，表明问题本身并没有激起他足够的信心，使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它们。希法亭强调总价值和总价格相等的重要性，这种相等表明，“所有的利润都源自生产，而不是来自后来资本家对最终产品产生的任何影响”，希法亭接着给出了一个大胆但不合逻辑的断言：“既然总价格等于总价值，那么总利润除了是总剩余价值，不可能是其他什么东西”<sup>37]</sup>。事实上，马克思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它还没有得到证明。接下来，希法亭从无根据的断言转向了完全的错误，他宣称，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比率，“因此[原文如此]说在关注个别商品时马克思放弃了价值规律，而只在考察这些商品的总体时才坚持价值规律的有效性，是完全错误的”。<sup>38]</sup>希法亭在这里提示的似乎是剥削率与利润和工资之间比率的相等。这是一种妄想。就像在下一节将要看到的那样，在一般情况下，马克思的两个“不变条件”只有一个能成立。如希法亭提示的第三个条件的成立，只能以牺牲上述两个“不变条件”中的一个（或者更有可能同时牺牲两个）为代价。

争论双方没有任何一方在交流中变得更为完善。庞巴维克对《资本论》第三卷的批评明显不如他对第一卷的批评。尤其是他未能正视马克思劳动价值逻辑优先性的主张，正视这个主张，就要对马克思一般利润率能够用（且只能用）价值比率加以确定的观点进行反驳。这反过来对庞巴维克也提出了新要求，他需要对马克思的技术分析，作出比他原本认为的更多的研究性评价。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这一方面，希法亭的答复表现得也很软弱。如果希法亭能够用一个对价值向生产价格的历史转形连贯一致的描述，对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方法进行说明，

那么他对这种方法进行重新表述的意义将会大大加强。事实上，他并没有为恩格斯对这个问题作出的不那么令人信服的分析增添什么新的内容。因此，令人满意的价值向价格转化的模型仍然没有形成。

#### 4. 米尔普福特和德米特里耶夫

《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不久，《国民经济年鉴》上发表了一篇由东普鲁士哥尼斯堡的沃尔夫冈·米尔普福特撰写的短文，这篇短文借鉴了他自己两年前提交的学位论文《资本主义社会的价格和收入》。<sup>[39]</sup>米尔普福特的社会主义是俾斯麦式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的论文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杂志《新时代》的严厉批评，<sup>[40]</sup>他的文章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似乎都完全被忽视了。然而，米尔普福特的论文和文章，包含两个存在细微差别的转形问题的代数表达，并且非常清晰地指向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有关转形问题的数学文献。马克思没有把投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转化为生产价格，米尔普福特以此为出发点，认为这个问题可以运用下述方式解决。用 $a_1$ 表示商品1的劳动价值， $x_1 a_1$ 表示它的生产价格， $x_1$ 是价格与价值的比率，这意味着价格是由劳动价值度量的。 $P$ 表示一般利润率， $x_0$ 被定义为 $\frac{1}{1+p}$ ，马克思意义上商品1的“成本价格”（米尔普福特把它命名为公司1的“资本价格”）由 $x_0 x_1 a_1$ 给出。<sup>[41]</sup>

对 $n$ 个生产不同商品的企业来说， $a_{11}, a_{12}, \dots, a_{1n}$ 是为了生产一单位商品1使用的商品1, 2, ...,  $n$ 的数量； $a_{21}, a_{22}, \dots, a_{2n}$ 代表公司2每单位产出使用商品1, 2, ...,  $n$ 的数量，等等。用现代术语来说，它们就是每个产业的里昂惕夫投入系数。<sup>[42]</sup>米尔普福特明确地表明，它们是由“各个公司的技术”决定的。<sup>[43]</sup>然后，他写下了下列等式：

$$\begin{aligned} x_0 a_1 x_1 &= a_{11} a_1 x_1 + a_{12} a_2 x_2 + \dots \\ x_0 a_2 x_2 &= a_{21} a_1 x_1 + a_{22} a_2 x_2 + \dots \\ &\dots\dots\dots \\ x_0 a_n x_n &= a_{n1} a_1 x_1 + a_{n2} a_2 x_2 + \dots \end{aligned} \quad (3.1)$$

在上面的式子中，左边给出了每单位不同商品的成本价格，右边是生产它所需的不同商品单位投入的价格总和（用 $1/x_0 = 1+p$ 分别与两边相乘，将会得到一个更为人熟知的表达式，即生产价格和所有投入品的价格总和相等，投入品的价格是用 $(1+p)$ 作为乘数得到的）。米尔普福特在一定程度上和马克思一样，忽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把工人消费的商品看作是和原材料与机器一样的物质投入。这是一个在有关转形问题的现代数学讨论中经常出现的情况，而且很

容易被改进为一个更加正统的马克思的表述式。

米尔普福特得到了  $n$  个等式，但是却有  $n+1$  个未知数（ $n$  个价格—价值比率  $x_1, \dots, x_n$  和用  $x_0$  表示的利润率），在这一点上他泄气了。他可以做的是，要么使所有商品的价值总和等于价格总和，要么使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得到第  $n+1$  个等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需要指定第  $n$  种商品的产出数量。他未能这样做，而且混淆了马克思的两个不变条件，把  $\sum a = \sum \pi$ （ $\sum \pi$  代表生产价格总和）写为：

$$\begin{aligned} (a_1 - a_{11}a_1 - \dots - a_{1n}a_n) + \dots + (a_n - a_{n1}a_1 - \dots - a_{nm}a_n) = \\ (a_1x_1 - a_{11}a_1x_1 - \dots) + \dots + (a_nx_n - a_{n1}a_nx_n - \dots) \end{aligned} \quad (3.2)$$

这真是不伦不类。左边代表了物化在每单位不同商品中剩余劳动的数量，右边代表的是与每单位产出相对应的利润。等式（3.2）更加近似于第二个不变条件（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而不是第一个不变条件。<sup>[44]</sup>正因为如此，米尔普福特才不得不用产出的数量去乘以每单位产出的剩余价值和利润。如果用  $X_1, X_2, \dots, X_n$  表示商品 1, 2, ...,  $n$  的产出数量，我们可以把：

$$\begin{aligned} (a_1 - a_{11}a_1 - \dots - a_{1n}a_n)X_1 + \dots + (a_n - a_{n1}a_1 - \dots - a_{nm}a_n)X_n = \\ (a_1x_1 - a_{11}a_1x_1 - \dots)X_1 + \dots + (a_nx_n - a_{n1}a_nx_n - \dots)X_n \end{aligned} \quad (3.3)$$

当作（真正的）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的条件。

即使是这样，米尔普福特的代数方法也是失败的，但是他的贡献不仅独具匠心，而且富有成效，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米尔普福特认为自己是在推动古典价值理论和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分析的综合，前者解释了“自然”（即长期均衡）价格，后者用心理规律说明了稀缺性对短期价格决定的影响。虽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仍然是现有的最佳理论。“从另一方面看，奥地利学派的错误在于试图把他们的解释方法，应用于自由竞争条件下可自由再生产的商品的自然价格。我的观点是，在古典学派和奥地利学派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两个体系可以以一种我已经解释了的方式统一在一起”。他带着一种审慎的希望（至少在他有生之年，这成了令人遗憾的失望）推论说，“专业人士”将确证或否定他的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尤其是，我希望看到公认的马克思的解释者，比如伯恩施坦、恩格斯、考斯基等，以客观的形式表达的观点”。<sup>[45]</sup>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与此同时，一个不怎么知名的斯摩棱斯克的海关官员，开始以一种新奇的方法

式着手处理这个问题。V. K. 德米特里耶夫(1868-1913)是当时最重要的俄罗斯数理经济学家。<sup>[46]</sup> 追随着同胞彼得·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参见以下第九章和第十章)的足迹, 德米特里耶夫希望能够综合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价值理论。虽然从来没有提到马克思, 而且他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应归功于瓦尔拉斯而不是李嘉图, 但德米特里耶夫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这个框架对后来的劳动价值论和转形问题研究具有巨大的价值。他关于这一主题的第一篇论文, 发表于1898年, 但显然是之前几年就完成了的。论文认为, 劳动价值的计算可直接从物质投入和产出的技术数据(马克思经常用其它的价值—— $c, v$ 和 $s$ ——表达价值, 从来没有明确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得出。对于商品 $A$ ,  $N_A$ 表示它的价值(即生产它需的直接或间接劳动投入的总和);  $1/m_i$ 是生产商品 $A$ 耗费的第 $i$ 种商品的数量, 或者, 如果第 $i$ 种商品是机器的话, 它表示年折旧系数;  $n_A$ 是生产 $A$ 的直接劳动投入, 德米特里耶夫得到:

$$N_A = n_A + 1/m_1 \cdot N_1 + \dots + 1/m_M \cdot N_M \quad (3.4)$$

在这里, 劳动价值由直接劳动( $n_A$ )和间接劳动( $1/m_1 \cdot N_1 + \dots$ )的总和决定。

德米特里耶夫也思考了生产价格的决定问题。然而, 他的方法是李嘉图式的而不是马克思式的。他使用“过去劳动”模型取代了不变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分。在这种模型里, 不再把商品看作是由直接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生产出来的, 生产技术被“简化”为由它们作出贡献的时期加以区分的一系列劳动投入。棉纱被认为是纺纱工的劳动(当年耗费的)、棉花种植者的劳动(去年耗费的)和必要的机器制造者的劳动(追溯到两年或两年以上)的产物。<sup>[47]</sup>忽略掉机器, 并假定棉花是由独立的劳动种植的, 可以得到原棉和棉纱的“过去劳动”价格方程:

$$P_A = W \cdot L_A(1+r) \quad (3.5)$$

$$P_B = W \cdot L_B(1+r) + W \cdot \frac{1}{m_A} \cdot L_A(1+R)^2 \quad (3.6)$$

$P_A$ ,  $P_B$ 是棉花和棉纱的价格,  $L_A$ ,  $L_B$ 是种棉花和纺纱活动中每单位产出使用的劳动的数量;  $\frac{1}{m_A}$ (再一次)是生产一单位棉纱要求的棉花投入的数量;  $r$ 是年利润率。  $L_A$ ,  $L_B$ 和 $\frac{1}{m_A} \cdot L_A$ 表示“过去劳动”, 每个都被 $(1+r)$ 的乘方加权, 乘方的大小由劳动被“锁定”在生产中的周期的长短决定。<sup>[48]</sup>长期均衡价格, 定义为资本家过去的所有工资开支, 加上包含所有相关时期, 以当前的平均利润率为折算系数计算出的复利形式的利润的总和。简单地说, 假定工人只消费谷物, 给定时资本家的支出为 $n_A a P_A$ ,  $a$ 是每个时期工人消费的谷物的数量,  $P_A$ 是谷物的价格,  $n_A$ ——和前面相同——代表所需的(这次是在时期 $A$ )直接劳动投入。

对商品  $A$ （谷物）来说，自然价格（生产价格）被定义为：

$$P_A = n_A a P_A (1+r)^{t_A} + \dots + n_M a P_A (1+r)^{t_M} \quad (3.7)$$

$r$  为平均利润率，在得到最终产品之前，劳动投入  $n_A \dots n_M$  存在的生产周期为  $t_A \dots t_M$ 。给定真实工资  $a$ ，一旦定义了价格计量单位，便可由方程（3.7）所代表的方程组解出用技术系数  $n_A \dots n_M$  与  $t_A \dots t_M$  表示的生产价格  $P_A \dots P_M$  和  $r$ 。甚至超越了米尔普福特，德米特里耶夫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已经预见到了20世纪中叶出现的数理经济学。<sup>[49]</sup>

## 5. 冯·博特凯维茨的解决方法

上述这一切，都没有给西方的社会主义者留下什么印象，也没有对俄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什么影响。然而，德米特里耶夫的著作被有着俄罗斯血统的柏林统计学家拉迪斯劳斯·冯·博特凯维茨注意到了。博特凯维茨是一个对马克思有着强烈兴趣的李嘉图主义者，1907年他发表了两篇研究转形问题的重要文章，虽然这些文章在当时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但对后来的研究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sup>[50]</sup>在第一篇文章中，博特凯维茨把德米特里耶夫“出色的工作”应用于马克思的转形问题，认为德米特里耶夫的作品“证明了一种杰出的理论才能，真正提出了一些新颖的东西”。<sup>[51]</sup>博特凯维茨和德米特里耶夫的分析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正如马克思那样，德米特里耶夫的模式，把商品生产的技术条件，包括表现为给定的实际工资的劳动力商品生产的技术条件，作为价格最终的和唯一的决定因素”。<sup>[52]</sup>博特凯维茨用由方程（3.4）到（3.7）构成的德米特里耶夫的代数框架，得出了马克思的剥削率和利润率函数（用“过去劳动”数量表示）。他还说明，在作为货币的商品的有机构成、劳动力价值和相关产业的生产价格之间存在精确的关系。<sup>[53]</sup>

然而，马克思和德米特里耶夫之间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博特凯维茨注意到，后者拒绝了马克思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所做的区分，并用代数表达式取代了数字例子。这种区别，比它们表面上看起来要重要得多，因为它意味着一种重大的方法论上的突破：德米特里耶夫使用同时决定的方式进行论证，而马克思使用因果链条进行推理，博特凯维茨批评这种推理是一种“连续近似”的谬误。德米特里耶夫证明了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批判是无效的，李嘉图没有混淆价格和价值，也不需要马克思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进行的区分，李嘉图的主张（被马克思否定的），利润率不受某些产业生产条件变化的影响，这些产业既不生产

工资商品也不生产用于（直接或间接的）工资商品产业的生产资料，这是正确的。<sup>[54]</sup>博特凯维茨在结论中，对马克思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毕竟价值计算和价格计算之间有着密切的数学联系，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缺陷，反映了他数学能力的缺乏”。马克思认为与价格决定相比，价值决定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是错误的：“不仅价格、工资和利润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简化为无需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数量开始的数学表达式，而且如果使用正确的公式表达的话，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数量甚至可以不出现在计算中”。<sup>[55]</sup>

博特凯维茨似乎对马克思有些着迷，他的第二篇文章更为直接地分析了《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转形问题。从概念层次看，这篇文章不如第一篇成熟，用三类模型取代了存在  $n$  种商品的模型（另外，对三个部类而言，生产不变资本的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是相同的）。第 I 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 II 部类的产出由工资商品构成，第 III 部类生产资本家消费的奢侈品。博特凯维茨进一步抽象掉固定资本，所有的资本每年周转一次，并假定简单再生产居于支配地位。这使得：

$$\begin{aligned} c_1 + v_1 + s_1 &= c_1 + c_2 + c_3 = C \\ c_2 + v_2 &= s_2 = v_1 + v_2 + v_3 = V \\ c_3 + v_3 + s_3 &= s_1 + s_2 + s_3 = S \end{aligned} \quad (3.8)$$

在这里，不变资本的产出完全等于各个产业使用的不变资本；工资商品的产出正好足以养活三个部类中的雇佣工人，奢侈品的产出正好等于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量。同米尔普福特一样，博特凯维茨用  $p$  表示平均利润率。另外， $x, y$  和  $z$  分别表示三个部类中生产价格和价值的比率；这和米尔普福特的  $x_1, \dots, x_n$  相对应。马克思的转形问题解决方法要求：

$$\begin{aligned} (c_1x + v_1y)(1+p) &= (c_1 + c_2 + c_3)x \\ (c_2x + v_2y)(1+p) &= (v_1 + v_2 + v_3)y \\ (c_3x + v_3y)(1+p) &= (s_1 + s_2 + s_3)z \end{aligned} \quad (3.9)$$

等式 (3.9) 是米尔普福特的等式 (3.1) 在三部门模型中的对等物。等式左边代表（用价格术语）每个部类的成本价格，乘以  $(1+p)$  表明生产价格必须包含成本和利润。右边表示用生产价格而不是用劳动价值标示的每一类商品的产出。资本家必须从出售他们的商品中获得足够多的收入（等式的右边）去补偿他们的支出和平均利润率为  $p$  时可获得的利润（等式左边）。

博特凯维茨有了 (3.9) 所表示的三个等式，但却有四个未知数： $x, y, z$  和  $p$ 。



他注意到，那个缺失的等式可以通过引入马克思两个“不变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得到（但不是同时引入两个）。总价值和总价格的相等使得：

$$C_x + V_y + S_z = C + V + S \quad (3.10)$$

$C, V$  和  $S$  是总量指标，使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等同于指定

$$z = 1 \quad (3.11)$$

等式（3.10）和（3.11）表达了马克思的两个不变条件。如同博特凯维茨在几个数字例子中表明的那样，一般情况下，两个条件不可能同时成立。比如，在一个第Ⅲ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构成的模型中采用等式（3.11），将使得价格总和超过价值总和，<sup>[56]</sup>反之亦然。马克思假定  $p = S/(C+V)$  是错误的。只有那些生产工资商品的产业（直接的或间接的）——事实上，即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但不包括第Ⅲ部类——决定了利润率。在这一点上李嘉图是正确的，错误的是马克思。<sup>57</sup>但是，博特凯维茨提醒道，这种结论不能被推广的太远。这并不意味着部类Ⅲ的资本有机构成可以无限的大，因为如果它的确很大，那么利润率的均等化将不再可能。<sup>[58]</sup>马克思的分析存在问题，但他的本意是正确的。

博特凯维茨的著作没有产生明显的直接影响。1949年，他的著作的英文翻译者保罗·斯威齐认为，“有证据表明，它只被少数几个专家阅读过”。<sup>[59]</sup>斯威齐没有对这些专家的身份进行说明，就我们所知，1942年出版的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对博特凯维茨的第二篇文章进行了概括，并引发了对转形问题重要的（和持续的）争论，在此之前，对转形问题进行的认真分析仅有两次。<sup>[60]</sup>没有任何一个第二国际的著名理论家关注过这个问题。35年的空白期，折射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研水平的不足。在这一段暂歇期，对价值理论进行的哲学思考出现了一些重大的进展，<sup>[61]</sup>但有关这个问题的技术分析没有取得什么明显发展。直到线性经济学工具在冯·诺依曼和里昂惕夫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出现后，对价值问题“数量方面”的讨论才重新开始。<sup>[62]</sup>

### 第三章注释：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8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172页。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 [3] 引自《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176页。
- [4] F. Set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4, 1957, pp. 154-5.
-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177页。
-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0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198页。
-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0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第218-219页。cf. R. L. Meek,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Valu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3) 2nd edn, pp. xvi-xliv.
-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185页。
- [9] W. Sombart, 'Zur Kritik des Ökonomischen System von Karl Marx', *Archiv für Social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 7, 1894, pp. 584-6.
- [10] W. Lexis, 'The Concluding Volume of Marx's Capital', *Quarterly Journal Economics*, 10, 1895, pp. 11-13.
- [11] C. Schmidt to F. Engels, 1 March 1895; original stress (International Institutug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L5588).
- [12] 《恩格斯致桑巴特(1895年3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1-692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 [13] 《恩格斯致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2、694、693页。
- [14] 《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的增补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5-1027页。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3页。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6-1019页。
-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9页。
-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7页。
- [19] M. Morishima and G. Catephores, 'Is there an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Problem"?' *Economic Journal* 85, 1975, pp. 309-28; R.L.Meek, 'Is there an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Problem"? A Comment', *Economic Journal*, 1976, pp. 342-7; Morishima and Catephore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g Problem": a Reply',

Economic Journal, 86, pp. 348-52.

[20] 《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的增补第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1-1027页。

[21] P. M. Sweezy,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Sweezy (ed.)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New York: Kelley, 1966, first published 1949) pp. vii-xiv.

[22] E. von Bö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Innsbruck: Verlag der Wagner'schen Universitäts Buchhandlung, 1884) pp. 418-47

[23] Ibid, pp. 434-6.

[24] Ibid, pp. 439.

[25] Ibid, p. 445

[26] E. von Böhm-Bawerk,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in Sweezy(ed.)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p. 30

[27] Ibid, pp. 34-40, 51-63.

[28] Ibid, pp. 40-51, 104, 118.

[29] R. Hilferding, 'Böhm-Bawerk's Criticism of Marx', in Sweezy (ed.) Karl Maand the Close of Ins System, pp. 121-96; Sweezy, 'Editor's Introduction', Sweezy (ed.)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p. xix.

[30] Hilferding, 'Böhm-Bawerk's Criticism', pp. 132-4.

[31] Ibid, pp. 187, 196.

[32] N.I. Bukhari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33] Hilferding, 'Böhm-Bawerk's Criticism', p. 135.

[34] Ibid. pp. 166-8.

[35] Ibid, pp. 169-70.

[36] Sweezy, (ed.)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p. xxi. n.l.

[37] Hilferding, 'Böhm-Bawerk's Criticism', p. 159

[38] Ibid, pp. 160-1.

[39] Dr Mühlport, 'Karl Marx und die Durchschnittsprofirate',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65, 1895, pp. 92-9; Mühlport, Preis und Einkommen in der Privatkapit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Königsberg: Hartungsche Buchdruckerei, 1893).

[40] Compare Mühlport, Preis und Einkommen, pp.42-5 with W. Mühlport, Die Handwerkerfrage und das Neue Handwerksgesetz (Königsberg: Verlag von Wilhelm Koch,

1899) pp. 7-8, 42-6. His complaint about the review in Die Neue Zeit is in 'Karl Marx', p. 98, n.1.

[41] 即 $(1/(1+p))$  (价格/价值) (价值) =  $(1/(1+p))$  (价格) = 成本-价格, 因为 (价格) = 成本-价格 $(1+p)$  )。

[42] L. L. Pasinetti, Lectures on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1977).

[43] Mühlport, 'Karl Marx', p. 98.

[44] 在他的论文中, 米尔普福特写出下式:  $(3.2a)a_1X_1 + a_2X_2 + \dots + a_nX_n = a_1 + a_2 + \dots + a_n$ 。即马克思把总价格等于总劳动价值的第一个不变条件, 它优先于上述 (3.2) (Preis und Einkommen, p. 26)

[45] Mühlport, 'Karl Marx', pp. 98-9.

[46] D. M. Nuti, 'V. K. Dmitriev: a Biographical Note' in Nuti (ed.) V. K. Dmitriev: Economic Essays on Value, Competition and Ut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29-32.

[47] 这也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观点。后来, 斯拉法证明当存在联合生产时, “化约为过去的劳动”将遇到困难; see M.C.Howard, 'Austrian Capital Theory: An Evaluation in Terms of Piero Sraffa's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Metroeconomica, 32, 1980, pp.1-23.

[48] V. K. Dmitriev, 'First Essay: the Theory of Value of David Ricardo', in Nuti, 'V. K. Dmitriev', pp.39-45; cf. Nuti, 'Introduction', in 'V. K. Dmitriev', pp.7-12; and P.Sraffa,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34-40, 56-9, 67-8.

[49] Dmitriev, 'First Essay', pp.45-80; Nuti, 'V. K. Dmitriev', pp.12-18. 注意为了避免与方程 (3.3) 相混淆, 德米特里耶夫的  $X_a$  等被  $P_a$  等所替代, 另外, 他的  $n_{A1} \dots n_{AM}$  应当被写为  $n_{A1} \dots n_{AM}$ , 第一个下标代表第  $a$  种商品 (谷物), 第二个下标指明相关的生产时期。

[50] L. von Bortkiewicz, '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2, 1952, pp. 5-60; von Bortkiewicz, 'On the Correction of Marx's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in Sweezy (ed.)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pp. 197-221. On von Bortkiewicz see J.A.Schumpeter, 'Ladislaus von Bortkiewicz, 1868-1931', Economic Journal, 42, 1932, pp.338-40, and W.S.Woytinsky, Stormy Passage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61) pp.452-4.

[51] Bortkiewicz, 'Value and Price', p. 20, n.31.

[52] Ibid, p. 22;正如正文中解释的那样,这是对马克思的过度简化。

[53] Ibid. pp. 5-27.

[54] Ibid, pp. 27-53

[55] Ibid, pp. 56, 54.

[56] Bortkiewicz, 'Correction', pp. 204-6.

[57] Ibid, pp. 214-15.

[58] Ibid, pp. 214-15.

[59] Sweezy (ed.) 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 p.v.

[60] K.Shibata, 'On the General Profit Rate',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January 1939, pp. 40-66; O. Kuhne,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Wert-und Preisrechnung des Marx'schen Systems (Greifswald: L. Bamberg, 1922: Greifswalder Staatswissenschaftliche Abhandlungen, no.14); P.M. Sweezy,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first published 1942) pp. 112-25.

[61] F. Petry, Der Soziale Gehalt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Jena: Fischer, 1916); I.I.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73; first published 1928).

[62] 参见M. C. Howard and J. E. King, 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 vol.11,1929-88 (London: Macmillan, forthcoming).

## 第四章 伯恩施坦、考茨基和修正主义论战

### 1. 德国社会主义的兴起

19世纪后半叶，德国经济经历了特别高速的发展，帝国（1871年才成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由一个相对落后的主要农业区，转变为世界上重要的工业力量之一。人口从1849年的3千5百万，增加到1910年的6千5百万，农村人口差不多稳定地保持在2千5百万，而城市人口则翻了两番。煤炭、金属制品、重型机械、造船工业、化工和电器产品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仅生铁产量，就从1860年的不足50万吨，增加到1910年的差不多1千5百万吨。德国的后发优势给它带来了最现代的技术，德国的大工厂差不多获得了规模经济能够带来的所有的好处。但是，工厂制度的优点不能被过度夸大。工厂制度外的工人、工匠和农业工人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坚韧性，直到1907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仍然在农业和林业领域工作。尤其是在北部和东部，半封建地主（容克）的权力基本上没有被触动。

与英国相比，德国的工业很大程度上受银行资助，银行获得了大量的股份和对制造能力方面的控制权。德国银行业高度集中，到1914年，五个最大的银行集团控制了全部银行资本份额的四分之三。因而银行鼓励对价格操纵的卡特尔的形成，卡特尔存在于世纪之交的大多数产业中，促进了产业集中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它们在海外的活动得到扩大，以至于在19世纪80年代，德国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国。30年后，帝国的资产总计达300亿马克，三倍于全国的年出口收入。在德国进行工业化的最初几十年里，贸易壁垒逐步降低，直到遇到开始于1873年的严重萧条，这时候，来自北美的谷物和英国的生铁引起的竞争，迫使大企业和容克都要求政府进行干预。1880年后，德国的市场再次受到关税保护。这只是国家普遍并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这种参与还包括政府或市政拥有铁路、矿山、工厂和公共设施的所有权，还包括俾斯麦式的社会立法，这些法律要求为疾病、意外事故和养老提供强制性的保险，对妇女、儿童的工作时间进行控制。到1914年，德国已成为一个有着强大社团主义因素的混合经济。

帝国的社会结构密切地反映了它的经济基础。除大企业和工厂的无产阶级外，还存在一个代表强大的准封建利益的地主；一个只能算是半无产阶级的且深受压迫的重要的农业工人阶级；一个数量巨大、通常比较富裕的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在德

国的南部和西部尤为明显；一个经常变化的，由各种类型的城市商人、手工业者和小雇主构成的中产阶级下层。从政治和文化方面看，德国处于完全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和旧体制的中间地带，前者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后者的典型例子是罗曼诺夫专制政体。特别是在普鲁士，前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即使是在非常先进的资本家圈子里也是如此。土地财富、军队和宫廷仍然拥有远远超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认为的影响力。<sup>[1]</sup>

德意志帝国的政治体制本质上仍然是专制式的，虽然对民主形式进行了少量的却意义重大的妥协，但贵族仍处于官僚机构的顶端。全国选举中，男性普选权的作用被削弱，这是由许多王国（特别是普鲁士）在选举方面作出越来越多的限制和人民主权概念的缺乏造成的。政府对君主而不是对议会负责，而且在整个这一时期，公民自由和言论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这些情况在1878年到1890年施行“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期间表现得特别明显。

当时德国的中层和上层阶级的观念非常保守，而且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既没有同时代法国存在的反教权的激进的共和主义，也没有格莱斯顿时期英国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上层资产阶级已经同贵族统治阶级结盟。同欧洲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贵族统治者的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雇主几乎普遍地敌视工会，这更多的是由于担心被颠覆，而不是由于对劳动力自由贸易教条式的坚持。英国模式中存在的集体谈判和工业调解，在德国发展的非常缓慢。在受人尊敬的德国政坛谱系的最左端，站的是“教授社会主义者”（讲坛社会主义者）。像古斯塔法·冯·施穆勒和阿道夫·瓦格纳这些人，更多受到的是洛贝尔图斯，而不是马克思的影响，试图把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竞争的怀疑、对福利立法的支持，与对德国政府以及德国正在迅速发展的军事机器那毫无异议的忠诚结合起来。<sup>[2]</sup>

德国社会主义深深扎根在这片明显贫瘠的土地上。1875年，在哥达统一会议上，成立了SPD——众所周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的缩写，SPD的成立是以一个马克思对它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和折中的纲领为基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影响力上，都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发展。三年后，带有压制性的“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没有影响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活动，只是使党的宣传活动变得更加复杂，但没有完全阻止党的宣传活动。SPD同迅速扩大的“自由”（非教派的，独立于雇主的）工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了广泛地开展党的宣传工作，便组建了一支庞大的由付薪雇员组成的队伍，这支队伍中包括一些组织者、讲演者和新闻记者。到1914年，SPD的成员已超过1百万，和它有联系的工会会员超过250万。在1912年的

选举中，人口在1万或1万以上的城镇中，SPD赢得了接近一半的选票。当时，完全有理由相信，德国社会民主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吸引了来自奥匈帝国、俄国以及德国国内的激进分子。它的辩论受到密切的关注，它的纲领被深入研究，它的知识分子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在欧洲内外都是如此。<sup>[3]</sup>

总之，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皇冠上的明珠，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对第二国际都起着主导作用。无论是在经济问题上，还是在其他一切问题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都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特别是卡尔·考茨基，写进了党的纲领。在下一节，我们将根据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中的表述和考茨基对纲领的阐述，对正统立场进行总结。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考察由爱德华·伯恩斯坦在这10年的后半段发起的对这些既定原则的挑战，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斯坦“异端邪说”的回应，以及由伯恩斯坦挑起的“修正主义论战”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有关殖民地政策和帝国主义的问题，只是论战中很小的一部分，对它们的讨论放在以下第五章和第六章。对修正主义在俄国产生的影响的研究放在第十章。

## 2. 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爱尔福特纲领》

德国社会民主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受到一系列不同的理论的影响，其中包括拉萨尔思想和恩格斯那声名狼藉的对手欧根·杜林的思想。19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期，洛贝尔图斯的保守国家社会主义也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马克思理论的最终胜利来之不易。<sup>[4]</sup>要想获得胜利，就需要努力奋斗。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最重要的倡导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是恩格斯及其门徒爱德华·伯恩斯坦与卡尔·考茨基。这一时期恩格斯的经济学著作，在以上第一章已经讨论过了。伯恩斯坦主要是一名记者，与考茨基相比，他只能勉强地算作理论家。考茨基是党的重要月刊《新时代》的编辑，撰写了非常有影响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该书实际上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摘要，1887年该书出版后的四年间，被译成5种语言，后来更被译成十三种语言。<sup>[5]</sup>



## 爱德华·伯恩斯坦小传

爱德华·伯恩斯坦，一个犹太火车司机的儿子，1850年出生于柏林，16岁离开学校开始在银行工作。1872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三年后作为代表参加了哥达大会，1878年以前一直积极参与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1887年因德国实行“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被迫流亡，先是在瑞士，之后移居伦敦（1888-1901），在伦敦时成为恩格斯的亲密朋友并和费边社有过联系。1901年返回德国，一年后当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的代表，此后多次当选，直到1928年退休。他是记者和党校讲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伯恩斯坦最初投了德国政府的赞同票，1915年改变自己的立场，并于1917年加入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1919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合并后的政府的财政部助理秘书。后来，伯恩斯坦再次加入社会民主党，但在20世纪2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1932年逝世。

## 卡尔·考茨基小传

卡尔·考茨基，1854年出生于布拉格，父亲是捷克人，母亲是德国人，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维也纳学生时代已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1883年创办德语的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刊物《新时代》，并任主编，直至1917年。1885年至1890年，生活在伦敦，同恩格斯和伯恩斯坦保持合作。回到德国后，考茨基撰写了大量的主题广泛的文章，很快就确立了他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杰出理论家的地位，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教皇”。从19世纪90年代后期到1914年，他领导了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斗争，同时也反对党的左翼的革命观点。考茨基最初支持德国的战争动员，1917年转而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1918年后，他继续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个极具批判性的视角）和苏联共产主义问题进行写作。1924年，考茨基返回奥地利，10年后，在陶尔斐斯政变之后逃亡到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移居荷兰，1938年在荷兰逝世。

考茨基负责被视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文献的制订和传播工作，在这一点上，考茨基的贡献甚至比恩格斯还要大。这里谈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比，出现了两个微妙但却是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作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特点，并在马克思晚年某些著作中仍然保留的黑格尔

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被更为常见的实证主义方法所取代，资产阶级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广泛接受了实证主义方法。严格的因果逻辑、趋势预测和决定论，逐渐脱离了马克思的辩证的先验论的范畴。第二，进化论的科学的自然主义被引进马克思的思想，随之而来的是有关国际和平、社会经济进步和科学认识日渐进步的乐观信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卡尔·考茨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的哲学观点更多受到的是《反杜林论》的而不是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影响。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历史科学，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牢固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sup>[6]</sup>

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着“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的废除，正常的政治生活开始恢复，党开始考虑用一个新的原则声明取代难以令人满意的哥达纲领。新宣言中有关实践的部分，交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伯恩斯坦负责，根据恩格斯的指示，考茨基负责理论部分。最终形成的《爱尔福特纲领》指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小企业被大企业取代，由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构成的中间阶层将最终消失；技术进步的一切利益都被资本家和地主独享，同时工人遭受的苦难和无保障不断增长；阶级对立日益尖锐；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对立，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经济危机一天比一天扩大，越来越具有毁灭性；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废除私有制，才可能使人类的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展。<sup>[7]</sup>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超越同样直白的《共产党宣言》。1892年，考茨基在他的著作《阶级斗争》中对纲领进行了系统的辩护，《阶级斗争》对资本集中和经济危机的原因作了极为详细的说明。考茨基论证道，资本集中和经济危机这两种现象密切相关。信用不只是一种资本集中、剥夺非资本主义部分的人口、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手段。它也是一种“使现代生产方式变得日益复杂并对一切干扰日益敏感的机体，使资本家日益感到不安并使他们的活动基础愈加不稳”的手段。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而这种生产过剩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造成的。经济扩张得越快，需求预测就变得越困难，市场条件的不确定性就越大，投机也就越疯狂。托拉斯和辛迪加无法消除危机，无法阻止国际竞争，它们只能造成资本家敌对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sup>[8]</sup>

考茨基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解释成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而日益增长的需求不足是他分析危机产生的另一个原因。利润率下降趋势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对危机产生冲击。考茨基认为，由于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相比增长得更快，利

润率在不断下降。但是, 这种趋势不会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 虽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显著的矛盾之一”, 虽然伴随的是产业利润中利息和税收份额的上升。然而, 资本积累增加得如此迅速, 以至于总剩余价值仍在继续上升。但是, 压力将转向小资本家, 他们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 “利润和利息的下降并不是资本家阶级的灭亡, 而只是它的范围的缩小”。反过来, 这又成为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资本集中以及它所推动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 使得剩余价值开始从消费收入比大的小资本家向消费收入比相对较小的大资本家转移。工人阶级消费的增长因失业率的上升而受到限制。<sup>[9]</sup>

考茨基认为, 结果将是长期的生产过剩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更加猛烈的危机。从长期来看, 国内需求的不足, 无法由市场出口的扩大相抵消。因为最有利可图的市场已得到充分的利用, 剩下尚未开辟的是那些“除了热带病和挨一顿棍棒之外, 什么也得不到”的市场。此外, 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上迄今为止仍不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 通过创造自己的竞争对手, “资本主义大生产为自己挖掘了坟墓”。市场的扩张最终将不再可能, 这“将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 它也已经“开始在自己的剩余中窒息”。考茨基的推论是, 资本主义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未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取代资本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个主题, 成为他这部著作下半部分的主要内容)。<sup>[10]</sup>

《阶级斗争》用简单而形象的语言写就, 坚持认为迫在眉睫的社会变革即将来临, 成为一本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除了恩格斯偶尔作出的思考(许多最重要的思考是三年后《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时才作出的), 《阶级斗争》是唯一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90年代的实际相结合认真尝试。至少在当时, 这本著作的不足之处被掩盖了, 考茨基本人的崇高威望、恩格斯的权威支持, 以及考茨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自信, 都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但是《阶级斗争》中的缺陷确实存在, 无论是从经验上还是从理论上, 《阶级斗争》都不能算是一本令人信服的著作。考茨基有关资本集中、无产阶级贫困加剧、利润率下降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判断, 并没有被任何严肃的统计调查数据所证明; 而且《阶级斗争》明显地缺乏马克思使用过的细致的历史研究方法。考茨基对卡特尔、信用、危机和崩溃的说明, 更多的是一种断言而不是严格的分析。不确定性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 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极具争议的复杂问题, 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上, 对考茨基期望过高是不公平的。尽管《阶级斗争》是在《资本论》第二卷出版差不多8年后写成的, 但考茨基却没有尝试使用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去证明生产过剩的必然性。当然, 这本书没有对它末日论式的腔

调进行任何合理的辩护。认为考茨基在《阶级斗争》中提出了“一个十分机械的关于崩溃的概念”的指责<sup>[11]</sup>，在《爱尔福特纲领》中也很少有为之辩护的内容。但是，对《阶级斗争》的这种解读，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当考茨基写下“不可抗拒的经济力量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毁灭”<sup>[12]</sup>时，他实际上是在向严厉的批判招手。不久之后，它真的来了，而且是来自一个最意想不到的方向。

### 3. 伯恩施坦对正统的挑战

重要的是要记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记者或政治活动家，而不是学者，即使是他们最抽象的作品，也是面向具体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当时，卷入修正主义争论的每个人都认为，抽象的理论问题和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理论上的错误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治上的失算；反过来，在保护关税、殖民地扩张或大规模罢工等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必然总是源自对唯物史观的误解或委婉拒绝。然而，事实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远没有修正主义争论的参与者所认为的那么紧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很少有对理论细节表现出极大兴趣的，党的领导人对发生的具体事件往往做出务实的反应，而不是始终如一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本原则。<sup>[13]</sup>争论的参与者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结果修正主义争论同时具有了政治分裂和理论辩论的双重特征。

在用什么方式实现社会主义问题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是很明确。《爱尔福特纲领》承诺党将致力于获取政治权力，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1891年，倍倍尔议员几乎否定了采取任何行动的必要性，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正在大踏步地走向毁灭，我们需要的只是等待，等待那个捡起从资本主义手中脱落的权力的时刻”。考茨基从来没有走得这么远，但是在考茨基那里也存在含糊不清的地方，1893年，他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定义为“一个革命的，但不制造革命的党”，并且否认无产阶级发起社会革命的权力要大于资产阶级阻止革命发生的权力。<sup>[14]</sup>阶级斗争在加剧：党必须作为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参与其中，但是这一切将如何结束？

爱德华·伯恩施坦认为这两种想法都是错误的，也否定了这些问题的相关性。如果阶级对立的强度事实上是在下降，那么社会民主主义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结盟就是可能的。但实际上，与党的领导人含糊不清的革命措辞相比，这种结盟能提供更为稳固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伯恩施坦宣称，社会民主党是

有着强烈选举倾向的改良主义的党。除了在口头意义上，不能把党和党的工会盟友，看成是有任何革命性的东西。这符合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现实，但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日益远离德国的现实。伯恩斯坦推论说，现在正是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真正本质、并相应地修正理论包括修正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极好时机。

重要的是，伯恩斯坦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之外的地方度过的，起先是在苏黎世，关键的是后来在伦敦（1888年至1901年之间）度过。在英国，没有可供谈论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革命党的位置被稳固而又成功的工会运动和一个强大而又激进的游说集团占据，游说集团通过议会立法完成重要的社会改革。伯恩斯坦深受英国费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影响，后者代表了左翼中产阶级的观点，并和费边主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sup>[15]</sup>早在1890年，伯恩斯坦就把社会民主主义描述为“民主自由主义的必然扩展”。<sup>[16]</sup>这种看法，既总结了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概括了诸如J.A.霍布森那样的改良的进化观。

当然，伯恩斯坦和恩格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恩格斯的巨大的权威性，也被伯恩斯坦用来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言论、用来捍卫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事实上，恩格斯去世前一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已经被公开地解释为（如伯恩斯坦解读的那样）第一篇重要的修正主义文献。<sup>[17]</sup>然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攻击将会深深地伤害恩格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伯恩斯坦直到1896年才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时，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已经受到了像冯·福尔马尔和大卫那样的人的攻击，他们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接受现实赋予它的任务：作为一个非革命性的改良党致力于建立和平的政治秩序。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这种支持，对党获得选举的胜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此外，他们坚持认为，同恩格斯和考茨基预计的不同，资本主义农业的胜利并没有使农民消失，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只是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生存状态。至少在农业领域，社会两极分化的速度远比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预计的要慢。<sup>[18]</sup>在1896年至1898年之间发表在《新时代》的系列文章中，伯恩斯坦对这些论点的讨论有着深远的意义，后来，伯恩斯坦将这些文章再加上一些补充说明和对考茨基的批评的答复，以《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为题出版。随后，1899年，伯恩斯坦出版了一本更加系统的论述修正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书以《进化的社会主义》为名被译成英文。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一个方法论宣言为开篇。伯恩施

坦主张，“对马克思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和阐释，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这不仅是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一系列的矛盾，而且“今天，不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可以证明任何事情”。<sup>[19]</sup>也因为马克思过于刻板的唯物主义，贬低了人类意识的价值，人们将会赞同和加尔文主义的宿命论差不多的东西，这对制定实现社会民主的有效政治战略来说，成了一种障碍。事实上，正如恩格斯在他晚年的很多著作中承认的那样，社会正在日益摆脱经济规律的残酷无情。伯恩施坦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未能考虑到这一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1867年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发生的许多根本性变化。他相信，可靠的唯物史观可以被用来反对过度的“极端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反对，只能建立在康德而不是黑格尔的哲学基础之上。事实上，他以把自己描绘为康德式的社会民主的支持者结束了自己的著作。<sup>[20]</sup>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造成的影响，比伯恩施坦自己意识到的更为深远。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日益增长的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智力反叛，引起了学术兴趣的再度复兴，但是这种学术兴趣针对的是康德的知识论，而不是长期以来声誉欠佳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康德否定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这种观点只把建立实际观察到的事物之间的规律性联系视为科学的任务，强调取消认知主体在知识构建中的优先地位。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因认为康德哲学具有非历史性的特征而经常批判它，但康德哲学并不一定必然和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或者《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所表达出来的哲学思想相对立，这两本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然而，新康德主义很难与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实证主义唯物论相调和，而且实际上向占主导地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重大的哲学挑战，尤其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作的同化提出了重大挑战。伯恩施坦取得的成就，要比他可能取得的少得多。他不是哲学家，他是一个折中的经验主义者，也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新康德主义者。<sup>[21]</sup>

伯恩施坦的理论特征，在他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批判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他借鉴了庞巴维克的反对意见（参见以上第三章的概述），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边际效用分析，但他并不主张放弃劳动价值论。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对不同工人之间技能、速度和效率差别的分析，赞同俄国学者利奥·冯·布赫的观点，认为个别工人耗费的劳动数量只能通过参照他们获得的工资去度量。除非以这种方式定义，否则价值概念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假设，一个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思维建构”。<sup>[22]</sup>伯恩施坦否认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标志着古典价值理论的重大

发展, 而认为古典价值理论的支持者显然很明白, 个体工人是广泛的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他被期待已久的《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对价值理论的分析, 特别是马克思对转形问题的讨论, 弄得很失望。伯恩斯坦并没有被恩格斯为劳动价值论进行的历史辩护说服(参见以上第三章), 他同意康拉德·施米特的意见, 如果劳动价值只是普遍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经济中, 那么把劳动价值概念应用于资本主义时, 它就只代表“一个纯粹的公式”、“一种抽象”、“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sup>[23]</sup>如果把同样的逻辑用于边际效用理论, 那么, 能够得出的结论是, 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相同的本体论基础, 因此, 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去拒绝一个而支持另一个, 两者都有其用途。考茨基却“拿枪抵住我的脑袋: 非此, 即彼”。但是, 没有任何人(即使是考茨基)否认在给出一个对象的价值时, 无论是效用还是明确的劳动内容都是必须的。伯恩斯坦问道: 为什么不能不再像马克思使用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概念时所做的那样, 因为合并了价值的两个要素而混淆了问题, 而明确地认识到上面的观点呢?<sup>[24]</sup>

在剥削理论上, 伯恩斯坦又一次试图调和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方法。他指出, 剩余劳动是“一个经验事实, 可以被经验证明, 不需要什么演绎证明”, 劳动价值论除了是“一种分析和说明的方法”<sup>[25]</sup>之外, 和剩余价值无关。马克思本人在使用他的原始积累模型解释剩余价值的起源时, 并没有引用价值理论。伯恩斯坦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和那些来自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和马克思相同的结论, 已经由欧根·杜林(等)支持的洛贝尔图斯主义者的“租”理论得出, 已经由英国的“杰文斯社会主义者”从劳动价值和需求价格的关系中推出的利润理论得出。<sup>[26]</sup>此外, 伯恩斯坦还认为, 在衡量剥削程度时,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率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指标。商品按它们的生产价格而不是劳动价值出售, 从而使得对个体而言的剩余价值率, 变得无关紧要。工作能力最低下的工人的剩余价值率也最低, 反之亦然。另外, 马克思夸大了总剥削率, 因为他认为商业和银行活动是非生产性的, 但是“从本质上看, 它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sup>[27]</sup>在这一点上, 伯恩斯坦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讨论。同作出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相比, 伯恩斯坦作为马克思的价值和剥削理论的批判者, 给人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像韦伯和霍布森那样的英国著述者的贡献更大, 即使他们的著作更加倚重乔治·亨利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而不是马克思或杰文斯。<sup>[28]</sup>

伯恩斯坦攻击的第三个批判对象是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早在1893年, 他就认为拉萨尔主义的“工资铁律”只在一个时代是成立的, 即先于伴随着工业革命

出现的“现代工业”时代之前的“制造”时代。“工资铁律”只适用于小工业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和存在国家干预、工会压力和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当代资本主义无关。伯恩斯坦称，如果以绝对而不是以相对的形式考察工资，实际工资在持续增长。如果说工人阶级的境况的确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这是因为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工人生存的不确定性造成的，而不是物质生活水平遭到持续的冲击造成的。<sup>[29]</sup>伯恩斯坦从来没有放弃这一立场，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也没有给这个立场增添什么更多的内容，也没有否认反映为利润比工资增长得更快的相对贫困的存在。<sup>[30]</sup>然而，1901年，他指出，工人阶级因地区和（特别是）职业的不同而开始不断分化。像工会那样，现代技术在工人阶级中造成整合和分化的趋势，但不能确定地说哪一种将占主导地位。但是，工人的工资差别很大且在不断扩大。伯恩斯坦认为，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传统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切实际，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视为一支单一、同质的力量，使得失业的产业后备军更像是一种抽象而不是现实。这些观点经常成为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理论的构成部分，并在20世纪70年代被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挖掘出来。伯恩斯坦的结论就是，这些问题给德国社会民主党带来了不利的政治影响，如果社会民主党打算实现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就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充满斗争精神的工人阶级。<sup>[31]</sup>

伯恩斯坦第四个反对意见是针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的观点，特别是针对生产资料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看法的。SPD在1895—1896年讨论“农业问题”时已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在考茨基的同名著作中，他被迫承认，德国农业资本的集中被证明比迄今为止预想的不仅要慢，而且还要复杂得多。<sup>[32]</sup>伯恩斯坦引用了来自几个国家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论点，上述情况在农业领域之外也是成立的，甚至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言都是如此。税额和股权分配的数据表明，财产所有权的分散广泛存在并可能逐渐扩大，而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预测的越来越集中。事实上，为了解释消费品行业产出的扩大是如何在国内市场找到盈利渠道的，是需要类似情况的。<sup>[33]</sup>然而，伯恩斯坦承认，虽然大工业发展得更更为迅速，但小作坊的生存也令人印象深刻，即使是在英格兰，小作坊也容纳了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就业人数。规模经济明显不如通常认为的那样重要，在诸如烘焙和零售分销等行业，小企业在继续主导着本地市场。《爱尔福特纲领》过高地估计了经济的现状，进而过高地估计了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正在变化的速度。<sup>[34]</sup>

这些结论把伯恩斯坦直接引向他批判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这一部分他抨击了认为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正统观点。在《资本



论》第三卷中，恩格斯的立场有点模棱两可，既可以被理解为预示了经常发生的旧类型周期性危机的终结，也可以被看作是对持续萧条的预言。有关19世纪90年代末卡特化“新资本主义”的观点，同样存在矛盾之处。在一些人看来，它是一个日益受到监管和控制的、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危机的生产方式，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它只是一种长期危机的状态。<sup>[35]</sup>伯恩斯坦确信，19世纪90年代体验到的繁荣，否定了后一种解释，而且这一解释还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和考茨基一样，伯恩斯坦认为利润率下降和危机问题相关。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斯坦表明最流行的社会主义者的危机理论是以消费不足的方式提出的。但是，这已经被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和马克思本人（经过最初的犹豫）否定了，因为这在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购买力都在稳步扩大的经济中，是完全站不住脚的。<sup>[36]</sup>

伯恩斯坦认为，马克思在晚年的著作中还提到危机的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由投资支出的积聚和更新引致的“回波效应”，但是这一原因原则上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也无法被任何证据所支持。另一个认为在再生产过程中存在比例失调，这种比例失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并且因世界市场的增长与财富和信用的大扩张而得以加强。伯恩斯坦认为，相反这些发展为有序的调整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不引发普遍的危机的情况下，特定行业的生产过剩越来越有可能被避免或消除。通讯条件的改善，使得信息的传递更加便捷和安全。卡特和托拉斯能够调节生产并保持更加稳定的价格和产量。由于无法预见的外部事件的存在，危机仍然是可能的，但它们已不再是无情的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那种认为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行将崩溃的普遍期望是没有根据的。<sup>[37]</sup>

#### 4. 卢森堡和考茨基的回应

伯恩斯坦的大部分批评只是尚待证实的断言，而不是严密推理的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作为理论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修正主义争论的内在本质造成的。对于积聚、集中、社会两极分化或无产阶级意识的增长程度，并不存在公认的评判指标。因而对于这些现象中存在何种程度的趋势来判断支持争论中的这一方还是那一方，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修正主义相类似的缺陷，在《阶级斗争》中也可以找到，但有理由认为，经济事实是站在伯恩斯坦一边的。伯恩斯坦最终受到的抨击是围绕他的理论基础展开的，伯恩斯坦的批评者通过对正式的危机和崩溃模型的详尽阐述，通过对垄断、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和战争之

间的联系展开的不是很严密的分析，对伯恩施坦进行了批评（参见以下第五章、第六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和第十六章）。然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最初的反应是论辩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毫无疑问，先行者应当是卡尔·考茨基，但他却被年轻、积极、雄心勃勃的罗莎·卢森堡抢了先。

#### 罗莎·卢森堡小传

罗莎·卢森堡1871年出生于沙皇俄国统治下波兰扎莫什奇一个犹太人中产阶级家庭。在华沙长大，1890年被迫流亡到苏黎世。她在苏黎世大学学习，帮助创建了反对民族主义的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SDKP)。1898年移居德国，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记者和教师，1908—1914年，她被德国社会民主党设在柏林的中央党校聘为讲师。卢森堡一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保持联系，她（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是德国社会主义者少数派的领导人之一，少数派从一开始就极力主张通过革命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卢森堡是斯巴达克同盟的创建者之一，1918年出狱后成为德国共产党（KPD）的创建者之一。卢森堡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热情而又充满批判精神的支持者，1919年，在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默许下，她和李卜克内西被右翼准军事部队杀害。

鉴于和伯恩施坦的私人友谊，考茨基在很长一段时间引而不发。卢森堡第一个参与了争论。<sup>[38]</sup>在1898年的一系列报刊文章中，卢森堡用和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詹姆斯·博纳相同的评价，开始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博纳在评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时，对修正主义作的政治上的评价是：“事实上，伯恩施坦先生的原理，给我们带来的似乎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只有民主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到目前为止在德国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一直变化无常）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伯恩施坦先生不过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sup>39</sup>卢森堡公开了她打算捍卫“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意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将由于自己、由于本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完全不可能存在。”这是解读已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种看法，卢森堡同库诺·亨利希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等一些次要人物，而不是同考茨基分享了这种看法。

卢森堡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有三大支柱构成：第一，“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断

增长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毁灭；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增长，孕育了未来社会主义秩序的萌芽；第三，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阶级觉悟在不断增长。伯恩斯坦否定了第一个论点，但却拒绝回答一个明显的问题：“究竟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达到，且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呢？”伯恩斯坦把第二个和第三个论点看成是阻止危机发生和促进和平进步的因素，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似乎成了多余的东西。针对这种观点，卢森堡认为，信用和卡特尔的增长加剧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危机的严重性。信用的扩张往往通过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投机活动引起生产的扩张，然后，当信心开始动摇的时候，它迅速地减少了消费，因为“危机刚刚露出苗头，信用就紧缩了”。卡特尔远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在卢森堡看来，它只是“加剧资本主义固有的无政府状态”的手段。卡特尔要提高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就只有牺牲别的部门的利益。但它无法阻止整个经济“利润率的致命下降”。<sup>[40]</sup>

重要的是，卢森堡（追随考茨基）把利润率的下降看作是资本集中的手段，而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以上引述的内容，似乎是她唯一一次对利润率趋势问题非常认真的分析。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一小册子的后面部分，卢森堡认为，军国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它为资本家的“金融和产业资本提供最重要的投资形式”。国内利润率下降导致的资本输出，推动了希法亭—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如果卢森堡的上述分析算得上是希法亭—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胚胎中所包含的东西，那么这种类型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卢森堡这里算得上是胎死腹中了。卢森堡自己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差不多酝酿了整整15年，而且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希法亭和列宁）的形式（参见以下第六章）。<sup>41</sup>在早期的争论中，不存在任何有资格被称作危机理论的内容。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这种口号式的东西，只能算是危机理论肤浅的表达。伯恩斯坦在反对卢森堡的信用和卡特尔的功能的观点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与此同时，他对卢森堡提出的关于德国社会主义党的“最终目标”如何实现这个问题的回答，成为修正主义的著名的格言：

我对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东西极少有热情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在我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我所理解的运动就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成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sup>[42]</sup>

卡尔·考茨基的《反批评》一书<sup>[43]</sup>作了更具实质性的努力。同卢森堡的批判一样，政治是这本书的核心。考茨基的政治基石是这样一个信念，即资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因此，无产阶级必须继续独立于其它阶级，社会民主党必须完全独立于所有其他党派。这种视角影响了他对修正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基础的反应。他反对伯恩斯坦思想中的新康德主义要素，因为它是从普遍的道德原则中得出社会主义，取消了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基础。他坚持资本集中日趋增加和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的观点，因为如果没有这些趋势，未来的前景就可能是他所强烈反对的阶级调和和政治结盟。<sup>[44]</sup>

《反批判》的特色在于它以方法论问题作为开篇。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批评马克思的方法，但却未能找到任何替代的方法，而且仍在（不一致地）继续使用它。修正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反对是错误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机械的必然性。<sup>[45]</sup>紧接着的，是简短但难以令人满意的论述价值理论的一章。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作出的唯一让步，涉及熟练劳动简化为非熟练劳动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他承认——马克思本来可以讲得更加明确。但从理论上讲，价值是先于工资的，用后者去决定前者是不合理的。价值不只是像伯恩斯坦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概念，价值是原则上可观察到的价格的长期趋势或价格波动的中心。考茨基谴责了伯恩斯坦的折衷主义，并指责伯恩斯坦在详细说明边际效用分析在何种用途上优于劳动价值论问题时，含糊不清和故意回避。然而，考茨基自己既没有提供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批判，也没有对他自己承认的确实需要的工资决定理论进行详细分析，也没有充分提到马克思对劳动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分析。这一章最后以一个教条式的断言结束，即对劳动价值论的拒绝导致的不仅仅是对任何一种剥削理论的放弃，而是对唯物史观的全部内容的放弃。考茨基没有尝试去证明这些包罗万象的判断，他对整个问题的处理远不及5年后希法亭对庞巴维克的批判（参见以上第三章）。<sup>[46]</sup>

《反批判》的主要目的是对《爱尔福特纲领》所勾画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详尽图景的辩护，《爱尔福特纲领》表面上是制定SPD战略的基础。这部分占据《反批判》其余部分五分之四的篇幅。首先，考茨基公开指责说，所谓的崩溃理论是伯恩斯坦根据自己的想象虚构出来的。无论是考茨基本人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曾提出过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理论，而且“崩溃”一词也不是（如伯恩斯坦声称的那样）社会民主党的日常用语。正如考茨基推断的那样，真正提出“崩溃论”的是《共产党宣言》，即使是《宣言》也只是提及无产阶级不断增加的力量、团结和阶级意识，而且和伯恩斯坦批评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宿命论完全不相

符。这种判断具有一定的真理的成分，考茨基也十分合时宜地略去了他自己的一些早期著作中末日论的论调和罗莎·卢森堡对崩溃理论所作的非常明确的说明。<sup>[47]</sup>

考茨基以更为坚定的态度，反驳了伯恩斯坦对资本集中的批判。考茨基指出，修正主义的观点再一次缺乏准确性，很难知道伯恩斯坦是不是否认任何资本集中程度提高趋势的存在。考茨基指出，所有的理论都必然是抽象和“不现实的”，如果伯恩斯坦说的仅仅是这件事，那么他没必要如此紧张。事实上，经济中所有部门的资本集中程度都在提高，只是有时候比较快，有时候比较慢而已。在零售贸易领域这点表现的最不明显。伯恩斯坦的理论是一个关于“理发店和小酒馆”的理论，并不适用于制造业中的重要部门。在任何情况下，小资本家都越来越依赖于大资本，在农业领域尤其如此，在这个领域土地使用状况的数据掩盖了经济力量有效集中的增长。工业卡特尔的存在，进一步证明了资本集中度的提高，令人惊讶的是伯恩斯坦忽视了这一点。<sup>[48]</sup>

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有关财产所有者数量在持续增加的观点，在英国之外的地方，并没有获得充分的统计支持，而作为全球性帝国中心的英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至于股份公司，它们代表的本来就是一种扩大资本集中的手段。完全有闲资本家数量的上升，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寄生性和历史多余性。<sup>[49]</sup>最后，考茨基认为伯恩斯坦对有产阶级规模扩大理论的分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剩余价值的急剧扩大并不需要越来越多的资本家的肚子去消费它。剩余价值中很大一部分被非常富有的人或代表他们利益的国家的非生产性支出吸收了，其中包括军事设施建设和对时尚、豪华商品的炫耀性消费。特别是资本积累成了剩余价值最重要的出路。<sup>[50]</sup>

在工资问题上，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作出了实质性的让步，把物质方面的贫困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最近才确立的领域。然而，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在增加，因为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如资本家快，无产阶级长期不安全的境况已威胁到甚至是英格兰和德国工人阶级中最有特权的那部分人适度舒适的生活。<sup>[51]</sup>这里不存在任何伯恩斯坦不赞同的东西。

考茨基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则是另一种情况。考茨基以一个揭示事实式的声明开始了他的分析，他认为与资本集中和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相比，危机只是次等重要的事情。它们只是加强了这些趋势，即使危机不存在这些趋势也会继续。考茨基争辩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曾断言经济危机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伯恩斯坦再次竖起了一个稻草人。没有任何人否认马克思那个时代体验到的十年

期的波动已经停止。真正的问题是，危机——无论它的周期有多长——是否会一再地发生，如果发生了，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sup>[52]</sup>

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危机不可避免，因为它产生了生产过剩。随着产出增长率提高，整个体制对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增加。工人阶级不可能提供充足的市场，因为其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任何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都是由自给自足生产下降造成的，类似的压力使得国外市场的扩张成为可能。但这从来都是不够的。“每一次市场的进一步扩张都刺激了生产，把它推向生产过剩和危机。每一次危机都对扩展市场产生了更紧迫的刺激”。这不仅促进了资本集中，增加了工人阶级生存的无保障，使我们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且也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破坏了资本主义。一旦生产过剩变为长期的，市场的扩张就不再能跟上生产的脚步，在这一意义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趋于不可能”。考茨基否认了在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生产中涅槃时大规模的、世界性危机的必要性。生产过剩的形成可能会十分缓慢，而且不可能存在任何关于“为何”和“何时”这类问题的准确知识。阶级斗争很可能在长期的生产过剩达到它的极限状态之前就废除了资本主义，但这种极限状态的存在是具有政治意义的，因为它使得最终目标的实现可以被预见。<sup>[53]</sup>

除了对信用和卡特尔的一个简短讨论之外，《反批判》对危机问题没有说出什么更多的东西，而且这个简短的讨论也未能给卢森堡的看法增添什么新内容。<sup>[54]</sup>考茨基对自己观点更详细的说明，发表在1901年的《新时代》杂志上，这是一篇评论俄国修正主义者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论述危机问题著作的文章（参见以下第九章和第十章）。他从对马克思利润率下降分析的辩护开始，批判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主张的利润率将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再一次把这看作是一个和危机问题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孤立的技术问题。<sup>[55]</sup>在论文的第二部分，考茨基提出了他自己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解释，这是一种十分明显的消费不足论。“然而，在无产阶级中存在着一个阶级，他们的消费不足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消费不足无论如何不能在物质的意义上加以理解，这有点像营养不良，而应当在社会的意义上加以理解，应理解为一个阶级的消费落后于他们的生产”。<sup>[56]</sup>

在这一意义上，考茨基继续指出，消费不足是阶级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然而危机的存在还不到一个世纪。从而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费不足才会导致危机。在工业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剥削的目的几乎完全是为了满足有产阶级奢侈消费的需要，从而生产过剩的危险不是太大。资本主义既限制了富人的消

费，也持续、迅速地增加了消费品的产出。因此，资本家“必须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之外和还没有开始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寻找更多的市场”。但是，即使这样也是不够的，考茨基断言，因为这些市场不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所要求的显著的弹性。“总而言之，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被普遍接受的由马克思所确立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sup>[57]</sup>

早在1884年<sup>[58]</sup>，考茨基就已经提出类似的观点，并预见到罗莎·卢森堡后来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帝国主义理论将在以下第六章详细考察。考茨基接着从资本主义工商业中不同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的角度，继续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比例失调是危机的唯一原因（参见以下第九章和第十章）。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使用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证明，只要所有部门以适当的比率增长，生产过剩是可以避免的。他推论道，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特征，使得成比例增长变得不可能并导致危机。考茨基赞同比例失调，“是一个能够不时……自行产生危机或使”已经存在的“一般性的危机变得更尖锐的因素”。但消费不足才是所有危机“最终的原因”。如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和人类需求无关的自我维持机制。“生产是、并仍然是为了人类消费而进行的生产”，考茨基坚持认为，持续的摆脱了危机的、并伴随着消费增加的生产扩大是不可能的。<sup>[59]</sup>

在积极的意义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指出，试图把卡特尔看作是避免危机的方式是徒劳无益的。<sup>[60]</sup>他记载的全球范围内失业增加的资料，被考茨基看作是危机变得更加尖锐、持续时间更长的证据。伯恩施坦几年前持有的“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将不再能够继续。<sup>[61]</sup>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数据和帕尔乌斯有关经济活动长周期的假说相吻合，第一次长周期开始于1815年，结束于1849年，第二次发生在1849年至1887年，第三次（开始于1887年）还处在它的上升期。这个理论既解释了19世纪90年代的相对繁荣，也对它的必然消亡作了解释。考茨基的结论认为，先前狂飙突进时期的迅速扩张，只持续了20年或最多25年。长期的生产过剩必然形成，甚至可能会迅速形成。在它来临之前，存在着严重的战争危险，因为停滞阶段是最有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sup>[62]</sup>

考茨基对危机的讨论表明，1914年之前消费不足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相随的利润率下降的观点被边缘化、比例失调的危机模型也广受怀疑。然而，在对问题的分析上，考茨基并没有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通过证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关于消费下降的同时避免了危机的增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就很容易驳倒杜冈·巴拉诺夫斯基<sup>[63]</sup>，或者用伯恩施坦自己的炸药把他

炸飞（因为这位修正主义的先驱者接受了相对贫困的现实）。构建一个消费不足的正式模型，并把它和周期性危机联系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作过努力。他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伯恩斯坦在这方面做得更少。事实上，故事中的两个主角，都没有显露出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才华。

## 5. 评价

考茨基主义的正统，建立在对德国社会独特认识的基础之上。伯恩斯坦在这点上同考茨基展开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算是成功的。考茨基认为，德国资本主义既是一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也是一个越来越容易发生危机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但要通过同类型的和具有激进的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预来实现。伯恩斯坦对考茨基认为的危机日益严重的观点提出质疑，因为考茨基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伯恩斯坦认为，德国社会比马克思抽象模型中纯粹的两极分化型的资本主义要复杂。小企业的地位仍然很稳固，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很强大，工人阶级中不仅存在着分化，而且还出现了改良主义者，因而认为革命即将到来的正统观点是完全不可信的。

但是，伯恩斯坦希望通过和平的议会手段去逐渐实现社会民主，同样是不现实的。议会手段预先假定了自由资产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打算在对抗国家时与社会主义者结盟，但是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阶级。考茨基认为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和群体，构成了（如果不是实际的也是潜在的）反对工人阶级的反动大众，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通过同所有其它阶级进行的斗争，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观点是正确的。考茨基的错误在于严重夸大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伯恩斯坦对通过阶级结盟取得社会改良的胜利的前景，充满了毫无根据的乐观主义，犯下了和考茨基相反的错误。

无论是从实际的组织上看，还是从理论上，伯恩斯坦很明显是修正主义争论的失败者。修改《爱尔福特纲领》的提议，遭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绝大多数党员的一致反对。即使是在对考茨基主义的正统持敌对态度的党的少数派中，伯恩斯坦更多的的是一个可供使用的符号，而不是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修正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的编辑约瑟夫·布洛赫承担了这一角色。<sup>[64]</sup>伯恩斯坦对考茨基分析性批评的答复，有时出现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有时出现在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中收集的文章撰写的附言中，它们不仅不够完整，而且缺乏深度。<sup>[65]</sup>修正主义者对正统信念发起有效挑战所需的理论专著一直没有出现。伯恩斯坦



自己几乎完全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唯一可能的候选人就是康拉德·施米特，他一直是以为记者为业的。

这并不是在否定修正主义观点的力量——无论是在抽象上（比如，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还是在具体的经济分析上（比如，价值理论、危机、希法亭后来描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出现等），修正主义观点的力量都是巨大的。不应当为修正主义的出现感到震惊。事实上，人类的主题在经常变换，可以认为，作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需要持续地修正它的规律和概念。但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具有僵化的宗教信仰的特征，它对批评意见不理不睬，对异端思想围追堵截。因此，伯恩施坦更多遭到的是谴责而不是反驳。

也有可能是因为修正主义者的理论项目——提出可以和自己的对手恩格斯与考茨基的理论相提并论的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理论——太雄心勃勃而无法实现。毫无疑问，修正主义无法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范围外获得发展。即使是在俄国也是如此，虽然伯恩施坦在俄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虽然列宁再三地对“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学家”以及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进行指责，虽然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俄国内部也存在着严重争议，但修正主义依然无法在这里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争论，同确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所需的战略有关，1917年之前，所有的非农民政党都赞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它是落后的沙皇俄国唯一可能的革命形式。虽然像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司徒卢威这样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确使用了和伯恩施坦相似的观点，但这只是他们用来反对一切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构成部分（参见以下第十章）。<sup>[66]</sup>

在德国，人们对这样一种观点充满争议，这种观点认为伯恩施坦在公开的战斗中失败了，但却最终赢得了斗争。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目标而言，正如伯恩施坦所说的那样，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务实的改革党，在很大程度上，它缺乏革命热情，甚至也缺乏（如1918-1919年的事件揭示的那样）对德国政府进行全面的资产阶级民主重建的能力。党以及（尤其是）和它有联系的工会，因接受改革带来的收益（虽然非常有限）而妥协，越来越倾向于接受社会和政治现状。

<sup>[67]</sup>可以认为，对任何作为合法的政治存在——无论多么空洞——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革命纲领和和改良活动之间的矛盾，构成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sup>[68]</sup>长期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理论和实践迟早（后来的事实证明）必须相一致，如果不是这样，实践就不能称之为实践。因此，1921-1925年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有效的《格尔利茨纲领》，体现出的是修正主义的精神。<sup>[69]</sup>1914-1933年之间的许多理论发展，从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到法兰克福学派对一切

机械的经济规律的反对，都可以在伯恩施坦最初的辩论中找到渊源（参见以下第十四章）。

然而，1914年以前，正统马克思主义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果说20世纪开初的15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确经历了重大发展，那么，这种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涉及考茨基在击败伯恩施坦时未能完成的工作时实现的。除了价值理论，这一议程还包括三项存在密切联系的内容。第一，必须对危机（或者根据个人喜好，理解作经济崩溃）作出更详尽的分析；第二，必须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作出系统的说明，这个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卡特尔和信用的发展提出来的，这个阶段的银行家和金融家与马克思时代的棉花生产商相比，产生的影响更大；最后也是最迫切的是，必须对帝国主义竞争、殖民扩张和军国主义的发展进行经济解释，它们已经引起不能再被忽视的政治问题。德国的理论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下面两章的主题；俄国有关这些问题的著作，将在以下第十三章讨论。

---

#### 第四章注释：

[1] J.H.Clapha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ance and Germany 1815-191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21) pp.278-368; G. Stopler, *German Economy 1870-1940*(London: Allen & Unwin, 1940) pp.41-92; K.Borchart, 'Germany' in C.M. Cipolla (ed.)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Part I*(London: Fontana, 1973) pp.104-47; A. Maye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London: Croom Helm,1981).

[2] A. Ascher, 'Professors as Propagandists: the Politics of the Kathedersozialisten',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23,1953, pp.282-302.

[3] R.Geary, 'The German Labour Movement 1848-1919',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6, 1976, pp.297-330; W.L.Guttsman,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1875-1933*(London: Allen & Unwin, 1981);V.L. Lidtke, *The Outlawed Party: Social Democracy in Germany,1878-189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G. Roth. *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 a Study in Working Class Isolation* (Totowa, N.J.: Bedminster Press,1963).

[4] Lidtke,*The Outlawed Party*, pp.59-66; G. Steenson, *Karl Kautsky 1854-1938:Marxism in the Classical Year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8) pp.67-8.

[5] K. Kautsky, *The Economic Doctrines of Karl Marx* (London: A. & C. Black, 1925).

[6] Steenson, Karl Kautsky, p.66; D.W.Morgan, 'The "Orthodox" Marxists: First Generation of a Tradition', pp.4-15 of R.J. Bullen et al. (eds) *Ideas Into Politics: 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880-1950* (London: Croom & Helm, 1984).

[7] 《爱尔福特纲领》的文本参见B. Russell,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London: Allen & Unwin, 1965; first published 1896) pp. 137-41; 有关背景的论述参见 Steenson, Karl Kautsky, pp. 98-100.

[8] K.Kautsky, *The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W.W. Norton, 1971; first published 1892) pp.48. 71-81.

[9] Ibid, pp. 53, 60- 2,68, 77-8.

[10] Ibid, pp. 81-7.

[11] F. R. Hansen, *The Breakdown of Capitalism: A History of the Idea i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pp.77-8.

[12] *The Class Struggle*, p.117.

[13] R. Fletcher, *Revisionism and Empire: Socialist Imperialism in Germany 1897-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1984) pp.33, 40; Geary, 'German Labour Movement', p. 305.

[14] Cited by Guttsman,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pp. 274,288.

[15] P. Angel, *Eduard Bernstein et l' Evolution du Socialisme Allemand* (Paris: Marcel Didier, 1961) pp.106-9, 这是迄今为止对伯恩斯坦的生平和思想进行的最好的概括。See also P.Gay. *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Eduard Bernstein's Challenge to Marx*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1962)p. 67, and Fletcher, *Revisionism and Empire*, pp.152-4. On 'New Liberalism' see J. Allett, *New Liber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 Hob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1).

[16] Cited by Lidtke, *The Outlawed Party*, p.317; cf. Angel, *Eduard Bernstein*; Fletcher, *Revision and Empire*, pp.143, 152-4.

[17]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554页。

[18] A. Hussain and K.Tribe,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Volume I: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Peasantry 1890-1907* (London: Macmillan, 1981)chs 3-4; Hussain and Tribe(eds) *Paths of Development in Capitalist Agriculture* (London: Macmillan, 1984); see also Chapter 10 below.

[19] E. Bernstein, *Evolutionary Socialism: A Criticism and an Affirmatio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61) pp.25-6; original stress deleted.

[20] Ibid,pp.7-23,222-4; E. Bernstein,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ocialismus(Berlin: Akademischer Verlag für Sociale Wissenschaft Dr John Edenheim, 1901)p.93;cf.H. Heimann, 'Die Aktualität Eduard Bernsteins, in Bernstein, Texte Zum Revisionismus) (Bonn-Bad Godesberg: Verlag Neue Gesellschaft,1977) pp.18-22.

[21] T.Botlmore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1983) pp. 36-7,183,247-8,288: Fletcher, Revisionism and Empire, pp.130-3; Angel, Eduard Bernstein,pp.182-206, and Gay,The Dilemma, pp.151-63.

[22] Zur Geschichte, pp.370-1,378-80;cf.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335-6. Von Buch's work, Intensität der Arbeit, Wert und Preis der Waren (Leipzig: Duker & Humblott, 1896) 如此的模糊不清以至于逃过了熊彼特的注意,它的中心主题最近再度浮现出来。 see I.Steedman, 'Heterogeneous Labour, Money Wages and Marx's Theory', History of Economy, 17, 1985,pp. 551-74.

[23] Zur Geschichte, pp.374-5;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p.29-32; 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208-13; Gay, The Dilemma, p.180-4.

[24] Zur Geschichte. p. 372.

[25]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35;cf.R.L.Meek,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3) pp.126-7; 在这个问题上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 213-4) 误解了伯恩施坦的意思。

[26] Zur Geschichte,pp.372-4.

[27]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p.33-9.

[28] 有关“杰文斯社会主义者”,参见S. Webb,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 Law of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 1888, pp.188-208;J.A.Hobson, 'The Law of the Three R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 1891, pp.263-88; and D.M.Ricci,'Fabian Socialism: A Theory of Rent as Exploitation',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9, 1969,pp.105-2;无论是韦伯还是霍布森,在更大程度上是受乔治·亨利和阿·马歇尔的影响,而不是杰文斯的影响, see J. E. King, Economic Exiles (London: Macmillan, 1988) chs 5-6.

[29] E. Bernstein. Ferdinand Lassalle as a Social Reformer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1893) pp.134-5.

[30] Heimann, 'Die Aktualität Bernsteins', p. 10; 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223-4.

[31] Zur Geschichte, pp.97-105; cf. 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231-6, and D.M.Gordon, R.C.Edwards and M.Reich,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32] A. Hussain and K. Tribe, Marxism and the Agrarian Question, especially pp.103-38.

[33]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p.42-51.

[34] Ibid, pp.54-72.

[35] Hansen, Breakdown of Capitalism, pp.38-9, 48-9.

[36]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p.73-5; 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218-21.

[37]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p.76-94; Zur Geschichte, pp.229-32; Angel, Bernstein, pp. 224-8.这种观点在1894年SPD大会上被麦克斯·席佩尔明确提出过。The argument was put explicitly by Max Schippel at the 1894 SPD congress: see H. J. Marks, 'The Sources of Reformism in the Germany 1890-1914',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1, 1939, pp.337-8.

[38] Steenson, Karl Kautsky, p.121.

[39] J.Bonar, Review Review of Assumptions, Economic Journal, 9, 1899, p.553.

[40] R. Luxemburg, Reform or Revolutio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0; reprint of second German edition, 1908) pp.8-13.

[41] Ibid, p.22.

[42]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p.80-91; Zur Geschichte, p.234(original stress partly deleted).

[43] K.Kautsky, Bernstein und das Sozialdemokratische Program: Eine Antikritik(Stuttgart: Dietz, 1899); cited hereafter as Antikritik.

[44] 参见D. Geary, Karl kautsk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7).

[45] Antikritik, pp. 1-34.

[46] Ibid, pp.34-41; Bernstein's reply is in Zur Geschichte, pp.366-81.

[47] Antikritik, pp.42-9; cf. Zur Geschichte, pp.218-222.

[48] Antikritik, pp. 49-80

[49] Ibid, pp.86-95, 100-1.

[50] Ibid, pp.104-14.

[51] Ibid, pp.127-8.

[52] Ibid, pp.135-7.

[53] Ibid, pp.140-5.

[54] Ibid, pp.146-51.

[55] K.Kautsky, 'Krisentheorien', Die Neue Zeit, 20, 1901-2, pp.38-45, reviewing M.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Jena: Gustav Fischer, 1901).

[56] Ibid, pp.78-9.

[57] Ibid, pp.79-81.

[58] Anon. (K. Kautsky) 'Tongking'. Die Neue Zeit, 2, 1884, pp.156-64.感谢Dick Geary提醒我们注意这篇文章。

[59] 'Krisentheorien', pp.110-8;cf. ibid, p.140.

[60] Ibid, pp.111-2.

[61] Ibid, pp.133-6

[62] Ibid, pp.137-8, 140-1, 143. 对“长波”分析的历史回顾参见E.Mandel,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arxist Interpreta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For Parvus, see Chapter 12 below and Z. A. B. Zeman and W. B. Scharlau, 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 The Life of Alexander Helphand 1867-192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63] 'Krisentheorien', pp.116-17.

[64] Fletcher, Revisionism and Empire, pp.2, 139.

[65] 全面了解伯恩斯坦1900-1914年之间的著作,参见Angel, Eduard Bernstein, pp.331-60.

[66]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ume 2: the Golden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347-50, 355, 363, 367-72, 378-9; G. Gneuss, 'The Precursor: Eduard Bernstein', in L. Labedz (ed.) Revision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62) p. 40.

[67] R.J. Evans, 'Introduction: the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German Labour History', pp.15-34 of Evans (ed.)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1888-1933(London: Croom Helm, 1892); Geary, 'German Labour Movement', p.308;Roth, Social Democrats, especially pp. 227-32.

[68] R. Miliband,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London: Merlin, 1973).

[69] Gneuss, 'The Precursor', p.40;在1925年SPD和更为激进的USPD合并后, 爱尔福特传统随着对当时《海德堡纲领》的接受得以恢复。

## 第五章 金融资本与帝国主义：考茨基和希法亭

### 1.引言

19世纪最后25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 大国政治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19世纪60年代末，世界经济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为普遍的自由贸易，自那之后，随着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建立，垄断不断增长，贸易保护主义趋势越来越盛行。世界贸易以远远高于工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持续扩张，1870年至1914年之间，出现了从欧洲向北美、南美、澳大利亚和南非的新定居地的大规模移民。与此相伴的是大规模的资本输出，通过“争夺非洲”和在其他地方疯狂地掠夺殖民地，欧洲国家的海外资产从1874年的65亿美元增加到1913年的440亿美元。这在何种程度上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的新阶段的出现，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早在1875年之前，资本主义经济中就一直存在垄断因素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快速增长，尽管“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使得英国（特别如此）能够在整个19世纪一直扩张其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帝国。<sup>[1]</sup>

然而，在政治上，没有理由怀疑正在发生的变化是根本性的。欧洲大陆紧随英国之后进行的工业革命，使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一背景下，长达10年的和平和相对和谐的国际环境，让位于一个日益紧张的时代。欧洲逐渐加速的重新军事化，是摩擦日渐增多最生动的例子。1870年至1910年，英国、法国和俄国人均军备开支翻了一番，德国则提高了三倍；在之后的4年间，人均军备开支进一步大幅度提高。到1914年，英国的军费开支占国民收入的3.4%，德国、法国分别为4.6%、4.8%，奥匈帝国和俄国超过6%。<sup>[2]</sup>按20世纪末的标准，这些数字是微不足道的，但放在刚刚过去的时代背景下看，军备开支的增加确是十分巨大的。如果未来要发生战争，在1890年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战争的所有准备都已经完成。

这些发展，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严峻的问题。从实用政治的角度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在保护关税、殖民扩张和军费开支增长等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发挥的作用越大，它对这些问题不作出抉择的难度也就越大。党的议员在国民议会上的投票行为是公开的信息，甚至投弃权票（正当的理由是商业政策的细节和无产阶级无关），也会被它的敌人利用。与此相关的分析性论题，也不能轻易忽略。当时德国资本主义中存在的政治扩张、军

事好战和经济矛盾之间的关系（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新帝国主义预示着当时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了一个发生了质的变化的新阶段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对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来说有什么影响呢？如何描述新阶段的特征，它的结局将如何？同修正主义争论一样，所有的参与者都认为，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的争论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正确的。在这一章，我们考察卡尔·考茨基和鲁道夫·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下几章讨论罗莎·卢森堡、奥托·鲍威尔（在第六章）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贡献，特别是尼古拉·布哈林和列宁的贡献（在第十三章）。

## 2. 伯恩施坦和考茨基论帝国主义

在帝国主义问题上，马克思很少能提供什么指导，在他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对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非常少，不仅零散而且往往互相矛盾。此外，他在报刊杂志上的文章（许多相关的片断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在1914年以前基本上看不到。<sup>[3]</sup>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的那样，恩格斯除了公开谴责保护主义并要求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裁军之外，没有为帝国主义分析增添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他只是声称，在当时的社会框架下，裁军是可能的。在经济危机、资本集中和帝国主义推动力之间可能存在密切联系问题上，马克思的著作也没有提供什么见解，恩格斯的著作也全然没有。

那么，新扩张主义是否只是由反动势力和前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造成的对资本主义常态的偏离，而不是什么更为根本性的情况呢？这一立场，一直是爱德华·伯恩施坦所坚持的，这再次反映了诸如英国自由主义者霍布森和布雷福德等人的世界主义对他的影响。像霍布森一样，伯恩施坦为较为文明的人们拥有把进步强加给文明程度较低的人们的权力进行了辩护。在这一点上，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是一致的，沙文主义在右翼中非常流行。伯恩施坦否认殖民政策和民族意识带来了狭隘和侵略性的沙文主义。<sup>[4]</sup>与此相反，他认为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无稽之谈，认为自由贸易的逻辑是无法抗拒的，国际和谐也将会增加：

认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将会加剧他们之间的敌对，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如果国家只是争夺有限客户的小店主，那么一个国家的所得必然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只要看一眼发达国家之间商业关系的发展，就能发现这些观点的荒谬之处。工业



最发达的国家，彼此既是竞争者又是消费者；同样，它们之间的贸易关系，随着彼此间竞争的加剧而扩张……人们试图彼此征服对方的时代，在欧洲已经终结了，而这种情况在亚洲也在逐渐变为现实。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国际法将成为主导的时代。<sup>[5]</sup>

伯恩斯坦这种彻底的自由主义式的乐观主义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完全符合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观念。卡尔·考茨基的帝国主义思想，在连续性上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程度。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包括1914年以前反对修正主义的理论家所表达的每一个重要观点的萌芽，以及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帝国主义模型的预见，<sup>[6]</sup>他的思想富有成就，但却存在严重的矛盾。早在1884年，考茨基就认为，殖民地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前提，德国缺乏殖民地，这是未能和英国同时进行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sup>[7]</sup>在17世纪和18世纪，殖民地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获得销售市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考茨基认为，后一种功能（实现功能）现在变得更加重要了。工人得到的工资低于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资本家的消费又不足以弥补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缺口。因此，资本家必须找到“他们自己生产领域之外的市场”，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资本家的第一个目标是国内的农民，但农民购买力因贫困不断加深而受到限制。因此，“作为销售市场的殖民地，成为资本主义存在的一个条件”。<sup>[8]</sup>后来，罗莎·卢森堡对这个观点作了深入分析（参见以下第六章）。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用类似的分析支持德国的扩张，他们这样做，要么是难以掩饰他们狂热的民族主义，要么是使用一个稍微有些迂回的观点，认为任何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的事都将使得社会主义更快地来临。<sup>[9]</sup>考茨基认为，法国占领东京(Tongking)（越南北部地区的旧称——译者注）是他写这篇文章的原因。这一占领不会给法国资本主义带来任何持久的利益，相反，它会鼓励正在形成的中国资产阶级进行竞争，与此相伴的将是，在印度、日本和伊斯兰世界已经表现得十分很明显的那类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其结果将是“现代殖民体系的崩溃”，将“使当前的工业体系难以维持下去”，并必然导致社会主义。<sup>[10]</sup>

考茨基《阶级斗争》一书出版于1892年，在这本广泛流传的阐释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著作中，存在着对那种在本质上是卢森堡式的帝国主义分析的共鸣（参见以上第四章）。但考茨基先前充满胜利口吻的结论，现在变成了悲观的论调。他认为，地区扩张对于市场增长至关重要，殖民政策鼓励了军国主义，将欧洲变成兵营。“要摆脱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状态，只有两条出路：要

么是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把欧洲现有的国家消灭掉几个，要么把欧洲现有的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同盟”。<sup>[11]</sup>后一个建议15年后再度出现，是以引起列宁愤怒的（参见以下第十三章）“超帝国主义”面貌出现的（参见以下第六章）。

考茨基在其早期著作中，似乎毫不怀疑海外扩张对资产阶级整体来说是一项合理的政策。到1897—1898年时，他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在一篇论述“新旧殖民政策”的长文中，考茨基对建立在欧洲移居地上的“劳动殖民地”和掠夺大量的本地居民成为一种习惯做法的“剥削殖民地”作了区分。后者除了进口一些廉价的商品外，提供不了什么更多的东西。只有劳动殖民地能够为殖民国家的出口提供有效的出路，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已经表明，试图垄断他们的市场是徒劳的。前工业阶级（商人，高利贷者，国家公务员）能够从对殖民地的剥削中获益，但是工业资本家需要的是有购买力的消费者。在商人资本进行垄断并推行军国主义的地方，工业资本正在寻求和平和秩序（如英国），并开始积极反对殖民主义。考茨基把当前重商主义保护政策的回归和殖民地的掠夺，解释为反对经济发展的阶级的政治反动的产物。它是官僚主义者、国家养老金领取者和“高级金融”者的政策，而不是工业资本家的政策。考茨基推论说，德国资本家没有从对非洲的殖民中获得任何东西，在中国也是如此。英国模式中的自由贸易要明智得多。<sup>[12]</sup>

在之后的4年间，考茨基再度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首次出版于1901年以及10年后修订再版的《商业政策和社会民主党》小册子中，考茨基先于希法亭和列宁，指出了卡特尔的形成、工业资本家对贸易保护的需求和可能引发世界大战的军国主义的增长之间的联系。这时，他关注的重点是，长期生产过剩背景下争夺市场斗争的加剧。考茨基认为，与早期的关税体制不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将是永久性的。它的建立不是为保护幼稚产业，而是为了满足卡特尔化的国内市场能够获得高于国外市场价格的需要。从关税中获得的收入用于军备开支融资的需要，从而增加了对钢铁以及相关产品的需求，保护了德国资产阶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行保护主义（甚至是保护农业）和军国主义时的既得利益。海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寻找新市场的竞争性扩张，导致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拟议中的国际关税同盟完全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它们的成员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不愿意进行和平合作。新兴工业化地区给现有的国际分工体系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新兴工业化地区带来的挑战受到最初的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金融支持，而这些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很快就将受到冲击。考茨基认为，一旦世界上所有的农业区被牵涉进来，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只有社会主义的出现，才能够避免战争的爆发。<sup>[13]</sup>

### 3. 希法亭论金融资本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分析中存在的反复无常、缺乏系统性、常常自相矛盾的特征，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常政治生活中，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远不如在当时重要的问题上建立的稳固的统一战线更有现实价值。不应忘记的是，在这些棘手问题上，没有什么可资借鉴的历史先例，而考茨基也不喜欢后见之明。最重要的是，他既没有受到过专业训练，也不特别擅长于政治经济学，从而无法进行严格的分析，而这种分析对于建立一套前后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来说是必须的。

对这一理论第一次作出认真分析的是希法亭。他在一篇早期的论述保护关税功能变化的文章中，超越了考茨基在《商业政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观点，指出：

在保护关税的现代体制中，资产阶级的行动似乎不再受不同的个体利益多样性的妨碍，他们的行动更加有组织、更加团结、更加自觉，他们使用有着巨大力量的政治（国家的、政府的）手段增加利润……并引入了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为了对抗利润率下降这一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资本消除了自由竞争，组织自身并通过借助国家力量把其组织放在能够增加其影响力的位置上，使它能够立即和直接地为剥削利益服务。<sup>[14]</sup>

其后果是越来越积极的殖民政策，以及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加剧和“对生产过剩产生最强烈的刺激”。<sup>[15]</sup>

这并不是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全面分析，对帝国主义的全面分析是在他的重要著作《金融资本》出版时（出版于1906年，差不多是在实际完成后四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以对马克思的货币和信用理论的说明作为开篇。希法亭把信用解释为：使没有被用于生产性目的的“闲置货币”保持其最低数量的一种手段。在节约资金使用方面，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相比有着巨大的优势。因此，商人失去了大部分先前所拥有的影响力，银行作为产业信用提供者的作用日益突出。银行信用的本质发生了变化，从提供短期融资（希法亭称之为“流通信用”）转向为长期投资项目提供资金（“资本信用”或“投资信用”）。除了直接的偿付能力外，银行对公司的长期前景越来越感兴趣。信用导致剩余价值分配发生了重要变化，利息份额的增加是以牺牲企业利润为代价的，这反映了在整个

经济中银行力量的不断增长。<sup>[16]</sup>

事实上,希法亭认为,典型的“产业资本家”已不再是业主经理,而是股份公司中的股东。公司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大规模生产经济的必然结果。这使得公司的扩张“摆脱了个人财产的桎梏”。<sup>[17]</sup>大企业对投资的需要远远超过了任何个人或小团体合伙人所拥有的资源。银行把资本动员起来,通过获取股份把信用扩展到生产性企业。现在的股东实际上是货币资本家,而不是企业家,他们的红利收入更像是利息支付,而不是企业利润。希法亭注意到,利息率总是低于生产性资本的利润率,并说明了这种差异是如何为公司的发起人提供获得巨大资本收益的机会的。

希法亭以一个非公司化企业为例。该企业有100万英镑的生产性资本,平均利润率为15%,从而,年利润流为15万英镑。如果该企业在证券交易所上市,那么它的价值是多少?未来的股东要求的股息率将稍微超过利息率(希法亭假定它为5%)。加上一个小的风险溢价,股东要求的收益率为7%。在收益率为7%时,13万英镑年收益(允许每年有2万英镑的董事费和其它支出)的资本化价值为 $130\,000/0.07=1\,857\,143$ 英镑。这是投资者打算支付给新上市公司的价格总额。股份的价格和生产性资本的价格之间的差额(857143英镑)作为“创业利润”,归公司发起人所有。用代数表示为:

$$P = \frac{100Y}{d} - \frac{100Y}{r}$$

$Y$ 是企业的收益, $P$ 是创业利润, $d$ 是平均股息, $r$ 是利润率。创业利润“既不是欺诈,也不是补偿或报酬,而是一种特殊的(*sui generis*)经济范畴”。<sup>[18]</sup>

希法亭分析中的缺陷是明显的:他把利息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异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对它的来源或它持续存在的原因进行解释。“创业利润”在希法亭的分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他所主张的在利息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趋于下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这将缩小从利息率和利润率的差异中获得资本收益的范围。<sup>[19]</sup>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创业利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十分典型的是,银行在资本动员方面的优势表明,正是它们主导了公司的上市活动,银行通过股份资本的形式得到回报,并持续增加它们在生产性产业中的股份。股份公司的增长,扩大了已经存在的资本集中的压力。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银行业内部,形成一个单一的“中央银行”的趋向,它最终将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sup>[20]</sup>

这些发展，对已经因许多产业部门固定资本需求增长而受到严重削弱的自由竞争，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银行发起建立卡特尔、托拉斯，并展开以压制竞争和提高它们投资利润率为目标的合并活动。这些垄断性收益被资本化为创业利润，然后用于购买更大的生产能力，去巩固卡特尔。价格协定越安全，银行增加其在相关产业股份的激励就越强。<sup>[21]</sup>希法亭对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的三个历史阶段作了总结。首先是“高利贷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其次是产业资本家独立于货币借贷资本家的古典阶段；最后是金融资本时代的到来，他把金融资本定义为“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使用的资本”（对此《金融资本》用了大约225页的篇幅作出论证）。<sup>[22]</sup>

在《金融资本》第15章，希法亭总结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最后”阶段的一些重要的经济和政治特征。垄断通过把利润从竞争性产业转向卡特尔化产业，侵蚀了劳动价值论的作用得以发挥的基础，产生了大企业利润系统地高于小企业利润的二元经济。两个部门的投资都减缓了：

在卡特尔化产业中，卡特尔最为关注的是限制生产，在非卡特尔化的产业中，利润率的下降威胁了进一步的投资。因此，一方面可用于积累的资本量迅速增大，另一方面投资的机会却减少了。这个矛盾要求一个解决的办法，这种解决办法在资本输出中被找到了，尽管资本输出本身不是卡特尔化的结果，但它是一种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分割的现象。但是，卡特尔化突然加剧了这一矛盾，使得资本输出成为紧迫的事情。

从根本上看，卡特尔化不存在绝对界限。设想，一个覆盖整个经济的巨大卡特尔的存在是可能的，它把价格转化为“单纯的计算方式”，组成“一个以对抗形式进行自觉调节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两极分化将达到顶点，因为财产在若干大资本联合体手中积聚和集中，表明它们与没有资本的群众的直接对立。因此，所有制关系问题，获得了它最清楚、最无疑义和最尖锐的表现；同时，社会经济的组织问题，随着金融资本自身的发展而得到越来越好的解决。<sup>[23]</sup>

接着，希法亭对经济危机进行了一个冗长而且复杂的分析，这部分的核心论题是：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可以采取或者也可以不采取消费增长和生产扩张之间联系失败的形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的利润率下降。（关于比例失调，参见以下第九章和第十章。）然而，这两个危机的原因之间存在的确切联系，仍然是不清楚的。<sup>[24]</sup>在金融资本条件下危机的具体性质问题上，

希法亭对修正主义者的观点作了让步。信用的发展和银行资本的集中，扩大了危机传导的风险，削弱了商品的投机。因此，货币和银行危机不如以前的阶段严重。<sup>[25]</sup>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产业危机是否因卡特尔的增长而有所缓和，希法亭的立场与卢森堡和考茨基的立场相一致（参见以上第四章）。卡特尔阻碍了重建繁荣所需的价格和产量调整。它们加剧了比例失调，并“把危机的重压，转嫁到非卡特尔化产业”，而不是消除一般意义上危机的严重破坏性。<sup>[26]</sup>

这里的分析和《金融资本》最后五章中的主要论点有些冲突。在这里，希法亭对他所称作的“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作了分析。他认为，关税的功能已经发生变化，从对幼稚产业的临时性扶植，转向为国内市场的垄断价格以及剩余产品在海外侵略性的倾销提供永久性的支持。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采取类似的做法，进一步刺激了由银行组织的资本输出，银行提供了避开外国竞争对手设立的关税壁垒的唯一方法。<sup>[27]</sup>这既没有给考茨基对商业政策的分析增加什么新内容，也没有使希法亭对自己早期著作作出什么新的发展。更具原创性的部分——从某些方面看，是整本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第22章，希法亭在这里分析了资本输出和“争取经济区的斗争”之间的联系。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大市场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这就是比利时这样的小国支持自由贸易的理由。对于大国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建立国际卡特尔。然而，这和各个国家的卡特尔要求增加竞争的强大压力相抵触，各个国家的卡特尔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来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从而，国际卡特尔协议“与其说意味着持久的共同利益，不如说意味着暂时的休战”<sup>[28]</sup>。其结果就是经济关系日趋政治化。

资本输出扩大了市场，有助于熨平危机，同时也增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但是，工资的增长受到从落后地区获得雇佣劳动的限制。这可以通过暴力消除前资本主义生产，实行强迫劳动，并通过从有劳动力储备的地区移民来克服。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需要国家某种程度的干预，因此，帝国主义国家对贫穷国家的支配，成了资本输出的一种必然结果。资本输出逐渐增强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抗。希法亭推断，“金融资本政策有三个目标”，这就是：“（1）建立尽可能大的经济区；（2）通过保护性关税壁垒排除国外竞争；因此（3）把这一经济区变成为民族垄断联盟的开发区。”<sup>[29]</sup>殖民野心引发政治冲突。希法亭指出，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增长和它的经济区规模相对较小之间的矛盾，大大加强了德国同英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并增加了“诉诸暴力解决”的可能。但是，也存在相反的趋势，最明显的是英国和法国在德国进行大量的投资，从而促进三个国家的资本家形成共同的利益——一切都取决于不同国家

之间的权力关系。希法亭认为，“作为一项规则，力量差距越大，发生争斗的可能性就越大。”<sup>[30]</sup>

希法亭对最终结果并没有做出明确的预测，只是预计可能会发生剧烈的动荡。“除了帝国主义政策外，资本主义在政策方面别无选择”。<sup>[31]</sup>资产阶级已成为反自由主义者和反世界主义者，他们赞同扩大国家权力而且反对科布登和平主义。军国主义、压迫、种族主义和寡头统治：这是帝国主义的思想体系。<sup>[32]</sup>“金融资本，在它成熟的形态上，意味着经济和政治权力在资本寡头手上的集中达到了最高阶段。它完成了资本巨头的独裁统治”。大企业、地主和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支持帝国主义——只有无产阶级和生活变得更不稳定的领薪的“新中间阶层”和专业工人反对它，因为只有他们能从提高工资和扩大国内市场的政策中获益。金融资本使得一国资本家大人物的独裁统治，同其它国家的资本主义利益越来越不相容，使国内的资本统治同受金融资本剥削的、并起来同它做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越来越不相容。在这些敌对的利益的暴力冲突中，金融巨头的独裁统治最终将转化为无产阶级专政。<sup>[33]</sup>

《金融资本》以这些煽动性的文字结束。

#### 4.对希法亭的反应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流把希法亭《金融资本》的出版看作是极为重要的事件。奥地利党的理论领袖奥托·鲍威尔认为，在精神上，《金融资本》更接近于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是恩格斯的著作，认为读《金融资本》就像是在读马克思的另一卷《资本论》一样。鲍威尔宣称，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者需要对新的敌人发起攻击，希法亭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sup>[34]</sup>考茨基把《金融资本》的出版，看作是《资本论》的最终完成，认为《金融资本》不仅证明了马克思的方法，而且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作出了增补和修订。<sup>[35]</sup>

事实上，《金融资本》被证明是除《资本论》之外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举例来说，难以否认的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中每个重大主题都是《金融资本》中论述到的显著的特点。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的金融资本的关键概念，垄断对自由竞争的取代，资本家对自由贸易的否定以及对支持他们建立的卡特尔的保护关税越来越多的依赖，对资本输出和开拓殖民地以及它们造成的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局势的强调，最后是希法亭末日论式的腔调……所有这一切，在列宁用简洁的语言、不那么深入的分析加以说明的

帝国主义理论中都可以找到。布哈林也非常倚重希法亭（参见以下第十三章）。事实上，后来几乎所有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都借鉴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希法亭似乎是自马克思以后把利润率下降和危机（而且间接地与资本输出）联系起来的第一人。<sup>[36]</sup>他对比例失调的分析和对马克思再生产模型的详细考察<sup>[222]</sup>，既刺激了罗莎·卢森堡在后来提出与希法亭存在很大差异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又推动了——与希法亭对劳动力供给是正在扩张的世界经济的根本性问题的关注相关——鲍威尔令人印象深刻的批判的出现（参见以下第六章）。

因此，《金融资本》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图景：使先前占主导地位的著作黯然失色。考茨基和恩格斯只是重述了已经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对自己的著作中真正新颖的东西极少作出很好的阐述。希法亭不仅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分析和新的词汇，而且尝试着进行综合。不过，《金融资本》中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既没有提供一个单一的、前后一致的对经济危机的解释，也没有对危机和发达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矛盾之间的联系进行清晰说明。他既没有提出一个经济崩溃的理论，也没有明确地否定这一理论的存在，在《金融资本》中，尽管可以找到他后来提出的、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危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概念的萌芽（参见以下第十四章）。《金融资本》中没有任何毫不含糊的预言。他对资本输出的分析不够精确。很难判断他认为的资本输出的主要动机是什么：\*是克服外国关税壁垒的需要，是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资本有机构成的（从而利润率的）差异，是卡特尔化导致的国内投资机会的减少，还是因为高度发达的金融机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sup>[38]</sup>

除了这些分析方面的缺陷，还有就是希法亭在历史层面上论证的困难。希法亭太容易从他自己的德国经验出发进行概括。1914年之前，德国银行拥有的经济力量，只相当于（不完全）当时美国的银行，即使美国银行，具有这么大的力量的时间也不长。相同的情形在英国和法国从来没有存在过，在英国和法国，希法亭提到的特殊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并没有主导产业生产，经济力量的集中远不是那么明显。对希法亭的这种反对意见，几乎立即由爱德华·伯恩施坦提了出来，他在对《金融资本》的评论中，指责希法亭虚构了诸如“资本”和“资产阶级”等概念的本质，把资产阶级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唯一拥护者。伯恩施坦认为，这是一种粗糙的过度的简化。不仅金融资本的概念完全和英国无关，即使是在德国也存在被希法亭掩盖了的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德国工业中的大量的竞争性部门，如巨大的西门子集团以及许多金融资本家，都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伯恩施坦推



论说，资本家继续显示出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倾向。科布登主义不仅远远没有破产，而且仍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旗帜。<sup>[39]</sup>

如前所述，卡尔·考茨基赞同《金融资本》中的观点，对它充满了溢美之词。但是，考茨基在发表评论时，也提出了他自己有关帝国主义和危机理论的最新观点，这些新观点表明，他的思想和希法亭的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消费不足论又一次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尽管——如考茨基承认的那样——它在《金融资本》中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sup>[40]</sup>考茨基使用马克思再生产算术模型，说明均衡增长是无法独立于消费增加的。马克思的算术模型假定消费者的支出有明确的增加：具体地说，马克思的模型要求资本家消费支出的增长要比工人的更快（如果允许剥削率越来越高的话，这一点的真实性就更不容置疑了）。在这一意义上，考茨基承认马尔萨斯是正确的，尽管马尔萨斯用来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方法是不可行的。一般说来，资本家的确会从雇佣更多的非生产性劳动力（比如佣人）中受益，但个别资本家迫于竞争的压力，往往生活更加节俭。因此，奢侈品消费的增长远远慢于其它商品上支出的增长。对军事开支的经济学分析与此类似。考茨基认为，虽然士兵的购买增加了消费需求，但这一过程并非没有矛盾。竞争迫使资本家降低工资，但他们又迫切需要增加工人阶级的购买力。军备开支面临着同样的情形：只要军国主义是通过来自利润的税收得到财政支撑的，资本家就将抵制它。结果就是长期的消费不足。<sup>[41]</sup>

考茨基强调的第二个方面的观点是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比例协调问题。他认为，这种协调和马克思再生产模型中三个部类之间的平衡一样重要。农业在两个方面确定了工业增长的限度，它既是原材料的供应者，也是制造品的消费者。考茨基坚持认为，寻找新市场是大规模海外扩张的首要动机。然而这里也存在着矛盾。在开始阶段，新市场是向欧洲的制造商开放的。但这些市场后来因为农村人口的下降遭到破坏，农业区的工业化最后进一步减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获得的市场机会。资本主义越是积极地寻找新的消费者，它就越是趋于迅速地消灭它自己的购买力来源。<sup>[42]</sup>

因此，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和希法亭的截然不同，希法亭怀疑消费不足论，没有对军事开支在经济方面的含义作出任何说明，忽视了农业和工业的平衡问题。然而，两人都同意把金融资本看作是必然出现的“最野蛮和最暴力的资本主义形式”，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上看都是如此。<sup>[43]</sup>如果这个短语确实有什么意义，那么其意义（如希法亭间接提到的“敌对利益……的暴力冲突”的迫近）就在于，除非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到来，否则战争就是不可避免

的，社会主义的出现将是这一场重大战争的必然结果。一直到1909年，考茨基仍然在静静地等待着日益迫近的战斗：

1891年时，恩格斯仍然认为，即使可能引起革命并且可能使我们过早取得国家政权的战争爆发，它对我们来说也将是极大的不幸。自那时以来，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无产阶级今天已是如此强大，它可以更加自信地思考战争了。我们不能再说什么为时尚早革命了。<sup>[44]</sup>

很典型的是，三年后考茨基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战争对工人阶级来说将是一个“可怕的灾难”，在当时的社会体制框架下，和平和裁军是完全可行的。如果这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在向资本家展示他们最佳利益之所在，这的确是他们的最佳利益。当工厂主发现他们也可以从对工作日长度的法律限制中获益时，可以说，上个世纪已经给出了类似的教训。<sup>[45]</sup>

两个新情况使考茨基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首先，考茨基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对战争的真正恐惧随着战争可能性的增大而增加。他越来越把战争看作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避免的东西，而不再把它看做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是值得欢迎的社会主义的前兆。<sup>46</sup>还有第二个不那么可信的理由：当殖民问题来到前台，沙文主义展示了它对部分德国无产阶级的控制时，在1907年的霍屯督选举（Hottentot election）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失势。党的重心开始向右转，到1912年，为了在和平和裁军问题上形成选举联盟，党的领导人正在秘密接触一些资产阶级政党。<sup>[47]</sup>考茨基这时开始批评党的左翼，左翼（他相信）认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在当时的体制下军国主义不可能受到约束，这如同不出现社会主义革命就无法消除雇佣劳动关系一样。考茨基公开指责这种类比是荒谬的。党的左派混淆了资本主义的产物（军国主义，殖民竞争和过长的工作时间）和资本主义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扩大市场，创造剩余价值）。像工作时间过长一样，军国主义的发展确实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但是，考茨基认为，可以通过足够强大的政治运动去克服它。卡特尔的成功表明资本主义内部存在合作的可能性。“两个世纪以来对企业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真实的东西，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也变得越来越真实”。如果北美铁路公司同意不发动价格战，那么为什么德国和英国之间不能签署一项军事条约呢？<sup>[48]</sup>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站在了一起，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灾变论者。在下一章，我们将考察左翼对考茨基分析的反应。

---

## 第五章注释：

[1] E. J.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77) pp.114-15; M. Barratt Brown,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pp.111-12, 127, 137, 171, 185-6.

[2]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 pp. xxvii-xxxiv.

[3] M.C. Howard and J. E.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 2nd edn, ch.14; E. J. Hobsbawm, 'The Fortunes of Marx's and Engels's Writings', in Hobsbawm (e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Volume I. Marxism in Marx's Day*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1982) pp.336-7.

[4] R. Fletcher, *Revisionism and Empire: Socialist Imperialism in Germany, 1897-1914* (London: Allen & Unwin, 1984).

[5] E. Bernstein, 'Die Internationale Politik der Sozialdemokratie',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10, 1909, pp.620-1, 623, cited by M. Salvadori, *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1880-1938*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p.131-2; 'Zusammenbruchstheorie und Kolonialpolitik', in Bernstein.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ozialismus* (Berlin: Akademischer Verlag für Soziale Wissenschaften Dr. John Edelheim, 1901) pp.218-48; 'The Growth of British Exports' *Contemporary Review*, 84, 1903, pp.775-87; 'German Professors and Protectionism', *Contemporary Review*, 86, 1904, pp. 18-31. Similar views were expressed by Parvus, *Die Kolonialpolitik und der Zusammenbruch* (Leipzig: Verlag der Leipziger Buchdruckerei Aktiengesellschaft. 1907).

[6] R. J. Geary, 'Karl Kautsk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970, ch.5; J. H. Kautsky, 'J. A. Schumpeter and Karl Kautsky: Parallel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 1961, pp.101-28.

[7] Anon [K. Kautsky], 'Tongking', *Die Neue Zeit*, 2, 1884, pp.156-64. (We are grateful to Dick Geary for bringing this article to our attention.)

[8] Ibid, p. 157.

[9] A. Ascher, 'Professors as Propagandists: the Politics of the Kathedersozialisieren',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23, 1963, pp.282-302.

[10] 'Tongking', Die Neue Zeit, 2, 1884, pp.163-4.

[11] K. Kautsky, The Class Struggle (New York: W.W. Norton, 1971; first published 1892) pp. 101-4

[12] K. Kautsky, 'Aeltere und Neuere Kolonialpolitik', Die Neue Zeit, 16, 1897-8, pp.769-81, 801-16.

[13] K. Kautsky, Handelspolitik und Sozialdemokratie (Berlin: Buchhandlung Vorwärts Paul Singer, 1911, 2nd edn; first published 1901) pp.33-5, 38-9, 44-8, 93-4, 98. See also O. Bauer,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07) chs 27 and 28.

[14] R. Hilferding, 'Der Funktionswechsel des Schutzzolles', Die Neue Zeit, 21, 1902-3, pp.279-80.

[15] Ibid, pp.277-8.

[16] R.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pp.94-5, 103-4.

[17] Ibid, p.123.

[18] Ibid, pp.109-12, 114.

[19] Ibid, pp.103-4. 希法亭的确提出长期股息收益率的下降是由于风险溢价的降低引起的。

[20] Ibid, pp.142-3, 180.

[21] Ibid, pp.186-92, 223-4.

[22] Ibid, pp.225-6.

[23] Ibid, pp.228-35.

[24] Ibid, pp.239-66.

[25] Ibid, pp.288-94.

[26] Ibid, pp.296-8.

[27] Ibid, pp.309-10.

[28] Ibid, pp.311-14.

[29] Ibid, pp.318-26.

[30] Ibid, pp.331-2.

[31] Ibid, p.366.

- [32] Ibid, p.333.
- [33] Ibid, pp.364-5, 370.
- [34] O. Bauer, 'Das Finanzkapital', *Der Kampf*, 3, 1909-10, pp.391.
- [35] K. Kautsky, 'Finanzkapital und Krisen', *Die Neue Zeit*, 9, 1910-11, pp.764,770-1, 883.
- [36] *Finance Capital*, p.315; cf. Bauer, *Nationalitätenfrage*, pp.396-7.
- [37] *Finance Capital*, pp.244-56, 282-4.
- [38] A.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p. 93.
- [39] E Bernstein, 'Das Finanzkapital und die Handelspolitik',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12, 1911, pp.947-55.
- [40] Kautsky, 'Finanzkapital', p.874.
- [41] Ibid, pp.801-4.
- [42] Ibid, pp.839-46.
- [43] Ibid, p.768.
- [44] K. Kautsky, *The Road to Power* (first published 1909; cited from 1910 edition) in P. Goode (ed.) *Karl Kautsky: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London: Macmillan, 1983) p.79.
- [45] K. Kautsky, 'Der Erste Mai und der Kampf Gegen den Militarismus', *Die Neue Zeit*, 30, 1911-12, pp.100-5.
- [46] G. Steenson, *Karl Kautsky 1854-1938: Marxism in the Classical Year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8) pp.177-8.
- [47] I. Petit, 'Kautsky et les Discussions Autour du Problème de l'Impérialisme dans le Parti Sociale-Démocrate Allemand de 1907 à 1914', *Revue d'Allemagne*, 1, 1969, pp.325-37.
- [48] Kautsky, 'Der Erste Mai', pp.106-9.

## 第六章 资本积累、帝国主义与战争：卢森堡和鲍威尔

### 1. 罗莎·卢森堡和资本积累

1907年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变得越来越明显。党的右翼虽然总是少数派，却越来越有信心能用修正主义理论反对左翼；党的左翼相信经济崩溃的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革命的政治观点。中间立场（在理论上）考茨基和希法亭占据。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那样，考茨基的中间路线越来越右倾。于是，左派对阶级协作和社会和平进化幻想的批判，直接指向考茨基本人。

这时，党的左翼的最重要的理论领袖是罗莎·卢森堡。早在1898年，她曾先于考茨基对伯恩斯坦作了猛烈抨击，并公开宣称资本主义无法避免的经济崩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参见以上第四章）。这些早期的论战性文章，几乎完全缺乏分析深度。在接下来的15年间，卢森堡读书、辩论，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撰写文章，在柏林的党校教授政治经济学。卢森堡1913年出版的《资本积累论》，是一部在严肃的目的和学术基调两个方面都可以与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相媲美的重要的理论著作。（1915年写于狱中的《反批判》，是卢森堡对自己受到的批评的答复，其中对《资本积累论》作了一个有意义的摘要，《反批判》更具有论战性。）但它也是进行政治干预的产物。1900年之后发生的事件，不仅没有动摇卢森堡的信念，反而明显地增强了她的信念。卢森堡的著作是为了科学地证明，考茨基国际和平与和谐的梦想是徒劳无益的。她重申，面对难以避免的世界大战，无产阶级采取革命行动具有绝对的必要性。

卢森堡的中心论题是，重点指出考茨基1884年和1901年所坚持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增长的可能性，就在于这一制度内生产出来的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量，必然要有这一制度外的消费者来实现。对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强制性的开拓，改变了落后地区的经济，颠覆了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生活模式，从而摧毁了发达国家迫切需要的出路。因此，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而且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因为争夺经济区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科布登主义已经死亡并被埋葬。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残暴的现代战争，这就是资本主义给人类提供的选择。<sup>[1]</sup>

尽管《资本积累论》是用来直接对抗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中心”的，但其信息却是用密码传递的。在该书索引中看不到希法亭的名

字，三次提到考茨基，但只有一次——大体上赞同考茨基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评论<sup>[2]</sup>——包含了实质性内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自己的分析参见以下第九章和第十章）。事实上，卢森堡同修正主义者一样，对马克思进行了公开的、正面的批评。她坚持认为，《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图式制造了一种危险的幻觉，即在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稳定的均衡增长是有可能的。马克思区分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在简单再生产中，全部剩余价值都被用于资本家消费；在扩大再生产中，部分剩余价值用于积累。简单再生产中的全部剩余产品可以毫无困难地找到市场，不存在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使用马克思的数字例子，卢森堡提出了一个两大部类经济模型，第Ⅰ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Ⅱ部类生产工人和资本家的消费资料，它们之间存在以下比例关系：

$$\text{I: } 4000c_1 + \boxed{1000v_1 + 1000s_1} = 60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boxed{2000c_2} + 500v_2 + 500s_2 = 3000 \text{ 消费资料}$$

在第Ⅰ部类的产出中， $4000c_1$ 代表本部门消耗的、没有被用于和第Ⅱ部类交换的生产资料。同样，第Ⅱ部类的产出 $1000(500v_2 + 500s_2)$ ，是本部类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部分。只有方框内的是用于交易的部分。第Ⅰ部类购买了第Ⅱ部类2000单位的产出，用于满足工人和资本家对消费品（ $1000v_1 + 1000s_1$ ）的需求。第Ⅱ部类购买了第Ⅰ部类2000单位的产出，用于补偿它消耗的生产资料（ $2000c_2$ ）。从而， $v_1 + s_1 = c_2$ ，或者用马克思的表示， $\text{III} + \text{IV} = \text{V}$ 。这里既不存在对任何一个部类产出的需求不足，也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下一期无法在这个水平上继续生产。<sup>[3]</sup>

再看另外一个简单再生产无法进行下去的例子：

$$\text{I: } 4000c_1 + 1000v_1 + 1000s_1 = 60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1500c_2 + 750v_2 + 750s_2 = 3000 \text{ 消费资料}$$

在这里，第Ⅰ部类对消费品的需求（ $1000v_1 + 1000s_1$ ），超过了第Ⅱ部类对生产资料（ $1500c_2$ ）的需求。两个部类之间的均衡，要求产出有增长，也就是说必须有资本积累。马克思假定，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半（500单位）用于增加下一期使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同时，第Ⅱ部类的资本家，留出剩余价值中的五分之一（150单位）用于同样的用途。马克思进一步假定，积累以一种能够使每个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保持在原有水平上的方式，在额外增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进行分配。从而，第Ⅰ部类增加的不变资本为（ $\Delta c_1$ ）400，可变资本为（ $\Delta v_1$ ）100；同样的， $\Delta c_2 = 100$ ， $\Delta v_2 = 50$ 。 $s_{0_1}$ ， $s_{0_2}$ 代表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得到：

$$\text{I: } 4000c_1 + 400\Delta c_1 + \boxed{1000v_1 + 100\Delta v_1 + 500s_{0_1}} = 60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boxed{1500c_2 + 100\Delta c_2} + 750v_2 + 50\Delta v_2 + 600s_0 = 3000 \text{ 消费资料}$$

同样，方框内是两个部类之间相交换的部分。在这里，由于  $1000v_1 + 100\Delta v_1 + 500s_0 = 1500c_2 + 100\Delta c_2 = 1600$ ，每一部类对另一部类的商品的需求量相等，每一部类的资本家都能够实现他们所在部类中工人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假定剥削率（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保持不变，下一期的产出为：

$$\text{I} : 4400c_1 + 1100v_1 + 1100s_1 = 66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1600c_2 + 800v_2 + 800s_2 = 3200 \text{ 消费资料}$$

在随后的各个时期，增长以同样的方式进行。<sup>[4]</sup>

卢森堡认为，没有理由证明，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无法以这样的方式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样的发展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不断扩大的生产要求持续扩张的消费。这些需求从哪里产生呢？更具体地说，被用于积累的那一部分社会产品（在我们的例子中，数量为  $500 + 150 = 650$  单位的社会产品）需求的源泉是什么？对它的需求明显不可能由资本家或由现有的劳动力的个人消费提供，也不可能通过人口的增长导致的工人阶级购买力的增加来提供，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对于这个增加本身作为增长着的需求的出发点，是不感兴趣的”。<sup>[5]</sup>这种必要的需求，也不可能由马尔萨斯和其它一些早期消费不足论者引入的由诸如地主、神职人员和公务员等构成的“第三者”阶层来提供，因为他们或者是从资本家的消费中，或者是从工资中（在税收和什一税是由劳动人民支付的范围内）获得他们的收入。他们的支出，只是资本家或无产阶级消费的转移。<sup>[6]</sup>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作为企业家而不是消费者的意义上，不同的资本家可以成为“彼此的客户”。这种看法是荒谬的，就像建造了“在空地上自我旋转的旋转木马”，它在“为生产而生产”。<sup>[7]</sup>（像我们以下将看到的，这是她的主要错误。）最后，诉诸对外贸易实际上只是以未决的问题作为论据的诡辩：分析中包含的困难——完全没有解决——只是从一国转移到了另一国，隐含的困难只是被转移了。然而，如果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不是以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而是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为对象，就不可能有对外贸易了：所有国家都是“本国”。<sup>[8]</sup>

如果考虑到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就会产生更大的困难。卢森堡改变了马克思另外一个算术例子中的数字，以使其能包含资本有机构成和剥削率的提高，同时保持利润率不变。<sup>[9]</sup>在卢森堡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利润率的下降而是需求的缺乏。她从马克思的另一个模型开始：<sup>[10]</sup>

$$\text{I} : 5000c_1 + 1000v_1 + 1000s_1 = 70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1430c_2 + 285v_2 + 285s_2 = 2000 \text{ 消费资料}$$



每一部类的资本有机机构都为5（第Ⅱ部类只是接近），剥削率为100%，共同的利润率为16.7%。同样，第Ⅰ部类的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半用于积累，第Ⅱ部类把差不多三分之二（285单位中的184单位）的剩余价值用于积累。卢森堡和马克思不同之处在于，卢森堡假定积累的部分中用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为6：1，而不是马克思假定的5：1。根据以上解释中所表达的精神，我们可以得到（虽然卢森堡没有这样做）：

$$\text{I} : 5000c_1 + 428.7\Delta c_1 + \boxed{1000v_1 + 71.4\Delta v_1 + 500s_0} = 70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boxed{1430c_2 + 157.7\Delta c_2} + 285v_2 + 26.3\Delta v_2 + 101s_0 = 2000 \text{ 消费资料}$$

同样地，方框内的部分是两个部类之间相互交易的数量。第Ⅰ部类为了满足其现有的劳动力、计划增加的下一期的劳动力和资本家的消费，需要由第Ⅱ部类提供的 $1000v_1 + 71.4\Delta v_1 + 500s_0 = 1571.4$ 单位消费品，第Ⅱ部类需要由第Ⅰ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 $1430c_2 + 157.7\Delta c_2 = 1587.7$ 单位，用以补偿当期消耗和计划中的不变资本的扩大所需的生产资料。这两个数字不等。“如果这是积累过程的真实图景”，卢森堡推论说，“生产资料（不变资本）在第二年将有一个16单位的短缺……同样地，消费资料将有16单位的过剩”，这种不平衡将会逐期递增。<sup>[11]</sup>

卢森堡认为，无论是工人、资本家还是马尔萨斯主义者所说的“第三者”，都不能提供实现剩余价值所必需的购买力。只有一个类型的消费者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些完全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费者。从而“在只由工人和资本家构成的社会里，为了积累而实现剩余价值，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深刻而根本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正是资本积累导致的，它周期性地产生危机，并驱使资本不断扩大市场”。<sup>[12]</sup>只有认识了这个矛盾，才有可能得出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的分析无法揭示“实现问题”的存在。它给人的印象是，资本积累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下去。从而放弃了“支持社会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客观论点……社会主义的政治行动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内容不再是经济事件的反映，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历史必然。”<sup>[13]</sup>《资本积累论》的密码很容易地被解码：在批评马克思的同时，卢森堡事实上不仅批评了修正主义者，而且还批评了考茨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心”。

卢森堡继续指出，在现实中，资本主义是“通过不断地吸纳那些能够确保自身存在的条件来发展的”。<sup>[288]</sup>资本主义首先攻击并破坏了前资本主义地区的“自然经济”，把商品生产引入其中。珍贵的自然资源被掠夺，劳动力被“解放”出来、被迫为资本服务，农业与工业和贸易之间发生分离。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武力完成的，因为“如果资本依靠缓慢的内部解体过程，这将需要几百年的时间”<sup>[15]</sup>。卢森

堡通过英国对印度的征服（参见该书第27章）、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和在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参见该书第28章）作出形象描述，阐明自己的观点。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展开的对“农民经济”或简单商品生产的斗争，工业与农业最终被分离开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引入。尽管这个过程，常常表现为一个由经济上占优势的大规模生产方法造成的和平的、渐进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农业与工业的分离过程，决定于诸如租税重压，战争，以及国家对土地的浪费和独占等因素。因此，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属于政治权力和刑法的范围，而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sup>[16]</sup>在该书第29章，北美定居者、南非的波尔共和国为卢森堡提供了有效的例证。

资本主义毫无障碍地取得了简单商品生产的胜利。但这里也存在着它最终垮台的关键：“资本没有非资本主义形态的帮助，就不可能进行积累，另一方面，它也不能容忍非资本主义形态与它自己并存下去。只有使非资本主义形态不断地和加速地解体，才能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然而，一旦资本主义在所有地方都赢得完全的胜利，资本积累必然停止，因为它无法再获得非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去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在其历史生命上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所表现出的矛盾行为的原因。”<sup>[17]</sup>

卢森堡的帝国主义概念是很独特的。它不依赖于正式的殖民化，同希法亭强调垄断的增长或银行支配地位上升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资本积累的帝国主义阶段，意味着资本的世界竞争阶段，包含对资本落后地区——在那里资本曾经实现其剩余价值——进行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的解放。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外债、铁道建设、革命与战争。”卢森堡提到1900年后向俄国、土耳其、波斯、印度、日本、中国和北非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帝国主义的渗透首先破坏了当地的农民经济，使得名义上独立的国家越来越依赖于欧洲的资本（该书第30章以土耳其和埃及为例，对这个过程作了详细描述）；然后，在这些迄今为止仍然落后的地区，产生了不可抗拒的、要求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压力。这仍然是在暴力的背景下完成的：

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及殖民地，通过战争与革命，获得资本主义自治。革命在资本主义的解放过程中是必要的。落后国家必须摆脱它们陈旧的政治组织，以及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的残余，创造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近代国家机器。土耳其、俄国及中国的革命，即属此类。

它们代表着“争取经济独立”的先驱。<sup>[18]</sup>

这就引出了卢森堡引关于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定义，即帝国主义是“一个政治名词，用来表达在争夺尚未被侵占的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竞争中所进行的资本积累……（帝国主义）在对非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中，在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中，变得愈来愈无法无天，愈来愈野蛮粗暴”。其表现之一就是世界范围内对自由贸易的放弃，自由贸易“仅仅是资本主义积累史上的一个插曲”。<sup>[19]</sup>表现之二就是军国主义，《资本积累论》以对这个主题的分析结束。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具有军国主义的特征。军事力量被用于征服前资本主义地区，它也是“资本主义各国争夺非资本主义文明地区的武器”。更重要的是，“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军国主义是实现剩余价值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领域”。<sup>[20]</sup>卢森堡重新回到再生产模型，考察了作为消费者的国家产生的影响。<sup>[21]</sup>她指出：“从工人所得中勒得的税收，在被用于军需品生产时，就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了新的机会”<sup>[22]</sup>，必须说明的是，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中所作的推理不很容易被理解。

## 2.对卢森堡的批判

即使是支持罗莎·卢森堡革命左派观点的著述者，对她的经济分析也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几乎没有人相信她试图证明的结论，即在封闭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积累是不可能的。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对卢森堡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批评，资本家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彼此互为客户，用于满足积累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需求，来自资本家意欲增加使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卢森堡对这类观点持有的反对意见，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她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评中，她同时也把对杜冈的批评用于反对布尔加柯夫和列宁的观点。仅仅建立在资本主义需求增长基础之上，不存在对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利用的积累，将意味着“人类消费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生产越来越成为目的本身”。<sup>[23]</sup>卢森堡认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但她却错误地把持续扩大人的需求的目标，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整体的目标。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恰恰在于它的无政府性，资本主义没有也不需要一种目的，对资本主义进行任何形式的目的论的解释都是不恰当的。<sup>[24]</sup>在个别资本家层面上，卢森堡同样是错误的。资本家是被利润而不是被对消费增长的关注所驱动，如果为了生产机器而不断增加能够生产机器的机器生产是有利可图的，那就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解释这种生产为什么应当被中止。把无限制的均衡增长的可能性和它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区分开来，当然是很重要的。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投资的决定因素，

但卢森堡对这一问题没有能作出详细说明。<sup>[25]</sup>希法亭对垄断作为一个限制支出因素的分析，有可能为这样一种投资理论提供必要的基础，但垄断在卢森堡的思想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总之，卢森堡混淆了个别资本的需要（需求的外部来源）和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在卢森堡的分析中，还存在着三个更为严重的不相一致之处。首先，她对解释经济危机的比例失调论做了猛烈的批判，因为（她认为）这一理论接受的是萨伊定律，但她的批判据以建立的事实与她自己的解释也存在着和比例失调论类似的缺陷。<sup>[26]</sup>在卢森堡提供的存在生产率提高的资本积累的算术例子中，消费品生产过剩的数量和生产资料供给不足的数量是相同的（如卢森堡自己承认的）。从总量上看，供给和需求是相等的。<sup>[27]</sup>第二，很难调和卢森堡对军事开支的分析和她对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第三者”的分析。如果资本主义从把对工人征税所得的收入用于资助军备中获益，为什么用于国家闲职人员或国教方面的开支，不会产生像军备开支那样的效果呢？很可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可以找到很好的理由，用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偏好于军事开支，而不是其它形式的国家活动，<sup>[28]</sup>但卢森堡没有对这些理由进行解释。

卢森堡对帝国主义讨论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不相一致之处，同向前资本主义市场出口的结果有关，如果这种出口被同等数额的进口抵消，那么出口就不会对需求水平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只有出口顺差才能造成需求的净增加，但这必然意味着资本向前资本主义世界的输出（在不存在世界货币数量的增加时）。卢森堡似乎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的难题。在卢森堡的分析中，需求不足问题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但是资本输出只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才变得重要起来，而且即便如此，资本输出也没有产生像希法亭和列宁模型中所说的那种支配作用。<sup>[29]</sup>在对资本输出的解释上，《资本积累论》比希法亭《金融资本》的内容更少。卢森堡的分析可以通过引入商品输出的间接影响来加以挽救，因为即使是在中性的贸易平衡的条件下，商品输出也会引致国内投资支出的增加。<sup>[30]</sup>然而，这并不是卢森堡的观点，这再次表明卢森堡缺乏投资理论。

卢森堡对落后地区被吸纳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分析也存在问题。帝国主义渗透并不像卢森堡认为的那样，总是必然敲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死亡的丧钟。常见的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能够生产剩余产品，而且还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因此，在许多落后地区，奴隶制和各种形式的封建主义只是被资本主义整合进世界经济中，而不是被消灭了。<sup>[31]</sup>对卢森堡关于落后国家工业化

的解释也有反对意见。她完全忽视了帝国主义可能阻碍、延缓和扭曲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她设想的大规模的自治性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幻想，她设想的充满侵略性和独立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则更像是一种妄想。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多地牵涉到复杂的依赖关系，吸纳过程的主要推动者是扎根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通过资产所有权、技术垄断和债务，维持它们的控制。<sup>[32]</sup>本书的第二卷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

此外，在卢森堡的观点中，还存在着布哈林在《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sup>[33]</sup>中指出的另外一些不足。《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写于1924年，这部著作对卢森堡的理论进行了直截了当的反驳，这部著作很可能是苏联打算对左翼反对派攻击时使用的（参见以下第十五章）。布哈林认为，在卢森堡的分析中，非资本主义的外围，实际上并没有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它的功能只是实现在其它地方生产的剩余价值。<sup>[34]</sup>此外，布哈林还认为，卢森堡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努力寻求海外殖民地的同时，其本土仍然保留着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sup>[35]</sup>布哈林还指出，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崩溃即将来临的信念和她自己所持立场，在逻辑上也是不相符合的，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仍然属于“第三者”的范畴。<sup>[36]</sup>

无论卢森堡的逻辑存在什么样的优缺点，她（完全不同于希法亭）在得出自己的结论时都是毫不含糊的。她强调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军事和国家力量的重要作用；强调军国主义和发达国家之间日趋紧张的关系的经济必然性；她否定了封闭资本主义体制中稳定均衡增长的可能性。在政治上，《资本积累论》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大多数人进行的激烈的、蓄意的挑衅，因为无论是修正主义的右翼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都对消除危机的经济发展和避免战争抱有希望。就像卢森堡在《反批判》中讲述的那样，党的机关报对《资本积累论》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令人惊讶的是，希法亭对《资本积累论》并没有作出反应，看起来可能是他对经济争论失去了兴趣。考茨基迟来的反应，是以间接的方式进行的。当时，他把在《新时代》上对这本书进行评论的任务，托付给了一个年轻的奥地利理论家——奥托·鲍威尔。鲍威尔的文章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对卢森堡的批判上，而且也体现在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贡献上。

### 3. 奥托·鲍威尔的积累模型

鲍威尔的分析是从对人口增长后果的思考开始的，他研究了在充分就业情况

下资本积累必然发生的变化。这使得他能够对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过程和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作出比较,在社会主义经济增长过程中,中央计划当局可以做出必要的调整,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缺乏有意识的社会调节。鲍威尔假定年人口增长率为5%,不变资本的使用每年以10%的比率增长。这既包含了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基本命题,也使得鲍威尔能够对卢森堡提出的对再生产的分析必须考虑技术变化的挑战作出回应。“此时”的鲍威尔,坚持剥削率保持不变,因此实际工资随着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相联系的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除了含蓄的暗示,在文章后面的论述中,没有放宽这些假定。<sup>[37]</sup>

#### 奥托·鲍威尔小传

1881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从事制造业的波西米亚犹太人家庭。在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在庞巴维克的指导下),在那里,结识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伦纳、鲁道夫·希法亭、麦克斯·阿德勒。鲍威尔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论述民族问题的著作。1907年至1914年,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SPO)书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东部前线被俘,在俄国度过了三年的战俘生涯。1918-1919年,鲍威尔任新奥地利共和国外长。之后的15年,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事实上的领导人和主要理论家。在1934年的陶尔斐斯政变中,被迫流亡捷克斯洛伐克,鲍威尔放弃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中间立场,转向更加革命的立场。1938年5月,他再次逃离(到巴黎),3个月后在巴黎去世。

如果经济一开始有200000单位的不变资本和100000单位的可变资本,剥削率为100%,总量上表示的经济增长过程如下:<sup>[38]</sup>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总价值
第一年	200000	100000	100000	400000
第二年	220000	105000	105000	430000
第三年	242000	110250	110250	462500
第四年	266200	115762	115762	497524

在这里,资本有机构成从第一年的2.00增加到第四年的2.30,利润率从0.333下降到0.303(在剥削率一定的情况下,利润率必然下降)。每一年的净产出

(即活劳动总量, 或者  $v+s$ ) 的增长率保持5%不变。这是由鲍威尔的假定决定了的, 由他的假定可知, 可变资本以每年5%的比率增长, 剥削率不变, 因此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有着同样的增长率。总产出 ( $c+v+s$ ) 以递增的比率增长, 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之间为7.50%, 在第三年和第四年之间为7.57%, 更重要的是, 鲍威尔称为“积累率”(一定程度上具有误导性)的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也在稳步增长。举例说, 在第一年, 100000单位总剩余价值中的25000单位被留作积累, 这使得资本家可以在第二年增加20000单位的不变资本和5000单位的可变资本。资本家把他们收入中的25%用于储蓄和积累。到第三年, 这个比率上升到接近27%, 而且只要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增长得更快, 这个比率就会继续增长。

接下来, 鲍威尔转向了对部类之间关系的研究。在第一年, 可以表示如下:<sup>[39]</sup>

$$I: 120000c_1 + 50000v_1 + 50000s_1 = 220000 \text{ 生产资料}$$

$$II: 80000c_2 + 50000v_2 + 50000s_2 = 180000 \text{ 消费资料}$$

如果资本家把剩余价值中的四分之一用于积累, 并把它们完全投资在本部类, 可以得出:

$$I: 120000c_1 + 10000\Delta c_1 + \boxed{50000v_1 + 2500\Delta v_1 + 37500s_{0_1}} = 220000$$

$$II: \boxed{80000c_2 + 10000\Delta c_2} + 50000v_2 + 2500\Delta v_2 + 37500s_{0_2} = 180000$$

通过对方框内部分的比较, 可以发现第 I 部类对第 II 部类生产的消费资料的需求完全等于第 II 部类对第 I 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的需求 (=90000)。但是这不能建立两大部类之间的均衡, 在第二年将出现如下情况:

$$I: 130000c_1 + 52500v_1 + 52500s_1 = 235000 \text{ 生产资料}$$

$$II: 90000c_2 + 52500v_2 + 52500s_2 = 195000 \text{ 消费资料}$$

生产资料产出的数量与鲍威尔假定的不变资本(是235000而不是242000)每年增加10%所要求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相比, 存在7000单位的欠缺, 同时消费品的生产将会比必须的多出同样的数量(是195000而不是188000), 第 II 部类积累过剩, 而第 I 部类则积累不足。

鲍威尔提供的解决方法是, 第 II 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积累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投资于第 I 部类, 增加第 I 部类的产出并相应地减少消费品的产出。在  $10000\Delta c_2$  中, 5334单位投资于第 II 部类中, 剩下的4666单位用于第 I 部类的投资; 同样地,  $2500\Delta v_2$  中的1333单位用于第 II 部类, 剩余的1167单位转移到第 I 部类。<sup>[40]</sup>第 II 部类的资本家可以通过“或者自己建立生产生产资料的工厂, 或者通过银行中介把他们积累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生产资料工业的资本家那

里，供他们使用，或者购买生产生产资料的公司的股份”来达到这一点<sup>[41]</sup>。当然，第 I 部类的资本家的全部剩余价值被用于本部类。

从而，第二年有：

$$\text{I} : 134666c_1 + 53667v_1 + 53667s_1 = 2420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85334c_2 + 51333v_2 + 51333s_2 = 188000 \text{ 消费资料}$$

第 II 部类的资本家拥有  $4666c_1 + 1167v_1 + 1167s_1 = 7000$  单位的生产资料（除本部类的全部产出之外）。同样的推理，可以得出第三年的情况：

$$\text{I} : 151048c_1 + 57576v_1 + 57576s_1 = 2662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909952c_2 + 52674v_2 + 52674s_2 = 196300 \text{ 消费资料}$$

以及第四年的情况：

$$\text{I} : 169124c_1 + 61738v_1 + 61738s_1 = 292600 \text{ 生产资料}$$

$$\text{II} : 96876c_2 + 54024v_2 + 54024s_2 = 204924 \text{ 消费资料}^{[42]}$$

与第一年相比，第 I 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 14.2%（从 2.40 到 2.74），利润率下降了 9.18%（从 0.294 到 0.267）。第 II 部类的有机构成提高了 11.9%（从 1.60 增加到 1.79），利润率降低了 7.01%（从 0.385 下降到 0.358）。

鲍威尔的结论就是：“不仅在第一年，而且在接下来的每一年，两个部类产出的总价值可以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出售，总剩余价值得以实现。因此，卢森堡同志的假定——被用于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无法实现——是错误的”。<sup>[43]</sup>鲍威尔认为，并不是第一年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如例子所显示的）都可以在当年得以实现——有可能是正确的。如果资本家只是在第二年开始的时候购买他们扩大生产所需的新机器，那么由  $\Delta c_1 + \Delta c_2$  所代表的那部分第一年的剩余价值将只能在第二年得以实现；但它最终还是被实现了。如果  $\Delta c_1 + \Delta c_2$  所代表的商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地方出售的——卢森堡认为这是必须的——积累将受到损害，因为继续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将无从获得。“这部分剩余产品从资本主义市场退出，将不会像卢森堡认为的那样使积累成为可能，恰恰相反，它将使得任何积累都变得不可能”。<sup>[44]</sup>

在对卢森堡的观点做出分析后，鲍威尔转向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增长周期本质的思考。就这一问题来说，必须放宽劳动力供给等于劳动力需求这一最初的假定。如果可变资本的积累比劳动力的增长慢很多，将导致失业。在这种积累不足的情况下，实际工资下降，剥削率上升。在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既定的情况下，积累率将增大。最后到达的一点就是，可变资本的增长超过劳动人口的增长。然而，随后发生的是暂时性的积累过剩。随着失业后备军的减少，实际工



资再一次上升，剥削率下降，这个过程一致持续到不仅利润率而且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绝对数量也开始下降。马克思描述的“绝对生产过剩”导致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在危机中积累受到严重的限制，失业率上升，实际工资下降，利润率再次得到恢复。“繁荣、危机和萧条的周而复始，经验地表现了一个事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动地产生积累过剩和积累不足，资本积累反复地根据人口的增长进行调整”。<sup>[45]</sup>

一旦从国际范围内考虑问题，国内人口的增长就不再是一个关键因素。积累过剩可能会因其它地方存在积累不足而在一些地区持续发生。

经常出现积累过剩的国家，把它们每年积累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投资到国外，而且这部分剩余价值越来越大，例如：法国和英国。经常出现积累不足的国家引进国外资本并把劳动力输出到国外，如东欧的农业家。在一国内部生产性资本的扩张总是受限于可以获得的劳动力。<sup>[46]</sup>

这就凸显了卢森堡错误的帝国主义理论中的真理内核。尽管积累在封闭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是可能的，但它也受到了限制。帝国主义有助于放松这些限制，它不仅通过扩张能够招募到新劳动力的控制区，而且也通过获取原材料、刺激有机构成超过平均水平的产业的发展，以及在经济危机期间，为“庞大数量的商品”提供市场来放松这些限制。<sup>[47]</sup>

鲍威尔否认他的分析是对帝国主义的辩护：

因为在资本的辩护者想要证明积累——消费能力随着生产的扩大而自动地上升！——不受限制的本质时，我们揭示了积累受到的限制。在资本的辩护者想要证明普遍危机的不可能性时，我们说明了积累的规律只能通过普遍的危机发挥作用，说明了危机造成的失业、工资的减少、大众苦难的增加、大多数工人日益增加的痛苦和愤慨。

从而，资本主义确实给自己带来毁灭，即使不是以卢森堡所假定的那种方式进行：

如果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可能的，它将会因军备竞赛、越来越多的压迫性税收、灾难性的战争而引起工人大众的愤怒。如果它的扩张被阻止了，对积累的限

制就会加剧，危机变得更加频繁，持续的时间更长，更具破坏性……资本主义将不会因实现剩余价值的机械的不可能性而崩溃，它将被它所激起的群众的愤怒所击败。并不是只有当最后的一个农民和最后的一个小资产阶级都变成雇佣工人，从而不再提供一个实现剩余价值的市场的时候，资本主义才瓦解：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教育、联合和组织起来的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愈来愈强烈的愤怒，将会早得多地把它击溃。<sup>[48]</sup>

#### 4. 卢森堡的《反批判》

鲍威尔的增长模型，无疑是1914年之前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尝试进行的最成熟的宏观动态分析，它与现代哈罗德—多马理论之间的密切联系，直到最近才被完全理解。鲍威尔文章的目的是为了驳斥卢森堡的崩溃理论，并说明在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稳定的均衡增长是可能的。尽管他对《资本积累论》的批评是有力的一——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达到的目标，但是鲍威尔自己的模型也未能经受住更加细致的审查。早在1929年，亨利克·格罗斯曼就证明了鲍威尔数值例子中所确定的增长路径，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已经被现代数学分析所证实。在经过32年的生产周期后，经济将会耗尽它用以维持给定的积累率提供资助的剩余价值。这是鲍威尔不变资本以两倍于可变资本的速度增加，剥削率保持不变的假设的必然结果。从代数上看， $s_1$ 和 $s_2$ 上升的太慢以至于无法满足模型所要求的 $\Delta c_1$ 和 $\Delta c_2$ 的持续增加，积累的过程无法一直继续下去。<sup>[49]</sup>从技术上看，鲍威尔的模型过于武断。稳定增长只有在鲍威尔提出的限定条件中，至少有一个被放松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一个明显的选择是允许剥削率上升，从而可以增加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率。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存在充分的灵活性能够保证稳定增长的可能性，确保这种可能性的最确定的方法是保持资本有机构成不变。<sup>[50]</sup>在不考虑鲍威尔本来意图的情况下，他的模型是一种和技术变革过程中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任何简单的意义上都不是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理论。

然而，这种判断完全不会损害鲍威尔危机理论的声誉，他的危机理论只能用它自身的优点来加以评价。积累不足时期和积累过度时期交替出现的概念有着直观的吸引力，而且它的确引起了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注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避免了比例失调、消费不足和利润率下降理论中的许多固有困难的同时，提供了对周期性波动的解释。<sup>[51]</sup>但是，鲍威尔的理论也

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因为它没有考虑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波动。萧条时期总是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因为总需求不足以实现经济中的生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时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坚持把危机和实现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在文章的开始部分，鲍威尔的确提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能力的持续增加和资本主义消费能力逐渐缩小之间的矛盾，<sup>[52]</sup>但是，这种考茨基式的暗示并没有很好地加以深入展开。因此，鲍威尔对经济危机的解释是很不完整的。

这些批评中，很少有哪个是由卢森堡在她那明显充满愤怒情绪的《反批判》中提出的，她对鲍威尔提出的很多反对意见是不着边际的。她指责说人口变化不是资本积累的真正基础，积累可以在人口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进行（就像当时的法国那样）；积累决定了人口增长率而不是相反。<sup>[53]</sup>卢森堡把鲍威尔对两部类之间比例失调的分析驳斥为“纯粹的欺骗”，并否认第Ⅱ部类的资本家会像鲍威尔设想的那样，购买保持均衡增长所需的4666单位的生产资料。<sup>[54]</sup>这明显是错误的，卢森堡本来可以通过对平衡增长的可能是如何转化为现实的进行提问，通过对直到第二年进行购买之前一直保有第一年生产的商品存货的资本家的资金来源进行探究，表现得更好。卢森堡认为鲍威尔模型中的剥削率应当上升而不是保持不变，这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但即使是在这里，她也因坚持在剥削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所有的技术进步只是为了工人的利益”<sup>[55]</sup>而损害了自己的理论。

在卢森堡对鲍威尔的批评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她自己的主张，“这一套学究式地炮制出来的令人发指的胡言乱语……不是一个普通的错误，这样的事在寻求科学知识时可能出现……（而是）当前官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耻辱，社会民主党的一桩丑闻”。<sup>[56]</sup>必须记住的是，《反批判》是在卢森堡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入狱之后在狱中完成的。它的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学术性的，它的主要目标是卡尔·考茨基而不是奥托·鲍威尔。卢森堡总结说，鲍威尔的文章代表了“一个十分明显的战术趋势的理论公式”，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心”而言，帝国主义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是“一小撮从中渔利的人心存不良的捏造”。虽然反对战争，但考茨基主义者拒绝接受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是通向和平的唯一的道路的观点，他们认为能够使资产阶级相信帝国主义的终结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无产阶级和资本之间为解决它们的世界历史矛盾而进行的最后的对抗，变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为‘缓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矛盾而进行的历史性妥协的乌托邦”。<sup>[57]</sup>正是因为卢森堡认为鲍威尔持有这样的立场，才对他的政治经济学如此敌视。

## 5.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第二次思考

不管卢森堡的批评用于鲍威尔时有什么样的缺陷，这种批评对1914—1915年考茨基文章中坚持的立场来说都是公正的。考茨基1914—1915年的文章和卢森堡的《反批判》，是最后的也是重要的论述帝国主义理论的德国文献。<sup>[58]</sup>在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约七周前的第一篇文章中，考茨基一开始就反对思想领域中存在的认为帝国主义可以和整个当代资本主义共存的流行趋势。考茨基论证说，这只是对在不存在帝国主义情况下资本主义就无法存活观点的同义重复。事实上，“帝国主义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产物。它源自每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力图征服和吞并越来越多的农业区的压力”。<sup>[59]</sup>考茨基认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对理解帝国主义是至关重要的。稳定增长要有两个条件：除了人们很熟悉的马克思提出的第Ⅰ部类生产和第Ⅱ部类生产之间的平衡，还有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平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后两个部门之间比例失调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因为农业生产者的购买力无法跟上工业生产发展的步伐。由此导致的危机，表现为制造品的生产过剩和农业品的生产不足两种形式，后者表现为食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这是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初级产品的价格下降后，1900年以后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

在考茨基看来，帝国主义是作为一种争夺农业区的特殊方式出现的。世界和谐的自由主义梦想终结了，自由贸易被放弃了，因为工业区总是能够支配农业区。由于工业化是实现或保持国家独立的一个条件，美国和西欧的一些国家利用关税限制英国制造品的进口。英国对这种挑战做出的必然的防御性反应，宣告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大规模的资本输出被用于在农业区建立铁路网，国家力量被用来保护这些投资；资本输入较多的国家（尤其是俄国和美国）本土的工业化开始了，这增强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所有可能的地区维持它们对其控制的决心。

迄今为止，很难在考茨基和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之间做出选择；而且如果用“农业区”代替“前资本主义”地区，那么甚至是卢森堡的分析也可以整合到考茨基的分析中。直到文章的最后部分，考茨基才开始和卢森堡（没有提到她的名字）背道而驰。<sup>[60]</sup>在这里，考茨基否认了帝国主义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持续获得原材料和资本投资的出路，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军国主义和战争并不必然符合除武器生产商之外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今天，每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都会向他的同僚大声呼喊：全世界的资本家，联合起来。”资本家们受到殖民地解放运动和国内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财

政负担的反抗带来的威胁，同时资本积累也因沉重的利税而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从而帝国主义在自掘坟墓……从纯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即卡特尔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取得胜利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对于超帝国主义，我们当然必须像对付帝国主义那样地同它作坚决的斗争，虽然它所带来的危险是在另一方面，而不是在军备竞赛和威胁世界和平方面。

考茨基承认战争是可能的。因此，“帝国主义的神圣同盟”只能出现在全球冲突终结的时候。任何世界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同盟就越有可能产生。<sup>[61]</sup>

作为事后诸葛亮，人们很容易对考茨基关于战争可能避免的主张嗤之以鼻。然而，在考茨基写作的时候，存在着使人相信国际紧张局势正在缓和的理由。当时大国之间的结盟方式变得越来越脆弱，一些现代历史学家否定它们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必然性。<sup>[62]</sup>战争爆发几个月后，考茨基重新回到这个论题，对修正主义者伦施和库诺进行了批评，他们披着卢森堡的外衣，认为正是因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所以社会民主党对帝国主义的反对是无效的、反动的。考茨基认为这是对希法亭《金融资本》的误解，在《金融资本》中，帝国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政策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阶段。因此，有可能存在其它的政策选择，可以想象，当前造成战争的政策将会被新的政策取代，这种新政策允许“国际上联合在一起的金融资本对世界进行共同的剥削”。这种超帝国主义政策将会削弱资本主义制度道德破产的趋势，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新希望和新期望的时代”。一切取决于战争的结果。<sup>[63]</sup>

## 第六章注释：

[1] N.Geras, 'Rosa Luxemburg: Barbarism and the Collapse of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82, 1973, pp. 17-37.

[2] 89 R.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1) pp. 318-19.

[3] *Ibid*, pp. 76-92, 127-30, citing K. Marx, *Capital*, volume II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1) pp. 397-402 (ch. 20, s. 2-3). See also M.C. Howard and J.E.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 2nd edn, pp. 182-5.

[4]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p. 114-19, 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页。这里的符号，也是霍华德和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第185-190页中的符号, 其中包含了一个一般性的代数解。

- [5] Accumulation ,pp.131-33.
- [6] Ibid,pp.134-5.
- [7] R.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An Anti-Critique', in K.Tarback(ed.)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Allen Lane, 1972) p.57;Accumulation,p.333.
- [8] Accumulation,p.136.
- [9] Ibid,p338.
-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 [11] Accumulation,p.337.
- [12] Ibid,pp.350,347.
- [13] Ibid,p.325; 'Antikritik', pp.61-2,76.
- [14] Accumulation,p.336.
- [15] Ibid,pp.368-70.
- [16] Ibid,p.396.
- [17] Ibid,pp.416-17.
- [18] Ibid,pp.419,444-5.
- [19] Ibid,pp.446,449.
- [20] Ibid,p.454.
- [21] Ibid,pp.455-67.
- [22] Ibid,p.464.
- [23] Ibid,p.136.
- [24] A.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80)p.67.
- [25] J.Robinson, 'Introduction' to Luxemburg, Accumulation ,pp.19-21; M.Bleaney, Underconsumption Theories :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Analysis(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6)p.191;M.Kalecki, 'The Problem of Effective Demand in Tugan-Baranovski and Rosa Luxembure', in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1933-197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148.
- [26] Accumualtion of Capital, p.324;Antikritik, pp.75-6.
- [27] Accumualtion of Capital,pp.337-8;cf.M.H.Dobb, O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m(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65)p.268.

[28] W.A.Darity, Jr, 'Kalecki, Luxemburg and Imperialism', *Journal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2,1979-80,pp.223-30;M.Kalecki, '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 in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pp.138-45.

[29] Dobb, *On Economic Theory*, p.270; Kalecki, 'Problem of Effective Demand',pp.152-3;G.Lee, 'Rosa Luxemburg and the Impact of Imperialism', *Economic Journal*, 81,1971,pp.847-62.

[30] J.Robinson, cited in Dobb, *On Economic Theory*, p.270,n; E.Patnaik, 'A Note on External Markets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Economic Journal*, 82,1972,pp.1316-23.

[31]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p.72.

[32] G.Lee, 'An Assimilating Imperi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2,1972,pp.345-60.

[33] N.I.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 Tarbuck(ed.) *Imperialism*,pp.151-270.

[34] *Ibid*,pp.245ff.

[35] *Ibid*,p.248.

[36] *Ibid*,pp.260-4.

[37] O.Bauer, 'Die Akkumulation von Kapital', *Die Neue Zeit*, 31,1913,pp.831-8,862-74, cited from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986, pp.87-110. On Bauer and his 'Austro-Marxist' colleagues see M. E. Blum, *The Austro-Marxists 1890-1918: A Psychobiographical Study*(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5).

[38] Bauer, 'Die Akkumulation',p.93, adapted from Table 1.

[39] *Ibid*,p.94.表4是这一段所有数字来源的基础。

[40] *Ibid*,pp.98-100.

[41] *Ibid*,p.98.

[42] 来自*Ibid*,p.96.的表7.

[43] *Ibid*,p.100.

[44] *Ibid*,p.103. (original stress deleted)

[45] *Ibid*,p.107.

[46] *Ibid*,p.107. (original stress deleted)

[47] *Ibid*,p.109.

[48] *Ibid*,p.110.最后一段结尾处出处不明的引用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马克思。

[49] H.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Leipzig: C.L.Hirschfield, 1929)pp.99-109,117-25,179-90; Z.B.Orzech and S.Groll, 'Otto Bauer's Scheme of Expanded Reproduction: An Early Harrodian Growth Mode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5,1983,pp.529-48; see also Chapter 16 below.

[50] M. Bronfenbrenner and M.Wofson, 'Marxian Macrodynamics and the Harrod Growth Mode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6,1984,pp.175-86; L.Samuelson and M.Wolfson, 'Expository Marxism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ynamics',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986,pp.65-85.

[51] See for example M.H.Dobb,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Some Essays in Economics Tradition*(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37)pp.113-14;P. M.Swee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pp.147-55;M.Bronfenbrenner, 'Das Kapital for the Modern Man', *Science and Society*,29,1965,pp.419-38.

[52] Bauer, 'Akkumulation', p.48.

[53] Antikritik, pp.81-2,113.

[54] Ibid, pp.91-4.

[55] Ibid, pp.98,108.

[56] Ibid, p.135.

[57] Ibid, p.108.

[58] K.Kautsky, 'Der Imperialismus,' *Die Neue Zeit*, 32,1914, pp.908-22;Kautsky, 'Zwei Schriften Zum Umlernen', *Die Neue Zeit*, 33,1915, pp.33-42,71-84,107-16,138-46.

[59] 'Der Imperialismus',p.909,original stess deleted.

[60]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section appeared as 'Ultra-Imperialism in New Left Review, 59,1970,pp.41-6.

[61] 'Der Imperialismus',pp.920-2.

[62] A.J.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tery in Europe, 1848-1918*(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pp.518-20.

[63] 'Zwei Schriften', pp.144-5.



## 第二篇 俄国到1917年的贡献

### 第七章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 1. 引言

自理论发展伊始，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同源於远东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分支就结合在一起。然而，马克思留给俄国的遗产与留给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遗产迥然不同。尽管他们能够接触到的马克思的著作在本质上相同<sup>[1]</sup>，但在俄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和沙皇专制的背景下，这些著作中的有关内容显得较为晦涩。而且马克思关于俄国的具体观点往往没有什么充分的根据，同他关于历史发展的整体理论毫不相干。有鉴于此，详细地概括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是必要的。此外，由于俄国马克思主义对国内环境的反应较为敏感，因而需要对沙皇专制帝国的本质给予更多的关注。

#### 2. 俄国专制主义的本质

以下将要证明的是，俄国作为专制持续时间最长的欧洲国家，在19世纪中叶仍然十分稳固。沙皇国家中央集权官僚机构对社会统治的程度，是较早时期西欧专制国家无法比拟的。国家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拥有大部分的非农业经济部门<sup>[2]</sup>。与幅员辽阔的领土相匹配，帝国控制着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及一整套对内镇压的国家机器。宗教不独立，教育机构的自治也微乎其微。帝国的意识形态并不复杂，它打的旗号是“权威、正统和民族性”。这一意识形态的谱系是清晰的、绝对的，因为沙皇专制国家没有经历过类似于在德国和奥匈帝国那样的改革。俄罗斯帝国完全不具备代议制议会、男性普选权和公民权这些德意志帝国19世纪70年代所具有的特征，甚至到了20世纪也依然如此。沙皇专制国家经受住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和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扩张的考验。事实上，它进行了反击，这种反击不仅在最终击败拿破仑时发挥了作用，而且（自18世纪晚期以来）为了镇压革命和支持

反动势力而准确地打入西方。<sup>[3]</sup>

俄国“利维坦”（Leviathan）的阶级特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代历史学家往往强调国家的独立和国家利益的至高无上。实际上，这种观点在马克思把俄国称作“半亚细亚”国家时也有所体现。<sup>[4]</sup>在革命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持这种观点。但是，马克思探讨阶级与国家关系的理论蕴涵着复杂的视角。尽管现实是充满矛盾的，但这些矛盾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人们不太可能就追求阶级利益所需的必要条件使达成共识。从而，任何一个阶级国家都必定会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sup>[5]</sup>此外，虽然俄国专制主义的历史演变，有助于形成“国家主权凌驾于所有社会阶级之上”的观点，但是19世纪中叶俄国的形势更为复杂。回望19世纪中叶俄国专制统治的历史，对历史记录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但在极为严峻的条件下，封建君主专制的形成必然要求极高程度的国家自治。

至19世纪中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世袭贵族，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是稳固的：

在大约100000个贵族地主中，接近50000个地主拥有不到270公顷地产。另外一半的贵族地主，却在10亿公顷贵族土地中占有97%，而且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这些面积超过了所有私人拥有的土地50%多。给人印象更深的是，极少的（10%）农业贵族拥有了2700公顷的土地，其比例占有所有不动产土地中的75%。甚至155个超级权贵，他们的不动产平均达270000公顷，其比例占有贵族土地的33%。<sup>[6]</sup>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机器与贵族结构的融合。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

对应于国家官僚机构的级别，在贵族阶级内部形成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反之，凡在国家机构中占据确定位置的人，也被授予相应的贵族等级，在一定级别之上的等级为世袭等级。这样，一直到1917年，贵族头衔和特权，通过政治体制同各种级别的行政职能联系在一起。<sup>[7]</sup>

因此，尽管名义上是沙皇统治，但是沙皇不仅要通过官僚贵族，而且还要通过贵族地主阶级来进行统治，而他自己就是这个阶级中最重要的一员。

这一时期开始的农业领域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下述事实：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的废除，是按照贵族的利益、不合比例地展开的。现实中封建关系依然很强

大，拥有土地的农民的数量少于农奴制下农民的数量，强迫前农奴因分得贵族的土地而赔付给贵族地主的补偿费明显过高。<sup>[8]</sup>后来，在20世纪初期对特权结构所做的修补也如出一辙。对民众革命的力量不得不做出让步，但尽可能少地伤及贵族的经济利益或国家的政治权力。

这种相对单纯的封建专制主义形式，意味着支撑它的经济基础是极其落后的。1861年俄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不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一半，不及英国的1/4和美国的1/6。<sup>[9]</sup>婴儿死亡率和文盲率明显是欧洲最高的。<sup>[10]</sup>农民使用原始的技术，并被落后的交通孤立在相互隔绝的小村落里，他们的数量占整个人口（74000000）的70%以上。<sup>[11]</sup>19世纪60年代之前，农奴的生活条件与奴隶的非常接近，与中世纪欧洲隶农的地位差不多。农奴依附于他们的主人，而不是土地，只有少数人在大规模的采矿业、建筑业和工业活动中工作，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封建农业中。<sup>[12]</sup>从而，剥削在本质上表现为一种古代的而非中世纪的属性。即便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农民获得的自由也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数农民尽管在法律意义上拥有土地，但仍然受当地贵族的剥削，同时又受中央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sup>[13]</sup>

19世纪50年代，城市人口不到总人口的10%，其中仍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sup>[14]</sup>城市本质上是行政、军事和商业中心，城里零星地有些工业，但没有大工业。仅有的一些大工业，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尤其是军事上的需要而进行干预的结果。私人资本，尤其是国内私人资本并不是19世纪中叶俄国的主要力量。这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1789年、1830年和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未能在沙皇统治的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唯一表现出受到当时的西方世界影响的阶层是知识分子阶层，它主要是由士绅、官员、教授和学生组成，知识分子阶层的态度和主张变得日益激进。<sup>[15]</sup>然而，这个阶层自身积聚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国外的军事压力与国内农民反抗和叛乱这两股并行的历史力量，塑造了俄国社会，这也是在稍后一个时期造成它分裂的力量。两种力量最初都起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贵族安全的作用，“一方所需要的政治忠诚，是用满足另一方所要求的世袭农奴制换取的。”<sup>[16]</sup>这一过程（农奴制）开始于15世纪的相对较小的莫斯科公国伊凡三世时期，尽管与所有的成长中的专制主义国家一样，专制主义在俄国经历了几番潮起潮落，但是，在18世纪初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农奴制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巩固。<sup>[17]</sup>独立的贵族权力受到了压制，通过要求贵族承担普遍的服役义务，提高了贵族的官僚职能，同时也巩固了他们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农民

流动受到限制，农奴制进一步得到强化，他们的反叛遭到镇压。城镇自治被粉碎了，一个地理上不断扩张的帝国，为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创造了条件。

但是，沙皇帝国也不乏经济现代化的因素。在能够使沙皇国家获得领先地位的意义上，这些因素不可能被摒弃；在面对更具活力的西方国家时，这些因素成为巩固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工业生产因国外生产资料和熟练劳动力的流入而得到直接的提高。<sup>[18]</sup>但是，这种工业生产，在本质上使用封建方式为自己提供资源，在新建立的工业企业普遍使用强制劳动，从而成为一种强化的剥削形式。落后和发展并存，19世纪晚期，政府在更大的规模上一再进行加速发展的各种尝试。各种矛盾因此而激化，并为该体系最终的分崩离析创造了结构性条件。

彼得大帝巩固了俄国专制主义，在此基础上，他的后继者们继续对专制主义进行结构上的改造和地理上的扩张，特别是放松了对贵族的某些限制。“接下来的几十年，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农奴，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贵族的解放’——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1762年帝国宣言的颁布。该宣言宣布，只要不出现公共紧急状态，贵族就可以随其意愿，决定是否为国家服务。”<sup>[19]</sup>在政治专制主义的体制内，贵族拥有特权而无需承担相应义务的封建结构得以确立。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在西方世界的扩张，这一体制遭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其脆弱性，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中暴露无遗，此后，这个专制国家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现代化。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的废除和19世纪80年代以后凸现的对快速工业化的扶植，是这一现代化过程中两个最显著的变化。前者为先前的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活力。<sup>[20]</sup>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流动更为方便，国家和贵族之间分享农业剩余份额的竞争减弱了。此时，国家面临的约束更少了，从农村获取资源、为雄心勃勃的工业化提供资金的能力更强了。

到1914年，俄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工业国，之前30年的增长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sup>[21]</sup>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在旧制度内得以建立。与此相伴的是，它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一个人数不多但高度集中的城市无产阶级，这一阶级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农民剥削的加重是这一过程得以完成的主要方式。

### 3.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俄国

这些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看到的俄国现实。很大程度上，他

们所面对的只是更为简单的专制政体。此外，19世纪70年代之前，他们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帝国的内部条件上，而在于帝国对外部产生的冲击上。在他们看来，沙皇俄国外交政策背后隐藏的只是险恶的称霸世界的计划，<sup>[22]</sup>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关注的是欧洲。1848年对匈牙利革命的武装干预，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独裁政体的反革命立场：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100年来就是这样，直到1789年的伟大运动才给它产生了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严峻敌人。我们指的是欧洲革命、民主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sup>[23]</sup>

俄国不只是革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原因，同时也威胁了革命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俄国的扩张主义，视为制约欧洲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从这一观点看，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俄国可能控制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以及对波兰进行实际的统治。前者可能会延迟外围地区融入以欧洲为基础的经济，进而阻碍资本主义从其发源地向外的直接扩张，同时也间接地抑制了资本主义在其发源地的发展。<sup>[24]</sup>后者威胁到欧洲国家的独立，特别是威胁到西方世界革命成功的前景。<sup>[25]</sup>

这种分析大部分是肤浅的。它没有对（俄国）称霸全球目标背后的根本力量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欧洲的政治家们通常被认为是去阶级化的，被描述为懦夫、沙皇的代理人或同路人，而不是阶级的代言人。<sup>[26]</sup>此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为他们的如下信念提供基本的理由：俄国力量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阻止、甚至颠倒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上述信念，除了与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满怀信心地宣称的现代化的必然性之间存在矛盾，还与他们把俄国国内史想象为静态的未开化的历史之间存在张力。<sup>[27]</sup>即使是对理论问题不怎么敏感的斯大林，也对这种缺乏唯物主义分析的观点作了批评。<sup>[28]</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亚细亚社会内部结构，即他们认为的同俄国有关的社会结构的更加深思熟虑的著作，也是不充分的。事实上，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现在被认为具有内在的不一致性，在把这一概念应用于经验研究时，时有不确切之处。<sup>[29]</sup>就俄国个案来说，这种情况并不是十分明显，这是因为人们经常通过为这个术语添加前缀而改变它的限定条件。不管怎样，把沙皇帝国称为“半亚细亚社会”，只会使人更加困惑。在这里，如同得到了一个加权平均的概念，但只对构成这一概念的某一单一要素作了详细说明，而未对构成它的所有要素的权

重进行设定。此外，马克思对俄国具有亚细亚社会性质的解释，有时候显得有点过于唯心主义。<sup>[30]</sup>马克思认为19世纪50年代之前，俄国没有“国内史”的观点近乎荒谬。<sup>[31]</sup>恩格斯认为的沙皇政府在对内政策方面“不能理性行事”的观点，从根本上低估了沙皇政府的自我调整能力。<sup>[32]</sup>

尽管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把俄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强调俄国的非欧洲特征，这对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影响至深。在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发展中，他逐渐强调俄国历史的非西方的特征（参见以下第八章），并且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理论，因为实现这种民主专政，就无法根除俄国农业秩序中的亚细亚社会的特征（参见以下第十一章）。列宁本人也无法前后一致地提出一个有关俄国阶级本质的理论，他在几种观点之间徘徊不定，先是强调俄国的亚细亚属性，继而强调它的封建性，最后是它的资产阶级属性。<sup>[33]</sup>孟什维克则专注于在俄国复制他们认为的西欧政治历史一直遵循的发展道路。<sup>[34]</sup>托洛茨基最初形成的“不断革命论”的信念就在于：在俄国，国家创造了符合它自身利益的阶级等级。<sup>[35]</sup>在斯大林专制统治时期，作为对“一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广泛辩护的组成部分，斯大林否定了亚细亚社会形态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和苏联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使他感到不安（参见以下第十五章）。<sup>[36]</sup>

马克思关于1848年德国革命的著作，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德国经济的落后，马克思起先承认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是合适的，但很快他就开始批判资产阶级的保守性。马克思最终转向了另一个立场，即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激化革命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预期的、以这样的战略成功的革命，到底是什么类型的革命，这并不太清楚。<sup>[37]</sup>对1848年革命的研究，最终并没有得出什么结论。马克思随后集中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背景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不过，他确实从1848年革命中得出了某种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教训，这反映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无产阶级政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上。鉴于沙皇长期的专制统治和俄国社会形态的相对落后，要求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超越这一事实，并赋予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进行的论述更加重要的意义是合理的。因此，普列汉诺夫不仅强调社会民主党必须保持它的独立性，而且强调它要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参见以下第八章）。1905年之后，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农民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必将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参见以下第十一章）。最重要的是，托洛茨基主张，马克思有关1848年革命的观点，含蓄地表达了革命变革的一种新范式，在俄国存在的由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意味着资产阶级革命将迅速地进入社会

主义革命阶段（参见以下第十二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分析存在的缺陷，部分原因是由他们主要关注其他问题造成的。但是，即使当马克思最终开始深入研究俄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时，他的结论仍然具有“例外论”的特征。他认真地考察了以农民为基础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发展无需借助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最终达到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他深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民粹主义是一场包含了多方面主题的运动，它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主宰了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事实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才真正终结了民粹主义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民粹主义也是一种中介，马克思主义通过它开始在俄国发生影响，这一影响的核心部分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

#### 4.俄国的民粹主义

俄国的沙文主义是有其具体的社会特征决定的。保守分子强调并欢呼帝国非西方的本质。俄国之外的进步思想家，则因俄国缺乏文明而感到震惊和恐惧，斯拉夫思想家论证其本土优越性时，采取了与外国进步思想家完全相反的立场。在这样做时，他们表现出的贵族态度与西方相似，但是他们为此作出的知识上的辩护，作为一种副产品就是最早的俄国民粹主义。在这些民粹主义者中出现了一种比较新奇的社会主义学说，他们的领导人随后抛弃了沙文主义，并和第二国际保持联系。这个发展过程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对农村土地公社（村社）的解释。

村社，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原始共产主义。它的根本特征在于公社土地的公有制，土地在家庭之间定期进行平均再分配，以确保所有人维持生存。带状土地和轮作制农业使个体劳动成为可能，但这要求农村公社进行集中管理。农民对领主费用和国家税收承担连带责任，强化了这种特征，结果村社掌握并行使权力，村社权力约束了农民的个人主义。19世纪60年代取消农奴制之前，农业经济自身及其同地主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是极其“自然的”，几乎不存在货币交换。<sup>[38]</sup>

尽管农奴解放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生产，但是村社的基本结构仍然保留了下来。根据解放农奴的条款，农奴摆脱了人身依附，但仍被束缚在土地上和他们所属的村社内。尽管不再向领主履行义务，但是，对他们征取的税收增加了，而且税收是以货币形式支付，这迫使他们进入市场关系。从而，为农业经济中的商业精神、商品生产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此，农村公社在多大程度上开始解体，农民在多大程度上开始出现社会分

化，这些问题在19世纪末成为俄国社会主义者争论不休的话题。事实上，即使是现在，这些话题仍颇具争议。然而，农村公社以及维持其长期运行的惯例，并没有随着农奴制的消失而消失，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非资本主义关系继续占据支配地位。这正是俄国农业极其落后、传统残余对农民的意识仍在产生强大影响的部分原因。

这也为俄国的斯拉夫人捍卫旧政体提供了经济支柱。通常认为，村社阻止了西方常见的有害的、堕落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因而也抑制了自由主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相反，无论是否意识到，村社也把农民束缚于专制沙皇和东正教居于顶端的旧秩序中。从而，俄罗斯帝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能够进一步地开拓疆域，能够“解放”南欧的斯拉夫人，并与西欧的扩张主义相抗衡。

对民粹主义者来说，正是村社提供了进入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希望。在他们的蓝图中，村社关系阻止了西方个人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在他们看来的）现代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基础。从而，俄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通过对政治结构的适当改造，直接走上集体主义道路。正是农业体制落后的社会本质，使得俄国的发展可以是直线型的——古老的俄国能够成为新俄国的基础。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既不必要、也不值得期待。当然，民粹主义者认识到，村社并不是一种最优的社会制度。宗法关系、近乎普遍的无知和经济的不发达如此明显，使得民粹主义的观点很难在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深受西方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流行。但是，民粹主义者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展开的启蒙运动，将会使这些不利因素逐渐消失。

马克思的经济学容易被融入到民粹主义的框架中。19世纪80年代之前，马克思的经济学主要发挥了告诫功能：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俄国占据支配地位，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换言之，俄国的广大民众将不得不经历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而来的所有的恐怖。《资本论》对这些恐怖状况的描述，对它们和资本主义本质存在的紧密联系的分析，对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思想家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sup>39</sup>在马克思对民粹主义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民粹主义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马克思没有试图去哄骗他的俄国读者继续接受他30年来竭力阐述的观点，而是沿着采纳民粹主义思想的方向前进。

## 5. “晚年马克思”

马克思在赫尔岑的著作中初步接触到民粹主义思想，民粹主义并没有给马克



思留下什么好印象。这更多的是由于民粹主义者解释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斯拉夫气质，而不是他们的内容造成的。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从不掩饰对民粹主义作为俄国沙文主义的一个变种的蔑视，尽管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可能更为仁慈。<sup>[40]</sup>但是，后来的民粹主义者放弃了斯拉夫主题，加之一系列其它因素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对民粹主义理解的视角发生了转变。埃德蒙·威尔逊将这种转变描述为充满才智的头脑迸发出的“最后的重要的火花”，马克思这时转变了立场，承认俄国民粹主义者的奋斗目标是可能的。<sup>[41]</sup>20世纪的新民粹主义者坚持认为，在作出这种转变的同时，马克思本人也为“晚年马克思”奠定了基础，新民粹主义者要求一并注意“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青年马克思”探讨的主题极大地影响了一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成熟马克思”的思想成为第二国际的思想内核。<sup>[42]</sup>

毫无疑问，19世纪70年代的一些知识上的和政治上的思潮影响了马克思，使他转变了对民粹主义的立场。在此期间，在整个欧洲，俄国的革命运动是最为活跃的。<sup>[43]</sup>马克思一方面深深地被俄国革命中积极分子的勇气所感动，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在这些活动家眼中的声名而深感欣慰。<sup>[44]</sup>毋庸置疑，马克思对沙皇专制怀有深深的、持续的憎恨。希望能够为反对沙皇专制提供支持的愿望，深深地影响了视自己为历史进步的精神领袖的马克思。<sup>[45]</sup>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学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俄国与西方的不平衡发展，认为俄国有可能复制西方的成就，而无需付出后者那种惊人的代价。<sup>[46]</sup>摩尔根的人类学改变了马克思有关原始公社形式地位的观点，很可能促使马克思对俄国社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sup>[47]</sup>

然而，“晚年马克思”并没有撰写出可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不要说与《资本论》相媲美的著作。马克思只有一些晦涩的评论，散见于他为早期著作所写的附注中，以及回答俄国一些向马克思征询对他们所关注问题的看法的信件中，事实上，这些信件的草稿有些从来就没有发出。马克思有关俄国的观点，如果不借助现代想象力加以扩展，所有这些观点无论如何也难以构建成一个“体系”。这些观点，至多是一种梗概式的立场描述，这些立场涉及的主题从未被详细地加以说明，也与早期的分析没有什么联系。

马克思个人对民粹主义的兴趣，最早出现在1877年他对民粹主义者米哈伊洛夫斯基关于《资本论》的充满敌意的评论的回应中：

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

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sup>[48]</sup>

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原始积累的论述只适用于西欧，否认它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它对俄国的适用性只表现在：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到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sup>[49]</sup>

1881年，在回复维拉·查苏利奇要求马克思提供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信件中，马克思再次重申了这一立场。<sup>[50]</sup>尽管马克思断言“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他又说“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sup>[51]</sup>这种回复，明显地引发了马克思更多的思考。至少有4封信件的草稿为人所知，<sup>[52]</sup>正是这些信件充实了马克思论点的关键部分，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结合到生产关系中。土地归集体所有，但劳动过程是个体式的，可转让的财产受制于私人交换。两种不同的发展都是可能的，这取决于哪一种要素占主导地位。沿着沙皇俄国的现代化启动的当前的道路继续前行，最终将导致公社的消失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它因民粹主义者的革命而中断，将有可能在公社的基础上建成共产主义，使西方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融入社会主义者对公社进行的重组中。

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件的草稿中，马克思没有再提及民粹主义发展道路的实现取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在为1882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中，他又加入了这一限定条件。<sup>[53]</sup>这可能体现了恩格斯的影响，恩格斯是序言的共同作者，恩格斯事实上起草了这一序言。<sup>[54]</sup>同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有关“晚年马克思”主题的著述，无疑更加强调西方政治领袖对实现民粹主义理想是必不可少的。<sup>[55]</sup>也有证据表明，恩格斯从未认真地思考过这一前景，即使是

在马克思逝世之前。<sup>[56]</sup> 1883年之后，恩格斯的有关这一立场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强化。恩格斯的怀疑论也反映在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中。虽然他们有时候承认俄国有可能避免经过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是他们总是指出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国际革命。<sup>[57]</sup> “一国社会主义”学说是20世纪20年代的产物，1917年之后欧洲革命的失败是它形成的原因之一（参见以下第十五章）。

对“晚年马克思”思想重要性的任何评价，都必须面对这种思想与早期著作中的思想的不一致之处，而且必须考虑早期思想在19世纪70年代对马克思的影响。<sup>[58]</sup> 显然，晚年马克思的观点与他早期的大量著述中反映出来的观点并不一致：马克思明显抛弃了在《资本论》中阐述的普遍适用的工业化的“自然法则”。<sup>[59]</sup> 从他最早期著作开始，一直存在的一个主题，即对无产阶级独自作为共产主义的代理人的效果的分析，<sup>[60]</sup> 现在加入了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同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结盟得以实现的新内容。很显然，马克思早年许多有关农村生活愚昧、农民的不开化以及缺乏政治上的可靠性的污蔑，适用的范围更为有限了。<sup>61</sup>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对西方帝国主义应当在更加相对的意义上加以认识，比如，就西方帝国主义对印度的影响，马克思一方面谴责了它的残忍性，另一方面也欢呼其进步性。<sup>[62]</sup>

无论如何，民粹主义的目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任何试图在村社的基础上实现的社会主义，都将导致独裁主义。领袖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劳动生产率的欠发达，都意味着不可能以民主的组织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即使在农民中广泛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巴枯宁主义情绪，为了充分实现生产的社会化需要瓦解传统公社的生产关系，这势必要求解除那些社会化的权力。那么，在避免经历阶级形成的沧桑巨变下，拿什么拯救统治精英？在马克思逝世那一年，在青年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普列汉诺夫明确地表达了这些用来反对民粹主义的观点。“晚年马克思”当然没有为反对民粹主义的观点提供理论基础。<sup>[63]</sup>

## 6. 结论

因此，马克思留给俄国追随者的遗产，比留给德国同志的遗产更加复杂。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概念的理论兴趣有限。然而，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个概念表明他们面对的情况与欧洲完全不同。这突出了如下事实：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合适的革命策略需要采取特定的斗争形式，例如，马克思在评价1848年德国革命时所概述的那些斗争形式。即使

是马克思成熟著作的核心部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与俄国的相关性也是存在争议的。俄国不必等待修正主义的争论吞噬他们的各个阶层——从一开始修正主义就存在，而且明显得到了马克思自己的支持。

这一背景有助于解释俄国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特点。在俄国的背景下，马克思著作显示出的模糊性与沙皇专制的具体特征相互作用，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产生了与德国相比更大的离心力。尽管19世纪90年代晚期发生的争论，从知识上看类似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参见以下第十章）中发生的争论。自1903年起，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了新的裂缝。这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党分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两派的分歧是由党应当采取何种组织形式的争议引起的，但是后来把经济理论问题也牵涉进来（参见以下第8章和第11章）。如果不存在争议，也就不会有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两派。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是托洛斯基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理论（参见第十二章）。在1917年之前，托洛茨基及其同仁接受了孟什维克的政党组织的观点，但是，他们的激进主义使得他们更像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理论家列宁和布哈林（参见以下第十一章、第十二和第十三章）。1914年第二国际解体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差异变得更加明显，不同团体进行了重组。1917年，托洛茨基和列宁联合起来，但是大量的孟什维克和一些布尔什维克反对十月革命，因为他们认为冒险主义不符合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参见以下第八章和第十三章）。

同时，由于马克思把俄国描述为欧洲的反动堡垒，这使得俄国革命被认为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国际事件。结果，改良主义变成了一支微弱的力量，而革命强硬传统成为一支更为强大的潮流，马克思本人体现出这种特征，在说德语的理论家中只有罗莎·卢森堡保持着这种传统。早期的经济理论的发展，清楚地说明了革命实践的优先性。为了制定有效的革命战略，人们很少关注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理解俄国经济发展的本质上。

---

## 第七章注释：

[1] 参见第一章第1节。所有重要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使用多种语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作为流亡者在欧洲或北美生活了较长时期，并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接触，大部分接触是广泛的，并具有较高价值。

[2] P.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1850-1917* (London: Batsford, 1986).

[3] H. Seton-Watson, *The Decline of the Imperial Russia*(New York: Praeger, 1952) L. Kochan and R. Abraham, *The Making of Modern Russia*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3) J.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Anderson,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London: Verso, 1979).

[4] U. Melt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London: Macmillan, 1977).

[5] 但是, 事实是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提供区分相对自治与真正独立的标准。

[6] A. J. Maye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Pantheon, 1981), p28.

[7] Anderson, *Lineages*, p346.

[8] 358 对农奴解放条款的详细分析参见A. Gerschenkron, 'Agraria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Russia 1861-1917,' in H. J. Habakkuk and Post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y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Vol.6, pp706-800.

[9]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p. 33.

[10] *Ibid*, pp. 33-4.

[11] P. Gregory, *Russia National Income, 1885-191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55-7.

[12] M. E. Falkus, *The Industrialisation Russia 1700-1914*(London: Macmillan, 1970) pp.24-35, 39 and 52; G. T. Robinson,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Berkeley: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277, note 3.

[13] Gerschenkron, 'Agrarian Policies', Robinson, *Rural Russia*.

[14]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15] M. Raeff, *Origins of the Russia Intelligents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66).

[16] Anderson, *Lineages*, p.337.

[17] R.Hellie, *Enserfment and Millitary Change in Muscovy*(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1); Anderson, *Lineages*, pp.328-47; Kochan and Abraham, *The Making of Modern Russia*,chs2-7.

[18] B. Brutzkus, 'The Historical Peculiarities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ssia', in R. Bendix and Lipset, *Class, Status, and Pow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19] Robinson, *Rural Russia*, p.26; see also Anderson, *Lineages*, pp.342-44 and P. Dukes, *Catherine the Great and Russian No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20] A. Gerschenkron, 'Agrarian Policies'; A.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A. Gerschenkron, *Europe in the Russia Mirr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Falkus, *Industrialisation*; and Gatrell, *Tsarist Economy*.

[21] Falkus, *Industrialisation*, p.82; Gatrell, *Tsarist Economy*, pp.41-3, 67;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pp.119-142.

[22] F. Engels, '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Czarism' in P. W. Blackstock and B. F. Hoselitz (eds) *The Russia Menace to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1953) pp.25-55.

[23] 恩格斯: *New York Tribune*, 12 April 1853, in P. W. Blackstock and F. Hoselitz,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 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18页。

[24] K. Marx, *New York Tribune*, August 12, 1853 and December 30, 1853, in P. W. Blackstock and F.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p.168-9, 171-2.

[25] Blackstock and F.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art IV.

[26] 如参见 Blackstock and F.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p.12, 113, 128-9, 135, 141, 164, 169, 171-2, 186, 268-70; S. F. Bloom, *The World of Nations* (New York: AMS Press, 1967) pp.152-9.

[27] Blackstock and F.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p. 46, 168, 171-2 and 261.

[28] *Ibid*, p.243.

[29] S. Avineri, *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of Modernisation* (New York: Anchor, 1969) pp.1-31; M. C. Howard and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 2nd edn, pp.225-37; Anderson (第15-42页) 也指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欧洲专制制度时存在某种逻辑上的一致。但是, Melotti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对马克思亚细亚社会的概念, 以及把这一概念应用于俄国进行了辩护。

[30] Blackstock and F.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p.167 and 254; Mel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p.84.

[31] *Ibid*, 46-47; see also pp.18, 255-6, 261.

[32] *Ibid*, pp.25-6, see Chapter 11 below.

[33]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0-70) vol. I,

pp.153, 154, 160, 196-8, 218, 258, 259, 261, 267-70, 283, 291, 359, 363, 367, 419, 426, 433, 451-2, 521; vol II, pp.109-11, 119, 120, 277, 288, 333, 335, 337, 453-4, 458, 463-4; vol IV, pp.213, 264-6, 363-4, 375-7, 405, 410, 421. See, however; Chapter 11 below.

[34] A. Ascher, Pavel Axerod and Development of Menshev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lso see chapter 8 and 11 below.

[35] L. Trotsky, Result and Prospects, in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New York: Merit, 1969) pp.36-122; see also chapter 12 below.

[36] Blackstock and Hoselitz, Russia Menace; Mel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K. A. Wittfogel, Oriental Despo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ch.9; M. Sawyer, 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The Hager: Martinus Nijhoff, 1977).

[37] K. Marx, The Revolution of 1848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 and R. Larsson, Theory of Revolution (Stockholm: Almqvist and Wiksell, 1970) pp.17-107.

[38]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commune see D. Atkinson, The End of the Russia Land Commune 1905-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T.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easantry in a Developing Society: Russia 1910-2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Rubinson, Rural Russia; and Brutzkus, 'Historical Peculiarities'.

[39] A. Resis, 'Das Kapital comes to Russia', Slavic Review 29, 1970, pp.219-37; R. Pipes, 'Russia Marxism and its populist background', Russian Review, 19, 1960, pp.316-37. 1880年之后, 马克思经济学被更直接地投入到理论应用中, 并且其主题也被用来证明俄国资产阶级可能从不会成为实际上的统治阶级这一主张。这一论点及其评论将留在以下第九章讨论。恩格斯既意识到这一观点, 也指出了有些人会敌视这一观点; 马克思似乎对此没有评论, 并且很可能忽视了整个问题。

[40] K.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pp.33;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Westport, Connecticut, 1975) p. 286; Blackstock and F.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229; W. O. Henderson, 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Cass, 1976) vol. II, p.703.

[41] E. Wilson, To the Finland St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72) p.409.

[42] T. Shanin (ed.) Late Marx and Russia Road: Marx and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43] Pipes, 'Russian Marxism'.

[44] Henderson, *Life of Engels*, pp.705,708,710;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edn,p.333;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Greenwood, edn,p.390.

[45] Henderson, *Life of Engels*, p.520; Shanin, *Late Marx*, p.127; Bloom, *World of Nations*, p.165.

[46] N. Chernyshevsky, 'Selected Writings' in Shanin, *Late Marx*, pp.181-203; Henderson, *Life of Engels*, p.705;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edn, p.256,311;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Greenwood, edn,p.386.

[47] Henderson, *Life of Engels*, pp.605-605; *Marx and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edn, p.373; Shanin, *Late Marx*, part II.

[48] Blackstock and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217; 这一文本表明“直到1860年”应为“自1861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表明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案并非线性的。See K. 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ed. by E. J. Hobsbaw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5)。Mel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50] Blackstock and Hoselitz, *Russia Menace*, p. 27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0-590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0页。

[52] See Shanin, *Late Marx*, part II.

[53]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I(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pp.99-100.

[54] Shanin, *Late Marx*, II, pp.70-1.

[55] Blackstock and Hoselitz, *The Russia Menace*, pp.213.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恩格斯否认了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Henderson,《恩格斯生平》)。在1858年,马克思同样认识到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存在的困难(*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edn,p.111)。并且,在1893年,恩格斯宣称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求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Selected Correspondence*, Greenwood edn, p.508-9)。在这方面,参见Larsson 第19-49页。

[56] Blackstock and Hoselitz, *The Russia Menace*, pp.203-15;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 edn, p.464; Henderson, *Life of Engels*, pp.705,709-10.在此问题上,恩格斯并不完全是前后一致的,正如Henderson的《恩格斯生平》中所指出的,第384, 580-1和



712页。

[57] 对托洛茨基而言,一直都是这样,对布哈林来说,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这是正确的,列宁的立场不是太清楚,但是他有时候表现出了与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类似的思想。见后面的第12,13章。马尔托夫(Martov)是一位孟什维克最杰出的、也是立场最不坚定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同样的广博。See I. Getzler, *Martov: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Russian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58] Shannin著作中的评论者缺乏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考察是一个重大的缺陷。载Shanin《马克思》,第2部分。总的说来,他们全都太急于接受“晚年马克思”的观点,而没有进一步研究这样做给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

[59] K. Marx, *Capital*, vol.I, pp.8-9.

[60] G. Lichtheim,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D. McLellan, *K.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73).

[61] Avineri, *Karl Marx*; D. Mitrany, *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51); M. Duggett, 'Marx on Peasant',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 1975, pp.159-82.

[62] Howard &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63] G. Plekhanov, 'Soc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in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4) vol.I, pp.47-106.

## 第八章 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

### 1.引言

1880年左右，“晚年马克思”逐渐形成，年轻的普列汉诺夫却正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他同自己过去的民粹主义决裂，接受了包含成熟马克思的核心主题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由此他的思想开始在俄国革命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他知道自己有关俄国的观点与马克思不同，<sup>[1]</sup>而且在马克思逝世后的许多年，他很少得到恩格斯或其他马克思主义领袖的鼓励。<sup>[2]</sup>这些事实表明了他在知识方面的自信。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能力由如下事实所证明：他的理论体系的总体框架，统治俄国马克思主义达30多年之久。孟什维主义牢固地建立在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没有任何一个孟什维主义理论家在学术地位上可以与他相比。<sup>[3]</sup>19世纪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昙花一现也同他有关。<sup>[4]</sup>即使在1905年普列汉诺夫同布尔什维克因“革命的算术”问题决裂之后，列宁仍然视自己为普列汉诺夫革命的“代数学”的支持者（参见以下第十一章）。十月革命的胜利无法证明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的赞赏，<sup>[5]</sup>十月革命的理论原理与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格格不入（参见以下第十三章）。在苏联，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在官方认可的合法的基本的理论著作中，占有突出的位置。<sup>[6]</sup>

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源自同革命的民粹主义的论战，他整个一生不断地卷入各种各样的理论争论。然而，他的纲领本身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恒定品性。实际上，普列汉诺夫从来没有向他的论敌作过任何妥协。俄国的资本主义将会继续沿着西方的道路发展，步入社会主义，要求马克思主义者首先集中关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现问题。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他的观点可能会改变，这些问题通常随着普列汉诺夫兴趣的多样化使他进入新的研究领域而被拓宽，但他分析这些问题时使用的基本原理始终没有改变。<sup>[7]</sup>普列汉诺夫关注的问题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息息相关。事实上，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时，普列汉诺夫被视为——他自己也这样认为——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既是正统理论的重要支持者，也是与落后的俄国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

### 普列汉诺夫小传

G.V. 普列汉诺夫，1856年出生在俄罗斯中部省份坦波夫的古达洛夫卡村。他的父母属于下层士绅，父亲有鞑靼血统。普列汉诺夫作为一位民粹主义者参加了革命运动，在19世纪80年代，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作为一名流亡者，1883年在日内瓦创建了劳动解放社。这是此后20多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思想中心。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远远超过其它任何人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孟什维克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在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普列汉诺夫的地位仅次于考茨基。1905革命后，尤其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温和的政治主张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倾向，普列汉诺夫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声望逐渐下降。他反对但并不坚决抵制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1918年5月，在芬兰逝世。

## 2. 普列汉诺夫体系，第二国际的正统和俄国马克思主义

普列汉诺夫创造了一个术语——“辩证唯物主义”，用来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本质。<sup>[8]</sup>在第二国际的知识分子中，他是马克思主义最博学的倡导者。他有关哲学思想的兴趣和知识首屈一指，在这方面，他甚至明显超过了考茨基。因此，普列汉诺夫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捍卫，往往是围绕哲学问题展开的。尽管在同修正主义的论战中，他对伯恩斯坦和施米特的回应确实涉及经济问题（参见以上第4章），但是同他反对康德的认识论、捍卫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相比，这些只是他关注的次要问题。毫无疑问，普列汉诺夫有力地揭发了自己的论敌在哲学上的无知，这有助于击败他们，但他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讨论并没有做出什么独创性的贡献。普列汉诺夫对理论重建一直怀有敌意，呼吁将伯恩斯坦从社会民主党中开除出去，谴责考茨基对修正主义的容忍，一直质疑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德国理论家的能力。<sup>[9]</sup>这些并不是例外的情况，在许多其他的学术争论中，普列汉诺夫也显示出类似的强硬立场。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得他的学说被描述为一种具有极其僵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这主要还是一种依赖于恩格斯晚期著作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所知，在始终不渝地支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人中，并不包括马克思）<sup>[10]</sup>，他的马克思主义也被描述为一种能够十分便利地融入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去

的教条主义。毫无疑问，普列汉诺夫紧紧地追随恩格斯，他无法认识到在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分析中，以及把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界时存在的难题。普列汉诺夫也错误地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代表了一种存在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必然出于某种无知或者出于某种反动企图。然而，下述情况却是真实的，普列汉诺夫认为知识的探索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他正确认识到不同形式的折中主义的空疏无用，准确地诊断出修正主义的本质——对正统的严重偏离。更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的体系不容易受到这样的指控，即他清晰地表达了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坚持了历史宿命论，或者说他贬低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强调了某种政治寂静主义（political quietism）。民粹主义批评家对他进行的批评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普列汉诺夫从不隐藏自己的反应。他对民粹主义的反驳，对理解作为整体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至关重要的。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社会发展的规律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对这些规律精确研究的概念。<sup>[11]</sup>先前的思想体系，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思想，取得了重要的知识进步。但是，普列汉诺夫坚持认为，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才能克服这些思想体系中存在的矛盾，保留其真理，摒弃其错误，社会生活的最终基础才得以显现。因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代表了知识发展的顶峰。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当代科学家的分析反复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出版于1895年，普列汉诺夫同民粹主义的争论正达到高潮，普列汉诺夫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sup>[12]</sup>然而，尽管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但他并没有讨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这反映出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兴趣更多地是在哲学思想上。这种情况表明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俄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区别于中欧的马克思主义。1917年革命之前，技术性的经济分析从来没有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3]</sup>俄国经济欠发达的性质，使得对价值范畴的讨论意义有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俄国理论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理解资本主义兴起的意义，而不是分析它崩溃的原因。确实，1914年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民粹主义的争论中，就强烈反对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根本没有辉煌的经济前景的观点（参见以下第九章）。

普列汉诺夫不是历史发展道路的单线论者，不认为每个社会都必然要经过相同的发展阶段。<sup>[14]</sup>事实上，他得出了一个和马克思相同的结论：从原始共产主义开始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对此作了概

述。<sup>[15]</sup>当然，普列汉诺夫并不知道马克思论述的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在他逝世21年之后才出版的。<sup>[16]</sup>此外，普列汉诺夫努力为历史发展的多线论提供分析基础。与马克思的晦涩的评论相比，普列汉诺夫的分析明显地要清晰得多。

普列汉诺夫在强调历史发展多线论时突出了三点：首先，地理或自然条件在决定经济发展时具有重要的作用。正是这样的视角，使得普列汉诺夫能够解释俄国的半亚细亚、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他相信，这样的社会条件致使俄国的历史与西欧的历史迥然不同。其次，构成任何一个复杂社会体系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子系统的相对自治。在这个基础上，普列汉诺夫认为，人类意识和政治组织在影响历史发展的过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普列汉诺夫认为，国际关系对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对落后的社会来说更是如此。正是通过这种外部影响，俄国被推向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资本论》中描述的“运动规律”才适用于俄国。

自孟德斯鸠之后，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发展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但是，普列汉诺夫的地理决定论是独特的，这是因为它被整合进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总结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sup>[17]</sup>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人类发展可以分为两大类型：达尔文主义式的和历史唯物主义式的。前者与物种起源有关，后者“是从达尔文研究结束的地方开始”的。<sup>[18]</sup>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正是不同类型的智人出现时的自然环境，决定了生产力形式的最初发展。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代表了支配整个社会形态的关键因素，<sup>[19]</sup>不同的地理条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形成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sup>[20]</sup>如果生产力有所发展——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孤立的状态下，<sup>[21]</sup>也有可能不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日益增加，减少了非社会因素在决定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但是，自然条件的约束作用从来不会完全消失，它只是与社会性的决定因素日益交织在一起。

这使普列汉诺夫超越了恩格斯的“归根到底”(last resort)的原则<sup>[22]</sup>，根据这一原则，社会形态中不同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经济因素被认为是历史发展唯一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每一个因素都可以影响到其它所有因素，那么我们就很难用因果关系的术语讨论问题了。因此，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受上层建筑构成因素的影响，我们怎么能够又说前者决定了后者？普列汉诺夫对地理因素重要性的强调，切断了这一循环。因此，他能够在接受所有的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同时，<sup>[23]</sup>坚持包含着实质内容的一元论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不厌其烦地强调，尽管发达的科学不能忽视复杂性，但它也不能满足于任

何一种二元论，也不能仅限于追溯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sup>[24]</sup>它必须寻求有机的整体因果联系的基础。<sup>[25]</sup>

普列汉诺夫坚信历史唯物主义，但他坚持认为，自然条件或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发挥，采取了中介形式，即采取相对自治的社会关系的亚结构的中介形式。只有在最原始的社会中，经济基础才直接决定上层建筑。在更为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作用是通过阶级关系体系、政治权力和法律体系的结构发挥的。<sup>[26]</sup>为了支持这种观点，普列汉诺夫深入研究了他认为的唯物主义的决定作用发挥的最不明显的领域——艺术创造领域。<sup>[27]</sup>

因为决定论是十分复杂的，所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如此。但是，正因为如此，人类意识和政治主体的能动性才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尽管普列汉诺夫从没有说明其界限，但是，他强调当有关社会发展规律的意识——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出于政治的目的被组织起来时，可能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运行产生显著影响。<sup>[28]</sup>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说明在落后的社会，社会民主主义是如何与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发生联系的。它的作用在于带来了最有利于社会主义实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因此，分析实际产生的是哪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什么类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可能的？将会产生什么后果？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头等重要的大事。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不同的方式，最终与普列汉诺夫分道扬镳。在政治战略和战术层面，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同普列汉诺夫决裂了（参见以下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所有这些理论家都强调俄国资本主义面对的国际背景，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体系也是如此。普列汉诺夫认为，如果没有西方世界那种发达的经济条件，俄国资本主义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参见本章以下第3节）。更普遍地，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轨迹，都深受它同其它国家的联系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些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时候。普列汉诺夫不只满足于对一种明显的方式的描述，这种明显的方式证明这种影响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努力去识别支配这些相互作用的规律。<sup>[29]</sup>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在1917年采取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坚持认为只有孟什维主义才能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牢固的基础。这其中还蕴含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构成苏联建立原因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列宁和托洛茨基（尤其是托洛茨基）确保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战略，要求无产阶级革命扩大到更加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认为，只有到那时，俄国自身才能具备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充分的物质基础（参见以下第十二章、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但是，普列汉诺夫自己分析得出的结论，恰恰质疑了他昔

日的追随者的这种逻辑。在同民粹主义论战过程中，他被迫思考过类似的情况。民粹主义者有时也认为，欧洲更为发达的经济条件，允许俄国绕过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sup>[30]</sup>普列汉诺夫并没有立即否认历史的“捷径”是可能的。事实上，正像我们先前理解的那样，而且在以下第3节和第4节，我们将会证明，普列汉诺夫自己的革命战略明确地取决于他的如下信念：这些战略都是可行的，也都是合适的。但是，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只有通过适当的关系结构的加速发展，它们才有可能实现。它们不可能单纯地依靠技术引进、资源转移或国际支持来实现。<sup>[31]</sup>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了一种决定论的社会学理论，普列汉诺夫慎重地对待它的术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形下，这意味着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够取代广大的、成熟的无产阶级。因此，在俄国，作为社会主义必要的前提条件，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是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的。如果革命领袖要在一个相反的假设下继续前进，他们必然会逐渐削弱他们公开宣称的目标——无论外部环境多么有利。<sup>[32]</sup>

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自己的方案很明显以一种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取得了胜利，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逐渐支配了西方的劳工运动。普列汉诺夫错在哪里了？普列汉诺夫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使得对该问题的回答总有一个难题。困难源自普列汉诺夫对待辩证法的认真程度；辩证法赋予现实的丰富性掩盖了普列汉诺夫的分析的局限性。比如，考虑到1917—1918年发生的事件，可以合理地假设，普列汉诺夫的错误是因他对资本主义对俄国农民的影响的错误说明造成的，而这个错误的根源可能在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无法正确地理解农村生产阶级的本质。或者可以假设，即使是在民主革命时代，落后的资本主义的本质使资产阶级变成了反革命的力量，尽管普列汉诺夫的战略要求他们成为一支根本性的力量。研究这些问题，对评价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但是，由于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致使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变得格外困难。

### 3. 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明

普列汉诺夫认为，资本主义不会在每个国家以相同的方式出现，但即使如此，当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时，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却会在不同的国家以相似的方式运行。<sup>[33]</sup>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俄国的情况是特殊的，它的发展包含了从“半亚细亚”帝国转变为与西欧类似的社会形态的过程。即使到20世纪的

第二个十年，这一两百多年前因为应对国际压力而由彼得大帝发起的改革进程，还远没有完成。<sup>[34]</sup>普列汉诺夫认为，正是因为地理位置上与西方毗邻，才使俄国免于陷入像东方社会那样的停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俄国的历史将会与中国的历史相似。<sup>[35]</sup>

俄国的西方化是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开启的。<sup>[36]</sup>然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世纪60年代亚历山大的改革，同样是作为对国际事件的反应，才开始为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sup>[37]</sup>普列汉诺夫非常注意这些变化。在解释它们的重要意义时，普列汉诺夫诉诸于商品经济的逻辑<sup>[38]</sup>——他视之为社会变迁的一般经济规律。

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做的那样，<sup>[39]</sup>普列汉诺夫对“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做出了明显区分。他把前者等同于停滞，后者等同于增长，认为在后者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通过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sup>[40]</sup>从事市场交易的小生产者日益分化。大量的小生产者逐渐沦落，并最终成为无产者；而少数人最后成为资本家。普列汉诺夫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法律关系，可能阻止或加速这一过程，因此它们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他认为，任何法律施加的约束都是有限的：因为它们最终不可能阻止发展。事实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司法规则最终将会做出调整，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而，俄国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19世纪60年代农奴制的终结是分化过程的分水岭。<sup>[41]</sup>人身依附关系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农民成为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同时，货币化的赎身费，迫使他们成为商品生产者。农奴解放启动了，或者说明显加速了内在于商品经济本质中的分化机制。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这最终确保了农业的资本化，作为民粹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方案基础的村社势必解体。有鉴于此，建立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希望只是一种乌托邦。

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明。对此所做的任何评价，都必须牢记以下两个事实。首先，普列汉诺夫的分析与马克思对俄国半亚细亚社会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参加以上第七章），也与马克思强调的商品关系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重要性相一致。其次，有关农业商品化和农民分化的一些经验证据，证实了普列汉诺夫的结论。<sup>[42]</sup>因此，普列汉诺夫的观点既依赖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与现实的发展相符合。尽管如此，在某些方面，这种分析也容易招致批评。

绝对信守马克思对俄国的亚细亚社会的分类，是普列汉诺夫的一个弱点。这并不是因为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的盲从。普列汉诺夫的结论源自他对俄国历



史资料的研究，这些历史资料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未能接触到，他对俄国社会具有重要的亚细亚社会性质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强。<sup>[43]</sup>然而，任何情况都无法弥补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的“半亚细亚”概念是最不可靠的概念之一（参见以上第七章）。这些缺陷也反映在普列汉诺夫身上；事实上缺陷变得更明显了。普列汉诺夫的说明强调了俄国专制主义的东方属性与其它封建特征占主导地位的属性的并存。<sup>[44]</sup>俄罗斯帝国的地理特征，以及基于这种特征所产生的农业的类型，被普列汉诺夫用来解释俄国的亚细亚特征。<sup>[45]</sup>然而，普列汉诺夫并没有把俄国与其它东欧的政体进行比较，从而对这些因果关系加以证明。面对西方的威胁，为何沙皇专制主义能够积极应对，而中国的专制主义则不能如此，成了普列汉诺夫著作中的一个谜。而且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正是这种作为西方化过程重要构成部分的对西方威胁的反应，进一步强化了俄国的亚细亚性质，特别是强化了国家的作用。<sup>[46]</sup>普列汉诺夫从来没有能解决这一悖论。他对辩证法一贯敏锐的感悟能力似乎离他而去，因而他把重塑一种更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任务留给了托洛茨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不平衡的，而且将与非西方的结构因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因此，俄国的发展将必然不同于西欧的发展（参见以下第十二章）。

普列汉诺夫追随马克思，强调了商品关系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关键作用。再一次，他并不是不假思索地强调这一点的。在马克思对俄国进行的最后的讨论中，在证明了他民粹主义特征的结论中，马克思的思考同样基于对19世纪60年代俄国改革所产生的效果的分析，普列汉诺夫关注于这种情况。但是，普列汉诺夫不可能了解马克思的论述，因为马克思的著作直到20世纪才被全部看到。更为重要的是，普列汉诺夫对这一方面的分析，比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本质的评论更为有力。商品生产显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但问题是，它是否是充分条件。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一种最纯粹的方式，强调了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起源中的重要性。<sup>[47]</sup>《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和“晚年马克思”的著作，都表明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思想。<sup>[48]</sup>然而，他确实指出了商品关系作用的发挥存在的一些限定条件。马克思特别说明了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具有的两重性质。尽管这些资本形式既能够扩大商品流通，也能够加速小生产者的毁灭，但它们并不会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sup>[49]</sup>恩格斯也指出，东欧的（第二次）农奴制拥有融入世界市场的能力，<sup>[50]</sup>马克思对新大陆的奴隶制作出过同样的评价。<sup>[51]</sup>从而设定了把市场生产和资本主义模式联系起来的任何一种一般规律的限定条件。

普列汉诺夫忽视了这些限定条件，尽管在俄国农奴解放之前，使用农奴劳动的工厂强化了这些限定条件，并且沙皇俄国1906年之前的农业政策有时候也确实巩固了村社的地位，而不是加速其灭亡。<sup>[52]</sup>然而，我们很难指责普列汉诺夫在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讨论中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到19世纪末，沙皇专制很显然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业，而且如果不提高农业关系的商品化程度，资本主义工业就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发展。此外，既然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迅速地改变了农业生产者的境况，因此可以期待它可能开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革命化的道路”。<sup>[53]</sup>但是，普列汉诺夫把创建一支推翻沙皇专制的政治力量作为自己终生努力的目标。那么，他为什么要相信革命将会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呢？况且，根据他的分析，沙皇专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对这一问题提供完整的答案，要等到下一节对他的政治理论的分析，但是，普列汉诺夫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进行的经济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影响了他的政治理论。

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一样）表达出对农民的普遍的不信任。他对任何激进的土地革命的进步性充满怀疑。毫无疑问，要求有一场肃清封建残余、促进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革命。<sup>[54]</sup>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问题在于“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实现，很可能会以其它方式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如，破坏大地产），同时提升农民的政治地位可能阻碍俄国的进一步欧洲化。<sup>[55]</sup>这些担忧是有充分依据的，尽管它们的实现形式与普列汉诺夫料想的有所不同。在1917—1918年革命期间，俄国农民不仅明显地改变了先前引起农民分化的财产分配方案，而且还赋予村社以新生，这种特征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集体化时期才终结。<sup>[56]</sup>在此意义上，农民革命具有极其退步的性质。普列汉诺夫没有考虑村社重新恢复的可能性，但是，这一事实不应当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即使是对俄国农民问题有更加深入研究的列宁，在村社重新恢复变为现实的前夕，也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的端倪。这是有关1917年的最大的矛盾之一，即便是最敏锐的辩证学家都没有预测到这个矛盾。但是，普列汉诺夫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联系上，并没有强调未来的发展前景，这种研究是直接用来反对民粹主义的观点的，民粹主义认为传统农民经济组织有着持久的生命力。

普列汉诺夫对有关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的思考不是太清晰。他似乎曾经希望城市革命对农村的支配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农业关系的改变将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最小的制约。然而，他完全没有认识到，农业生产在经济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本质以及十分有限的规模经济。<sup>[57]</sup>19世纪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这一要点，<sup>[58]</sup>而马克思并没有认识到。<sup>[59]</sup>然而，德国的修正主义者强调小规模农业继

续存在的必要性，<sup>[60]</sup>同普列汉诺夫一样，列宁尽管也抵制修正主义，但他的著作却表明他学习了修正主义者（参加以下第十一章）。普列汉诺夫则没有这样做。

与农业技术的特征相伴的，是独立的农民不同寻常的坚韧性，正是这种特征使得独立的农民可以存活下来，并阻碍生产的资本主义化。在工业方面，市场的扩张使手工业者成为商品生产者，并且城市的文化环境瓦解了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传统束缚。商品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化进展顺利，尽管有点残酷。农民则不同，农民在很大程度上自产自销，对他们而言，“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提供了更低的生产专业化的激励。要不是货币化债务或税收给他们施加压力，农民就可以抵制市场的渗透，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对沙皇专制下俄国农业发展的分析，体现了第二个方面的实质。他对19世纪60年代的财政变化的集中关注，就完全与此一致。然而，他似乎并没有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这一事件，尽管他认为法国的历史很重要，在法国，革命的解决方式使得财政变化采取了另外一种具体形式。<sup>[61]</sup>他非常忧虑“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可能会阻碍其它地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sup>[62]</sup>此外，这些忧虑迫使他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的方案，该方案旨在充分挖掘农民的革命力量反对独裁专制，同时避免农民长期存在造成的影响（参见下述第11章）。普列汉诺夫自己的方案未能很好地考虑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

另外，普列汉诺夫反对列宁的农民方案暴露了他分析中的另一个缺陷。他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集中于小生产者。他很少注意地主庄园的转变，他只是假设前者的去自然化和去封建化将会影响后者，在更大的范围内使得后者资本主义化。这就忽视了庄园主缺乏有效地调整自己经营行为的能力，和农奴制结束后庄园农业经历了一定程度的衰落的事实。<sup>[63]</sup>与此相对照，列宁认识到这一事实，而且这一事实巩固了列宁革命策略的逻辑基础（参见第11章）。

因此，尽管普列汉诺夫坚持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尽管存在和他对沙皇专制下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分析相一致的证据，但是他的著作仍然存在重大的缺陷。要全面地认识这些缺陷，我们必须转向普列汉诺夫尝试在他自己分析的经济基础之上构建的政治理论。对普列汉诺夫的政治学的考察，将会进一步揭示他的经济学中存在的缺陷。

#### 4. 革命的结构

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的几个不同的地方，区分了“革命的代数学”和革命

的“算术”，<sup>[64]</sup>这类似于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区别。的确，他有时候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代数学”，而且他相信自己为俄国革命者提供的战略，是依赖于马克思在（相似的）情形下为1848年德国革命制定的战略的（参见以上第七章）。<sup>[65]</sup>他一直认为，同算术相比，代数学是抽象的，因此坚持同一革命视角的人们之间可能存在重大的差别。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才可能长时间地认为他们同属于一个政党，即使当他们因为战术的不同而决裂的时候也是如此。

普列汉诺夫为俄国革命者提供的“代数学”比较复杂。<sup>[66]</sup>与国际社会主义者一样，他的最终目标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会表现为一系列的民族的或地区的革命的形式，<sup>[67]</sup>因此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包括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的历史情况要求进行作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必要的历史前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sup>[68]</sup>这是由俄国资本主义欠发达的特征决定的，俄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因对资本主义不利的专制环境而加剧。为了取得资本主义最快速的发展，专制主义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上层建筑必须被推翻。

尽管在普列汉诺夫看来，这样的一场革命将会开创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时代，但他认为这样一个时代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必然的。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将确保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sup>[69]</sup>工人阶级的人数将会增加，素质将会提高。为了文化的发展，剥削将得到控制，民主自由将有助于组织的成熟。因此，无产阶级支持资产阶级革命符合自己的直接利益和长远利益。

但是，普列汉诺夫认为，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充当资产阶级的副手并不是令人向往的事情。尽管在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中，资产阶级有其客观利益，但是，它也会把革命限制在满足自己的阶级利益要求的范围内。欧洲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当资产阶级革命动员城市大众反对旧制度时，工人的直接收益是很小的，革命以一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未来的方式受到了制约。<sup>[70]</sup>尤其是在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中，他坚决主张，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不能再重复这种情况。所以，无产阶级需要独立的政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并推动资产阶级继续前进，否则的话，革命将会朝着其它方向发展。<sup>[71]</sup>他设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成反对专制的同盟，但在这个同盟中，对专制制度的“共同”打击来自于两个阶级“各自”采取相应的行动，而且无产阶级应当成为同盟的领导者。<sup>[72]</sup>无产阶级由此承担了“民族阶级”的角色。<sup>[73]</sup>

尽管普列汉诺夫确信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一个直接的目标是不可行的，<sup>[74]</sup>但他

也相信他所追求的那种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不容易实现的。他对俄国资产阶级日益增加的政治保守性充满了鄙视。<sup>[75]</sup>正如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表明的那样，这些判断都是有事实依据的。普列汉诺夫的立场存在的缺陷，不是对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性的盲目乐观，而是他把自己对资产阶级的理解仅限于政治行为层面造成的。普列汉诺夫的战略的关键之处在于，尽管资产阶级充满怯懦和犹豫，但是，它同专制政府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的利益冲突。<sup>[76]</sup>但是，普列汉诺夫从来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在他的经济分析中，他集中关注的是俄国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的发展。他并没有对工业发展动力学进行过类似的分析，但他却赋予城市资产阶级革命的角色。普列汉诺夫根据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的一般理论范畴和欧洲资产阶级的行为，审视了俄国的资产阶级。他没有从俄国工业化面临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创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推导出资产阶级政治学。

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很明显的就会是，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据的位置，会使人怀疑它没有能力完成赋予它的那部分任务。经济中城市工业的比重相对较小，主要由国家的军事需求和补贴提供帮助，由因沙皇政府实行严厉的财政政策而变得可能的国外资本的大量注入推动产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sup>[77]</sup>此外，不太清楚的是，在工业与专制政府之间是否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也就是说是否存在无法以进化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的妥协来解决的冲突。当然，工业资本会偏好更少独裁色彩的政体，扩大与政府的联系并推动社会经济改革的进行。但是，在俄国，在1789和1848年引起资产阶级不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sup>[78]</sup>资产阶级对专制的不满与一个年幼的家庭成员类似，渴望发挥更大的影响，但是，又囿于他一直以来成长于其中的环境。<sup>[79]</sup>这正是列宁根据1905年革命得出的结论——他相信资产阶级赞同“普鲁士”式的现代化道路，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重建旧制度，而无需推翻沙皇专制（参见以下第十一章）。托洛茨基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他更加乐观地认为这样的进化道路将会失败（参见以下第十二章）。与托洛茨基相比，列宁对这种道路的前景的思考更为认真。

普列汉诺夫没有对俄国工业资本主义作出经济分析，因他分析农业资本主义时的一个重大疏忽而变得更为复杂，这一点在前面的部分已经有所涉及。普列汉诺夫没有认识到，在制约自由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上，在确保农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受制于不完全的土地所有上，符合农村业主利益的经济基础的存在，也没有认识到非农民农业受到了政府财政政策特殊的照顾。因此，甚至是具有商业化

倾向的地主，也仍然保持着对专制政府的依赖。正如俄国资产阶级无法复制18世纪末法国中产阶级的行动一样，俄国的土地所有者也不可能踏上17世纪中叶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领导者选择的道路。在俄国，缺乏先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所要求的经济基础，然而，普列汉诺夫的战略适合于他们政治上模仿的信念。

从而，列宁认为的俄国现代化的“普鲁士式”的解决方法是建立在俄国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基础之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矛盾在于，这种情况在政治方面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被普列汉诺夫证明了。他说明了从18世纪早期至19世纪晚期自上而下地进行的重建是如何展开的。列宁看到但普列汉诺夫没有觉察到的是，1905年革命的结果预示了新的历史篇章。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深深地困扰着列宁，这使他断定彻底的民主革命将要求无产阶级与农民结成反对资产阶级同盟（参见以下第十一章）。此外，这样一种同盟不一定必然成功，另外的演化的方案正在形成，它可以“普鲁士式”的方式完成俄国向现代化的转变。这必然会在党的组织层面巩固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的立场确实可以在普列汉诺夫对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的意识的分析中找到其理论基础。<sup>[80]</sup>

列宁的战略填补了普列汉诺夫经济学中的另一项空白，尽管直到1917年，当促成他的革命战略发生另一个根本性变化、并使他的立场更接近托洛茨基的时，列宁才意识到这一点。普列汉诺夫为资产阶级革命制定了两大目标：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为作为社会主义力量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普列汉诺夫意识到，这两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因为资产阶级将会把革命局限于第一个目标；而工人阶级将着眼于实现这两个目标。然而，至少是在1905年之前，普列汉诺夫不相信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民主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是第二位的；革命关注的是政治方面的问题，而非经济方面的问题。有利于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力量发挥其未来的作用的彻底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缩短工作日、最低工资立法以及对劳动过程的管制等），并不是无法与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维持相适合。在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认真思考的是，经济上与资本主义相适合的改革，将可能需要借助于政治上的改革来实现，也没有考虑政治方面的措施具有的经济方面的含义。

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设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理所当然地包括两个方面：无产阶级行使领导权，而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获得，不只是无产阶级行使领导权的问题。如果资产阶级抵制无产阶级（并且普列汉诺夫也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有兴趣这样做），将会出现发生第二次内战——在第一次

内战中——的可能性，无产阶级将被迫行动起来，既反对资产阶级，也反对专制统治。无产阶级的成功将会产生重要的经济意义，因为物质生活将必然根据非资产阶级的原则来重新组织。因此，寻求实现普列汉诺夫“两阶段”革命方案中第一阶段革命的工人阶级，将被迫超越这一阶段。从这一点看，普列汉诺夫有关无产阶级为什么要让自己受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的说明，是不中肯的。<sup>[81]</sup>像批评家通常所指出的那样，问题不在于工人阶级将必然要求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而在于普列汉诺夫理解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措施引起了政治上的冲突，而解决这些冲突又带来了新的经济秩序的变化。托洛茨基首先认识到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成为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在“不断革命论”中，资产阶级革命将嵌入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参见以下第十二章）。结果就是“革命的代数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 5. 结论

普列汉诺夫有关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缺乏保证它实现的物质基础能力的观点，当然没有改变。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广大成熟的无产阶级和少量的农民，那么物质匮乏和反革命力量将会最终毁灭革命。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后发优势”或世界革命不可能颠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真理。<sup>[82]</sup>

因此，普列汉诺夫把革命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背后的逻辑，促使他走上了和列宁认为的“普鲁士式”道路具有相同的客观含义的道路。（参见以下第十一章）。尽管普列汉诺夫仍然坚持他最初的论述，但他实际上坚持的立场，在1905年革命期间和之后已经远离了他最初的观点。工人阶级领导权的作用被淡化了，更加强调服从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捍卫沙皇帝国也最终被认为是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合适的立场。<sup>[83]</sup>普列汉诺夫退却的曲折道路是悲剧性的。它的根源，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是他不能诊断出俄国资本主义落后的本质。他的确正确地坚持了另一种极为愚蠢的“革命的代数学”，但是，这一事实并不会减少它在这方面的失败。

普列汉诺夫体系中的内在矛盾，为即将在20世纪俄国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分裂奠定了基础。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方案，这些方案都是普列汉诺夫理论体系中最薄弱环节清晰可辨的产物。实践也在发挥作用，因为作出修正，一定程度上是运用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更是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无法应用的结果。然而，尽管政治战略至关重要，但是，每一个政治战

略都依赖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理论。

然而,在出现这样的理论之前,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取得胜利,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必须被击败。在这里,俄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又一次成为问题的核心。它是争论的一个主要特征,尤其是争论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下一章将专门探讨这些问题。

---

## 第八章注释

\*参考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选》(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4-81),简写为SPW加上卷数。参考《列宁全集》(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0-70),简写为CW加上卷数。

[1] Vera Zasulich是普列汉诺夫的同事,1881年马克思向他表达了自己的民粹主义倾向。

[2] S. H. Baron, *Plekhanov: The Father of Russian Marx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122,141,160.

[3] 在Parvus的影响下,托洛茨基不再受1904-1906年普列汉诺夫思想体系中基本原理的影响。但是,除了1905年在某些孟什维克党人中短暂流行之外,他的思想在1917年之前影响不大。(参见以下第12章)。

[4] S. H. Baron, 'Legal Marxism and "the Fate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6, 1957, pp. 113-26.

[5] 《论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2-296页;V. Fomina, 'Plekhanov's Role in the Defence and Substanti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in SPW, I, p. 46.

[6] 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每一卷的导论。

[7] 对这些原理最重大的偏离也许发生在1892年,当时,农民暴乱的前景使他改变了他自己的观点,改变后的观点接近于列宁在1905年之后表达的立场(参见以下第11章)。但是,这种接近被证明是短暂的,普列汉诺夫很快再次强化了他先前的想法;See R. Larsso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Stockholm: Almqvist and Wiksell, 1970), pp.143-4, 148-50, 307-8.

[8] SPW, II, pp.124, 424; III, pp.119.

[9] SPW, II, pp.17, 316, 514; III, pp.55, 104, 282; Baron, *Plekhanov*, pp.164-85,246.

[10] S. Avineri,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L. Kok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 The Founder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 SPW, I, p.607.

[12] SPW, I, pp.480-697.

[13] 与此有关,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是这一原理的例外。1917年之前, 只有他的经济学对德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并不令人奇怪。但是, 同样让人毫不奇怪的是, 他并不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成员, 尤其是在1900年之后。

[14] SPW, I, p.197; II, p.228; III, P.327; IV, p.79, 713; V, pp.327, 675.

[15] SPW, I, p.303; II, pp.295, 597, 619; IV, p.79. K. Marx, 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 edited by E. J. Hobsbaw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5).

[16] 1939年, 它在莫斯科出版, 但是直到1953年再版时它实际上还不为人所知。See E. J. Hobsbawm, The Fortunes of Marx's and Engel's Writing in E. J. Hobsbawm (e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Volume I: Marxism in Marx's Day (Hassocks: Harvester, 1982), pp.327-44.

[17] K. Marx,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pp.20-2.

[18] SPW, I, p.659.

[19] SPW, I, pp.609, 626; II, pp.141, 214, 269. SPW, II, pp. 141, 214, 269.

[20] SPW, I, pp.580, 586, 657, 698; II, pp.146, 175, 194, 214, 617; III, pp.142, 145, 148; IV, pp.76, 79, 272; V, pp.50, 215.

[21] 也可能存在反向运动, 见SPW, IV, p.274.

[22] 社2009年版, 第667-670页。

[23] SPW, I, pp.71, 630; II, pp.145, 261; III, p.160.

[24] SPW, I, pp.501; II, pp.134, 159, 226, 455; III, p.156, 267, 626.

[25] SPW, I, pp.406, 408, 490; II, pp.191, 226, 232, 455; III, p.605.

[26] SPW, I, pp.34, 537, 614, 621, 630, 636; II, pp.172, 188, 214, 228, 272, 274, 617; III, p.160, 165, 300, 302, 367; IV, pp.9, 14, 329.

[27] SPW, II, p.165. 尤其是参见SPW第5卷。

[28] 见普列汉诺夫的经典论文《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载SPW第2卷, 第283-315页。

[29] SPW, I, pp.33, 243, 383, 586, 610, 626; II, pp.174, 196; IV, p.9.

[30] See, for example, N. Chernyshevsky, 'Selected Writings' in T. Shanin (ed.) Late Marx and Russia Road: Marx and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pp181-203.

[31] SPW, I, pp.60, 147, 303, 316, 626, 670; II, pp.91; III, pp.623; IV, pp.14, 59, 76, 86, 103, 121, 128, 162, 251, 281, 293, 297, 302, 316, 335, 346, 410, 450, 539, 621, 629,

683, 710; V, pp.64, 89, 133, 147, 267, 400, 458, 521.

[32] SPW, I, pp.95, 296, 328, 448; IV, pp.153, 187.也见前面第7章第五部分。

[33] SPW, I, pp.69, 197; IV, pp.713.

[34] G. Plekhanov, *History of Russian Social Thought*(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67); SPW, I, pp.369, 383, 389; II, pp.174; IV, pp.49, 406.

[35] SPW, I, p.398; V, pp.60, 146.

[36] SPW, IV, pp.432, 713; V, p.124.

[37] SPW, I, pp.133, 144, 243, 390, 730; IV, pp.45, 51.V, pp.105, 131; T. Dan,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London: Secker & Warburg,) p.14.

[38] SPW, I, pp. 58, 266, 288, 311, 316, 321; II, pp.173, 259, 295, 460, 482, 493; IV, pp.77, 350; V, pp.54, 61, 140, 348. See also R. L. Meek,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3)2nd edn.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20页。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普列汉诺夫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存在。普列汉诺夫聚焦于自然经济、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阶段,因为他想强调前资本主义俄国亚细亚社会,而非封建社会的性质。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案被认为无法应用于俄国。

[40] SPW, I.P.266.

[41] See the references in note 37.

[42]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2页。 P.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London: Bastsford,1986) ch.4.

[43] M. Sawyer, *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The Hager: Martinus Nijhoff, 1977), pp.146-87; S. H. Baron, 'Plekhanov's Russia: The Impact of the West Upon an "Oriental" Socie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 1958, pp. 388-404.

[44] SPW, I, pp.63, 131, 254, 277, 287, 390, 432; II, p.452; IV, pp. 46, 416, 429, 516, 596, 688; V, pp. 50, 142.

[45] SPW, III, p.154; IV, p. 79; V, p.50.

[46] Plekhanov, *Hisory*, pp.33, 48-58, 61-8, 98, 110, 147-9, 212; SPW, IV, pp.47, 51, 194, 527; V, p.105.

[47]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7页。

[48] R. L. Meek, *Labour Theory of Value; Howard and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2nd edn, pp54-9; T. Shanin(ed.) *Late Marx and Russia*

Road: Marx and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4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0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0] 《恩格斯致马克思(1882年1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30-131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20页。

[52] A. Gerschenkron, 'Agraria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Russia 1861-1917,' in H. J. Habakkuk and Post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y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Vol.6, pp.706-800.

[53] 《资本论》第三卷,第20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376页。

[54] SPW, I, p.356.

[55] SPW, I, pp.21, 82, 97, 104, 147, 309, 315, 359, 398; II, pp.436; VI, pp.33, 48, 110, 416; V, pp.223, 55, 63, 72, 89, 92, 112, 141, 144, 441, 467; S. H. Baron, 'Plekhanov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05', in J. S. Cutiss (ed.) Essays in Russian and Soviet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133-48; Baron, Plekhanov, pp.10, 31, 76, 101, 104, 107, 136, 141, 265, 304, 346; Dan, Origins, pp.177,310,313.

[56] D. Atkinson, The End of the Russia Land Commune 1905-1930(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T.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57] 今天,由于农村的电气化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这一因素已远不是那么重要。

[58]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ongman, 1909) pp132-3;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1936)p.652.

[59] See, however, S.A. Mann and J. M. Dickinson,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apitalist Agricultur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5, 1978, pp.466-81.

[60] A. Hussian and K. Tribe, Marxism and Agrarian Question, Volume, I,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Peasantry, 1890-1907(London: Macmillan, 1981).

[61] T. Kemp, Industrialisation in Ninteenth-Century Europe ( London: Longman,1985)2nd edn.ch2.

[62] See note 55.

[63] G. T. Robinson,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129-37.

[64] SPW, I, pp.120; 18, 48, 90, 137, 607, 625; IV, pp.528.

[65] SPW, I, pp.205, 669; 675, III, pp.571.

[66] SPW, I, pp.275, 355, 359; II, pp.204, 421.

[67] SPW, I, pp.353,358; S. F. Bloom, *The World of Nations*(New York: AMS Press,1967.

[68] SPW, I, pp.351-62.

[69] SPW, I, pp.73, 140, 171, 341; 103, 109, 442.

[70] SPW, I, pp.58, 82, 102, 212, 341; IV, pp.103, 109, 442.

[71] SPW, I, pp.104.

[72] 正如P. B. Axelrod所说的：“在反对沙皇专制和独裁的斗争中，如果俄国无产阶级不可能担当一个独立的、出类拔萃的角色，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历史权利。”转引自N.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London: Macmillan, 1977),vol.1,p.47.

[73] SPW, I, pp.376.

[74] SPW, II, p.586.和先前的注释30、31。与之对照，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确把社会主义革命看做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见前文第4章。

[75] SPW, I, pp.355, 477; II, pp.77, 181, 443; III, pp.173, 552, 558; IV, pp.718; V, pp. 587, 654; Dan, *Origins*, pp.19, 183; Baron, 1905.

[76] SPW, I, pp.208, 211, 394; II, pp.524; III, pp.476; IV, pp.722; V, pp. 213.

[77] A.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78] 社会民主党和后来的保守-自由分子彼得·司徒卢威一度认识到这一点。见R.Pipes, *Struve: Liberal on the Right, 1905-1944*(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79] R. A. Roosa, 'Russia Industrialists Look to the Future: Though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1906-1917', in Curtiss, *Essays*, pp.198-218.

[80] 重要的是，在党的组织方面，与其他孟什维克的主要领导相比，无论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还是在1905年“取消主义 (Liquidationist)”争论期间，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反对都不是太明显。

[81] SPW, I, pp.84, 94; Baron, *Plekhanov*, pp.270; Baron, 1905, pp.136; Dan, *Origins*, pp .183.

[82] SPW, I, pp.49-106, 147, 296, 303, 316, 328, 335, 448, 626, 670; II, pp.91; III, pp.623; IV,pp.59, 76, 86, 103, 121, 128, 131, 153, 162, 187, 251, 293, 297, 302, 316, 335, 346, 410, 450, 539, 621, 629, 683, 710; V, pp.64, 89, 133, 147, 267, 400, 458, 521.

[83] Baron, *Plekhanov*, pp. 279-361.

## 第九章 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

### 1.引言

普列汉诺夫主要是在反对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过程中，发展了他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世纪80年代，俄国工人运动欠发达的本质，使得普列汉诺夫的直接目标是把知识分子中的革命者转变到他的立场上来，而不是寻求对无产阶级的直接影响。<sup>[1]</sup>普列汉诺夫对民粹主义的批评，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更广泛意义上对民粹主义批判的一部分。第一轮批判是由恩格斯在1873年发起的，<sup>[2]</sup>在俄国，同民粹主义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这一争论随着斯大林集体化运动的兴起而结束。争论的高潮发生在1894-1899年，当时，批判性的出版物的数量显著增加。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取得知识上突破的时期。特别是在在一系列成熟的反对观点的攻击下，作为民粹主义哲学基础的经济理论被削弱了。尽管民粹主义幸存了下来——主要是在社会革命党中，但是，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向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作出了重大让步，改变了自己的立场。<sup>[3]</sup>

观念的胜利有其物质基础。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的广大农村地区遭遇饥荒，这不仅进一步激化了这一时期的论战，而且表明农业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sup>[4]</sup>随后几年，工业迅速增长，城市无产阶级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及时地出现了，<sup>[5]</sup>这进一步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显然，资本主义正在发展，无产阶级的激进与农民的逆来顺受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得到了具体的证明；随着民粹主义队伍的衰落，社会民主主义的队伍逐渐壮大。

胜利并不全面，民粹主义改头换面地幸存了下来，这反映了普列汉诺夫理论体系中存在弱点。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尽管难以表述清楚，但他们认识到，落后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不完全像普列汉诺夫描述的那样；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存在重大的障碍，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农民行为的分析是不充分的。当20世纪资本主义开始“东扩”时，当马克思主义和农民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反殖民运动开始结合起来时，民粹主义开始复仇。民粹主义特有的主题重新出现在新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受到极大的影响。在这一意义上，在第七章讨论的“晚年马克思”思想方面存在的不足，并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20世纪下半叶，民粹主义作为一项世界性政治运动，同1914年之前为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提供理

论基础的“成熟马克思”的思想相比，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

## 2. 民粹主义的俄国资本主义理论

民粹主义的观点包罗万象，只在敌视资本主义发展、主张社会进步以俄国经济生活的传统制度为基础的意义，它们才构成统一的整体。至于“进步”的确切内涵、实现它的最佳方式、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一种威胁，以及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健康状况和适用性问题，都是莫衷一是的。<sup>[6]</sup>但是，在19世纪最后20年间，民粹主义理论的一致性逐渐增强。一般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了阻碍，全面仿效西欧不仅不合适，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俄国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下来，那么经济演化必然主要地表现为非资本主义式的。其他类型的出路将导致俄国从属于西方国家，甚至可能沦为它们的正式的殖民地。

民粹主义的重要理论家有V.沃伦佐夫和N.F.丹尼尔逊。<sup>[7]</sup>他们每个人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原理，特别是丹尼尔逊，他把《资本论》翻译成俄文，而且在差不多30年时间内，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通信联系。<sup>[8]</sup>实际上，他把自己视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人们也普遍认为确实如此。然而，他和沃伦佐夫所做的，就是整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民粹主义的主题，以此支持民粹主义。<sup>[9]</sup>正如我们在以上第七章看到的，这是民粹主义著述家的一贯特征。而且当他们的观点遭到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时，他们往往倾向于扩大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但是，大多数民粹主义者仍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持有好感。令普列汉诺夫懊恼的是，民粹主义者通常视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不合法的，是错误的。

尽管沃伦佐夫和丹尼尔逊在诸多重要问题上存在异议，但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充分发展的观点上，确实可以放在一起，并一同加以考察的。他们的理论基础是相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引起消费不足。从而，纯粹形式的资本主义将陷入停滞；只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部因素，才能消除停滞、促进增长。剩余价值不可能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中实现。因为剥削率为正，工人的消费需求不足，而且消费不足不可能由资本家的消费去消除，因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用于积累或储蓄。为了确保剩余价值全部实现，资本主义经济需要一种特定类型的市场体制——存在着源于外部消费需求的体制。<sup>[10]</sup>

这是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它没有分析作为资本主义变种的俄国的具体缺陷。但是，民粹主义经济学家却将一般理论应用于俄国，否认俄国资本主义能够开辟外部消费需求的充足来源。俄国的“后发”，意味着国外市场已经被更为发

达的国家所垄断。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只能通过沙皇政府财政政策的人为刺激，以一种退化了的形式得以维持。最终，即使是对这种寄生现状的维持来看，国家的资源也是不足的。如果不抛弃照搬西欧策略的话，那么持续的、全面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俄国必须走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道路（但是，也许可以借鉴在一些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使用的现代技术）。

关于俄国经历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后果，民粹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存在分歧。沃伦佐夫强调，农民进行“人民生产”的能力，可以抵御侵蚀和保持农业的完整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丹尼尔逊则指出了资本主义对农业经济的毁灭性影响。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产生的是毁灭而不是转型：农业生产者日益贫困化但却没有转变为雇佣工人。他进一步论证，内在于资本主义部门的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因而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财富的集中程度。因此，任何发展都是内向的，但非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转化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特别是丹尼尔逊的观点，可以被解释为《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案例”，这也是他自己理解《资本论》的方式。丹尼尔逊的理解强调了马克思分析中存在消费不足的线索，回避了发展中存在的矛盾。<sup>[11]</sup>相反，正统马克思主义强调和发展了民粹主义者忽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那些原理。普列汉诺夫最早清楚地表达了所有可以用来反击民粹主义的主要观点。<sup>[12]</sup>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如果考虑到普列汉诺夫的内容写于《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公开出版前这一事实，那更是如此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内容对正统观点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论战”中，普列汉诺夫把扩展和完善民粹主义者早期经济学批判的任务留给了他人，自己则集中精力反对民粹主义理论中的哲学和社会学原理。

许多能力不同的著述者，以不同的方式阐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许多人认为需要详细浏览整个争论过程的批驳性材料，但结果发现这些材料中存在大量的重复和夸张的成分。然而，我们可以挑出两位参与者，他们明显地胜过他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列宁以一贯的——其他人只是偶尔能够达到的——专业性和彻底性，表述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批判。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集中证明，通过扩大生产资料再生产实现剩余价值具有可能性。列宁强调，剩余价值的实现内在于资本主义关系的粗放式增长之中。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经验分析充实了他的理论分析，因为正是俄国工厂的发展支撑了他的理论框架。列宁的经验研究也与自己的理论视角相吻合：他以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系统化程度，记录了农业经济中生产关系的变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列宁

的主要观点是互补的。不存在一方否定了另一方要点的情况，而且两个人通常用自己的方式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自己的说明。在专业领域，他们各自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在以下四节将集中分析这些内容。这与许多作者的做法不同，他们强调19世纪90年代批判民粹主义的论战中司徒卢威的重要性。<sup>[13]</sup>司徒卢威作为“大论战”的催化剂和社会民主主义中自由力量的一位重要组织者，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无论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还是同列宁相比，他都只能算是二流人物。司徒卢威在反击民粹主义的主要经济观点时，对他的对手作出了重大的（和错误的）让步。<sup>[14]</sup>

### 3.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论扩大再生产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首先认识到1885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提出的马克思再生产模型的重要性。<sup>[15]</sup>在他看来，这些模型是经济理论上迄今唯一的最重要的成就，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严谨的框架，借助于这一框架，可以对资本主义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作出具体分析。1894年，杜冈借助于再生产模型，提出了周期性经济增长理论，批判了其它的理论，并且对英国的经济波动进行了经验分析。<sup>[16]</sup>在这一过程中，他清晰地批判了所有的消费不足论，其中包括民粹主义的消费不足论。作为对其他理论的替代，他强调要把“比例协调”以及它的反面“比例失调”作为理解资本主义运行的关键。

####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小传

1865年出生在乌克兰的Solyonoye，他有半乌克兰和半鞑靼人血统，也可能有贵族血统。他获得过自然科学、法律和经济学学位，在19世纪90年代同民粹主义者围绕资本主义发展展开的争论中，在社会民主主义圈子内崭露头角。尽管他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但早在19世纪90年，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批判的态度。20世纪初离开社会民主运动之后，他的修正主义倾向日益显露。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圣彼得堡和其他地方获得了不少大学的教职。他生命的最后10年，专注于合作社运动。作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者，1917年迁居基辅，在乌克兰临时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1919年1月去世。

马克思主要以数字例子的方式，阐述了再生产理论。在方法上，杜冈效仿马克思，但是，他把马克思分别论述的三个部分整合为一体。<sup>[17]</sup>首先，他常常加上



一个第Ⅲ部类（尽管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马克思有时候也把第Ⅱ部类分为生产工资商品的部类（Ⅱa）和生产奢侈品的部类（Ⅱb））；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杜冈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引入他的分析中；再次，至关重要是，杜冈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或推动经济增长。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那它们就只是派生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目标。当然，没有哪个马克思主义者会不赞同最后一个观点（或者事实上包括后面两个观点），但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他们并没有体会到它们的真正内涵：正因为如此，消费不足论才在马克思主义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杜冈认为，一旦经济分析结构得当，消费不足论的核心部分就是无效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只有通过造成生产部门之间比例失调的因素才能加以解释。<sup>[18]</sup>

这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分析再生产问题时的结论，马克思认为只要生产部类保持必要的比例关系，剩余价值的实现就不成问题。第Ⅰ部类产生的对消费品的需求，实现了第Ⅱ部类的剩余价值；与此相类似，第Ⅱ部类对不变资本的需求，使得第Ⅰ部类生产的剩余价值得以实现。<sup>[19]</sup>加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质上可以被视为生产资料的进一步生产是为了生产资料的生产。尽管从人类价值的视角看，这种观点似乎有些荒谬——并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承认它的荒谬之处，<sup>[20]</sup>但是，从这种分析中必然得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正确理解。它也意味着剩余价值的实现越来越独立于消费需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通过设想一种（虚拟的）自动化经济——在该经济中，大量的机器的生产只是为了用来生产更多的机器——把这种推理方式的逻辑推至（或几乎推至）极端。<sup>[21]</sup>同样，在达到这一终点的过程中，伴随着的是消费的下降——大量的人口贫困化——剩余价值的实现。因此，在资本主义的运行过程中，消费需求并没有起到什么特殊的作用。

对于沃伦佐夫和丹尼尔逊极端形式的消费不足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作了有力的驳斥。但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拥护的更合情理的消费不足论（参见以上第四章到第六章和以下第十章）并没有受到损害。杜冈的模型只是认为，并不存在像民粹主义宣称的那样的必然、持续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积累周期性的中断导致暂时性的短缺，仍然是可能的。当然，他承认，可能引起危机的某种类型的比例失调，可以被描述为消费不足。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强调这一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机能失调的根源，在于缺乏确保按比例安排生产的制度。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强调了比例失调的一般现象，而非消费比例失调的可能性，并

且逐渐地反对各种形式的消费不足论。<sup>[22]</sup>此外,他坚持认为,即使人们可以把消费不足论正确解释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消费不足也不必然带来停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他的周期理论中就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诸多能够确保经济繁荣的力量。<sup>[23]</sup>因此,俄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受到阻碍;俄国走西方国家此前走过的同样的发展道路,并不存在什么障碍。<sup>[24]</sup>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是抽象的,但用它来消弱同样抽象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基础却是合适的。然而,他并不总能认识到自己结论的局限性。特别是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是根据价值向价格转形前的价值范畴建立的。因此,生产价格和利润率并不能明确地加以描述。在这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同马克思一样,没有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利润结构,基本上就可以引导资本主义走上他所描述的增长道路。今天有可能做到这一点,<sup>[25]</sup>但是,杜冈并没有进一步深入阐释自己的观点(即使是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之后)。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写作时的背景,他的模型没有能准确地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实际遵循的经济增长模式。例如,他承认对外贸易在英国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他是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这一点的,而不是从理论上对它进行解释。<sup>[26]</sup>在殖民扩张的高潮时期,这是一种极端的和戏剧化的立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长期满足于从偶然事件的重要性的角度来解释帝国主义,正因为如此,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受到了批评。<sup>[27]</sup>就俄国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来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也并非无可挑剔。再生产模型事先已经假定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但是,部分民粹主义者讨论的情况是俄国资本主义受到了更大的非资本主义部门的阻碍。列宁认识到这一缺陷,<sup>[28]</sup>他在论述实现问题时采取了与杜冈非常不同的视角。但是,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一样,为了消除民粹主义思想残留的最后一点合法性,列宁也采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 4. 列宁关于通过扩大商品生产实现剩余价值的理论

列宁试图追随马克思,而且当然想尽力赶上普列汉诺夫,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相比,他的确更加接近普列汉诺夫。他反对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的主要理论观点,是详细阐述了“商品经济的逻辑”,普列汉诺夫此前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参见以上第八章)。在此意义上,列宁的思想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相比,少了些原创性。但是,他的观点的威力一点也不弱,因为他的观点与俄国经济的实

际情况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容易得到统计数据的证明。

#### 列宁小传

V.I.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笔名），1870年出生在伏尔加地区的辛比尔斯克，父母是中产阶级。1891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的法学专业，两年之后参与社会民主政治运动。他迅速崛起，积极参加对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论战，并寻求组建一个有效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即使在1895年被捕和短暂流放后也是如此。在1900年和1903年，离开俄国，他的布尔什维克派开始组建独立的政党。最初，因为组织问题他脱离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随后，列宁对范围广泛的问题作出阐述，形成独特的理论立场。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他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既是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又是一个大的政党的主要组织者。列宁也因把党组织带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围内而著名。从一开始，他就作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在十月革命之后，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一职位上工作到1924年1月逝世。

支配列宁的观点的是一种广义的发展阶段类型，这种发展从自然经济开始，经过商品生产阶段，最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城乡分裂、不同性质产业的出现、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这些都等同于商品生产的增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更高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生产同前一个阶段相比都更有效率，而竞争是一个阶段取代另一个阶段的推动力。<sup>[29]</sup>

在列宁看来，沃伦佐夫和丹尼尔逊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不发达阶段的性质。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大规模的机器工业集中于城市中心、只使用雇佣工人，它们关注的只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忽视了多种原初形态的资本主义与发达类型的资本主义并存的事实。列宁认为，正确地看问题，就要求承认资本主义关系可能采取多种形式。而且他还指出，一旦资本主义关系稳固地建立起来，商品生产（从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就不可能受到阻碍。当然，它们不可能受到有限市场的限制，因为这一过程能够确保市场按相同的步调，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在这里，列宁借助丹尼尔逊自己的观点反驳丹尼尔逊。当商品化和资本化的过程确实带来贫困化时，这一事实本身必然包含着市场的扩大。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一无所有的生产者被迫为购买消费品而出卖劳动力。一方面市场扩大了，另一方面大量的生产者贫困化了。<sup>[30]</sup>

列宁没有忽视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带来的贫困问题，他的分析也不是简单化的。他并不是没有解释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有时可能会阻碍其向更为发达的形式发展。较高的发展阶段甚至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部分地恢复过去的经济组织类型。他完全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都会遵循同样的演化模式，并且那些法律认可的自然经济的残余，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sup>[31]</sup>因此，很难指责列宁不关心他所设想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列宁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来应用自己的原理。从本质上说，普列汉诺夫尽管持有同样的看法（参见以上第八章），但在具体应用时，他较为谨慎。因此，普列汉诺夫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商品化过程的结果，而列宁则倾向于把两者等同起来。<sup>[32]</sup>他视“国内市场发展的程度”为“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结果“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sup>[33]</sup>1900年，斯科沃尔特索夫在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sup>[34]</sup>的评论中批评了列宁，因为列宁把两者混为一谈。<sup>[35]</sup>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我们将在这一章的第7节回到这一问题。

列宁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分析，还批判性地考察了俄国经济的统计材料。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反驳民粹主义者，也进行过深入的经验分析。考虑到他们的视角不同，他们集中关注的必然是问题的不同方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主要聚焦于工业，尤其是工厂的增长；而列宁则更加关注农业经济的转变。接下来的两节将依次考察他们两人的研究成果。

## 5. 《19世纪的俄国工厂》

以上第3节概括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观点，并不只是代表了一种“可能性”。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将使第Ⅰ部类相对于第Ⅱ部类更大一些，并且资本主义经济有产生“比例协调”的趋势，只是由于缺乏使得“比例协调”平稳实现的制度，才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功能失调。但是，这一论断要得到全面证明并不容易，特别是在俄国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此外，他认识到工业的历史演变，比他理论上的设想更为复杂。因此，尽管他对俄国经济的经验研究受到他理论视角的启发，但涉及的范围更为宽广。《19世纪的俄国工厂》首次出版于1898年，<sup>[36]</sup>该著作追溯了自彼得大帝时期开始的俄国工业的整个发展过程，仅在这一点上，就对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研究重点中的诸多内容作了有力驳斥。但是，这部著作的内容超越了19世纪90年代的论战，它到目前仍然是在历史唯物主

义框架下对工业化过程分析的最好的著作之一。<sup>[37]</sup>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主要关注的是要削弱下述观点的基础，这种观点认为，俄国政府在发展工业生产时发挥的作用，赋予工业一种“人为的特征”。他雄辩地证明，发端于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的现代化是生存的必然选择。<sup>[38]</sup>正如我们在以上第八章看到的，普列汉诺夫持有同样的立场，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给这种观点增添了更多的内容，并且更加详细地解释了它的经济特征。他特别强调，这一阶段体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的部分特征是不可避免的。新型生产必须在大规模工厂中进行，以便有效地利用进口技术。<sup>[39]</sup>仅商业资本家就有资源和能力来筹办新工厂。<sup>[40]</sup>由于提供自由劳动力的国内市场并不存在，<sup>[41]</sup>因此，国家有必要进行直接干预，以提供强制劳动。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解释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发展的辩证法将会越来越明显：那些有利于工业增长的措施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债役劳工最初促进了发展，但是，随后又变成了一种障碍。<sup>[42]</sup>雇佣工人日益增加，农奴制改革的压力增大。<sup>[43]</sup>然而，他承认，19世纪60年代解放农奴的运动阻碍了一些大工业的发展。那些严重依赖农奴的工厂不得不做出改变，开始了痛苦而又漫长的——最终证明是有效率的——重组过程<sup>[44]</sup>。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看来，大工业的发展并不是马上就取代小规模的手工业。在许多情况下，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最初局限于工厂的生产，因为需要输入劳工的技术，于是就转向了小生产者，并造成了传统工业活动的复兴。<sup>[45]</sup>此外，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随之增加了供给商的活动，而这些供给商有时是按传统方式组织起来的。但这只是有可能，因为商业资本长期以来已经主导了许多老的工业。<sup>[46]</sup>接着，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指出，机械化破坏了家庭式生产，尽管——正如爱尔福特纲领所表明的——不存在“小规模”生产直接被“大规模”生产所取代的情况。<sup>[47]</sup>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识到，“后发者”的发展模式明显地与英国的模式不同，而民粹主义经济学家则往往把英国作为分析的基准。后发国家的工业化缺乏自发性：国家行为发挥了支配性的作用，非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关系结合在一起，公开的强制补充了市场训诫，技术引进发挥了重要作用。<sup>[48]</sup>同样的，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传统信念相连接；特定类型的阶级利益重新塑造了自由主义。<sup>[49]</sup>即使如此，他强调，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整个俄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市场。<sup>[50]</sup>所以，民粹主义支持的“特殊道路”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实际上所走的道路已经把俄国融入到整个欧洲的经济史中。<sup>[51]</sup>俄国西方化的过程仍在继续，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尽管是借助历史的、特有的方式实现的。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因而成为第一个认识到“后发国家”与英国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的社会主义者，而马克思本人和民粹主义者则把英国提升到典型的地位。此外，正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指出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思想，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基础。不断革命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首先在落后的俄国社会发生，而不是在发达的西欧这个中心发生。与普列汉诺夫和集中关注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列宁不同，托洛茨基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一样，集中研究城市工业。但是，他又与杜冈不同，他根据工业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考察了俄国工业化的“现代性”问题。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工业化形式显著地扩大了俄国无产阶级的规模，同时又使集中在城市的国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人数减至最少。在与国家发生任何冲突时，无产阶级将成为主导的力量；同样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也成为最重要的事情。此外，沙皇时代鼓励工业发展的方法使农业问题恶化，这使得城市革命可以利用农民的支持。正如现在已被广泛认识到的，托洛茨基的理论与任何一个他的竞争对手的理论相比，都更加准确地说明了1917年革命的阶级动力学（参见以下第十二章）。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并没有深入研究托洛茨基基于与《19世纪的俄国工厂》相同的经济视角推导出的这些政治问题。杜冈的观点是直接用来反对民粹主义的，他更加强调俄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将使俄国未来的历史与西欧的历史一致。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相信，俄国融入世界市场，使得民粹主义者偏爱的“特殊道路”已经不可能实现。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但是，在民粹主义在理论上失败之后，他所概括的不同的“特殊道路”具有的革命含义，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奠定了基础（参见以下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 6. 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杜冈的许多观点因列宁著作中的官方的证据而得到加强，但杜冈却从这些官方的证据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列宁这位未来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非常接近于这种观点，并且远离了支配了他自己19世纪80年代的分析的观点。列宁对杜冈的观点进行了改造，从而产生了与杜冈本人的立场完全不同的政治行动。（参见以下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十三章）。这在前面已经有所提及。在与民粹主义论战达到高潮时，列宁仍然坚信他自己的理论愿景，坚持自己的经验证明。他关注的主要是农业经济问题。列宁的主要目标是想从经验上证明“人民生产”中的不平等与小生产者的分化——这两者明显的——都是资

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分化的症状。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可以得到的统计资料远远超过普列汉诺夫15年前可以接触到的统计资料，而且列宁仔细地运用这些资料，对民粹主义经济学发起了猛攻。<sup>[52]</sup>

在本章第5节讨论的列宁理论的本质，为他完成自己的任务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多种衡量指标；作为一个过程，而非终结状态，资本主义可以视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列宁充分地利用这一点证明，不只是使用雇佣工人，有官方证据的专业化和商品化、土地所有者的不平等、生产资料的集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sup>[53]</sup>他并没有宣称农村的小生产者实际上构成了典型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只是说存在非常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转化正在进行。为此，他集中分析了农民家庭而非个人情况的变化。农村的无产阶级主要由贫困的农民家庭构成，那部分无法获得足够的生产资料的农户被迫使他们家庭中的一些成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在另一个极端，富裕的农民家庭不能提供他们自己生产活动中所需的劳动力，而不得不雇佣工人。<sup>[54]</sup>因此，形成了一种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阐述的（英国）方式不同的资本原始积累机制。<sup>[55]</sup>列宁并没有强调这一点，<sup>[56]</sup>他承认，仍存在大量中等农民家庭，他们既不受雇于他人，也不雇佣其他人。然而，他坚持认为，大量的资源被富裕的农民拥有所产生的激烈竞争，将逐渐使农户转变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人民生活”会逐渐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尽管它只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低级阶段。<sup>[57]</sup>

农村的这样的阶级构成，说明了民粹主义的观点为何能够流行。在列宁看来，民粹主义——正确的（即根据马克思主义范畴）可以理解为——只不过是小有产阶级的意识形态。<sup>[58]</sup>它反映了大量农民家庭被边缘化的境况，进一步的经济的发展将使农民家庭进一步衰落。但是，这是危险的，因为它妨碍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并且民粹派推动的改革可能会成功地阻碍更高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列宁并不认为民粹主义是完全反动的。他认识到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对同它对封建主义的敌视是类似的。在俄国，农奴制当然早就废除了，但由于农奴解放的不彻底，许多封建残余保留了下来，结果确实需要一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对农民自愿转让和获得土地与劳动力的能力的制约、劳动租金的长期存在，市民自由权的缺乏，所有这一切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sup>[59]</sup>就民粹主义对这些问题采取的批判性立场而言，它是一种客观的进步力量。因此，同许多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普列汉诺夫）相比，列宁对民粹主义对手的态度显得更加复杂。尽管他赞同，民粹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但他也认识到，民粹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可能是有用的。事实上，这些思考在列宁的思想中注定要发挥更大的

作用。但是，在它们发挥作用之前，列宁已经彻底地修正了他自己有关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我们将在第十一章中考察这一变化。

## 7. 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的经济理论被削弱了，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抨击下，民粹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也同样遭到削弱。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更为优越的思想体系，而且经济发展的主要突破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然而，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正统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严重缺陷。这些缺陷中的一部分，事实上就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而且它们在思想史中一再明显地暴露出来。

“实现”和“国内市场”问题是一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需求是否足以吸纳供给？但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他的俄国追随者，都没有能够准确地使用这些范畴。马克思自己论述的内容是自相矛盾的。他既坚持新古典的需求概念，排除任何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又提出另一个（凯恩斯主义的）需求概念，认为需求不足是长期的。<sup>[60]</sup>在解决这一问题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止步不前。列宁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因而在对《资本论》晦涩的内容引用时，遇到了困难（参见以下第十章）。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识到需要一种需求理论，但他自己的分析甚至连马克思的水平都没有达到。<sup>[61]</sup>因此，他们的理论缺乏坚实的基础。今天，这些理论可以在坚实的逻辑基础（当然，这和他们经验研究的有效性并没有什么联系）上被重建，然而，他们的对手的观点问题更多。<sup>[62]</sup>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予理会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批评，在同民粹主义者的论战中，这种批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非是确凿无疑的。

其实，鉴于沙皇时代工业化的实际历史情况，部分地接受民粹主义分析的精神而不是它的具体内容，还是可能的。19世纪90年代，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是存在矛盾的。扩张所需的资源，并不完全来自国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就像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抽象的再生产模型所描述的那样。它们部分是通过农民经济的榨取以及维持有利于这种榨取的村社制度提供的。这阻碍了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因而也抑制了进一步增加对农村的剥削以继续这一过程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仍不清楚，<sup>[63]</sup>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在此意义上，沙皇时代工业政策的核心部分存在“人为”的因素，民粹主义经济学家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加明确地强调了俄国的特殊性。



对俄国农民和更为一般的农村小生产者的研究，至少为民粹主义的直觉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我们在以上第八章指出，普列汉诺夫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存在两个缺陷：它没有注意到农业领域规模经济的相对缺乏；它忽视了农民可以利用的维持自身地位的手段。19世纪9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重复了这一错误。事实上，列宁的错误比普列汉诺夫的更为严重，因为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等同于市场的发展。此外，再次同普列汉诺夫一样，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真地思考俄国农业领域具体的经济组织，对俄国经济发展和农民分化产生的限制。正如列宁所坚持的那样，村社并不只是其经济基础已完全被商业化破坏了的日趋没落的封建残余。<sup>[64]</sup>它在技术上也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轮作的敞田制要求一个管理机构凌驾于个体农民家庭之上，而且把农民的份地分开也存在巨大的经济上的困难，更不要说，法律方面的约束一直维持到1907年。<sup>[65]</sup>因此，村社根植于当时农业经济的现实，而不只是在过去才如此。

此外，尽管农民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但这些不平等的程度是有限的，并不必然导致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引起农民分化的因素之一与农民家庭的生命周期、他们的再分配程序以及村社的再分配过程有关。<sup>[66]</sup>商品生产的发展，并不总是与这些实践相冲突；它可能推动而非阻碍它们作用的发挥。<sup>[67]</sup>因此，列宁的理论观点和他对经验资料的重构，最轻意义上也是误解了农村可观察到的不平等。<sup>[68]</sup>农民比他认为的更具同质性，并且把它视为小资产阶级阶层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因为这样做，反映了对农民可能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行动的一种过于狭隘的观点。当列宁把俄国农民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描述的法国农民进行比较时，<sup>[69]</sup>他的错误就更为明显。对这一点的具体证明出现在1917-1918年间，村社制度不仅没有被农民革命削弱，而且成为完成革命的一种手段，而且因为革命的成功而得到加强。<sup>[70]</sup>农民既不是一种资产阶级力量，也不是一种无产阶级力量，也不是这些力量的混合物。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范畴中，没有哪一个与它相吻合。

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经济学本质上是符合实际的。显然不是。但是，它的确意味着，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认为的那样，对民粹主义的批评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证明是同一项任务。的确，列宁的分析最容易受到指责。没过多久，他就认识到自己著作中的不足之处，尽管他从没有解释过19世纪90年代他自己的错误的确切性质（参见以下第十一章）。但是，当这十年结束时，他做出改变的可能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正在他试图用官方资料证明农民内部的阶级形成时，俄国马克思主义本身正在经历分化的过程。特别是出现了一个与德国类

似的修正主义派别。为阻止修正主义的不良影响，列宁有关农业经济学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且这很可能进一步导致了他在20世纪初对自己的策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当然，这并非俄国修正主义唯一的、重要的意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种批判，它是值得关注的，更不要说它也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分析层面的洞察力。这将构成下一章的主题。

---

### 第九章注释：

[1] 参见‘Soc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Struggle’ and ‘Our Differences’, in G. Plekhanov,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4) vol. I, pp. 49-352.

[2] F. Engels, ‘Russia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P. W. Blackstock and B. F. Hoselitz(eds) The Russia Menace to Europe (London: Allen & Unwin, 1958)pp.203-215.

[3] O. H. Radkey, ‘The Agrarian Foes of Bolshev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M. Perrie, The Agrarian Policy of the Russia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4] R. Kindersley, The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41.

[5] R. Pipes, Struve: Liberal and the Lef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45.

[6] 参见A. P. 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A. 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F.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0).

[7] V. V. Sud’ by Kapitalizma V. Rossii (St Petersburg: M. Stasjulevic, 1882); Nikolai-on, Ocherki Nashego Poreformennogo Obschestvennogo Khozyaystva(St Petersburg: A. Benke, 1893)

(Vorontsov wrote under the pseudonym ‘V.V’ and Danielson under ‘Nikolai-on’).

[8] A. Reis, ‘Das Capital Comes to Russia’, Slavic Review, 29, 1970, pp.219-37.

[9] 正是这一点，最终使恩格斯的观点接近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2-665页，以及以上第七章。

[10] 进一步的论述, 参见Walicki, and R. Luxembure,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51).卢森堡对沃伦佐夫和丹尼尔逊表示同情的论述,当然是由于他们的理论和她自己的理论存在相似之处(参见以上第6章)。

[11] 另一种合乎逻辑的可能是,丹尼尔逊的经济学可以视为充实了马克思在答复米哈伊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评论进行的评论:参见Blackstock and B. F. Hoselitz, *Russian Menace*, pp.216-18和以上第七章。

[12] Plekhanov, 'Our Differences'.

[13] 比如,参见Kindersley, *The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ipes, Struve and T. H. Von Laue, *Legal Marxism and 'Fate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Review of Politics*, 18, 1956, pp.23-46.

[14] 参见S. Bulgakov, *O Rynkakh pri Kapitalisticheskomo Proizvodstve* (Moscow: M. I. Vodovozovoj, 1897) and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292-8.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章、第21章。

[16] M. I. Tugan-Baranovsky, *Promyshlennye Krizisy v Sovemnoi Angli*(St Petersburg: I. N. Skorokhodova, 1894) 第二版和第三版分别出版于1900和1914年,第二版被翻译为德文*Studi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Jena: Fischer,1901)。第三版被部分译为英文 'Periodic Industrial Cycles',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the Arts and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 pp.745-802.

[17]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方案载于L. M. Kowal, *Economic Doctrines of M. I. Tugan-Baranovsky*(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h.d.,1965)pp.309-20.

[18] 这一主张得到了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贫困化和分配问题持批评态度的人的支持。(见后文第10章)。

[19] 参见Howard and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2nd edn, pp.185-90,和上文第6章。

[20]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pp.230-1. 也可参见以下第10章。

[21] *Ibid*, p.230.

[22]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p.203; 'Periodic Industrial Cycles', p.801.

[23] Tugan-Baranovsky, 'Periodic Industrial Cycles', pp.780-802.

[24] Tugan-Baranovsky, *Promyshlennye*, p.i.

[25] Howard and King, *Political Economy*, pp.181-93.

[26] L. M. Kowal, 'The Market and Business Cycle Theories of M. I. Tugan-

Baranovsky',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Economiche e Commerciale*, 4, 1973, p.314.

[27]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pp.181-93.

[28] 参见列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参见《再论实现论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29] 参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第102-296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297-465页;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对工厂工人罚款的解释》,第25-64页;《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8-9月)》,第235-332页。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562页。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第85-134页。Meek, *Studies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London:Lawrence&Wishart,1973) 2nd edn.

[30] 参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101页。II, p.138;《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11;《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562页。

[31] 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562页。

[32] 参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论所谓市场问题》,第56-101页;《什么是“人民之友”?》,第102-296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297-465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562页。参见《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第9-39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第85-134页。

[33] 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52页。

[34] 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562页。

[35] 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Macmillan, 1985) vol.I, p.69.列宁对斯科沃尔佐夫的答复,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563-585页。

[36] 在1898-1907年间,这部著作出过三个版本。1900年的俄文第二版在同年出过德文版。1917年以来,第三版在俄国重印过4次,这表明了它在学术上的重大影响。此处参考了俄文第三版的英文版(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D. Irwin, 1970)。

[37] 现代经济史学家对此依然印象深刻;比如,参见S. Amato, 'Tuhan[sic]-Barnaovsky's Theories of Markets, Accumul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i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ic Research' in I .S. Koropecy(ed.)*Selected Contributions of Ukrainian Scholars to Economic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pp.1-59.

[38] Tugan-Baranovsky, *Factory*, pp.1-43.

[39] Tugan-Baranovsky, *Factory*, pp.14,204.

[40] *Ibid*, pp.1-43.

[41] *Ibid*, pp.16-20.

[42] *Ibid*, pp.21-2, 62-5.

[43] *Ibid*, chs2-5, 9.

[44] *Ibid*, ch9.46.

[45] *Ibid*, pp.42-3.

[46] *Ibid*, pp.1-43.

[47] *Ibid*, chs7, 12.

[48] *Ibid*, pp.53,279; also see *ibid*, ch12..

[49] *Ibid*, ch8, 13.

[50] *Ibid*, pp.94-5, 257, 268.

[51] *Ibid*, p.277.

[52] 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 64, 68, 146, 155, 249, 298, 309, 406, 416, 457, 543页。也可参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 113-114, 176, 186, 277, 425页。《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评经济浪漫主义》，《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第156, 239, 255页。《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书评：〈俄国工商业〉》，《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 57页。

[53] 参见《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什么是“人民之友”？》，第102-296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297-465页。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第235-332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562页。

[54] 参见《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4页；《评经济浪漫主义》，第102-231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562页。参见《论我国工厂统计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第9-39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第85-134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章。

[56] 参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页。

[57] 参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220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506页。

[58] 参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265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302-465页。参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243页；《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第406-407页。

[59] 参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270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386-465页；参见《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7-383页；《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第451-458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562页。参见《市场理论问题述评》，《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49-50页。

[60] 参见Howard and King, *Political Economy*, pp.210-11, 216-18.

[61] 比较Tugan-Baranovsky, 'Periodic Industrial Cycles', pp.748-9, 765-6, 781, 802.

[62] 参见M. Kalecki, 'The Problem of Effective Demand with Tugan-Baranovsky and Rosa Luxemburg' in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M. C. Howard, *Profits in Economic Thoughts*

(London: Macmillan, 1983) pp.164-77.

[63] 比较A.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19-51; and P.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London: Basford, 1986).

[64] 参见《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8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302-357页。参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3页；《我们拒绝什么遗产？》，第400-401页；参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469页。

[65] G. T. Robinson,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pp.122, 222; Gerschenkron 'Agrarian Policies and Industrialisation Russia 1861-1917,' in H. J. Habakkuk and Post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y History of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Vol.6 pp. 719, 745, 792; A. Hussain and K. Tribe, *Marxism and Agrarian Question*, Volume, I,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Peasantry, 1890-1907*(London: Macmillan ,

1981)pp.47, 88; *ibid*, II, pp.7, 9, 14.

[66] Robinson, *Rural Russia*, ch.12; T.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Political Sociology of Peasantry in a Developing Society: Russia 1910-25*(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67] H. Friedmann, 'World Market, State, and Family Farm: Social Base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in the Era of Wage Labour',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 1978, pp.545-86; H. Friedman, 'Simple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Wage Labour in the American Plains', *The Journal of Peasants Studies*, 6, 1979, pp.71-100.

[68] 列宁的错误,部分可以归因于他无法获得时间序列数据,比如参见《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页。但是,显然他的整个视角也使他不容易认识到这一问题。

[6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578页。参见CW, I, pp.123, 256, 373, 430; 参见《论所谓市场问题》,《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101页;《什么是“人民之友”?》,第102-296;《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297-465页。参见《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3页。参见《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9页;参见《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4卷,第99页。

[70]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D. Atkinson, *The End of the Russia Land Commune 1905-193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arts III-V.

## 第十章 俄国的修正主义

### 1.19世纪9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派别

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崛起过程中，正统派逐渐演化为两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正统派被定义为坚持普列汉诺夫思想体系的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任何主张不仅要应用于新情况，而且不需要作更改或修订。正统派的主要支持者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合法马克思主义”包括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布尔加科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是最为重要的经济理论家。1900年之前，他们接受普列汉诺夫制定的政治方案，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采取了批判的态度。20世纪初，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其他不太重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不仅逐渐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脱离了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转而迎合自由主义、唯心主义和温和派。<sup>[1]</sup>

“经济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修正主义，但是，无论是在起源上还是在试图加以修正的内容上，“经济主义”同“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大相径庭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些和发展中的工人运动很少联系的知识分子，而经济主义者则深深地涉足工人运动。此外，合法马克思主义集中于修正理论而非实践，而经济主义则几乎完全相反。从本质上说，经济主义者们不关心理论问题，而是寻求扩大社会民主党参与经济运动的程度。他们认为，组织罢工、促进工会的形成和赢得国家的法律让步，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活动不仅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而且还可以取代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有时候的确需要求助于德国的修正主义，伯恩斯坦把他们视为自己的支持者。<sup>[2]</sup>

“经济主义”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作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同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工人运动手段之间存在的冲突。经济主义者因其愿意受限于工人运动、追随而非积极领导工人运动而著称。从理论上讲，他们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但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演进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同正统马克思主义冲突的过程，也是“列宁主义”——通常被理解为把阶级同政党联系起来的理论——产生的过程。列宁最著名的著作《怎么办》，就是为了回应经济主义的挑战而撰写的（参见以下第十一章）。<sup>[3]</sup>



基于本章的论题，我们对俄国修正主义的研究仅限于合法马克思主义，因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司徒卢威声称自己提出了国际修正主义涉及的根本问题，<sup>[4]</sup>而且在对正统派的批评中，合法马克思主义比德国修正主义更为深刻。但是，在政治上，俄国的修正主义争论相对来说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件。19世纪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和正统派视民粹主义为它们共同的敌人，它们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团结一致的。此外，在当时，所有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俄国需要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愿意接受经济主义。在1898-1903年，经济主义被正统派视为真正的威胁。到1901年，合法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社会民主党的行列中完全脱离出来，这进一步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不太愿意与他们建立系统的密切联系。当然，正统派对俄国修正主义并没有采取完全沉默的态度，但正统派的反应时而很分散，时而很克制。只是在1900年之后，马克思主义革命阵营中才逐渐出现对修正主义的更为充分的批判。

合法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包括辩证法、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价值理论。尽管后两个方面与政治经济学存在密切的联系，但前两个方面对列宁后来的思想演变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价值理论和危机理论之前，下一节首先讨论前两个方面的理论。如同在民粹主义的争论中一样，这里存在相当大的重复现象。以下，我们只关注最好的理论家提出的精彩观点。

## 2.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1894年，司徒卢威出版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sup>[5]</sup>该著作的初衷是对民粹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式的批评。但事实上，它引起了以上第九章讨论的19世纪90年代的“大论战”。在该著作中，甚至也包含有修正主义的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主题变得越来越突出。<sup>[6]</sup>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有以下三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司徒卢威主张划时代的变迁可能采取进化的方式；对抗性力量可能会相互适应，结果不是矛盾的激化，而是矛盾的“缓和”。<sup>[7]</sup>其次，在批判民粹派时，司徒卢威描绘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不流血的形式。丹尼尔逊只看到资本主义消极的一面，司徒卢威则一直强调它积极的一面。这反映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中的著名结束语上：“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这就给民粹派的指责留下了口实，即至少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对资产阶级秩序进行了辩护。<sup>[8]</sup>再次，在解释农业经济危险的状态时，司徒卢威利

用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吸收了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司徒卢威认为，人口过剩是造成19世纪90年代初发生饥荒的关键因素。<sup>[9]</sup>

普列汉诺夫毫不费力地避开了进化式社会变迁的一般主张。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主张所有的进步都是通过革命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概念是抽象的，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的。此外，司徒卢威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他把矛盾看作是经济关系与一般的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的对抗，但是，正如普列汉诺夫正确地强调的那样，这决不是这种学说的核心。<sup>[10]</sup>因此，正统派领袖对司徒卢威修正主义作出的让步并不比对伯恩施坦作出的多。（参见以上第八章）。<sup>[11]</sup>

列宁也没有公开地做出让步，但在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却体现出对司徒卢威实质批判上的重大让步。<sup>[12]</sup>1905年之后，列宁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他开始接受司徒卢威“缓和了的矛盾”和非革命式发展概念的合理性。列宁把俄国历史解释为“自上而下的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沙皇和占主导地位的地主阶级力图适应那些维护自己生存必需的资产阶级的某些秩序。1905年的事件把资产阶级卷入这一过程；资产阶级在执政联盟中已经初步获得一定的地位，在面临民众的激进主义时，他们变成了彻底的保守派。列宁由此逐渐相信俄国资产阶级的转变，很可能采取了渐进的“普鲁士式”的方式（参见以下第十一章）。实际上，20世纪初，列宁和司徒卢威曾就此问题达成过真正的共识；<sup>[13]</sup>他们的分歧与其说是政治上的，还不如说是分析上的。在司徒卢威的政治立场日益转向右翼，并乐于接受改良时，列宁为了抵制改良，转向了左翼。但是，人们还远没有弄清楚，列宁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地受惠于司徒卢威（参见本章以下第7节）。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私人关系相对密切，并且列宁对司徒卢威从未丧失的知识能力作过高度评价，<sup>[14]</sup>尽管在1900年之后，列宁对他进行了谩骂和攻击。

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上，列宁没有对司徒卢威的分析作出丝毫的让步，他认为后者的分析严重低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代价，是一种“客观主义”而非“唯物主义”<sup>[15]</sup>。在这一点上，恩格斯本人完全赞同。<sup>[16]</sup>更具体地说，列宁相信资本主义矛盾一开始就在起作用。<sup>[17]</sup>这与他倾向于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过程的观点完全一致（参见以上第九章），在这种情况下，他比司徒卢威更接近于丹尼尔逊。并且，列宁在其它方面可能过于“矫枉过正”。他低估了人口增长在引起农民生活条件恶化上的实际上的重要性。<sup>[18]</sup>此外，尽管马克思本人敌视马尔萨斯，<sup>[19]</sup>但还是认为，过多的人口增长可能对封建生产关系有

着天然的影响。<sup>[20]</sup>

### 3. 消费不足和管理资本主义

同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样，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比例失调论是针对民粹主义的（参见以上第九章）。然而，《资本论》中也有消费不足论的线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对消费不足论的批评上并没有放过马克思。像民粹派经济学家一样，马克思被指责为“西斯蒙第主义”<sup>[21]</sup>，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总是不足的，因为工人太穷，以至于不能买回他们生产的全部净产品。这很有可能引致来自正统派的批判性反驳，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在解释经济危机时非常倚重消费不足论（参见以上第四章和第六章）。

正统派的反应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宣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本质上是在反对民粹派观点的合理论述中得出了极端的、不可靠的结论。这一主张（参见以上第九章）中包含的一些内容，是一些种断言而未经证明，而且主要依赖的是对马克思论述的引用，而不是实质性的材料。<sup>[22]</sup>事实上，列宁超越了这一点，指出消费不足可以被解释为比例失调的一种形式，包括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比例失调，因此，他的观点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危机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sup>[23]</sup>但是，列宁的观点不够成熟，因为他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这种特定形式的比例失调比其它形式的比例失调更易于发生。考茨基和后来的布哈林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增添任何新的内容。<sup>[24]</sup>希法亭也是如此。事实上，有迹象表明，他的著作受到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影响。<sup>[25]</sup>罗莎·卢森堡的观点较为深刻，她指责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工作只不过是一种“算术练习”，它无法解释是什么在推动资本主义进行无休止的投资。<sup>[26]</sup>卢森堡所作的批判是以她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的，如同以上第六章中看到的那样，这种资本积累理论缺乏连贯性。（只有依据凯恩斯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够令人信服地阐明，卢森堡基于错误的理论基础的批判中蕴涵着的真理成分。）<sup>[27]</sup>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以上第九章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缺乏的恰恰是分析消费不足问题所需要的一个连贯一致的有效需求理论。

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理论，才出现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曲解。他被指责为是“调和主义者”和倾向于认为管理资本主义具有可能性。<sup>[28]</sup>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文本中，这两种指责都难以成立。事实上，杜冈曾主张，考虑到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分权式的、无政府主义的体制，它不可能消除比例失调，并且将产

生长期的以周期形式表现的经济危机。<sup>[29]</sup>但杜冈并没有尝试用对比例失调的复杂性问题或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功能局限性的详细分析,来证明他自己的结论。此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明确地拒绝接受所有的崩溃理论。<sup>[30]</sup>他不相信比例失调引起的危机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且对其它的崩溃理论进行了批评,特别是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

#### 4. 利润率下降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比例协调论包含着对马克思利润理论的批判。如果资本主义可以完全自动化,并不断地进行积累,那么利润就不可能仅仅来自对工人的剥削。但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没把这一点当回事,他实际的批判集中在利润率下降规律上。在这一问题上,他是最早宣称马克思的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的学者之一。<sup>[31]</sup>他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减少了工人阶级的必要劳动时间量。如果实际工资没有提高,这将使得剥削率的增加足以提高利润率(或至少保持不变)。<sup>[32]</sup>他假设,技术进步包括了不变资本对直接劳动的替代。不变资本的价值等于或小于它替代的劳动力的价值,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坚持认为,“基于这些假设,新的技术条件下的生产量不可能下降,要不然的话,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就没有任何经济意义”。<sup>[33]</sup>他的结论是,利润率要么不变,要么上升。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分析存在一些不足,但他的整个观点是合理的。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对剩余价值率上升起“反作用的各种趋势”,这一点正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一定程度上所提示的那样,但马克思显然不认为这会破坏他整个理论的结构。<sup>[34]</sup>这可能构成了列宁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做出如下评价的基础,列宁认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只是随意地进行修改……以便反驳马克思”,整个程序是“极为愚蠢和荒谬的”。<sup>[35]</sup>此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判没有认识到马克思观点的复杂性,马克思是在分析存在多种商品经济背景下的问题,创新既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又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因此在初始价格下创新才是有利可图的;只有在所有的资本家完全采用新技术时,新的价格才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的逻辑结构,局限于单一商品生产的世界,生产过程包含了生产自身和劳动力生产(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有时候他也使用三部门模型,但是,在他的模型中,资本有机构成是始终不变

的)。<sup>[36]</sup>因此,相对价格是无法改变的(假设工资不变的话),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没有正视马克思的分析。然而,要证明一个假定的一般规律无效,只需要一个反例就行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提出这样的“特殊案例”对马克思进行反驳。他的见解是有力的——这已被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著名的“置盐定理”所证明,“置盐定理”指出,只要实际工资保持不变,成本节约型的创新确实会提高利润率。<sup>[37]</sup>

但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对正统派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直到1929年亨里克·格罗斯曼出版《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和崩溃》时,利润率下降规律才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发挥重要作用(参见以下第十六章)。<sup>[38]</sup>但是,提出沿着这一思路发展下去将会是死胡同的观点的先驱者,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莫属。他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演化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这种观点强化了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存在崩溃趋势的信念。正因为如此,杜冈才主张社会主义需要一个非经济的基础,这样,他预见到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参见本章以下第7节)。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其他一些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都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的成熟包含着实际工资的提高。像伯恩施坦和德国的修正主义者一样,他们相信“贫困化”仅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一旦资本主义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建立起来,就会出现工资上升的趋势。<sup>[39]</sup>当然,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实际工资确实提高了。但是,历史事实并不能替代分析性的解释,而他们恰恰没有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分析性的解释。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好不到哪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解释说,马克思主张贫困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并且极力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统计数据与这种主张是相一致的。<sup>[40]</sup>一般说来,这与马克思论述贫困化时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即贫困化是一个相对份额的问题,当然,这与修正主义的观点并不冲突。<sup>[41]</sup>问题是,考虑到马克思的逐渐扩大的失业后备军的理论和工会只具有有限能力的观点,<sup>[42]</sup>并没有理论能够证明贫困为什么不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无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都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工资理论。

## 5. 价值和分配理论

俄国修正主义者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严厉批判。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布尔加科夫都发现《资本论》第三卷中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在

那里实际上是把利润率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非内生变量。如布尔加科夫提出的:

即使经济中的总价格恰好与总价值相一致,也不意味着价值是由劳动、利润是由剩余价值决定的……如果不能证明在单个情况下利润由剩余价值构成,那么用总剩余价值除以总资本定义平均利润率就很奇怪了……这完全是以待决之问题为论据,尽管它是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sup>[43]</sup>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的马克思价值概念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在于,“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值是对象化的劳动。但是,正如马克思明确地承认的那样,价格不等于劳动价值。劳动如果不在价格中体现的话,就不可能把自身对象化为任何东西。因此,价值不是对象化的劳动。”结果,“马克思生活在一个与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虚幻的世界中。诸如土地价格之类的真实现象,被描述为想象的产物,而完全虚幻的概念,如在交换关系中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交换价值,却被当作经济学的最高智慧。”<sup>[44]</sup>

然而,在他们自己的价值分析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精微而复杂,他利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区分了三种形式的劳动价值论,他反对的只是把劳动定义为价值实质的“绝对”形式的劳动价值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可了阿奎那和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他们的理论中,物化劳动成为一种伦理标准和公平价格的基础;他也认可了李嘉图的“相对”的劳动价值论,这种理论认为劳动是决定价值的两个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生产过程的长短)。他附和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的劳动的负效用和拉斯金、霍布森的人本经济学,把劳动定义为“绝对成本”的基础,因为人是唯一的经济活动的主体。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资本家只认识到“金钱成本”或“相对成本”,因而忽视了人作为目的自身与作为实现其它目的的手段之间的区别。其必然后果就是商品拜物教,即认为人类的属性是由无意识的客体决定的一种意识状态。<sup>[45]</sup>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相信,要构建一个令人满意的价值理论,客观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必须辅之以主观效用价值论。既然实际的经济生活有主观的和客观的方面,那么价值理论也就必须有两个维度。经济行为既包含了(主观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也包含了(客观的)外部世界的变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李嘉图至少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假定了最大化行为的存在,只是没有确切地阐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然而,这一规律完善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而不是在效用价

值论要求存在由劳动成本提供客观要素的严格意义上与之相矛盾。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推论说，（对每一对商品来说，）均衡要求它们的边际效用的比率等于他们的劳动成本的比率。劳动并不是如马克思所坚持的那样，是价值的实质，而是大多数商品平均价格最重要的决定因素。<sup>[46]</sup>

提出这种类似的综合方案的，还有保守的德国人米尔普福特和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老前辈马歇尔（是用迥然不同的形式来表述的），近来还有雷弗·约翰森和森岛通夫。<sup>[47]</sup>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来说，这是一条充满意想不到的困难的道路，而且布哈林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他们。布哈林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建立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自由主义概念基础之上，这与马克思主义是不一致的。这种概念不可能只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内容，而不损害马克思主义整体的连贯性。<sup>[48]</sup>这种观点因新古典式的批评而得以强化，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单效用理论就足够了，不需要客观主义者提供的成本理论。效用即是需求也是供给的基础。<sup>[49]</sup>此外，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产生最重要的影响的奥地利新古典主义，恰恰是一种主观主义形式的理论，而这种理论与杜冈自己的积累理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从资本设备对消费品生产做出的贡献上寻找商品价值的根源。从而积累依赖于消费需求，正如布哈林指出的，这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分析再生产时的立场相矛盾。<sup>[50]</sup>此外，布哈林也可能已经注意到——假如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杜冈一样犯糊涂的话——新古典主义的需求概念，排除了消费不足的可能性，而这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sup>[51]</sup>

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效用理论和劳动成本相统一的探索中，还存在着其它的缺陷。尽管他认识到不同的资本密集程度意味着劳动价值的比率不可能等于均衡价格的比率，但他并没有把这种思考纳入劳动价值与边际效用相联系的方程中。此外，他拒绝了马克思本人的价值概念，但是，又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去证明为什么还要保留源于它的其他概念。相反，他坚持的是一种定义不清的折中主义，搅乱了在系统阐述经济理论时要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区分开来这一真正的问题。<sup>[52]</sup>

在分配问题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接近于马克思而不是新古典主义。他拒绝接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因为利润还受到生产中使用的不变资本量的影响，而不只是受可变资本的影响——这种判断源自他对利润率下降的批评。<sup>[53]</sup>但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保留了剩余劳动的概念，因为他正确地注意到，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它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无需证明”，<sup>[54]</sup>而且从逻辑上看，剩余价值独立于任何价值理论。他把分配问题视为解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劳动的

受益者是谁，以及获得了多大的数量的问题。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严厉地（也是合理地）批评了新古典主义的生产率理论和“节欲”利润理论。同马克思一样，他把地租和利润解释为特定的阶级社会的范畴，而不是土地和资本的生产率发展的必然（非历史的）结果。与马克思不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剥削理论具有明显的伦理本质：非生产者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是不道德的，因为它违背了人类平等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这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显示出他受到康德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或“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杜冈认为，这些社会主义理论在某些方面甚至比马克思本人的社会主义理论更“科学”。<sup>[55]</sup>

狭义上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分配理论并不成熟。他呼吁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生产率分析，因为两者都包含真理的成分，并且支持那种认为资本家通常会在讨价还价中获胜的工资理论。<sup>[56]</sup>所有这一切，连同他的价值理论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折中，并且杜冈对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是相互独立的这种观点的坚持，很难和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高度整合的体系——一个部门的变化必然引发广泛的反应——这一事实的强调相调和。<sup>[57]</sup>然而，今天，人们可能明白，他也许正在尝试提出后来被斯拉法严格地加以阐述的观点，即分配数量的决定在逻辑上先于商品价格的决定。<sup>[58]</sup>

## 6. 农业经济学

如果俄国的修正主义者可以宣称自己在经济思想的许多分支上具有原创性的贡献，那么在农业问题上他们则严重地依赖于德国人。对俄国的正统派而言，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沙皇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欠发达的本质和民粹主义的重视，都把农业问题推到了最突出的位置。自然，鉴于在这一领域的突出地位，列宁是反对修正主义的主角，但是，在这样做时，列宁与修正主义者批评家一样，严重地依赖于德国的资料，尤其是考茨基的《土地问题》。<sup>[59]</sup>

德国的修正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大规模农业在经济上具有优越性的信条是错误的，农民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能够存活下来，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做出让步，以确保农民在政治上对他们的支持。<sup>[60]</sup>考茨基成功地抵制了纲领上的变化，在《土地问题》中寻求从理论上对修正主义者的反击。但是，他是通过对迄今为止仍然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粗糙的观点的修改来达到这一点的，并且承认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截然不同。考茨基认识到，农业领域的无产阶级化通常是复杂的，工人保留了少量把他们束缚于土地上的份地。农民可能通过“劳动



过度”和“消费不足”来抵制资本主义农业的侵蚀（换言之，他们将比产业工人劳动更加努力而消费得更少）。

列宁运用《土地问题》来反对布尔加科夫对农业经济学的修正主义分析，这种分析只不过是德国修正主义者的观点的重新表述。<sup>[61]</sup>在这样做时，列宁的观点进一步偏离了马克思本人对原始积累的分析。列宁有关农民家庭而不是个体分化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把这个观点同“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的机制都能够使农民抵制无产阶级化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了。然而，他借助这些因素支持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它们具有一般性：俄国的农业与西欧的几乎没有不同。列宁使用考茨基反对修正主义的观点强调他对民粹主义的批评。而且不像考茨基那样只满足于理论上的反击，列宁随后调整了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以便使修正主义者注意到的农业生产特殊性造成的影响趋于最小化（参见以下第十一章）。

## 7. 俄国修正主义的重要意义

人们严重地低估了俄国修正主义的变种——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最常见的错误是，把合法马克思主义只看作是著名的德国修正主义的分支。尽管没有对这两个修正主义派别的理论联系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但明显的是，俄国的修正主义绝非德国修正主义的翻版。语言的障碍是一个方面，因为俄国人都读德语，而德国人似乎并不理解俄语。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思想的传播是从西方到东方的。然而，早在19世纪90年代，当伯恩斯坦还是一个忠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时，<sup>[62]</sup>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修正主义已经相当成熟。很可能，这两支异端是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只是沿着相似的线路前行而已，都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和新思潮（包括“新古典”自由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挑战的反应。1900年之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作的德文译本出版，德国理论家可以看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德国理论家确实是认真地对待他的。在修正主义者当中，伯恩斯坦赞扬杜冈引入伦理问题，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冷漠的历史主义注入了生活的气息”，并把康德而不是黑格尔置于他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同时他也批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废弃剩余价值理论上的无力。<sup>[63]</sup>对正统派而言，卡尔·考茨基详尽地批评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主要著作，认为即使杜冈与德国修正主义者都是错误的（在归根结底的含义上），他仍然是一位比德国修正主义者更为优秀的理论家。<sup>[64]</sup>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和他的

社会主义杂志也出现了类似的严厉批判杜冈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康拉德·施米特、奥托·鲍威尔、安东·潘涅库克、路易斯·鲍丁等。<sup>[65]</sup>

考茨基的评价本质上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走得足够远。俄国修正主义者对正统派的批判，通常比对德国修正主义者的批判更为深刻，并且只是到20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者才认识到俄国修正主义者揭露出来的许多分析性的问题。此外，俄国修正主义从一开始就对俄国正统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正如我们在这一章的第2节表明的那样，1905年之后，司徒卢威批判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提出的核心观点，在列宁的政治经济学中找到了自己的新的位置，与此同时，根据布尔加科夫对农业经济学的批判，列宁似乎修改了他的布尔什维克土地纲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更加重要。他的比例失调论为马克思主义对民粹派的停滞理论进行反驳，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在隔了一代人之后，在分析层面支持了苏联经济学家的观点，即认为通过限制消费增长而不是通过消费导致的增长来加速工业化。布哈林谴责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后来斯大林的“应用杜冈主义”，并不是没有道理（参见以下第十五章）。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经济分析，对理解俄国革命过程的动态学也是至关重要的。他在俄国历史分析中强调的那些属性，被托洛茨基作为自己“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正是这一理论被证明最具先见之明地预测了1917年的事件（参见以上第九章和以下第十二章）。

所有这一切，很少被人们认识到。俄国的修正主义最多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批判者，而没有认识到它对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产生的影响。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正如我们在这一章第1节所指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发生的修正主义争论不那么重要，因为民粹主义被视为他们共同的敌人；其次，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退出社会民主党，意味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承认修正主义者对自己有任何的影响。如果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在向正统马克思主义中自己的对手提供弹药。因此，1905年之后，列宁用资产阶级转型的“普鲁士”模式对俄国现代化进行的讨论，与司徒卢威的讨论实际上是相同的。但是，在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司徒卢威是不受欢迎的人。很自然的，当孟什维克的评论家质疑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经济学时，列宁无意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理由。因为这一点，是不可能从文本上去证明俄国修正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的。然而，即使这种影响真的不存在，但主要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至关重要的观点被俄国修正主义者预见到，却是一个事实。

正是因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正统派的决裂，加之他们的思想没有被正统派明确地认可，人们就会假设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无足轻重的。这是

一个错误，这种错误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确实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断绝了关系，在他不再是社会主义者时，也没有追随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仍然严厉地批判资本主义，而且正是他的经济理论和他的新康德主义一起，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sup>[66]</sup>正如在第九章中所指出的，他相信“用更多的机器生产更多的机器”与人类价值并不相容。然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把它作为对资本主义必然本质的表述，因此他强调了在马克思那里可以找到的异化和拜物教的主题，而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贬低、或者完全忽视了这一主题。谴责资本主义，不是因为它行将崩溃，而是因为它违背人性。如果资本主义将来会被取代的话，其逻辑依据必然是伦理方面的，完成这种取代的手段只能是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的行动。“人类将不会把它视为盲目的、自然的经济力量带来的礼物而接受社会主义。人类必须为实现这一新的社会秩序而有意识地工作和奋斗。”社会主义不再是“科学的”；它的基础是一种新形式的乌托邦，但是，这种乌托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已有所体现。<sup>[67]</sup>

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与同时代德国的修正主义相比成果更为丰硕的观点，因为后者总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发展的必然终点。在20世纪下半叶，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类似的思想，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sup>[68]</sup>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都拒绝接受政治经济学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而坚持上层建筑分析。社会哲学、认识论和美学来到舞台的中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青年马克思”，而不是支配了第二国际的思想的“成熟马克思”，成为灵感的主要来源。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可以理所当然地宣布他自己开辟了这条道路，即使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此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点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与列宁分享了共同的立场。尽管是经济分析方面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意识理论和政党组织理论将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中的唯意志论因素发挥到了极致。1917年革命后不久，它开始被视为“列宁主义”的真正本质，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影响，引起了对1914年之前正统理解的否定。

## 第十章注释：

\*参考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选》（莫斯科：Progress Publishers, 1974-81）的，简写为SPW加上卷数；

[1] 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R. Kindersley, *The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vol.2, pp.362-73. R.Pipes, *Struve: Liberal and the Left*(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A.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G.Fischer, *Russian Liber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2] J. Frankel, *Vladimir Akimov on the Dilemmas of Russian Marxism, 1895-190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42.对经济主义更一般的说明可参见N.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London: Macmillan, 1977)vol.I,ch.6. 也可参见R. Larsson, *Theories of Revolution*(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1970), pp.177-95.

[3] 参见《怎么办? 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3页。

[4] 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112, 204; Pipes, *Struve*, p.107.

[5] P. B. Struve: *Kriticheskie Zametki k Voprosu ob Ekonmicheskoi Razvitiu Rossii* (St Petersburg: I. Skorochodov, 1984).

[6] 实际上,在司徒卢威的早期著作中可以看到他的修正主义思想。参见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47,124.

[7] P. B. Struve, 'Die Marxsche Theorie der Sozialen Entwicklung: ein Kritischer Versuch',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XIV, 1899, pp.658-704; 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131-4.

[8] A.Walicki, *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72ff.; G. Plekhanov, *SPW*, II, pp.477ff.

[9] 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176.

[10] G. Plekhanov, 'A Critique of Our Critics' in *SPW*, II, pp.474-595.

[11] 普列汉诺夫也批评了司徒卢威的康德主义,并且他还把辩证唯物主义描述为“不可攻克的堡垒”。*SPW*, II, p.317.

[12] 在某种意义上,普列汉诺夫与孟什维克人也是如此;参见以上第八章第4节和以下第十一章。

[13]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本司徒卢威的传记中明显地看出来。Pipes, *Struve: Liberal on the Left, 1870-1905*(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and *Struve: Liberal on the Right, 1905-1944*(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尽管Pipes并没有指出其相似之处。但是像其他评论家一样,Pipes似乎被描述同一过程的不同语言和

司徒卢威与列宁相反的政治立场误导了。

[14] E. M. Hill and D. Mudie(eds.) *Lenin Correspondence*(Westport, Conn.:Hyperion Press, 1973), p.91.

[15]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7, 362页。《再论实现论问题》，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16]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92年9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4-636页。

[17] 《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什么是‘人民之友’？》，第140-141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362, 369, 442-443页；《评经济浪漫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156, 183-184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2页。《谈谈罢工》，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

[18] P.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1850-1917* (London: Basford, 1986), pp.48-97.

[19] R. L. Meek (ed.) *Marx and Engels on Malthu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4).

[20] 参见R.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70, 1976, p.30-75; Anderson, *Passage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Verso, 1974) pp182-209.

[21]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Jena: Fischer, 1901) p.203; L. M. Kowal, 'The Market and Business Cycle Theories of M. I. Tugan-Baranovsky',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Economiche e Commerciali*, 4, 1973, p.308; S. Amato, 'Tugan[ sic ] Baranovsky's Theories of Market, Accumulation and Industrialisation' in I.S. Koropecykj(ed.) *Selected Contributions of Ukrainian Scholars to Econom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5-16.

[22] 《什么是“人民之友”？》，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157页；《评经济浪漫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5, 36页；《书评：亚·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23] 类似的解释30年后在Natalie Moszkowska的著作中再度出现。

[24] K. Kautsky, 'Krisentheorien', *Die Neue Zeit*, XX, 1901-2, p.107; N.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Accumulation of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25] R.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pp.243, 285,420,421.

[26] R.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1). Also see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An Anti-Crit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27] M.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46-55. 也可参见J. Robinson, 'Introduction' in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ism*, pp.13-28; and P.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ch: X.

[28]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ism*, pp.311-26; see also Chapter 16, section II, below.

[29] 对杜冈的周期理论的英文说明参见他的 'Periodic Industrial Crises',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 pp.745-802.

[30]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pp.230-1 and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Leipzig: Dunker & Humblot, 1905) ch.9.

[31] 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同时提出这一点的是B. Croce, 'A Critique of the Marxian Law of the Fall in the Rate of Profit', in Cro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Karl Marx* (London: Cass, 1966; 文章最初发表于1899年)。

[32] *Studien*, ch.7: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pp.174-85.

[33]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p.212.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十四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十四章。Howard and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 2nd edn, pp.200-5.

[35] Hill and Mudie, *Letters of Lenin*, p.86.

[36] 参见P. Garegnani, 'Heterogeneous Capital,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ory of Distribu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37, 1970, pp.407-36.

[37] N. Okishion, 'A Mathematical Note on Marxian Theorem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91, 1963, pp.287-98; K. Shibata柴田敬预见到了置盐的观点, K. Shibata, 'On the Law of Decline in the Rate of Profit',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July 1934, pp.61-75 and 'On the General Profit Rate', *ibid*,

January 1939, pp. 40-66;这种观点以一种不那么严格的方式被Moszkowska预见到了, N. Moszkowska, *Das Marxsche System: ein Beitrag zu Dessen Aufbau*(Berlin: Verlag Hans Robert Engelmann, 1929)ch.II, 两者都要归功于L.von . Bortkiewicz, '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2, pp.36-51, (第一版用德语发表于1907年)。

[38] H. Grossma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 (Leipzig:C. L.Hirschfeld,1929,reprinted in 1907, Verlag Neue Kritik, Frankfurt am Main).

[39] M. I. Tugan-Baranovsky, *The Russia Factory in the Nineteen Century* (Homewood, Illinois: Irwin, 1970) pp.251-2; cf. Chapter 4 above.

[40]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0-431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134页；《书评 卡尔·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判〉》，第175-185页，《我们党的纲领草案》，第186-208页；《谈谈罢工》，第251-260。

[41] R. L. Meek, *Econo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Chapman &Hall, 1967) pp. 113-28.

[42] Howard and King, *Political Economy*, pp.119-23, 197-9.

[43] S. N. Bulgakov, "Trety tom 'Kapitala' k. Marksa", *Russkaya Mysl*, 3, 1895, p.12, 转引自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157-8.这里有一个说明列宁担心。《书评 卡尔·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判〉》，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

[44]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pp.140, 142; cf. *ibid.* pp.166-74.

[45] *Ibid*, pp.133-54.

[46] M. Tugan-Baranovsky, 'Subjektivismus und Objektivismus in der Wertlehr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2, 1906, pp.557-64 ;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pp.154-65. 新古典马克思主义对其他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见 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157-8.pp.154-72.

[47] 参见上文第3章第4部分; 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890) Appendix I; L. Johansen,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Marginal Utilities', *Economics of Planning*, 3, 1963, pp.89-103; M. Morishima, *Marx's Economics: An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ch.4.

[48] N. Bukharin, 'M. I. Tugan-Baranovsky's Theory of value' i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p.169-72. 在反击庞巴维克时, 希法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参见以上第三章)。

[49] V. P. Timoshenko, 'M. I. Tugan-Baranovsky and Western European Economic Thought'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the Arts and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 pp.803-23.

[50] Bukharin, *Imperialism*, pp.218-19. see M. C. Howard, 'Austrian Capital Theory: An Evaluation in terms of Piero Sraffa's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Metroeconomica*, 32, 1980, pp.1-23.

[51] 参见 M. C. Howard, *Profits in Economic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83) pp.164-77.

[52] Howard, *Profits*, pp.143-4, 153-5.

[53] *Studien*, p.225;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pp.186-8.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把这视为商品拜物教的另一种形式。

[54]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p.190.

[55] *Ibid*, pp.190-206; *Modern Socialism*, pp.vi, 14, 57-62.

[56]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pp.202-3.

[57] Tugan-Baranovsky, *Modern Socialism*, pp.57-62; D. Ricardo,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edited by P. Sraff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2) vol. VIII, p.194; Tugan-Baranovsky, 'Periodic Industrial Crises'.

[58] P. Sraffa's,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59] K. Kautsky, *Die Agrarfrage* (Stuttgart: Dietz, 1899).

[60] A. Hussain and K. Tribe, *Marxism and Agrarian Question*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81) vol.1; see also Chapter 4 above.

[61] 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172-5.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 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85-134页。《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9章, 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84-199页。《对欧洲和俄国的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参见《列宁全集》第56卷, 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19-35页;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后3章, 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200-244页。

[62] 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112, 204; Pipes, *Struve*, vol.I, p.107;



L. I. Kowal, 'Economic Doctrines of M.I. Tugan-Baranovsky'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65) ch.IV.

[63] E. Bernstein, 'Tugan-Baranovsky's Marx-Kritik', *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 Hefte für Geschichte, Urkunde und Bibliographie des Sozialismus, 5, 1905, pp.418-21; Bernstein, 'Tugan-Baranovsky als Sozialist',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8, 1909, pp.786-96.

[64] K. Kautsky, 'Krisentheorien', *Die Neue Zeit*, 20, 1901-2, pp.37-47, 76-81, 110-18 and 133-43; Kautsky, *Verelendung und Zusammenbruch: die Neueste Phase des Revisionismus*', *Die Neue Zeit*, 26, 1907, pp.540-51 and 607-12; see also Chapter 4, section III, above.

[65] C. Schmidt, 'Zur Theorie Handelkrisen und der Überproduktion',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9, 1901, pp.669-882; O. Bauer, 'Mathematische Formeln Gegen Tugan-Baranovsky', *Die Neue Zeit*, 26, 1907, pp.524-35, 557-67 and 603-10; A. Pannekoek, 'Herrn Tugan-Baranovsky's Marx-Kritik', *Die Neue Zeit*, 28, 1910, pp.772-83.

[66]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pp.228-31. 关于新康德主义的讨论参见以上第四章。

[67] Tugan-Baranovsky,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pp.236-9; see also *Modern Socialism*.

[68] P.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vol.3; 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London: Macmillan, 1979); J. G. Merquior, *Western Marxism* (London: Paladin, 1986).

## 第十一章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1905—1914

### 1. 列宁经济思想的分期

1900年以前，原创性并不是列宁政治经济学的特征。正如我们在以上第九章看到的，列宁政治经济学中显然存在某些新特征，但整个理论框架则是由普列汉诺夫提供的。同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形成的经济理论，主要建立在其他人著作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希法亭和布哈林的著作（参见以下第十三章）。这后一阶段，列宁的思想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它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这两个阶段之间，列宁创造了新的富有想象力的政治经济学，它为理解整个俄国历史发展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观点。此外，这一阶段的许多主题，对理解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的作为至关重要，尽管写于1916年的《帝国主义论》的论题，<sup>[1]</sup>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同孟什维克决裂之后，列宁开始了他第二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最初，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认识到经济问题是导致他们分裂的根源。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sup>[2]</sup>列宁得出了并不被其他理论家认同的结论。特别是他坚持的沙皇时代的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观点<sup>[3]</sup>，在起草党的纲领时引起一些争议。<sup>[4]</sup>然而，这一论题只被看作是论述问题的着重点上的差异，当然，列宁不会寻求同普列汉诺夫的策略的彻底决裂：尽管资本主义在俄国占据主导地位，但资本主义关系仍然十分落后，两阶段革命论的适用性仍然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直到1917年初，列宁并没有打算放弃这一“算术学”。<sup>[5]</sup>1903—1904年，对他（和其他人）来说，同孟什维克决裂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不清晰的。他的解释集中在先前的“经济派”在党内已经获得稳固的地位，造成了对《怎么办》中作出概述的党的组织方案的抵制<sup>[6]</sup>，而这一点曾被所有的火星派接受。<sup>[7]</sup>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无论是列宁本人的立场，还是他对孟什维克坚持的立场的解释，显然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无论是《怎么办》中的理论内容，还是对机会主义的说明，都缺乏唯物主义的基础，直到1905年，列宁才填补了这一空白。通过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考察，可以最好地理解列宁是怎么逐渐做到这一点的。

## 2.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纲领

一开始，俄国社会民主党认识到，如果能够获得农民的支持，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将得到极大的帮助，而且成功的革命将包括农业关系的变化，这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sup>[8]</sup>然而，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土地纲领中的措辞大多仍然是一些一般性的术语，不存在对什么样的具体经济措施最能促进俄国农业现代化的分析，也不存在对前资本主义关系为何能够存活下来的分析。党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指向，把农民的不满引导到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上。只是随着列宁对农业的分析，这方面的具体政策才开始形成。

列宁的具体政策完成于1899年，主要围绕所谓的“割地”展开的。<sup>[9]</sup>这一指向除了要求废除地主，设计了其他一些旨在创造新的资产阶级秩序的措施之外，还包括了一些具体的经济方面的要求，即没收地主的割地重新分配给农民。19世纪90年代，列宁对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为这一主张提供了依据。他的研究把封建生产关系的保留上溯至这一事实：1861年农奴解放法案剥夺了农民的一部分份地，并把它们分给地主以弥补领主权利的丧失。这些“割地”意味着小农经济行不通。为了生存，农民被迫进入这些被没收的土地，这反过来又导致为地主提供劳动服务和履行其它从本质上看具有封建属性的义务。因此，要消除旧秩序的残余，主要地可以通过把割地还给农民来实现，因为它会破坏旧秩序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这一政策可以满足农民渴望土地的要求，因而能够获得农民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支持。<sup>[10]</sup>

显然，这一纲领存在严重的错误，至少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1905和1917年，农民完全获得了土地，他们并没有把行动仅限于部分的没收上。考虑到这一点，“割地”方案具有极强的人为特征。<sup>[11]</sup>然而，这种政策，明显地是从列宁的经济分析中得出的，并且也与其它的社会民主党成员的思想相符合。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有些原因使他们很难证明全面夺取土地是合理的。这毕竟是革命的民粹主义者的政策，并且普列汉诺夫强调，在反对民粹主义时要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纯洁性，人们广泛认同这一观点。当时，人们也相信，等同于农场的大规模农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和这些观点交织在一起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对俄国农民的落后和野蛮的恐惧（参见以上第八章）。在经济分析层面，列宁指出了农民内部存在的分化，而且通常认为这种分化限制了农村的阶级斗争。人们相信，农民资产阶级从不可能全力以赴地向土地所有权发起攻击，他们只热衷于支持那些消除前资本主义剥削的措施。<sup>[12]</sup>因此，有强有力的理论证据表明，

应当把土地纲领仅限于割地。

1902年开始的农村骚乱，使得这一政策的实施遇到了更为严重的阻力。1905年之后，党的两翼都放弃了这一政策。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全面的没收土地的政策（尽管他们的政策截然不同）。然而，只有布尔什维克提供了对这一变化的经济基础的说明。1905年以后，列宁的政治思想并不是原创性的；在他之前，许多人已经提到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结盟。<sup>[13]</sup>但是，只有列宁提供了成熟的经济理论支撑这一策略，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如他的经济分析构成了割地的土地纲领的基础一样，他独自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为政策的变化，再一次提供了理论支撑。相比之下，孟什维克只是基于纯粹的政治目的改变了他们的政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孟什维克的观点是肤浅的，尽管他们自称为正统，布尔什维克才更接近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坚持。

列宁在19世纪90年代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做的分析显然需要修改，而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相比，他可能是最适合做这件事的人。列宁的优势不仅在于他广博的农业知识，而且还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俄国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本质。一开始，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就对自由主义表露出极其罕见的批判立场。从情感方面来说，这源自他痛苦的个人经历，<sup>[14]</sup>但是，他的立场又被如下认识强化了：他认为俄国革命所需要的激进的本质，很可能会远离资产阶级的支持。这在19世纪90年代引起了他与普列汉诺夫及其支持者的摩擦，这一摩擦最终因列宁对自由主义者的贬损变得温和而得以解决。<sup>[15]</sup>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列宁真正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因此，在同孟什维克决裂之后，在修改他自己关于革命的经济理论时，列宁不再有所顾虑，在赋予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实际性作用方面，他受到的压力也更小了。

此外，列宁作为著名的农业方面专家，反对修正主义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规律”不适用于农业部门的观点的任务，也落在了他的肩上。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做出任何明显的让步，而是像考茨基那样，提出了说明了农业部门的小生产者比工业部门的小生产者更容易生存下来的理由。从而，列宁对能够从制度上加强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的重要性特别敏锐（参见以上第十章）。

这两件事被证明是有联系的。第一件事促使列宁思考如何创造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盟友的资产阶级秩序。社会民主党手中掌握的革命性的国家权力，可以通过土地的国有化为第二个问题提供解决办法。但是，这两个因素只是整个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的和独特的视角的一部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被认为包含着这两种在部分上互补、但在本质上却存在着深刻冲突的趋势。

### 3. 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经济学

1905年，农民的激进主义证实了列宁的疑虑，即他的政治经济学存在严重的缺陷。他逐渐认识到，他先前的著作不仅低估了农业中封建残余的力量，而且对它们经济基础的说明也存在问题。他现在主张，不能从割地的角度，而应当从地主经济本质的角度理解这一经济基础。<sup>[16]</sup>因此，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只限于对地产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而是需要对整个地主阶级的剥夺。<sup>[17]</sup>只有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农业资本主义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而且社会民主党只有毫无保留地支持农民夺取土地，农村小生产者才能成为无产阶级获取领导权时的同盟。<sup>[18]</sup>

但是，列宁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富于活力的农业资本主义与垂死挣扎的封建主义之间的简单冲突——事情更为复杂。如他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表明的，无论是地主经济还是农民经济，都正在日益资本主义化，<sup>[19]</sup>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推翻自己的观点。相反，他主张地主的现代化程度被高估了，它更重要的是代表了资产阶级转型中的一种特殊类型，这一点在他1899年的著作中并没有被揭示出来，只是在部分程度上有所说明。地主的资本主义化只是“自上而下的重建”的一个特征，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沙皇和占主导地位的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秩序的某些因素相妥协。旧体制的重要特征被保留了下来，因为正是旧体制自己的力量领导了这一变迁过程。特别是因为，从经济层面上看，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半封建关系主要决定于后者，因而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限制。<sup>[20]</sup>因此，广泛而又深刻的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要求农民革命反对沙皇政府推动的现代化，根据列宁的观点，农民革命客观的经济内容，可以被看作是努力建设更为完善的资产阶级秩序的合力之一。<sup>[21]</sup>

1905年的革命，使列宁能够对城市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在这两种对抗形式的资产阶级转型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说明。十月党人和士官生的妥协行为，证实了列宁此前对自由主义分子的疑虑，说明资产阶级自身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革命过程中的行动者：<sup>[22]</sup>资产阶级寻求的是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沙皇政府的妥协，而非推翻它们。资产阶级对人民革命的支持，只不过是增强它在既定的统治阶层内部拥有更多权力的一种手段。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凸显了资产阶级的保守性。<sup>[23]</sup>农民革命强化了这一点，因为通过土地购买，资产阶级已经“地主化”了，这如同地主阶级变成了工业资本家一样。<sup>[24]</sup>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资产阶级成为激进革命的敌人，证明1905年革命缓和了中产阶级与封建上层建筑之间的摩擦。<sup>[25]</sup>列宁断言，如果建立了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秩序，它将包括反

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sup>[26]</sup>

这意味着列宁同普列汉诺夫的革命“算术学”的决裂（参见以上第八章）。列宁认为，指明需要经过两个阶段革命的更为抽象的“代数学”仍然是正确的；<sup>[27]</sup>但是，如果要实现正统派最初的目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结盟是不可能的。确实，孟什维克对普列汉诺夫的策略的坚持是反动的。它意味着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屈从于资产阶级从上层统治阶级那里获得让步的目标，从而捍卫了沙皇统治的重建。在孟什维克演化的过程中，列宁日益警觉地发现这一逻辑本身在孟什维克演化中产生的结果，他不愿意为了维护党的统一而进行妥协的意向进一步加强。<sup>[28]</sup>它不再只是一个反对改良主义的问题，或者是主张坚持某种特定类型的党组织的问题，列宁现在为自己的政治立场找到了经济基础（参见本章第6节）。客观地看，而且不考虑孟什维克的意图，<sup>[29]</sup>他们成了戏剧中的演员，这一戏剧把工人阶级整合到再造后的旧体制中。<sup>[30]</sup>因此，把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斗争看作只是争夺个人领导权，是肤浅的。1905年革命之后的布尔什维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复杂本质的唯物主义分析基础之上的。<sup>[31]</sup>

在列宁看来，俄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选择。它要么在影响“普鲁士”式道路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扮演一个卑微的角色，要么坚持正统派的精髓，在彻底推翻旧的沙皇体制（尽管在进行现代化）的革命中掌握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领导权。每一个策略都包含着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支持，但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们之间具有对抗的性质。<sup>[32]</sup>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两种资产阶级革命构成一个正在展示次要的历史变化的统一体，是错误的。它们可以是完全不同类型的革命，这取决于哪个阶级占据支配地位，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采取何种道路。<sup>[33]</sup>

#### 4. 俄国历史和“普鲁士道路”

列宁认为，现代俄国历史中的主导力量是“普鲁士道路”。<sup>[34]</sup>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重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旧体制把资本主义体制的因素融入自身中，<sup>[35]</sup>以确保自己能够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来。<sup>[36]</sup>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这条道路前行的一个重要阶段，就是1861年的农奴解放。<sup>[37]</sup>列宁意识到，作为农业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因素，俄国的农奴解放与马克思集中研究的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形式具有完全相反的特征。<sup>[38]</sup>在俄国农奴解放中，农业生产者没有与土地分离，他们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加之对地主阶级进行的补贴，农奴解放并没有触

动传统的剥削关系，只是推动了大地产向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演变。<sup>[39]</sup>然而，农奴解放也为农业经济中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基础。<sup>[40]</sup>但是，由于它要服从“普鲁士道路”的要求，农业资本主义的活力受到限制。<sup>[41]</sup>列宁认为，后来的事件，可以被看作是以农民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推翻建立在大地主转型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的斗争。

在列宁看来，1905年与1907年之间的农民革命，是这种对抗最明显的表现。革命虽然因镇压而失败了，但是，它进一步中断了“普鲁士道路”的演进过程。<sup>[42]</sup>政府当局，特别是政府首脑斯托雷平认识到，长期的生存依赖于获得强大的社会支持。<sup>[43]</sup>因此，农村和城市的资产阶级获得了一定的特权。保护村社的法律被撤消了，许多措施被用来激励富农巩固他们的土地。<sup>[44]</sup>农民大众付出了代价，<sup>[45]</sup>他们的贫困化继续支持着大地主向更为资本主义化的形式缓慢地过渡。当大量农民破产时，<sup>[46]</sup>这种过渡可能进行得相对平稳，但是一个更广泛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农村有产阶级——农民资产阶级——才构成社会安全的长久的基础。

列宁认为，沙皇专制也把城市资产阶级纳入到它的政治权力的结构中了，尽管它们的地位比较低。现有的体制改变了它的绝对专制主义的特色，<sup>[47]</sup>并且，新的议会（杜马）为官僚阶层、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达成未来的妥协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sup>[49]</sup>这些让步并不能让所有的中产阶级都感到满意，因为卡德茨（立宪民主党）想要取得主导地位。<sup>[50]</sup>然而，由于不愿意支持人民革命，他们被迫接受特权的重新分配，<sup>[51]</sup>并且试图通过宪政手段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利益。列宁相信，这势必引起他们与官僚和地主之间的摩擦，社会民主党为了自己的利益将会充分利用这种摩擦，<sup>[52]</sup>但是，如果（像孟什维克那样）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得以圆满完成的根基，那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sup>[53]</sup>

列宁认为，虽然无产阶级从流产的革命中获益不多，但是现有政权有可能同意进行一些政治和经济改革，以努力把无产阶级吸纳进来，这就如同西欧曾经发生的事情那样。<sup>[54]</sup>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上了“普鲁士”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且也确实巩固了这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在这一过程也有可能成功。<sup>[55]</sup>但是，布尔什维克的任务是阻止它的实现，<sup>[56]</sup>用更富有活力的“美国式道路”取代它，通过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

## 5.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和“美国式道路”

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列宁集中关注了“商品生产的逻辑”对农业

经济的影响，他在新政治经济学中并没有抛弃这一观点；事实上，他把它提高到了更为突出的位置。他通过19世纪90年代的分析，作出三个重要方面的修改来达到这一点的。首先，正是地主阶级，或者说更广泛的“普鲁士道路”才是关键的因素，它们现在被视为农业经济现代化的限制因素，而不只是1861年解放农奴的特定形式。其次，进一步提高了如下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显著地受到实践中的土地占有形式的影响，而且土地的国有化是一种最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占有形式。最后，列宁主张，通过“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策略，农业资本主义可以获得迅速发展。

自1905年开始，列宁倾向于认为，地主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封建性质的，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尽管拥有数量可观的土地，但地主的生产活动并不能代表“大规模”农业生产。地主的生产过程，通常是农民在传统的方式下使用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的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加总，而且这种方式还被一套半封建关系笼罩着。尽管受到国家补贴的支持，但这种生产活动只是缓慢地接近于资本主义形式，而且是通过同时造成农民大众的贫困来实现的。<sup>[57]</sup>这和列宁19世纪90年代的观点是相反的。他不再认为，农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和地主经济中的资本主义一样，可以获得很好的发展。相反，前者受到后者的显著影响。

列宁进而主张，稳固地建立以农民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要求剥夺地主。这种剥夺，将结束封建剥削，并为生产资料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正如列宁认识到的，最初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因为同落后的地主一起将会失去一部分资本主义化程度较高的地主，而且农村无产阶级的数量也可能会下降。<sup>[58]</sup>但是，这些特征将被他描述的“美国式道路”的全面的合理性所抵消，“美国式道路”是指资本主义从占有大量土地的自由农民阶级发展而来。<sup>[59]</sup>所以，任何的延迟，只不过是后退了一小步，却前进了一大步。<sup>[60]</sup>

列宁认为，这其中的包含着比仅仅从封建关系中解脱出来更多的内容。“普鲁士道路”不仅带来了，而且本身也要求大量农民维持受压迫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民的普遍的落后和野蛮被保持下来。与此相对，通过没收增加的可用的资源，扩大了农民的眼界，需求将会增加，市场化程度将会提高，农村与城市文明的差别将会减小，对工业品的需求扩大，农业部门的规模相对缩小。总之，通过创造出一种类似于北美的自由的、广泛的和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具有的良性循环，将会逐渐削弱“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sup>[61]</sup>

在同修正主义的论战中，列宁认识到，在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有时候会同时存在相对落后的农民，农民通过“消费不足”和“过度劳作”减缓自身融



入资本主义关系的速度。<sup>[62]</sup>因此，他倾向于通过“普鲁士模式”在欧洲现代化中的主导地位来解释这一点。<sup>[63]</sup>但是，他的著作也显示出，他越来越强调土地国有化是俄国摆脱传统的一切障碍的一种手段。<sup>[64]</sup>列宁并没有把土地国有化视为一种社会主义措施，因为与之相伴的不是生产的社会化，尽管它确实提高了商品交换和流通。<sup>[65]</sup>土地租赁建立在与马克思《资本论》中概括的级差地租理论相一致的商业原则的基础之上。<sup>[66]</sup>

同马克思和考茨基一样，<sup>[67]</sup>列宁宣称土地国有化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消除了绝对地租。<sup>[68]</sup>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与商品生产中各种形式的级差地租不同，绝对地租要求土地私人所有权的存在，<sup>[69]</sup>而这种所有权也可以通过土地国有化来消除。这是有益的，因为绝对地租剥夺了农业资本家的资源，因而阻碍了积累。然而，马克思的理论是有缺陷的。马克思所说绝对地租，实际上不过是级差地租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且马克思对绝对地租大小的解释建立在错误的观点之上。<sup>[70]</sup>因而，列宁对马克思理论的应用是缺乏充分的根据的。但是，这并没有损害列宁观点的实质。像马克思一样，他用其他一些思考充实了他的分析。土地国家所有提供了一种灵活性，它便于在技术进步下经济规模变化时投入的重新组合。它也使得不同的、但相互作用的生产过程的有效配置与公共资源的适当管理变得更加容易。最后，公共主管当局作为（级差）地租的接受者，拥有了一种为所需要的投资提供资金的手段。<sup>[71]</sup>

列宁对土地国有化的支持，可以被看作是对马克思分析原始积累时提出的“清扫领地”这一“古典”解决方法进行优化的一次尝试。<sup>[72]</sup>在列宁的整体方案中，这完全是行得通的。在马克思看来，英国农业中三个阶级构成的阶级结构，是最适合于资本渗透的历史案例。<sup>[73]</sup>列宁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寻求一种更彻底的“清扫领地”的方式，他正确地认识到，农业越不发达，这种方法就越合适。<sup>[74]</sup>

但是，合适的程度并不是这里涉及的唯一问题。除此之外，还存在如何实现土地国有化的问题。它不可能遭到无产阶级的反对。<sup>[75]</sup>但是，农民是怎么样看的呢？他们会认为所有土地都国有化符合他们的利益吗？列宁对此深表怀疑，并且也认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可能是农业革命可以推至的极限。然而，对农民政治代表所能接受的方案的考察，使他相信有些农村地区支持全面的土地国有化。<sup>[76]</sup>当然这更符合马克思主义者的愿景，即上升的阶级要求采取的措施与进步发展客观要求的措施相一致。总之，这些因素，是列宁把革命的民粹主义解释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正如以上第九章显示的，他从来没有把民粹主义思想看作是完全的乌托邦，更不用说是反动的。但是，1905年之后，列宁对民粹主义思想有了

更加清晰的认识，同孟什维主义相比，民粹主义持有的是一种对实现“美国式道路”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要求的主观想象的观点。<sup>[77]</sup>

列宁设想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结盟实现土地的国有化，这种结盟把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农民的土地革命结合在一起<sup>[78]</sup>。这两支力量都是需要的。<sup>[79]</sup>农民的作用在于以一种有效的、“平民”的方式摧毁农村旧体制的经济基础。<sup>[80]</sup>无产阶级则会削弱城市中心并全面地领导革命力量，农民很难做到这一点。<sup>[81]</sup>资产阶级在最好的意义上是袖手旁观，在最坏的意义上则是被“民主专政”镇压的反革命力量，<sup>[82]</sup>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这一术语就是不受法律约束的阶级统治。<sup>[83]</sup>“民主专政”以苏维埃形式组织起来，<sup>[84]</sup>它的作用是确保革命成功，镇压反对者，建立未来法律上的平等和彻底民主的基础，实施限制剥削的措施，如果有可能的话，实行土地国有化。<sup>[85]</sup>

但是，在列宁看来，专政应该仅限于民主革命要求的范围之内。因为有资产阶级成员，所有的措施都同资产阶级秩序的继续这一目标相适应。<sup>[86]</sup>客观条件妨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而且农民从一开始也会制约它的实现。<sup>[87]</sup>这是两种力量的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革命成功后，将通过召开立宪会议使情况稳定下来，<sup>[88]</sup>在立宪会议中，资产阶级统治将在非特定的意义上出现。<sup>[89]</sup>从那时开始，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力量团结起来，民主专政下实施的措施将最大可能地实现这一点。<sup>[90]</sup>从而，普列汉诺夫的两阶段革命论保留了下来，但是，是以一种新颖的形式，而且是以一种令“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不能信服的方式保留下来。

## 6. 列宁主义的力量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普列汉诺夫保持怀疑是明智的，尽管他提出的用以捍卫孟什维克主义的观点在实际问题面前通常都表现得软弱无力。然而，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必须承认的是，列宁1905—1914年之间形成的理论代表了俄国马克思主义真正的进步。在这一时期，列宁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与革命问题存在着密切联系，这种品质是社会民主党一直以来所十分缺乏的。无论是列宁还是其它的人的有关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理论，都未能为社会民主党的战略和策略提供清晰的含义。这些理论，主要集中在关注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因而无法与普列汉诺夫理论体系中的政治结构相吻合，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体系专注于和城市资产阶级结盟的问题。正统派依据马克思著作采取的这一立场，试图表明俄国正在发展

的资本主义与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逻辑没有联系。<sup>[91]</sup>通过对区分不同类型资本主义新观点的阐述，列宁填补了这一裂缝。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形式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多样性相联系，并且正确地指出，普列汉诺夫只有俄国革命的“抽象”概念。<sup>[92]</sup>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核心。从方法论层面看，列宁比孟什维克更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人。当然，列宁的著作也包含了一些独特的因素，尤其是他强调自发的无产阶级意识和社会民主党的意识之间的区别，以及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合适的党组织问题。但是，1905年之后，列宁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为这些思想的存在提供了从经济基础层面的解释，从而保证了这些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分析视角之间的一致性。布朗基主义——雅各宾倾向和军事化组织是适当的，因为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争夺统治权，取代普鲁士道路的关键是捣毁并夺取国家权力机器。<sup>[93]</sup>因而，在这方面，孟什维克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是不中肯的。只有当第一阶段革命成功，社会主义被提上议事日程时，这种批评才是合适的。

令人惊讶的是，甚至是列宁著作中存在的某些明显的混乱，按照他1905年之后的理论理解，也呈现出合理性的特征。例如，在以上第七章可以看到，列宁对沙皇俄国特征的说明是不稳定的。他有时认为它是亚细亚式的，有时又认为它是封建式的，甚至偶尔称之为资产阶级式的。<sup>[94]</sup>这种不稳定性，在列宁晚期的著作反复出现。<sup>[95]</sup>但是，现在讲得通了，因为列宁的理论强调沙皇专制的转型——因而也是模糊的——本质：“普鲁士道路”恰恰是把绝对专制主义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特征结合在一起的，当这些特征达到新的统一时，沙皇俄国也就走到了尽头。

支持列宁“普鲁士道路”概念的理由有很多。把这一概念应用于沙皇俄国的历史，明显地克服了普列汉诺夫与此不同的观点中存在的疑难，普列汉诺夫的观点集中关注亚细亚形式与欧洲形式的融合（参见以上第八章）。此外，它也可以用来反击普列汉诺夫对土地国有化的批评，这种批评认为，土地国有化为恢复亚细亚特征奠定了基础。<sup>[96]</sup>此外，列宁揭示了普鲁士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无效率，这由地产的危险境况所证明。<sup>[97]</sup>俄国的贵族与东部德国的容克相比更缺乏向农业资本主义转变的能力。这既反映了他们为沙皇政府服务的取向<sup>[98]</sup>，也反映出大土地所有者数量的巨大。列宁十分正确地指出，大规模本身并不意味着效率，它只是资本主义关系中的次要因素。<sup>[99]</sup>尽管落后，但农业经济明显地具有活力，<sup>[100]</sup>而且地主把土地租给农民，通常比直接把它作为商业企业的一部分来管理更为有利可

图。<sup>[101]</sup>然而，税收落到了农业中的小生产者身上，其中的许多收益被浪费在直接或间接的对官僚化土地贵族的支持上。<sup>[102]</sup>列宁也可以求助于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的论述，来反击孟什维克对“民主专政”的批判。尽管普列汉诺夫也深受马克思这方面见解的影响（参见以上第七章和第八章），但是，出于对马克思晚期著作的思考，列宁的解释改变甚微。<sup>[103]</sup>

关于“美国式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列宁1905年后的分析与他早期著作中的分析相比，在与关键问题的联系上，不如早期著作中的分析联系那么紧密，这的确是事实，原因在于规模经济的缺乏成为产生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的障碍（参见以上第九章）。但是，列宁后来对土地国有化的强调是完全适当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这一错误。如果他的方案实现的话，它将成为一种富于效率的、相对人道的消除传统农民的手段。不仅私有产权的缺乏削弱了资本渗透的阻力，而且对级差地租的控制也可以被用来控制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此外，国家收益的增加挤出了地主的消费，否则的话它就会阻碍积累。因此，尽管技术条件将会保留小农，但是他们的数目将会锐减，那些留存下来的小农将比在私人地主那里工作更富裕。<sup>[104]</sup>马克思的绝对地租理论是错误的——这一点是由孟什维克的农业专家马斯洛夫提出的<sup>[105]</sup>，这一事实并不会削弱列宁方案中的合理内核。并且在批评孟什维克的土地归市有或市营的替代方案时，列宁指出他的批评者的主要局限，这种替代方案不仅是一种历史上人为的，而且也缺乏经济基础。<sup>[106]</sup>

更一般地说，撇开俄国情况的具体特点不论，列宁对不同类型资产阶级转型的明确区分，预见到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sup>[107]</sup>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普鲁士”道路对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它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前资本主义因素，有力地影响了20世纪的政治学，这表明“现代化付出的代价至少和革命的代价一样大，很可能还要高昂得多”。<sup>[108]</sup>甚至是18世纪晚期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认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典范——的性质也是模糊不清的。迄今为止，它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能够很好地与经典（有些人可能会说庸俗）马克思主义相吻合。<sup>[109]</sup>此外，列宁对在实现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秩序时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本质的强调，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情况，而非特殊的例外。<sup>[110]</sup>在此意义上，正是列宁的著作，而不是马克思或孟什维克的著作，更具有一般性。

但是，列宁并没有由此推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整体的理论是不够格的，他只是断言，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非资产阶级来推进。在这里存在的不仅是语义上的冲突，这一主张体现的是一种真正的矛盾。因为它源自列宁的政治经济

学，所以在这种形式的列宁主义中存在着深刻的理论问题。

## 7. 列宁政治经济学中的矛盾和难题

列宁1905—1914年的政治经济学源自有悖常情的逻辑。农民政治学为列宁相信的封建关系先前被严重低估的观点提供了主要的证据。<sup>[111]</sup>上层建筑中发生的事件引起了对经济基础的评价的变化。列宁不是借助于独立地重新分析农业经济的本质，来重新表述他加以改进的经济学。他也没有试图准确地解释他自己的错误的根源，这些错误是他在19世纪90年代得出的与现在不同的结论的基础。相反，地主只是被重新划分为主要是封建性质的。这个过程被他早期著作的本质所掩盖。在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它出现的过程本身时，列宁能够求助于大量的指标（参见以上第九章），每一个指标的重要性都被一个事实掩盖起来，即没有提供有关这些指标重要性的等级序列。<sup>[112]</sup>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因而接近于一个对证伪具有免疫力的循环体系。

同样类型的“逻辑”，在列宁的政治经济学中也是明显的。继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之后，列宁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因素构成的混合物，而不是一个自成一类的范畴。这为解释农民的行为和信念提供了巨大的灵活性。列宁充分利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一般特征，把民粹主义解释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且把土地革命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美国式的道路”的体现。因为不存在可用的标准去明确地质疑这些解释，因而列宁的观点受到了保护，避免受到孟什维克的批判。<sup>[113]</sup>

但是，列宁有关农民的立场存在一个缺陷，这个缺陷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识别，他对原始积累的分析最为特殊。正如我们在本章第5节中看到的，列宁支持土地国有化政策，是因为它使得小生产者不再能控制他们的生产资料，而使资本主义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然而，列宁认识到，农民可能只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尽管这样做不如国有化有益，但列宁还是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也具有高度的进步性，因为它破坏了地主财产；在他看来，这是关键问题。<sup>[114]</sup>他指出：“农民从地主那里得到的……土地越多，……资本主义发展的就越迅速”，以此来支持他的观点。<sup>[115]</sup>在1861年农奴解放的背景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般说来，这明显会让人生疑，并且列宁的土地国有化的主张又突出了这一点。孟什维克对此也不得要领。但他们指责列宁已经接近于民粹主义的革命策略。<sup>[116]</sup>而这只有在他们随后能够坚持民粹主义代表了

一种切实可行的观点，并坚持列宁相信的简单的没收可以促使资本主义产生是错误的的时候，这一观点才能产生极大的力量。但是，这一点孟什维克做不到。和列宁一样，他们也相信“商品经济的逻辑”，因而列宁在两个方面都有问题。无论是完全剥夺地主土地所有制，还是作为唯一的所有者，农民都将建立有利于原始积累的条件。

民粹主义思想的历史内涵可以交由历史事件去说明。那些村社势力最强大的地区，<sup>[117]</sup>也是1917年（包括1905年）农民革命最有力的地区。资产阶级因素完全被淹没了；那些巩固了他们的土地，或者完全同村社相分离的富农，又被迫成为村社的成员，而且他们的土地连同地主的土地都被重新分配。用马克思的术语看，土地革命是反动的：它重新确立了传统制度（列宁分析中的明确的封建残余）<sup>[118]</sup>的重要性，恢复了它们的活力。孟什维克对农民激进主义的怀疑，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sup>[119]</sup>但这并不能削弱如下事实：他们无法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从理论上证明自己的观点。

这反过来显示了列宁主义中存在的另外两个问题。它表明与实现列宁的目标有关的农业中的力量是富农，也表明合适的革命策略是同农民资产阶级结盟。<sup>[120]</sup>而且，这样的联盟，势必引起贫农和中农的反对，他们是恢复村社的主要受益者。但是，这将意味着两种阶级斗争——反封建主义的和反资产阶级的——不可能同时进行；在农村，它们将是相继进行的。然而，列宁与所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固执地认为它们必须同时进行。而且理由充分：只有这种立场与把农民视为小资产阶级相一致（因此大量的农民注定要无产阶级化），而且只有以此为基础，社会民主党才能反击民粹派的指责，指出他们——客观地说——是资产阶级力量。

此外，有关1905年和1907年革命本质的经验证据表明，“普鲁士式道路”和“美国式道路”并不像列宁所认为的那样，是对抗性的。建立后者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个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力量足够强大，以至于能够主导土地革命的进程。因此，尽管视斯托雷平与列宁为竞争对手是明智的，<sup>[121]</sup>但他们之间仍然有共同之处。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列宁需要斯托雷平在大的范围内实现他自己的目标，结果是村社的关系彻底被打碎，农民资产阶级更加稳固地成长起来。

因此，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普鲁士道路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正是对这种可能性的认识——列宁超越了这一点，设想了它的完全成功——为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它说明“矛盾”并不一定必然发挥赋予它们的力量，因为它们可能以皮特·司徒卢威所表明的方式得以“缓解”。因

此，1905年之后，列宁自己的分析承认了修正主义核心观点的合理性（参见以上第十章）。这不是他这样做的唯一的一点。在《怎么办》中，修正主义被视为是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威胁，因为它表达了对工人阶级自身的“自发”意识的崇拜。<sup>[122]</sup>而且在后期的著作中，列宁反复提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平衡和整合机制。<sup>[123]</sup>

在这里，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普鲁士式道路”的核心是封建贵族转变为依据资本主义经济原则行事的的地主阶级。那么，通过什么标准来定义它的阶级利益呢？是通过旧模式的结构，还是新模式的要求？是通过一些适合于描述转型过程中的转变时刻的变量的加权平均值来定义，还是通过转型自身的本质属性来定义？类似地，“普鲁士式道路”被认为包括了资产阶级融入到现代化的旧制度中。正如列宁注意到的，对资产阶级自身而言，这是一个次优的解决方法，对人民激进主义而言，它可以勉强被接受。但是，如果这是事实，我们就有了阶级利益和阶级行动的区别。不仅经济结构无法清楚地界定阶级利益，现在对这个问题来说又加入了一个新认识，一个被结构性地定义了了的阶级利益，可能并不是阶级行动的主要基础。

面对这种情况，列宁得出的明显的结论就是：如果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想要实现，它必然是通过除资产阶级以外的其它阶级实现的。<sup>[124]</sup>并且列宁认识到，这可能包括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自身的反对。但他不相信这提出了一个矛盾。革命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秩序，而不是资产阶级统治，更不要说是建立特定一代的资产阶级个人的统治。换言之，资产阶级革命是依据革命的结果，而不是革命的主角，来思考的。<sup>[125]</sup>然而，列宁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可能导致革命偏离轨道视而不见，这不是因为它可能成功，而恰恰是因为它将会失败。<sup>[126]</sup>在这种情形下，成功的革命将包括剥夺资产阶级和使无产阶级控制工业。在工人阶级掌权的情况下，通过什么样的手段维持城市经济中资产阶级的组织和配置原则呢？在城市地区，农民不可能把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阶段。在长期看，他们——在马克思的“麻袋里的马铃薯”的比喻意义上——也不可能对反对他们的有组织的城市力量进行更多的抵抗。因此，同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一样，列宁的政治经济学同样未能克服任何一种在非社会主义革命中赋予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的理论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参见以上第八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社会民主党中，只有托洛茨基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它成为“不断革命论”的支点，从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嵌入于社会主义革命中。1917年，列宁对俄国问题的分析采取了同样的立场。他得出结论的思路与

托洛茨基不同，但是考察后者的立场有助于理解前者的实质。所以，在以下第十三章转向列宁的政治经济学之前，我们将首先讨论托洛茨基著作中“不断革命论”的概念及其理论基础，考察他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政治经济学。

---

## 第十一章注释:

[1]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439页。

[2]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2页。

[3]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2页。这一观点也见于他早期的著作，例如，《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296页。

[4]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1-3月)》，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239页。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London: Macmillan, 1985) vol.1, pp.54,98; J. Frankel, *Vladimir Akimov on the Dilemmas of Russian Marxism 1895-190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62.

[5]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2页。《进一步，退两步》，参见《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425页。《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参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199页。《社会民主党人在梯弗利斯选举中的胜利》，《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111页。《土地问题和革命力量》，《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9-173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363页；《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参见《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6-123页。也可参见以下第十三章。

[6] 《怎么办？》，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3页。

[7] 《进一步，退两步》，参见《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425页；这一阶段孟什维克对列宁主义的批判见Larsson, *Theories of Revolution*(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1970), pp.230-51.

[8] 《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



241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

[9] 《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5页。

[10]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296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297—465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2页。《再论实现问题》，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78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第85—134页；《1900年12月29日记事》，第341—343页；《工人政党和农民》，第379—386页。

[11] 实际上，对此总是有批评意见，但是他们强调了其他问题。参见A. Ascher, Pavel Axelro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enshev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173; (《答对我们纲领草案的批评》，《我们纲领中的民族问题》，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226页。) and T. Dan, The Origins of Bolshevism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64) pp.310—16.

[12] 《答对我们纲领草案的批评》，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217页。这也与历史先例相吻合。在法国革命时期，农民一致要求废除封建残余，但是他们的异质性又排除了没收大地产的可能。见 T.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126—8.

[13] 参见Larsson, Theories pp.143—4, 148—50, 177—95, 256—304, 307—8, 311, 320—1, 357—8.

[14] N. K. Krupskaya, Reminiscences of Leni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p.13.

[15] T. Cliff, Lenin (London: Pluto Press, 1975) vol.1, p.37.

[16]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5页；《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第215—241页；《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第201—207页；《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开幕》，第17—20页，《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54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120页；《“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316页；《“土地规划”的某些结果》，《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6—417页；《论现政府的（一般的）土地政策问题》，《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287页。

《“劳动”农民和土地买卖》，参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7—380页。

[1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决议的总提纲》，参见《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304页，《无产阶级和农民》，第324—329页。

[18] 在1902年“微型革命”之前，列宁怀疑农民的革命潜力。《我们党的纲领草案》，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208页；《工人政党和农民》，第379—386页；《宝贵的招供》，《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1页，《危机的教训》，第72—76页；《内政评论》，第268—312页；《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3页。兼之他对资产阶级的怀疑，因而，他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所有民主力量组成的广泛的联盟的重要性，无论这些民主力量的源头是什么。《内政评论》，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8—312页，《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第324—331页；《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252页。

[19]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三章，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220页。

[20] 《农奴主在活动》，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81页；《政治斗争和政治手腕》，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8页，《告贫苦农民》，第117—178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120页；《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参见《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337页。

[21] 现在，列宁在解释《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第2、3章时，把他们描述为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尽管这两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但本质上却是冲突的，见这一章的第六部分。

[22] 《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64页；《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253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报刊评论》，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243页，《论抵制》，第336—343页；《俄国政党分类尝试》，《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7页；《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5—76页。

[23] 《革命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264页，《戴白手套的“革命家”》，第284—288页。

[24] 《第二届国家杜马的开幕》，参见《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20页；《布尔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第50—54页，《对社会民主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的经典评价》，第208—216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229页；《‘庄园主邻居’》，《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147页。

[25] 《俄国政党分类尝试》，《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7页；《谈谈崩得机关报上的一篇文章》，第186-193页；《勾结的基础》，《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113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0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

[26]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序言，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4页。

[27] 参见以上注释5。

[28] 《进一步，退两步》，参见《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425页。《地方自治运动和〈火星报〉的计划》；《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78页。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1-124页；《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169页。《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401页；《孟什维主义的危机》，《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171页，《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第175-185页，《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第248-271页。《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382页。《致〈斗争报〉纪念号》，《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304页。《〈两个政党〉小册子的序言》，《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7-300页；《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第307-319页；《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第334-354页。

[29] 《孟什维克的策略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36页；《两个世界》，《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8页。

[30]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319页；《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第334-354页。

[31] 这支持了哈丁(N. Harding)关于列宁主义本质的认识。参见N.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London: Macmillan, 1983)。但是，尽管哈丁极好地阐述了列宁的思想，但他的分析也存在一个不足。哈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列宁的思想基本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这里强调的却是1905年前后列宁思想的转变。

[32] 《孟什维克的策略纲领》，《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1-236页；《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第120-154页。《反对抵制》，《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

185—397页；《新土地政策》，第406—410页。《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246页；《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1页。

[33]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

[34]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134页。

[35]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328页；《“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81页。

[36]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6页。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走上大路》，《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339页；

[37]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1页。《我们的取消派》，《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135页；《关于纪念日》，第163—171页。

[38] 《论党内状况》，《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62页；《我们的取消派》，第115—135页；《关于纪念日》，第163—171页。《民粹派论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0—364页；《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农村中的农奴制经济》，第95—97页；

[39] 参《告贫苦农民》，见《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178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

[40] 《第一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337页；《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328页；

[41] 《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20页；

[42] 《对目前时局的估计》，《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259页；《走上大路》，第329—339；《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1页。

[43] 《革命冒险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386页。《政治短评》，《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8—404页。

[44] 《进一步，退两步》，参见《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425页；《地主的土地规划》，参见《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175页；《论现政府的（一般的）土地政策问题》，第270—287页；

[45] 《政治短评》，《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8—404页。

[46] 《沿着老路走去！》，《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27页；《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第18—120页。

[47] 《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5页。

《斯托雷平和革命》，《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333页。

[48] 《新土地政策》，《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6—410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5—403页；《选举结果》，《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371页；

[49] 《‘非党’抵制派的错误一轮》，《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277页；《新的政变在酝酿中》，《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9页；《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328页；《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第380—387；《被揭穿了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4页；《取消派的手法和布尔什维克的护党任务》，第142—149页；《政论家札记》，第236—300页；《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第406—413页；《资本主义和‘议会’》，《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0—372页。

[50] 《新的政变在酝酿中》，《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9页；《关于旧的但又万古常新的真理》，《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285。

[51] 《革命斗争和自由派的渔利行为》，《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253页；《革命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第258—264页；《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8—169页。《报刊评论》，第241—243页，参见《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论抵制》，第336—343页；

[52]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第三届杜马》，《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8页。《为什么而斗争》，《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215页；《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311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选举中的僧侣的选角》，第142—145页；《论民粹主义》，第326—330页；《选举结果》，第343—371页；《革命无产阶级的五一游行示威》，《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319页；《国际反对卖淫第五次代表大会》，第347—348页。

[5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168页；《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368页；

[54]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走上直路》，《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41页；《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7-339页；《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问题的症结》，第14-15页；也可参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319页；《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第334-354页。以及 Dan, Origins, p.222.

[55] 《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第65-76页；《怡然自得的庸俗言论或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革命党人》，第178-181页；《弗·梅林论第二届杜马》，第257-264页；《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41页；《关于纪念日》，《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171页；《“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第172-181页。

[56] 《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5-363页；《自由派工党的宣言》，第395-409页。

[57] 参见注释16和注释46。

[58] 《自由派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9页；《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225页；《社会主义和农民》，第284-292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

[59]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2页。《农奴主在行动》，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81页；《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参见《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195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

[60]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6-449页；这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废除农奴制的分析类似，因为它影响了经济中的工业部门。见前文第9章第5部分。

[61]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320页；《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参见《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54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第307-363页；《社会民主党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Krupskaya, Reminiscences, p.256.

[62] 《农民经济中的童工》，参见《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299页；参见以上第10章。

[63] 《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199页。

[64] 在1905年之前，列宁已经认识到土地国有化的一些优点，但是，他接受了普列汉诺夫的意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9章，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199页；《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320页；《专制制度在动摇中》，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110页；此外，在1905年之前，列宁的经济分析表明不存在实现国有化的方式。

[65] 《无产阶级和农民》，参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1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120页；《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394页；《论左派民粹派》，《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164页。

[6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六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3—920页；《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320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2—357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154页；《彼·马斯洛夫歇斯底里大发作》，第235—246页。

[67]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5) pp.288—90; K. Marx and F.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5), pp.342—3; K. Kautsky, Die Agrarfrage(Stuttgart: Dietz,1899), 《〈火星报〉编辑部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会议(代表会议)的报告》，《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280页；《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第281—320页；《一封给地方自治人士的信》，第339—347页。

[68]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

[69]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Harlow,Longman,1985) 2nd edn, pp.103—7.

[70] Ibid, pp.147-8.

[71] 《专制制度在动摇中》，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110页；《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9章，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199页；《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185-397页；《对彼·马斯洛夫的〈答复〉的几点意见》，《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246页；《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394页；我们有可能构建一个基于新古典外部性、公共产品和可分性基础之上的土地国有化的完美案例。

[7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0-875页。R.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70, 1976, pp.30-75; R. Brenner,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97, 1982, pp.16-113; 《再论实现问题》，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78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第85-134页。

[73] 这给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型带来了某些挑战，见K. Tribe, ‘Economic Property and the Theorisation of Ground Rent, Economy and Society, 6, 1977, pp.66-88.

[74] 《份地的转移》，参见《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378页。

[75] 《无产阶级和农民》，参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1页；《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401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168页；《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120页。

[76] 《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241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第322-357页；《杜马选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86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新土地政策》，第406-410页。《第二代立宪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7页；《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第48-120页；《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131-154页；《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第314-328页；《资产阶级的“向左转”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第380-387页。《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第133-141页；《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第388-394页。

[77] 《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



版，第96—99页；《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参见《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195页；《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328页；《关于纪念日》，《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171页。

[78] 《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第18—28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第83—188页；《临时革命政府图景》，第338—340页；《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

[79] 《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4页；《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363页。

[80] 《关于我们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343页；《嫁祸于人》，《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1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第83—188页。

[81] 《彼得堡选举的意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372页；《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0页。

[82] 《革命的阶段、方向和前途》，《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142页；《谁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250页；《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第344—360页。

[83] 《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319页。

[84] 《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4页；《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第200—214页；《立宪民主党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第242—319页；《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323页。

[85]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莫斯科流血的日子》，第314—319页；《俄国局势的尖锐化》，《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4页；《我们的任务和工人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4页；《军队和革命》，第102—105页；《为政权而斗争和为小恩小惠而‘斗争’》，《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221页；《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185页；《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步》，《列

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32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文献(5-6月)》,《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275页;《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70页;《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154页;《关于民族政策问题》,《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74页。

[86]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参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130页;《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第1-65页;《谁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2502页;《步步下降》,《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304页;《布尔什维克和小资产阶级》,《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0-54页;《土地问题和革命力量》,第169-173页;《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第366-387页;《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363页;《评论。缅施科夫、格罗莫博伊和伊兹哥耶夫》,《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158页。

[87]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8页;《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363页;也可参见注释5和L.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69), pp.189-205.

[88] 《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参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8页;《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323页。

[8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3-188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知》,第200-204页。《俄国政党分类尝试》,《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7页。

[90]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参见《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美国工人的胜利》,参见《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119页。

[91]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聚焦于工业方面,但是他并没有得出什么政治方面的结论,而且,作为一个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与正统派之间的联系是暧昧不清的。直到托洛茨基的著作出现,他提出的问题和革命的政治学存在清晰的联系。参见以上第九章第5节和以下第十二章。

[92]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2页。

[93]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94] 参见以上第七章以及注释33。

[95] 《宝贵的招供》，《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1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239页；《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第349—359页；《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专制制度在动摇中》，第105—110页；《告贫苦农民》，第111—178页；《革命青年的任务》，《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2—335页；《告贫苦农民》，第111—178页；《‘沙皇与人民和人民与沙皇的一致’》，《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2—180页；《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政治派别划分的初步总结》，第7—15页。《社会主义和农民》，第284—292页；《暴风雨之前》，《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335页。《俄国政党分类尝试》，《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7页；《政治形势和工人阶级的任务》，第201—207页。《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382页；《在彼得堡组织代表会议上关于杜马运动和杜马策略问题的报告》，第409—413页；《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关于斯托雷平的宣言》，第26—28页；《不当应当怎样写决议》，第87—108页；《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第366—387页；《第三届杜马》，《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8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185—397页；《被揭穿了取消派》，《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4页；《谈谈彼得堡选举》，第67—72页；《关于政权的社会结构、关于前景和取消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208页；《纪念赫尔岑》，《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1—268页；《论俄国各政党》，第282—293页；《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第294—311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第395—403页；《选举结果》，《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371页；《论“石油荒”》，《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6页。

[96] S. Baron, 'Plekhanov's Russia: The Impact of the West Upon an 'Oriental' Socie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 1958, pp. 388-40; M. Sawyer, *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pp. 173-8. 但是，根据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意见，列宁确实支持了土地的国有化政策。《进一步，退两步》，参见《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425页；《社会主义和农民》，《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292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2—357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

[97] G. T. Robinson,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52, 129, 229.

[98] P. Anderson, *Passage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London: Verso, 1979), p.132; T.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p.109.

[99]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Past and Present*, p.70; Brenner, 'Agrarian Roots', *Past and Present*, p.97.

[100] A.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pp.52-71; P.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1850-1879* (London: Batsford, 1986), pp.119-40.

[101] C. de Crisenoy, 'Capitalism and Agri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8, 1979, pp.9-25.

[102]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pp.119-51.

[103] CW, IX, pp.33, 43, 57, 87, 113, 131, 136. 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1-124页。

[104] W. F. Owen, 'The Double Development Squeeze on Agricult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 1966, pp.43-70, is relevant on these matters. See also Brenner,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Past and Present*, p.70, and Brenner, 'Agrarian Roots', *Past and Present*, p.97.

[105] 《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怎样维护修正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265页。

[106] 《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241页;《前“布尔什维克”派出席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告全党书》,第358-363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气的晕头转向》,参见《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256页;《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328页。

[107] B.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 A. J. Maye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Pantheon, 1981); R.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Anderson, *Lineages*; E. Kamenka and R. D. Neale, *Feudalism, Capitalism and Beyond* (London: Arnold,1975).

[108] Moore, *Social Origins*,p.505.

[109]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pp.40, 141, 162, 174-9, 233.

[110] J. Merrington, 'Town and Country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in R. Hilton,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Londo:Verso,1978); A.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111] 《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5-241页；《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参见《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0-347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328页。

[112] 《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20页。

[113]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297页；也可参见 Howard and King, *Political Economy*, p.37.

[114]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7-225页；《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大会》，第276-282页；《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54页；《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120页；《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第314-328页。

[115] 《俄国目前的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164页；也可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第217-225页；《社会主义和农民》，第284-292页；《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5页；《无产阶级和农民》，参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8-91页；《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第123-130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第122-125页；《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154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9页；《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57页；《土地规划和农村贫苦农民》，《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116] 《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借用他的术语，列宁毫不费力地反驳了这一指控。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239页；《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

纲领》，第281—320页；《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信》，第349—359页；《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181页。《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第217—225页；《社会主义和农民》，第284—292页；《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379页。《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41页；《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参见《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117] M. Perrie ‘The Russian Peasant Movement of 1905-7: Its Social Composition and Revolutionary Significance’, *Past and Present*, 57, 1972, pp.123-55. T.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pp.133-140.

[118] 《各阶级和各政党对宗教和教会的态度》，《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02—410页。

[119] 参见以上第八章第3节。《俄国目前的形势和工人政党的策略》，参见《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164页；《孟什维主义的危机》，《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171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参见《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363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297页；《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第314—328页。

[120] 在列宁的观点中，不太清楚的是究竟是农民中的哪一部分最为认同《最低纲领》。有时候，贫农号称是最具革命性的，而有时候最具革命性的又成了农民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参见《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329页；《自由派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9页；《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9页；《革命界的小市民习气》，《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53页；《“你会听到蠢人的评判……”》，第272—290页；《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397页；《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120页。

[121] B. D. Wolfe, ‘Lenin, Stolypin and the Russian Village’, *Russian Review*, 6, 1947, pp.44-54.

[122] 《怎么办？》，参见《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3页。

[123] 《俄国革命的开始》，参见《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5—188页；《革命的日子》，第189—208页；《再论党性和非党性》，参见《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110页；《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参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3—70页；《〈两个政党〉小册子的序言》，《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7—300页；《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第307—319页；《论俄国各政党》，《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293页；《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4—367页；也可参见 M. Liebman, *Leninism Under Lenin* (London: Merlin Press, 1975) pp. 30, 71; Krupskaya, *Reminiscences*, p. 186.

[124] 孟什维克抨击《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为Millerandism，但是，列宁毫不费力地揭示了这一指控的空疏无力。《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见《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第83—188页。

[125] 《谁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250页；《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185页；《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4—363页；《评论。缅施科夫、格罗莫博伊和伊兹哥耶夫》，《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158页。

[126] 尽管考茨基对列宁反对孟什维克进行支持时使用的表达方式，引起了列宁对这一问题的警觉。见《告贫苦农民》，参见《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178页。

## 第十二章 托洛茨基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

### 1.引言

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sup>[1]</sup>正像我们在以上第八章和第十一章看到的那样，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坚持这一观点。他们的经济学遵循《资本论》的结构，集中从商品生产关系的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他们的政治策略也都与加速俄国的西方化进程相一致。列夫·托洛茨基与他们不同，他否定了马克思的观点。<sup>[2]</sup>他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使他能够比其他任何一位理论家都更好地理解沙皇俄国现代化的结构和矛盾，理解俄国革命进程的本质。托洛茨基把最早出现在民粹主义中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整合在一起，证明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俄国都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

托洛茨基在1904年至1906年首先概述了关于俄国革命过程的理论，<sup>[3]</sup>在他一生的剩余时间里，他从未放弃过这一理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日趋成熟，尽管此处我们关注的是革命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在他后期著作中的观点能够用来清楚地说明他早期思想时，我们将会使用他的后期著作。由于托洛茨基不存在像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那样的著作，我们这样做就更为必要。此外，由于托洛茨基1917年后的立场与他早期的观点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也有必要考察20世纪20年代他的理论从俄国向所有资本主义落后国家传播的情况。这为理解斯大林主义获胜前苏联的经济论战，提供了最可靠的基础。关于斯大林主义，则将在以下第十五章讨论。



## L.D. 托洛茨基小传

列夫·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泰因的笔名），1879年出生于乌克兰亚诺夫卡一个较为富裕的犹太人农民家庭。19世纪90年代末，参加革命运动，旋即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1902年从西伯利亚逃离，成为一名流亡者并与列宁合作。1903年他与列宁决裂，成为布尔什维克最严厉的批评者。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做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两翼和解的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他被选为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1917年再次获得这一职位。十月革命成功夺取政权的主要组织者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政府中，最初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18年当选为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这一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925年。他在军事领导期间，创建了苏联红军，并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自1923年末起，在党内，领导左翼反对党，反对党内执政的派系。1927被开除党籍，1928年在国内流放，次年被逐出苏联，20世纪30年代，仍然是斯大林主义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1938年创建了第四国际。1940年8月，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在墨西哥被暗杀。

下一节将集中讨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因为它的最初发展和俄国有关。接下来的第3节考察他为支持不断革命论进行的经济分析。第4节考察托洛茨基的修正主义。第5节阐述他随后是如何让这些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这些因素不仅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协调，而且也为1917年和列宁团结在一起，以及革命后很方便地把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整合进他自己的分析中提供了基础。第6节概述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长处，对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的缺点的分析构成结论部分的主题。

## 2. 俄国不断革命的政治学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中，托洛茨基的《总结与展望》代表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激进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宣言。<sup>[4]</sup> 他1905年到1907年革命失败期间在狱中完成的这部著作认为，只要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进一步的群众暴动将会成功。除非嵌入于无产阶级专政中，否则民主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托洛茨基指出，无论是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的“两阶段”革命论，都对阶级动力作了错误的说明，阶级动力将会因任何激进力量重新恢复活动而被释放出来。无产阶级领导权必定是永久性的，而不是像正统派认为的那样，只限于击溃沙皇专制。落后的

俄国将不会、也不能经历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sup>[5]</sup>

托洛茨基并没有否认俄国面临的问题是民主革命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俄国落后的现状,认为在俄国不存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任何物质上的先决条件。根除土地问题中的中世纪性质、推翻沙皇专制、实施对剥削的限制措施,既是革命的驱动力,也是历史的中心任务。但是,它们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府的建立。资产阶级无力领导民主革命,或者说无法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进行合作。资产阶级的抵制,迫使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且据此实施集体主义的经济措施。<sup>[6]</sup>成功的民主革命,将“长入”到一个连续的或“不断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俄国将不会经由民主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相反的,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因此,托洛茨基颠倒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顺序。

托洛茨基认为,农民只能选择追随无产阶级或选择支持反动势力;他们不可能采取一种独立的立场。<sup>[7]</sup>但是,正是俄国农业的落后性质,使得农民最终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土地问题在沙皇时代肯定无法解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得到根本解决,这将确保农民对反对地主和沙皇国家的支持。<sup>[8]</sup>无产阶级专政的土地基础,是广泛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缺乏,而不是像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认为的那样,要依靠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

因此,落后俄国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先于工业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取政权。<sup>[9]</sup>然而,在托洛茨基看来,在孤立的状况下,是无法维持这一政权的。最终,必然和农民发生冲突,因为农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持只限于完成土地革命。维护无产阶级统治所要求的集体主义措施,将导致与农民的分道扬镳,<sup>[10]</sup>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措施的结果,将会同时削弱这种统治的非无产阶级基础。在此意义上,土地问题既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帮手,也是它的一个主要挑战者。<sup>[11]</sup>

不断革命论结果陷入矛盾之中,只有革命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并且成为世界范围内持续的“不断的”革命时,这个矛盾才可能解决。<sup>[12]</sup>但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选择再次受到限制。正如它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角参与到俄国革命中,结果被推动去超越民主革命一样,民族革命也将被迫成为超越国界的革命,因为欧洲国家将努力反对俄国的革命。为捍卫民族的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势必把阶级斗争扩大到西方,它的革命也将“长入”世界革命。<sup>[13]</sup>在这里,托洛茨基试图对他的分析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加以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的物质条件存在于工业发达国家,而俄国革命的命运提出了需要无产阶级力量的问题。就历史过程的结果而言,正统派是对的,但是明确无误地他们的错误在于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

上：革命将会从东到西发展，而不是相反。西方成功的革命，将消除对俄国革命的军事威胁，使得西方的资源可以用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之中。<sup>[14]</sup>

这些就是不断革命论的政治学的内核。但是，托洛茨基并没有将他的分析限于这一层面，他也不可能这样做。正如他所设想的，不断革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无论革命党的纲领是什么，历史事件的逻辑将要么绕过它们，要么吞没它们。把俄国革命带向成功的任务，必然要求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革命的真正本质。但是，过程本身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因为它根植于物质条件之中。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一样，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看是决定论式的。<sup>[15]</sup>因此，我们转向托洛茨基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经济学为托洛茨基不同寻常的政治学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

### 3. 俄国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

托洛茨基对俄国历史整体论述的重要观点，显然是符合正统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在指出传统俄国具有“半亚细亚”性质方面，<sup>[16]</sup>他追随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但无论如何，他也没有把自己同列宁明显地区分开来。在对推动俄国现代化力量的概括中，托洛茨基的分析也不很独特，尽管他强调了西方的军事影响。气候因素在托洛茨基那里也发挥了较为重要的解释功能。托洛茨基明显地承认了封建关系的出现，他把西方的影响看作是加速并改变俄国的发展、而不是俄国发展的主要原因。<sup>[17]</sup>但是，这些差异中没有哪一个是特别重要的。相反，托洛茨基对公认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问题的关注，对他独特的政治结论作了根本性的解释。

托洛茨基对当时俄国工业的性质、促使这种性质形成的制度，以及这些制度对城市社会结构的影响作了考察，这些是至关重要的。<sup>[18]</sup>托洛茨基很少关注农村的经济条件，他认为即使在1905年革命之前，俄国农业资本主义也不怎么明显。<sup>[19]</sup>这使得托洛茨基对俄国工业发展的分析，更接近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分析，而不是接近于列宁的分析（参见以上第九章）。但是，与列宁一样，托洛茨基也关注资本主义发展形式产生的革命潜力。与列宁相同，但不同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托洛茨基的经济分析主要是服务于解决政治问题的。

在托洛茨基看来，地理条件有助于说明俄国社会的亚细亚特征，这意味着俄国传统的城市主要是行政和军事堡垒。城市的商业活动很少，制造业更不集中，作为农业的附属物分布在农村。因此，俄国的城市与欧洲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

的城市迥然不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造成与欧洲的趋同。相反，它与早期的差别一起，使得20世纪俄国的城市人口主要由无产阶级构成，与欧洲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仍占据重要地位的城市相比，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多。俄国城市的平民特征，反映了沙皇专制工业化过程的“后发”特征、反映了在这个过程中对外国资本的广泛使用和国家职能的扩大。这最大程度地限制了俄国本土资产阶级的的发展，资本所有权主要控制在国家或外国人手中。尽管这提高了西方城市的资产阶级特征，但它却削弱了俄国城市的资产阶级特征。同时，工业化没有能够显著地增加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数量。工厂生产往往是大规模的生产，绕过了欧洲工业发展早期阶段存在的现象。反过来说明，这不仅创造了大量的无产阶级，而且这些无产阶级还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

托洛茨基承认城市人口只占少数，但他认为，城市人口的规模并不能反映它的经济与政治力量。城市创造了与其人口总数不成比例的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并且国家结构的神经贯穿于每个城市。<sup>[20]</sup>托洛茨基认为，所有的现代革命都是、并且必然是城市领导的。<sup>[21]</sup>托洛茨基显然比列宁更像马克思，坚持认为农民的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使得农民绝对不可能发挥独立的政治作用。<sup>[22]</sup>由此得出结论：在俄国任何形式的革命都将是无产阶级革命，尽管无产阶级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但它有能力摧毁现存的国家机器，取而代之的会是自己设计的国家机器。

这一结论本身，同其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结论类似。无产阶级领导权毕竟是普列汉诺夫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清楚说明的原则，而且列宁对这一原则也作了反复强调。托洛茨基开辟的新领域在于：强调无产阶级无与伦比的力量以及在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重要性。他低估了资产阶级、农民和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对革命产生的限制作用。所有这些问题，都与他提出俄国工业化独特性的观点密切相关。

我们已经对托洛茨基有关农民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在农村引起普遍不满的观点作了考察。对于俄国资产阶级来说，它不仅只是代表了城市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它的利益与现存秩序相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与地主和国家融合在一起，而且在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资产阶级需要一个专制的政府作为自己的保护者。<sup>[23]</sup>所以，它会抵制最有利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土地）。<sup>[24]</sup>这将阻止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并迫使无产阶级把革命扩大到打破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换言之，资产阶级的保守性，不仅对革命产生了限制性的影响，而且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催化剂。

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否认，俄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条件还不够成熟。但

是，他确实认为，这并不会削弱俄国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能力。在这方面，重要的不是俄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指标，而是他在分析中所揭示的这一发展所催生的阶级力量的汇聚。<sup>[25]</sup>此外，他相信，俄国革命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张是极有可能的。俄国工业同国外资本的联系，使得欧洲关注俄国工业的命运。无产阶级由于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而被迫进行的剥夺，引起欧洲国家的干预，因而也迅速地在整个欧洲大陆的范围内提升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西欧的无产阶级将会帮助俄国的工人阶级。尽管托洛茨基从来没有详细地说明其他国家的资源是怎样与俄国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但是，这种联系使他坚信，他的主张是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连接在一起的。可以认为，俄国的阶级斗争最终与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前提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是相符合的。

贯穿托洛茨基所有这些观点的核心概念是：“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在托洛茨基看来，俄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一些部门的发展不仅超过另一些部门的发展，而且它们还具备了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算得上是最先进的特征。同时，它们又综合在单一的社会形态中，这种社会形态中的其他部门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进度。这不是偶然的：存在着功能整合的特点。因此，落后的农业中剥削的加剧阻碍了它自身的发展，但是却有利于创造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飞地”。传统农业问题的恶化，使得农民在革命中跟随在无产阶级后面。反过来，无产阶级的领导，将保证传统农民暴动的成功。相似的情况对阶级团结并不总是必要的：在情况存在差异的形势下，阶级之间的结盟可能源自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sup>[26]</sup>

尽管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是复杂的理论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可以发现这些思想的不同方面，但总体说来，他们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存在明显差异。例如，列宁试图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广泛性与欠发达的本质；而托洛茨基则强调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背景下，它的集中程度及其发达形式。对列宁来说，工农联盟是基于俄国的落后这一共同的条件，托洛茨基则恰好相反。这种差异的后果之一，就是“落后”这一观点本身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尽管托洛茨基本人经常使用这一术语来描述俄国，并且他设想的革命被认为是“对落后的革命”<sup>[27]</sup>，但是，托洛茨基分析的逻辑表明，这些定义是不恰当的。<sup>[28]</sup>他的观点的核心是，一个姗姗来迟的现代的俄国，造就了一种在欧洲既是发展得最为现代的、又是发展得最为迟缓的经济结构。正是这种不平衡的形式，提供了理解俄国的历史和未来的线索。

对托洛茨基来说，前途就是不断革命。但是，他确实含蓄地承认，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具有与不断革命相抵触的性质。特别是俄国国家机器的现代化，使它变得比传统的专制主义更加强大。作为变革的主要的代理人，它使有产阶级

对它的服从达到极端的程度，并且引进了一些与完善其统治方式相关的知识和技术。<sup>[29]</sup>在这一意义上，俄国的革命是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与现代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尽管托洛茨基从来没有使用这些术语来说明问题，但是从他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些结论，并且应当能够被用来证明他的信念：不断革命是俄国唯一可能的前途。实际上，这种不明确性，在他后来的思想中注定要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将在以下第7节考察这一点。但是，在1917年之前，托洛茨基具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特征，尽管他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特征是有疑义的。

#### 4. 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遗产

把对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特殊道路的描述，建立在不平衡发展的逻辑基础上，这说明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明显地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尽管托洛茨基承认民粹主义并不是没有洞察力，<sup>[30]</sup>但是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民粹主义是托洛茨基得出他的结论的重要影响因素。像俄国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托洛茨基也经历过赞同民粹主义思想的阶段，而且也很典型的是，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就再也没有转向民粹主义思想。事实上，他有关农民革命能力的观点，使他的理论明显地呈现出反民粹主义的特征。因此，在说明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特征时，我们必须寻找其他方面的影响。

其他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亚历山大·赫尔凡德（其笔名帕尔乌斯更为著名）的思想和1905年的事件。托洛茨基相信后者证明并超越了前者的思想。帕尔乌斯是一位俄国犹太人，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度过的，他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到1924年逝世，他一直表现出标新立异的倾向。<sup>[31]</sup>他概略地叙述了大量包含在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主题，<sup>[32]</sup>毫无疑问，他深深地影响了托洛茨基思想的形成。<sup>[33]</sup>然而，具体的影响程度则不清楚。在1904—1906年期间，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联系密切，并且详细地讨论了俄国革命的所有问题。考虑到托洛茨基的学识，这种影响是否是单向的是值得怀疑的。托洛茨基把相关的见解发展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在这样做时，他超越了帕尔乌斯，帕尔乌斯不相信俄国的工人政府能够构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阶段，而不只是彻底解决民主任务的手段。托洛茨基并没有直接接受帕尔乌斯思想中的某些因素，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使民族国家过时了、这些发展将造就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的观点。后来，托洛茨基接受了这种观点（我们将在以下一节看到），这使得他的马

克思主义更接近于主流马克思主义。然而，即使那时，他也因为同正统派的彻底决裂，而不断地受到批评。

毫无疑问，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了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的概念和俄国的情况联系起来，最早是由大卫·梁赞诺夫在1903年提出的<sup>[34]</sup>，这一观点主要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上，即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十分发达，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参与到俄国革命中去。梁赞诺夫通过对1848-1850年间马克思策略发展的分析，来支持不断革命思想的针对性（参见以上第七章）。我们并不知道托洛茨基（或帕尔乌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梁赞诺夫的实际影响，关于俄国革命的激进性质和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的观点，是20世纪早年托洛茨基所生活的环境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观点很少准确地被表述过。正统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为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的统治将受到怎样的限制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参见以上第八章和第十一章）。当1905年革命爆发时，无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上升曲线向托洛茨基表明，实际的约束可能已经被克服了。<sup>[35]</sup>

作为“不断革命论”的基础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思想，也不是由托洛茨基本人，或是由他同帕尔乌斯一起带入俄国马克思主义中的。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早期著作中，只是简单地预见到这一概念（参见以上第八章和第九章）。更重要的是，梁赞诺夫认为，沙皇专制不只是旧社会的残余，沙皇专制还适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他也承认，土地条件能够为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支持。<sup>[36]</sup>考茨基也指出俄国的国外投资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认为俄国革命必然显示一种历史的独特性。<sup>[37]</sup>最为重要的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他的著作准确地聚焦于沙皇时代工业化的不同方面，为托洛茨基的分析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参见以上第九章）。但是，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中广泛地引用考茨基的论述时，从来没有表明他在理论上受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恩惠。考虑到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社会民主党的阵营，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考虑到《19世纪的俄国工厂》这部著作的分量，认为托洛茨基不曾读过，或者这部著作不曾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然而，托洛茨基的思想被他同时代的人视为与正统派的彻底决裂。毫无疑问，他的思想最初出现时，这种评价是正确的。在我们考察托洛茨基反对他的批评者并捍卫自己的观点之前，关注一下马克思著作中的两个特征是有意义的，托洛茨基可以从其中寻求支持。这两个特征虽然不会消除认为托洛茨基严重偏离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指控，但确实可以使人认为这种指控只在一般意义的性质上是成立的。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尽管托洛茨基是一位激进的创新者，但他同时也在

突出马克思思想的深层结构。

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概括的那样，<sup>[38]</sup>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概念。转型时代是两种生产方式交织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中的时代。它们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进步的生产方式获得了超前的发展，而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发展则滞后了，最终带来的危机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才能解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坚持认为，这有利于建立在单一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新的有机体的形成。<sup>[39]</sup>但是在其它地方，他承认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可能是更加普遍的现象：例如，马克思认为，西欧的封建制源自古代奴隶制与征服了罗马的德意志野蛮部落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渗透。马克思也注意到，19世纪的英国这一“典型”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不要求贵族必然丧失他们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在另一个极端，他认为法国农民代表了“文明中的野蛮”。这是他鄙视农村生活落后的一种表现，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对农村渗透的迟缓。<sup>[40]</sup>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它们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的更具一般性的阐释之间存在矛盾，在这种阐释中，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概念是隐含的和受到限制的。因此，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被视为是为了提供一个更具一般性的框架而进行的第一次有意识的尝试，在这个框架中，马克思承认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复杂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理念保持了一致。托洛茨基自己从来没有明确地宣称这一点，但他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是在他把分析拓展到世界经济层面和非俄国的外围资本主义之后（我们将在以下一节讨论这一点）。

事实上，托洛茨基为了对抗更为正统的批判而进行的辩护中，包含了不同类型的观点。他宣称，马克思主义代表了一种研究社会关系的科学，而不是文本的注释，因此他自己的思想应当在这种思想是否准确地说明了俄国革命的阶级动力的意义上加以评价。<sup>[41]</sup>为达到这一目的，托洛茨基阐明了这些思想中的某些因素。他否认他曾断言俄国可以直接从专制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或者说，不断革命意味着可以跨越民主革命阶段。不断革命的概念没有混淆革命过程的必然阶段。<sup>[42]</sup>它不像批评家宣称的那样，是一种把不同发展类型混合在一起的理论，而是俄国历史过程本身就是这样的。<sup>[43]</sup>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像正统派描述的那样理性，这给革命提出了无法回避的真正的问题。<sup>[44]</sup>

托洛茨基确实声称，不断革命论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明确的传承关系，因为这一思想源自马克思1848年革命期间的观点。<sup>[45]</sup>这不是一种冒险主义，尽管在19世纪中期不断革命并不成熟，但是通过考察1789年、1848年和1905年革命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嵌入社会主义革命是这一时代的内在属性。<sup>[46]</sup>这



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拉萨尔、考茨基、卢森堡，甚至普列汉诺夫所承认。<sup>[47]</sup>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论，同对孟什维克理论的毁灭性批判和同对布尔什维克观点不那么有利的评价联系在一起了。孟什维主义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一个正式的与俄国发展的独特性无关的历史类比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不存在独立的革命的中产阶级。因而坚持孟什维克主义，就意味着采取了一种客观上反革命的立场。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也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布尔什维克的保守性只在革命成功后才显现出来。一旦投身于无产阶级，农民就无法抑制自身的激进主义。并且，没有认识到实施反资产阶级措施的革命，随后就会被动地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开辟道路。<sup>[48]</sup>

1906年到1917年间，托洛茨基强化了他的主张，表述了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观点。他在《总结与展望》中作出的最初的说明，主要来自俄国的立场，并没有在国际资本主义的结构内说明俄国的现代化。他也没有以一种严格的方式，把俄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联系起来。没有理由证明，当俄国的革命成功时，欧洲的条件将有利于俄国革命的扩展。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的先决的物质条件的确存在于先进国家。但他也注意到，对俄国来说，阶级斗争在决定革命的爆发方面至关重要，但他对西方的阶级冲突的发展几乎没有说出什么内容。然而，到1917年时，托洛茨基做了许多有损他这些观点作用的事情，因此他的观点更接近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接近于布哈林和列宁的思想（参见以下第十三章）。托洛茨基对自己的理论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是在1917年之后作出的。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托洛茨基可以宣布，他已经建立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相联系的世界历史理论。

## 5. 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

托洛茨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资本主义的进步作用已经终结，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其结果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出现，反过来造就了一个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但是，托洛茨基认为，一旦资本实现了对世界统一的支配，主要国家就将被迫卷入一场争夺霸权的斗争。<sup>[49]</sup>在1914年之后，在世界历史上，唯一的选择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sup>[50]</sup>卢森堡较早的时候已经表达了这种观点（她也深受帕尔乌斯的影响），而且布哈林、列宁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得出了与托洛茨基类似的结论（参见以上第六章和以下第十五章）。纯粹民族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全球

体系，所有的民族国家已经联系在一起，并受到它们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整体结构的支配。对托洛茨基来说，无论对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是如此。彻底地摆脱这些关系，是任何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革命无法完成的任务。挽救一个国家的革命的唯一出路，在于把革命扩大到世界经济中的其他国家，并逐渐削弱国际资本。<sup>[51]</sup>托洛茨基现在主张，革命者应当根据他们对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影响，来评价自己的革命行动。求助于任何特定国家的发展水平都是时代的错误。现在，正是全球性的生产力和它受到的民族国家生产关系的制约，在发挥作用。这些力量将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战争的手段，威胁并破坏过去的进步发展。<sup>[52]</sup>

因此，对托洛茨基来说，尽管俄国革命一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但直到1917年，这种观点才与一个更加综合的视角联系起来，在这种视角中，他能够对正统派对他的思想进行的最猛烈的批评进行反击：在世界经济已经得到成熟发展的意义上，俄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机才是成熟的，不存在其它的评判标准，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全球体系。<sup>[53]</sup>事实上，托洛茨基明确地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经济纳入自己的分析之中，这意味着所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现在都可以被证明。对于认为这些主张没有得到运用的异议，可能反驳的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指明准确的参照点。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包括考茨基、希法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但不包括卢森堡）——都倾向于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型是与单个民族的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但这种看法无法从《资本论》中找到根据。在那里，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一般”，而不是特定的民族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一系列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而且《共产党宣言》明确地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全球体系。此外，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理论。那么，它怎么可能只限于诸如民族国家这样的特定的历史制度呢？

但是，托洛茨基主张，“后发优势”确实仍然在发挥作用。帝国主义战争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因而开启了向全面的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纪元。严格来说，这种过渡从哪里开始，并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俄国的不断革命恰好适合于领导其它国家走上这条道路，因为在一个充满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结构中，会更强烈地感受到战争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此外，由于俄国既是一个半殖民国家，同时也是一支帝国主义力量。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将会通过消除一个剥削区域而严重削弱西方的经济，并加剧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sup>[54]</sup>

所有这一切与托洛茨基早期的观点并不矛盾，而是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他把俄国资本主义视为帝国主义关系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而且他相信革命的传播效果得到加强。托洛茨基的观点的发展，引起了对同后一个问题相

联系的问题的思考。他认识到先进国家也展现出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重要特征。只有美国接近于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其它的西方国家仍然存在从来没有被实现的民主革命的一面（参见以上第四章、第九章和第十一章）。<sup>[55]</sup>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从而不会完全不同于俄国的不断革命。最终，可以预见俄国革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即使对先进国家也是如此。

但是，托洛茨基强调了俄国与边缘资本主义地区的相似性，这些地区包括1917年之前的巴尔干地区、20世纪20年代一般意义上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因此，他把俄国的经济发展视为典型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代表，对所有这些地区和国家而言，不断革命的模式都是适用的。<sup>[56]</sup>这意味着基于与俄国相同的原因，民族主义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都是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它们同样只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获得成功。而且任何地区的胜利，都将在地缘上扩大工人阶级的力量，通过减少剥削区域沉重打击国际资本主义，加速革命向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蔓延。<sup>[57]</sup>毫不奇怪，托洛茨基逐渐把20世纪看作是不断革命的时代。<sup>[58]</sup>

## 6. 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

毫无疑问，托洛茨基的主要思想成就，是他对沙皇俄国工业化导致的政治发展的理解。他比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准确地预言了推翻沙皇专制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顺序：1917年的历史与他十年前的预测大体一致。此外，托洛茨基比其他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更敏锐地认识到，这样一场革命将要面临的困难。因而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困难出现时，他更有可能不会低估这些困难，即使他并没有为克服这些困难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尽管在革命后的年代，托洛茨基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错误和反复，但他的理论的深度和连贯性都远远超过布哈林和斯大林。

对托洛茨基政治经济学的广泛支持，来自具有最强烈的理论倾向的西方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sup>[59]</sup>他对沙皇俄国工业发展的详尽分析，就是以类似托洛茨基使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他对专制统治下工业化逻辑的描述与托洛茨基相类似。他把俄国发展的独特性作为大陆模式的一部分，充实了托洛茨基对1789-1905年欧洲革命序列的分析。此外，通过对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对理解落后地区的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的强调，格申克龙对托洛茨基把他的理论应用到俄国的西方地区提供了支持。当然，这种理论的普遍化对马克思自己的分析提出了重大挑战。尽管资本主义代表了一种正在普遍化的生产方式，但是在托洛茨基看来，

作为历史转型的发动机，它并不像马克思本人暗示的那样强大有力。在这一点上，经验证据明显地支持了托洛茨基：在英国和法国——马克思眼中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样本，旧制度的主要因素在整个19世纪一直存在。这已经成为现代欧洲史学的主题。<sup>[60]</sup>

也可以为把托洛茨基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一般理论应用于俄国的东方地区提供支持。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带来了资本占支配地位的全球经济，但是，它并没有像《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sup>[61]</sup>相反地，正如托洛茨基理解的那样，它产生了一个复杂的分工的等级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通常使自己适应资本的要求，而不是被它消灭。因此，托洛茨基的著作，可以被视为是194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的最早的例子之一。<sup>[62]</sup>

托洛茨基更为具体的“时代概念”的有效性显然是值得怀疑的：1914年并没有引发大国之间的一系列帝国主义战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稳定的资本积累，并没有像托洛茨基认为的那样已经结束，而且正式的殖民帝国已经瓦解。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能够适应转型形式，它的灵活性比托洛茨基预计的要大。然而，20世纪上半叶托洛茨基的观点，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历史是一致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见证了一系列最漫长、最深重的危机。这不能被视为是纯粹偶然的情况造成的结果。在托洛茨基设想的形式中，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为了有效地运行，资本主义要求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一个类似于民族国家在自己疆域内形成的组织。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组织的重要雏形是由英国的海上霸权提供的。自20世纪中期开始，一个更加全面的美国霸权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在这两段时间之间，由单一民族国家行使国际霸权的经济基础并不存在，并且类似的替代组织也不存在。结果，欧洲军国主义势力高涨，国际经济遭到大规模的破坏，爆发了彰显帝国主义野心的两次世界大战。<sup>[63]</sup>

此外，也就是托洛茨基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为理解这一中间阶段为什么是一个过渡期提供了基础。他承认，相对于美国而言，欧洲战争削弱了重要的好战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到20世纪20年代，在同欧洲相联系时，美国已开始展示它的经济力量，它的长期利益在于瓦解所有的殖民帝国，以便实施“门户开放”政策。<sup>[64]</sup>托洛茨基没有意识到这对他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因为他坚持西方资本主义陷入了一场仅靠自身无法从中解脱的危机。相反地，他坚信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断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相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是唯一的选择。但是，与大多数持同样的总体的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在个别孤

立的要点上，他对未来持有的观点具有更少的决定论的特征。

## 7. 托洛茨基马克思主义的不足

按第二国际时期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托洛茨基思想中的非决定论特征，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缺点的潜在来源。不平衡和综合发展以及不断革命的概念，源自历史“特殊性”的观念，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停止证明它们的重要性。<sup>[65]</sup>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的主张势必受到削弱。因此，托洛茨基体系的主要困难在于，他在承认历史特殊性的支配作用的同时，试图提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尽管托洛茨基具有弱化对自己论点中的关键之处进行解释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特征的真实程度。<sup>[66]</sup>

我们可以从他的著作的许多特征中看出这一点。托洛茨基对不断革命论的最初表述，是把它当作必然的事件的序列。然而，在1917年革命取得明显胜利时，托洛茨基因为采纳了布尔什维克的唯意志论而削弱了它。这是对他先前立场的重大逆转，他先前的立场倾向于建立一个结构松散的群众政党，本质上是孟什维克式的。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孟什维主义中包含的机会主义的危险，但是，他相信当新的群众起义爆发时，客观事件自身的力量将会迫使孟什维克采纳不断革命论。结果，“取代”的威胁——布尔什维克党取代阶级成为革命斗争的主体——被视为一个更大的危险。二月革命之后，大多数孟什维克采取的阶级调和政策，最终使他相信列宁在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集中化的党组织问题上的毫不妥协是正确的。如果只是从隐含意上理解，托洛茨基现在不得不接受不断革命并不是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列宁描述的通过“普鲁士”道路完成俄国的现代化显然是可能的。自此以后，托洛茨基就这一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强调“主观”因素是革命成功必然的前提条件。<sup>[67]</sup>事实上，他的观点简化为：俄国之外革命力量的失败是领导不当的结果，并且如果没有列宁，俄国革命本身也将会夭折。<sup>[68]</sup>这是带有复仇性质的唯意志论。

托洛茨基在把不断革命论普遍化时，也存在类似的缺陷，不断革命论源自对俄国经济发展的深刻的分析。在把它应用于更广泛的地区时，他没有为这种理论提供类似的分析，他以帝国主义在整个东方再生产出类似俄国的那些特性为由，撇开了实际的民族的特殊性。毫无疑问，马克思遗产中的某些因素推动了这种情况的出现，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渗透之前，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整个非西方世界的特征的观点，推动了这种情况。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托洛茨基在把自己

的理论普遍化时存在的肤浅性，在1945年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实际革命中显露无疑：没有哪一个革命遵循了不断革命的模式。东欧是通过红军的占领苏维埃化的；中国的革命是通过城市知识分子组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获得成功的；古巴革命、越南、埃塞俄比亚和其它地方的革命，很少出现无产阶级领导的迹象。<sup>[69]</sup>

此外，借助于托洛茨基首先明确表达的这一概念，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欧洲之外的国家的结构和历史的多样性。按照托洛茨基的方法，甚至比托洛茨基更接近于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者展现了内在于托洛茨基最好的著作中的非决定论特征。在他们的手中，世界经济成了不同模式接合的拼盆，而马克思主义自身被简化为理解这个拼盘必须的“工具箱”。就算是同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最初主题的连续性被保持了，它也只是通过诉诸于专制政党的所谓的权力，寻求在不存在苏联过去那样情况的地方复制苏联的历史。因而马克思主义成了东欧政治结构和第三世界民族运动的借口。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和托洛茨基还存在另一处明显的联系。在他早期著作中，最主要的缺陷在于把不断革命与社会主义联系的方式上。托洛茨基声称，只要革命被扩大到国际范围，俄国不断革命的成功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步。但是，他从没有为这种观点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而且根据普列汉诺夫清晰表达的相反的观点（参见以上第八章），这种“疏忽”尤为麻烦。这种省略与托洛茨基的后革命社会的观点有关。尽管它不反对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进行人道主义式的描述，<sup>[70]</sup>但是，在他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中，这种人道主义是普遍缺乏的，在过渡中，生产关系的根本变化，等同于废除私有财产和结束商品生产，而对生产的专制管理仍然不变，<sup>[71]</sup>因此，直到20世纪40年他的生命结束时，托洛茨基仍然把苏联描述为“工人国家”（尽管是一种退化形式的），这恰恰是因为没有恢复私有制。<sup>[72]</sup>

托洛茨基试图通过把革命扩大到国际范围，以复活马克思主义，也因其总是倾向于简化他对争论中的关键问题的解释而受到诟病。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经济基础问题，没有被加以详细说明。到底它是一个规模经济问题、消费不足问题，是垄断的超额利润产生的剩余资本问题，还是其它一些问题，他从来没有明确地指明。在某些方面，托洛茨基的视角与卢森堡的有点相像。有时候，他暗示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长期的市场短缺。如果这是托洛茨基的观点，还容易理解。在一战前，帕尔乌斯持这一观点，并影响了卢森堡和考茨基（参见以上第四和第五章）。<sup>[73]</sup>但是，托洛茨基从来没有明确阐述帝国主义对抗背后的经济机制。因此，他对危机的分析差不多成了一种循环

论证：战争是矛盾的唯一证据，而矛盾又被用来解释战争。

这与他后革命的立场存在某些联系。托洛茨基没有对不同的帝国主义经济进行区分，尤其是在对战争中的帝国主义关系进行的说明中，缺乏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概念。相反，他表明，所有的“大国”都面临着几乎同样的问题：为有效利用它们的生产力找到充足的市场。这意味着他的视角与列宁的截然不同，列宁强调帝国主义力量的不平衡发展，并把它作为自己战争理论的基础。在20世纪20年代，理论上的这种差异，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爆发激烈争论的基础，因为对国际经济的理解成为政策制定的决定性因素（参见以下第十五章）。

毫无意外，建立在这一脆弱的基础之上的世界革命的方案，不可能是有效的。相比之下，倒是1917年托洛茨基为俄国制定的策略得到了证明。但是，正如我们注意到的，这种战略的成功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党获得的，托洛茨基并没有低估这一点的重要性。但是，他确实声称列宁逐渐接受了不断革命论的有效性，并且在关键时刻使它成为了布尔什维克的信条。这未免有点夸张，因为列宁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布哈林的影响，布哈林运用不同于托洛茨基的理论，得出了与他相一致的结论。在转向十月革命之前列宁观点的重大转变之前，我们在以下一章，先探讨布哈林的著作。

---

## 第十二章注释：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2] 明显否认的内容，参见Trotsky,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1923-5) (New York: Pathfinder, 1975), p.96-7; 205-6; *The History of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1977; written in 1930) p.1219; *The Living Thoughts of Karl Marx* (Greenwich, Conn.: Fawcett, 1963; first published in 1939), p.46.

[3] 参见L.Trotsky, 1905(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first published in 1909) p.v; and L.Trotsky, *Our Revolution* (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1973; 由写于1914-1917年的论文构成)。

[4] L.Trotsky, *Result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69; 写于1906年) in L. 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and Result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69), pp.29-122.

[5] 托洛茨基基本思想的总结参见如下著作：1905, p.v; *Permanent Revolu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30), p.76-281; My Life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0; 首版于1930年) p.171-2; 221-2, 370; and Stalin (New York: Stein & Day, 1967; 在1940年托洛茨基去世时仍未完成) p.439-40.

[6] Results and Prospects, pp.78, 101, 129; 1905, p.315.

[7] Permanent Revolution, p.193; History, p.331.

[8] 托洛茨基把1905年革命的失败归结为(农民)军队对国家的忠诚; 见 Our Revolution, p.156; 1905 pp.55, 98; 255; 263; 295; 325.

[9] Results and Prospects, p.63.

[10] Ibid, pp 76, 105, 115.

[11] 1905, pp.35, 76; History, p402.

[12] Results and Prospects, p.30, 105.

[13] Ibid, p.108.

[14] R. B. Day, Le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认为托洛茨基指出的把革命扩展到西方国家的主要观点是基于政治方面的需要, 而非经济方面的需要。根据Day 的观点, 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 是无产阶级没有能力完全支配农民, 而不是生产力欠发达这一核心问题。有证据显示, 这是托洛茨基1906年的观点; 参见Results and Prospects, pp.82-99. 和R. Larsson, Theories of Revolution (Stockholm: Almqvist and Wiksell, 1970), pp.290-2, 338. 但是, 证据决不是决定性的; 并且, 即使Day的解释可以接受, 我们也难以相信他的另一个相关论点, 即托洛茨基首先提出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1914年, 托洛茨基就这样做了, 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 他的论点在逻辑上遵循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世界经济的分析(参见本章第5节和以下第十五章)。

[15] 在大多数其他理论家看来, 托洛茨基有时候对未来的可能性显示出更为灵活的态度; 比如, 参见: 1905, pp.279-83.

[16] 1905, p. 8.

[17] Our Revolution, pp.69-72; Results and Prospects, p.37-45; 1905, 3-11; M.Sawer, 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pp179-81.

[18] Results and Prospects, p.37-51; 1905, pp.3-22; History, pp.25-37.

[19] 1905, pp.31, 177; History, pp.67-8, 858.

[20] 1905, pp.43, 236, 294, 390; Our Revolution, pp.153.

[21] Results and Prospects, p.52, 61, 72, 193; 1905, pp.98, 103, 187, 277; History,



pp.30.

[22] Results and Prospects, p.72.

[23] Our Revolution, pp.173, 175, 201; 1905, pp.40; History, pp.872, 1174.

[24] Our Revolution, pp.173, 175, 201; 1905, pp.40; History, pp.872, 1174.

[25] Results and Prospects, p.63; Permanent Revolution, pp.180-1; My Life, pp.223.

[26] Results and Prospects, p.76; History, pp.65-6, 71-2; Sawyer, Marxism, pp.184-5.

[27] B. Knei-Paz, 'Trotsky, Marxism and the Revolution of Backwardness', in S. Avineri (ed.), The Varieties of Marxism, (The Hager: Martinus Nijhoff, 1977), pp.65-81.

[28] 托洛茨基对这一点的认识, 参见 History, pp.30,472,906.

[29] Results and Prospects, p. 37f, 62ff; 1905, pp.3f, 332ff.

[30] History, pp.471, 1175.

[31] See Z. A. B. Zeman and W. B. Scharlau, 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A. I. Solzhenitsyn, Lenin in Zurich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6).

[32] 对帕尔乌斯的思想的说明, 参见 Zeman and Scharlau, Merchant; I.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pp.98-116, and H. Schurer,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Lev Trotsky', in L. Labeledz (ed.), Revisionism(London: Allen and Unwin,1962), pp.67-76.

[33] Deutscher, Prophet Armed, pp.219-20.

[34] Larsson, Theories, pp.182-95, 303-4.

[35] Our Revolution, 1905.

[36] Larsson, Theories.

[37] Ibid, pp256-68, 301, 311, 319-21.

[38] K. Marx,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pp.19-23.

[39] K. Marx, Grundrisse(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pp.278.

[40] K. Marx, Pre-Capitalism Economic Formation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4) edited by E. J. Hobsbawm; P. Anderson, Passage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Verso,1974); K. Marx,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in K. Marx and F. Engles, Se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0),vol.14, pp53-54;《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678-705页。 D. Mitrany, *Marx Against Peasants*(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holson, 1951); M. Duggett, *Marx on Peasants*,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2, 1975, pp159-82.

[41] *Results and Prospects*, p.34, 60, 80.

[42] 1905, pp.302;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p.168, 178, 208.

[43]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p.230, 239.

[44] 1905, pp.317;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p.254; *History*, pp.334.

[45] K. Marx, *The Revolution of 1848*(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p.330; *Results and Prospects*, pp.130;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p.130; Larsson, *Theories*, pp.17-107.

[46] *Results and Prospects*, pp.52-61.

[47] 1905, pp. viii, 55; *Results and Prospects*, pp.65, 105, 110; *Permanent Revolution*, p.179; Deutscher, *op. cit.*, p.178; Larsson, *op. cit.*, pp.256-76; B. Knei-Paz,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on Trotsk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71-2; 列宁的某些观点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托洛茨基的看法; 参见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0-70), IX, p.236; 参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列宁全集》第11卷, 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217-225页; 也可参见Larsson, *op.cit.*, pp.252-304.

[48] *Results and Prospects*, pp. 29, 73, 77, 116; 1905, pp.275, 286, 302, 322, 336;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p.126, 189;也可参见 *History*, pp.323, 1025; and *Stalin*, pp.422-434.

[49] Trotsky, *The Age of Permanent Revolution*(New York: Dell, 1964) edited and introduction by Deutscher, pp.71-83; Trotsky, *The Bolsheviks and World Peace*(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 1973) (written in under the title of *The War and International*).

[50] *Age*, pp.79, 81, 187; *Bolsheviks*, pp.236; *Living Thoughts*, pp.49.

[51] 1905, pp.322;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p.146; *History*, pp.1219-1257; *Living Thoughts*, pp.47.

[52]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255; *History*, pp.907, 1025; *Age*, pp.167, 186.

[53]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p.129, 133, 254; *History*, pp.991; *Age*, pp.121, 145, 252.

[54] Trotsky, *Political Profiles*(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 1972) (composed

very largely of essays written before 1917) pp.28-9; Bolsheviks, p.213; Age, pp.119, 128, 130, 167, 196, 230, 248; History, pp.39, 63, 269, 477, 507, 1025; Living Thoughts, pp.48.

[55] Political Profiles, pp.8, 31, 77, 125; Age, pp.73, 123, 181; Bolsheviks, p.24, 42, 80, 101, 103, 183, 212; Living Thoughts, pp.43.

[56] Permanent Revolution, p.148, 194, 196, 205, 246, 276; Age, pp.192, 229, 241, 293; History, pp.19, 35, 889, 899, 906, 909, 912.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之前,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论一般化的倾向比较明显。参见 L. Trotsky,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Monad Press, 1972) vol.1, p.222, 236-7; vol.2, p.284.

[57] Age, pp.129, 236.

[58] History, pp.907.

[59] 尤其是参见A.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60] A. J. Maye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Pantheon, 1981); B. Moor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 P.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0); P. Anderson, 'The Figures of Descent', New Left Review, 161, January/February 1987, pp.20-77; G. Ingham, Capitalism Divided? The City and Industry in British Social Development (London: Macmillan, 1984), 也可参见以上第十一章。

[6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62] A. Brewer, Marxism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63] 有关这些问题参见G.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3) pp.31-3, 110, 115-17; G. Lichtheim, Imperialism (London: Allen Lane, 1971) pp.29, 66, 71-9, 86, 88, 90-1, 93, 120; J. A. Mose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London: Prior, 1975); M. White, Power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6) pp.42-3, 55-6, 73, 75, 84, 101-4, 137-8, 144, 184, 200, 280, 290, 293, 297; V. Kiernan, Marxism and Imperial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4) ch.3.

[64] Trotsky, Europe and America (Colombo: Lanka Samasamaja, 1951) (written in the mid-1920); see also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1, pp.104, 181-4, 193-6; vol. 2, p.328.

[65] 1905, pp. 327-45; History.

[66] 沿着这一思路对托洛茨基思想的不同批评, 参见P. Beilharz, *Trotsky, Trotskyism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London: Croom Helm, 1987).

[67] L. Trotsky, *Our Political Tasks* (London: New Park, n.d) (写于1904年); *Political Profiles; Results and Prospects*, pp.30, 114; *Permanent Revolution*, p.173; 1905, pp.104, 251; *Age*, p.87; *My Life*, pp.148, 161, 204, 218, 333; M. Liebman, *Leninism Under Lenin* (London: Merlin, 1975) p.78.但是, 在1917年期间, 列宁明显偏离了他早期的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观点; 参见以下第十三章。只有在内战期间, 托洛茨基对布尔什维克的承诺明显地显现出来。

[68] *Challenge* (1923-25), pp.164-258; *My Life*, pp. xxxi, 176, 330; 也可参见 Deutscher, *The Prophet Outc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240-51.

[69] T. Cliff, *Permanent Revolution* (London: Bookmarks, 1983); M.Lowy, *The Politics of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1981); Deutscher, Introduction, in Trotsky, *The Age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New York:Dell, 1964) pp.13-40; J.Molyneux, *Leon Trotsky's Theory of Revolution* (Brighton:Harvest, 1981) pp.44-6.

[70] 比如, 参见: *Age*, pp.360-5.

[71] J. Molyneux, *Trotsky's Theory; Result and Prospects*, p.88; *Permanent Revolution*, p.132.

[72] Trotsky, *The Revolution Betrayed* (New York: Pathfinder, 1972; first published in 1937).

[73] R. B. Day, *Le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2-14; R. B. Day, *The 'Crisis' and 'Crash': Soviet Studies of the West (1917-1939)*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p.43-4; Zeman and W. B. Scharlau, *Merchant*. Also see chapter 15, section VIII, below.

## 第十三章 帝国主义和战争：布哈林和列宁论垄断资本主义，1914—1917

### 1. 战争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并没有立即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他也许认为俄国的落后阻塞了除民主革命外的任何其他变革。尽管在列宁战争年代的著述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本质表现得更为突出，但写于1916年的《帝国主义论》中的大部分原理，<sup>[1]</sup>可以在他战前的著述中找到，<sup>[2]</sup>直到1917年开头几个月，他仍然热衷于对“民主专政”的分析。<sup>[3]</sup>同样，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仍然致力于对战前经济的分析，坚持要同自由资产阶级建立同盟。只有托洛茨基对他的不断革命论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正如我们在以上第十二章中看到的那样，这一变化强化而非弱化了他之前的结论。

然而，战争并没有改变政治路线。大部分孟什维克，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都支持民族防御。只有由马尔托夫领导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完全否定通过“防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者都调和到和平纲领的基础上。这使得他们更接近于许多布尔什维克，但列宁的立场更为极端。列宁采纳的是一种“革命失败主义”立场，旨在将帝国主义的冲突转变为因军事失败引起的一系列内战。与此同时，列宁痛斥了竭力相信保卫“大国”的人，对“第二国际”作了谴责，强调建立一个新的忠于革命和革命战争的社会主义者组织的必要性。列宁将国际社会主义的破裂，视为类似于俄国1903年的分裂事件，但这一次他很快采取了一种不妥协的立场，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只是它在俄国的分支。<sup>[4]</sup>在这方面，他常常与其他激进分子包括某些布尔什维克发生争执。

在整个战争年代，列宁一直信奉这些原则，而且随着战争的推延，他不断地修改他的经济学和革命策略。虽然列宁对战争开始时的敌对行为感到诧异，<sup>[5]</sup>后来他有时也强调这种对立的政治原因，<sup>[6]</sup>但他很快就将战争视为他在1914年以前已观察到的基本经济变化的反映。战争既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只具有短暂的重要意义，相反，它标志着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最新阶段的到来，开辟了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sup>[7]</sup>这些问题，不再像在1914年之前那样，被当作是次要的主题；俄国社会的具体问题，不再是列宁思考的主题。

最初，列宁将希法亭对金融资本的分析（以上第五章作了概括），视为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关键，<sup>[8]</sup>尽管他认为《金融资本》的作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阶段可能造成的革命性的后果。<sup>[9]</sup>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宁开始修改他的经济学，用一种更为激进的方式解释其政治意义。毫无疑问，在这里，尼古拉·布哈林成为列宁理论上的促进因素，布哈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对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作了阐述，这种经济学认为，俄国唯一可能发生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到1915年时，布哈林对他的理论基础作了完善，在随后的两年间，列宁将这些理论吸收到自己的分析中。他并非不加批判地照搬，他对布哈林的著作始终有些怀疑，到1917年时，他有关适合于俄国革命的形式及其可能的后果的观点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布哈林的影响。

####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小传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1888年生于莫斯科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0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当时他还是莫斯科大学的一名学生。多次被捕后，1911年成为一名流亡者。1912年布哈林与列宁第一次相遇，1913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经济学（参加过庞巴维克讲座）。1917年，作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他在夺取首都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他担任了很多重要职位，包括《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主席，但他从来没有担任过政府职务。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几乎全部来自他的理论著作，他的思想在构建1923~1928年苏维埃国内政策上发挥了突出的作用。1929年后，他失去了真正的影响。1938年，成为臭名昭著的“公开审判”的一名被告，同年，遵照斯大林的命令，布哈林被处决。

## 2. 布哈林论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国家

战争使布哈林达到对更高的上层建筑的分析。他将边际主义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视为源于金融资本所有制关系变化产生的“有闲阶级”的意识形态，他试图揭露其自相矛盾的肤浅的推理。<sup>[10]</sup>他对边际主义方法论和实质的批判追随了希法亭、博特凯维兹和帕尔乌斯（参见以上第三章），但是他对新古典主义意识形态性质的说明是独创性的，清晰地与资本集中相联系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观点相吻合。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新奥地利经济学是

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并以有利于布哈林认为的“食利者”或寄生性的持股阶级的消费为导向。<sup>[11]</sup>即便如此，布哈林未能克服所有意识形态分析的根本的困难，也就是说，在对物质基础的分析上，他没有提供比其他人的分析更为准确的判断标准。<sup>[12]</sup>布哈林忽视了其它形式的边际主义，尤其是关注生产和分配的美国边际主义提出的问题。<sup>[13]</sup>这个问题可能确实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重大转变，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而不是19世纪晚期——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新古典主义分析仍然在发展新的形式。<sup>[14]</sup>

布哈林仍然坚持其观点，<sup>[15]</sup>但是战争促使他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重新作出思考，而不是继续对资产阶级意识的研究。他主要的仍然是依靠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尽管在强调的内容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大部分内容写于1915年的《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sup>[16]</sup>，把现代资本主义概念化为一种世界体系。希法亭集中关注的是先进国家的经济结构。布哈林追随罗莎·卢森堡——虽然不是她的消费不足经济学——将所有国家的经济看作是世界市场的构成部分，它们都遵循世界市场规律。<sup>[17]</sup>这些规律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sup>[18]</sup>“大国”都已经成为“有组织”的实体中的一员，在这个实体内，价值规律是无效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转移到世界经济中，马克思的范畴对此仍然是适用的。它们影响了各个国家的个别经济，但是通过国际关系进行的。与希法亭不同的是，布哈林认为，危机的纯粹的内部基础，已经因“国家资本主义”内“组织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而消除了。<sup>[19]</sup>

这意味着经济单位被进一步政治化了；它们的分离变成了一个国家边界问题，它们的竞争是通过国家体系进行调节的。这种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像托洛茨基一样（参见以上第十二章），布哈林相信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可以有效运行的界限。<sup>[20]</sup>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因为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和利润率的下降被迫国际化，这两者都反映了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sup>[21]</sup>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其中包括帝国主义的兼并。<sup>[22]</sup>同时还包括一国内的资本的联合，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集中和积聚产生了垄断：随着金融资本出现发展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甚至出现了更为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sup>[23]</sup>世界市场的参与主体和国家体系保持一致，竞争在国家之间以对抗的形式出现。<sup>[24]</sup>所以，尽管布哈林可能赞同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但是他会补充说，政治本身已融入经济之中。<sup>[25]</sup>

在布哈林看来，同时作用于“民族化”和“国际化”的资本的两种力量，确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它们证明了布哈林把希法亭阐述的现象综合

进来的观点。在《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一书中，布哈林在学术上受惠于希法亭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对希法亭思想的重新构思中，布哈林形成了他自己三大重要贡献中的第一个。他的第二个独创性的观点在于，主张资本的国家集中化已经超越了金融资本，<sup>[26]</sup>并形成一系列“新的利维坦”或准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sup>[27]</sup>战争本身就是新结构的产物，同时加速了新结构的成熟。<sup>[28]</sup>每个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了一种具有新性质的统一体。<sup>[29]</sup>议会已经成为一种时代错误，因为已不再迫切需要一个平台来调和资产阶级不同集团的部门利益。同样的原因，布哈林认为，自由主义的自由已经不复存在。<sup>[30]</sup>因此，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再重要，民主的目标不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通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被阻断了。<sup>[31]</sup>

此外，在布哈林看来，所有的国内机构都处在国家政权的管理之下，包括有组织的劳工和落后的农业资本主义。<sup>[32]</sup>对于前者来说，工人阶级领袖通常只愿意被整合到国家之中，因为他们把国家权力的增长等同于向社会主义的进步。<sup>[33]</sup>他们用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理由取代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布哈林坚持认为，第二国际的崩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sup>[34]</sup>这个过程有其自身特定的物质基础，因为日益扩大的垄断资本的利润被用来为“工人贵族”和官僚政治官员的特权提供资金。<sup>[35]</sup>然而，机会主义者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世界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最先带来的只能是一系列的世界战争。不断增加的人民大众的苦难，最终将打破改良主义者的幻想并导致革命。<sup>[36]</sup>在布哈林看来，危机变成了战争的同义语。他所理解的同卢森堡和托洛茨基一样，唯一的选择就是：社会主义或野蛮。

资本的“民族化”和“国际化”这两种并行不悖的趋势，为这两种可能奠定了基础。布哈林甚至比希法亭还肯定地认为战争是必然的：与其说它是由环境决定的可以实施也可以放弃的“政策”，不如说它是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结构的必然结果。<sup>[37]</sup>然而，他同时且再一次比希法亭更加肯定地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组织化”已经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打下了基础，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sup>[38]</sup>纯粹的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指标，与评价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无关，资本主义是一种涵盖了全球的世界经济。但是由于它分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单位，不存在实现进一步“组织化”的可能。在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概念中，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会协调他们的帝国主义剥削（以上第六章作了概述）。布哈林承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实际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国际资本主义不同部分的经济状况的多样性，使这种协定行不通。特别是，具有更为发达的生产力和较低的生产成本的生产者，或者有更强大的国家力量受其影响



的生产者，他们缺乏长期遵守国际卡特尔规定的兴趣。从而，从实践上看，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是无法实现的。<sup>[39]</sup>

列宁用类似的观点对考茨基作了驳斥（参见以下第4节），而且驳斥得更加有力。布哈林理论的一个普遍特征在于，低估了世界经济不同部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参见以下第3节）。<sup>[40]</sup>相比之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理论，主要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基础之上。因此，布哈林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批评具有矫揉造作的特征。他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才能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孤立地看，布哈林对考茨基的批评是很合理的，但作为他自己的帝国主义理论的一部分，这种批评与他的经济学的一般特征是相冲突的。因此，列宁对超帝国主义的分析虽然缺少独创性，但列宁的批评与他有关帝国主义的总体见解是一致的，布哈林的观点不具备这种一致性。<sup>[41]</sup>

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第三个原创性发展在于，他认识到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定本质决定了它被推翻的形式。在这个问题上，他完全不同于希法亭，后者认为简单地接管现有的国家机器作为无产阶级权力工具，毫无疑问是可行的。在布哈林看来，这是错误的“伯恩施坦主义”，它已经传染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参见以上第四章和以下第十四章）。<sup>[42]</sup>由于国家组织已经与资本主义经济融合在一起，所以现有的国家必然无法满足新生产方式的需要。“帝国主义国家”是一种只适合于资本主义最新阶段的特定的历史形式。相反，无产阶级不是控制而是必须打碎所有现存的政治形式，并通过建立适合于新社会的结构实施自己的专政。<sup>[43]</sup>

在这里，布哈林恢复了马克思对国家的敌意的观点，并提供一种经济学的论证，在这种经济学中，能够发现与潘涅库克和其他“左翼共产主义者”所坚持的类似的政治学观点。<sup>[44]</sup>布哈林这样做，为区分改良和革命提供了一种清晰的要素。同时，他含蓄地否认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在国家资本主义下，“政治”是“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之亦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发挥作用的、有组织的民族国家的“主体”是帝国主义国家，世界市场的关系与国家体系的关系几乎相同。<sup>[45]</sup>

### 3. 布哈林、托洛茨基和列宁

正如在以上第十二章看到的，托洛茨基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包含了类似的看法：历史唯物主义需要作重大的修正。托洛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结论，撇开他的消费不足论的特征，是可以与布哈林的结论相容的。除此之外，这

两位理论家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布哈林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的纯粹性，他没有托洛茨基理解的那种“综合发展”的概念。除了在同考茨基的争论中，布哈林没有强调不平衡发展。他当然知道世界经济中的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先进，国家内部的经济条件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不认为这些差异在解释问题上有什么价值。相反，他强调帝国主义对现代化的影响，认为大城市中心的组织化削弱了经济落后的重要意义。这样，原始农业和先进工业通过帝国主义吞并和有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结构融合起来。<sup>[46]</sup>布哈林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的矛盾源于它的现代性，而不是它的不完善和不完全发展。从而俄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他的信念——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必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中，起不到任何作用。<sup>[47]</sup>

列宁的立场与布哈林的立场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不只在在于这种关系总在变化。列宁在三个基本问题上，是赞同布哈林观点的。列宁认为，战争源于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其“最高”阶段，并产生了能在先进的西方国家中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形势；第二国际中出现的机会主义并非偶然，而是源自帝国主义的本质。尽管如此，在战争开头两年，列宁同样持保留态度，他们都关注了布哈林和希法亭不同的地方。这清晰地体现在列宁对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sup>[48]</sup>所作的序言中，特别体现在列宁第二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sup>[49]</sup>中。在后一本著作中，列宁强调希法亭和霍布森的重要性，声称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论述，“恐怕都没有超出这两位作者所阐述的。”<sup>[50]</sup>

毫无疑问，列宁认为布哈林描绘了一幅夸张而又存在过度简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图景。<sup>[51]</sup>至少到1916年中期，列宁才接受用“国家资本主义”描述大都会城市中心的特征，他从来不认为垄断消除了单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矛盾。事实上，他坚持相反的看法：因为垄断只是部分程度上的垄断，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的利益冲突仍然存在，一旦发生危机，垄断就阻碍了市场机制达到一个新的均衡。<sup>[52]</sup>此外，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正是俄国整体上的落后，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而不同的单个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地位的变化是战争爆发的原因。在列宁看来，世界被“大国”完全瓜分和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成为军事对抗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像布哈林认为的那样，战争是国家内经济消除了竞争，并把它完全转移到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中造成的结果。

另外，列宁认为，布哈林的国家理论接近于无政府主义。同时，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与考茨基的非常接近，考茨基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看作是对现存国家机器的完全控制。<sup>[53]</sup>1917年前，列宁也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爆发的可能性，他严厉地批评了布哈林更为一般性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民主问

题——尤其是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权问题——由于经济的发展变成了多余的。此外，他反对布哈林将农民排除在无产阶级联盟之外，同时认为布哈林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也有失误。<sup>[54]</sup>

因此，尽管他们相互尊重，但列宁和布哈林的关系在战争期间是很不融洽的。在1916年末和1917年初，这两位理论家达成重要的和解，主要是列宁转向了布哈林的观点而非相反的情况。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情：因为19世纪90年代之后，列宁很难在重要的理论问题上认同其他人的观点，而且在这些年的早些时候，他的灵活性也只是昙花一现（参见以上第十一章）。在1903年与孟什维克决裂后，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理论问题上也是极其独断的，他强制性地驱逐了很多反对者。<sup>[55]</sup>现在，在一些至关重要的观点上，他开始背离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在我们考察这一点之前，必须先研究一下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著作写于列宁仍在与布哈林发生争执的1916年。

#### 4.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向布哈林的转向

列宁以“通俗的论述”为副标题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没有什么原创性，仅仅是对一些重要的机构和关系进行了概述，他认为在当时这些机构和关系能够勾画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特征<sup>[56]</sup>。很多研究成果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研究的基础<sup>[57]</sup>，这个小册子实际上只是列宁先前一些观点的系统化，先前的观点是以一种相对晦涩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从而很难进行评价（参见以下第6节）。列宁主要参考了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相对于希法亭来说，英国自由主义者J.A.霍布森的著作也影响了列宁<sup>[58]</sup>。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只有一次顺便提及布哈林。<sup>[59]</sup>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笔记，清楚地指出希法亭存在不足之处。<sup>[60]</sup>笔记显示，在当时，只在现代资本主义独特的寄生性这一观点上，列宁受到了布哈林的影响。<sup>[61]</sup>然而，这反映的可能是《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而不是《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列宁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变化，实际上发生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出版之后。但是这部著作在列宁逝世后取得了经典地位，并因此掩盖了在列宁思想的演变过程中，它只具有第二位重要性的事实。

列宁把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虽然有时候以一种更为狭义的方式使用这一术语）视为同义语。从“纯粹的经济的概念”看，帝国主义有五个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sup>[62]</sup>

列宁文本的大部分内容，致力于对这一定义不同方面的经验证据的论述，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理论<sup>[63]</sup>的批评，以及对改良主义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创造的“工人贵族”这一信念的阐述。<sup>[64]</sup>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出现，不早于20世纪初。<sup>[65]</sup>然而，无论是对帝国主义同竞争性资本主义的联系，还是对帝国主义不同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列宁都没有予以详细的说明，而对帝国主义根本特征背后的因果机制的分析，也往往是晦涩的。比如，在资本输出这一重要问题上，列宁提到了大城市中心积累的“过剩资本”，但却没有解释为什么缺乏内部投资机会。他以赞同的态度提到霍布森，提到他接受了长期消费不足的观点。但是，列宁在19世纪80年代与民粹主义的争论中，已阐明了这种理论中存在的种种困难（参见以上第九章）。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或其他战争时期的著述中，他没有说明他已经对自己早期观点作了修改，而且希法亭也分析资本输出，但忽视了消费不足（参见以上第五章）。希法亭和布哈林都求助于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但这一点在列宁的分析中没有出现。<sup>[66]</sup>

在列宁那里，相对清晰的地方是他对帝国主义后果的分析。尤其是他强调世界被瓜分完毕和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一再发生的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不可避免。在这一点上，他的立场比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的立场更为坚定。在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时，列宁坚持认为，20世纪早期英帝国和法帝国控制的殖民地的面积，同它们的经济实力相比要大得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德国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为了获得充足的市场，同时也为了确保得到原材料和保护海外投资的领域，德国被迫诉诸军事侵略以便能重新瓜分其他国家的殖民地。<sup>[67]</sup>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列宁认为，在世界被瓜分完毕的背景下，持续的不平衡发展将动摇和平的基础。

如本章上一节看到的那样，列宁赋予这些现象的重要意义，使得他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的批评远比布哈林的批评有力。同布哈林和希法亭一样，列宁认为资本的集中化是一种持续存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理论上形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联合剥削世界的可能性。与布哈林和希法亭一样，列宁也承认国际卡特尔的存在，这意味着考茨基的思想并不是没有依据。<sup>[68]</sup>但是，列宁认为，任何超帝国主义的协定都是暂时的，因为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必然会破坏它，并带来进一步的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sup>[69]</sup>

布哈林和列宁都否定了考茨基关于经济领土的扩张仅限于正式的农业区殖民地的观点。<sup>[70]</sup>列宁有关资本输出目的地的资料表明，殖民地在资本输出中并没有占据重要的位置。<sup>[71]</sup>而且，列宁明确地承认，帝国主义的统治无需正式的政治控制，兼并不必仅限于农业区，或仅限于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sup>[72]</sup>同时，他十分正确地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他关注的中心问题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背景下的垄断，垄断的需要可以通过一些不涉及直接的政治控制、对农业区的统治、对欧洲以外地区的殖民的方式来实现。在其他地方，列宁注意到，很多真正的帝国主义国家并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sup>[73]</sup>有一段内容可能来自托洛茨基，这段内容指出了已经融入帝国主义中的非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重要性。这无疑与列宁早期著述中对“普鲁士”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性的认识完全一致（参见以上第十一章）。

然而，在关于垄断和帝国主义扩张对欧洲工人运动影响的问题上，列宁的分析不如布哈林。<sup>[74]</sup>虽然他们思想实质是一致的，都源于恩格斯的思想（参见以上第一章），但列宁的分析不如布哈林缜密，这不单纯是列宁用语粗糙的问题。由于没有能接受布哈林帝国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中活跃的“主体”的观点，列宁的“经济主义”更为明显。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不存在“相对自治”程度比较高的国家进行的斡旋，而根据布哈林的分析，某些国家的“相对自治”程度是相当高的。<sup>[75]</sup>正如我们将要在第6节中看到的那样，两种分析中没有哪种特别令人信服，但布哈林的分析要好一些。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完成后到1917年十月之间的著述表明，列宁至少在布哈林著作具有的其它三个特征上，作出了类似自己的判断。首先，列宁明显地接受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观点，即便是他没有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第二，他承认布哈林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分析是正确的，并对布哈林的分析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扩充；最后，列宁开始认为俄国革命必须超越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这造成了他和他自己政党中大多数人的冲突，而且只有经过艰苦的努力，得到布哈林与托洛茨基的后继者们的支持，他才能够战胜“老布尔什维克”的抵制。即使在那时，他仍然要面对由加米涅夫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右派的持续的负隅顽抗。<sup>[76]</sup>

列宁观点转变的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他在战争开头两年所处的地位的矛盾

造成的，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的观点同他的政治学之间存在矛盾。列宁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信念，在俄国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形式是寄生性的和反动的，<sup>[77]</sup>它们之间的战争威胁到文明本身。<sup>[78]</sup>那么，巩固资本主义基础的革命，应当在什么意义上被视为进步的呢？此外，他的“革命失败主义”的逻辑认为，现存政权的军事失败将有助于革命。那么，无产阶级如何凭借已经开始崩溃的国家机器来确保自己的专政呢？进一步讲，正如我们在以上第十一章所看到的，列宁设想的“民主专政”将采取一种苏维埃结构，这意味着要摧毁沙皇专制的国家机器。那么，在无产阶级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我们为什么将苏维埃从“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无论它的阶级本质是什么，它本身都不是苏维埃的形式——中排除掉呢？

因此，在1914年到1916年之间，列宁主义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混合物。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好战的政权也是如此，现实的发展使列宁意识到帝国主义的概念落后于历史的发展。政府管制和中央计划的加强清楚地表明，布哈林理论中的极端主义至少指向了正确的方向。<sup>[79]</sup>列宁的著作开始使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术语，他认为这个术语适用于最新阶段的资产阶级社会。<sup>[80]</sup>与此同时，他认为即使是这些新的控制手段，也无法维持物质再生产。全面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和对世界经济联系的破坏，使许多国家濒临破产。列宁认为，这种危机在俄国特别明显，从1917年开始，他坚持认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扭转向混乱状态急剧转变的局面。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措施是不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管理机器，必须完全脱离资本的统治并服务于人民群众。<sup>[81]</sup>

列宁相信，战争的进一步后果，是被剥削者在反对资本主义时变得越来越团结。不但俄国的无产阶级，而且贫困的农民和被征服的民族，都逐渐认识到未能制定出社会主义政策就停止的革命，无法满足他们最迫切的要求。在列宁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既能联合不同的财产形态，也能在被压迫阶级中建立新的团结。在帝国主义时代，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才能够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sup>[82]</sup>

列宁思想中的这种巴枯宁主义主题，融合了当时另一种产生于纯粹的思想过程的无政府主义思潮<sup>[83]</sup>。由于布哈林的国家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相联系，列宁对此既感到不安又充满敌意，他开始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研究的最终结果是《国家与革命》的发表，<sup>[84]</sup>这部著作写于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但是这部著作中的结论是在1917年2月沙皇专制被推翻之前得出的，这些结论是对布哈林的超越。列宁坚持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不仅必须被“打碎”，而

且必须由类似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那样的大众参与的民主机构来取代它。社会主义的秩序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从上层发展而来的管理机器和从下层产生的大众的民主机构的联盟来实现。<sup>[85]</sup>

列宁刚突破他先前理解的正统思想，他的新思想就得到明显的经验证明。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在1917年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将俄国置于欧洲革命的前沿。列宁当时认为，首先在俄国出现的社会主义能够引发世界革命。作为无产阶级力量的具体化身，作为新的国际主义的大本营，通过集结革命战争的手段，俄国革命能够扩大到国际范围。这将使一切都变得更容易，因为这样的革命将剥夺英国和法国的重要剥削来源，打破战时同盟。

从而，布哈林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因素被吸收到列宁主义中。然而，这种结合是不完全的，在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两个人之间仍然存在分歧。列宁的观点比布哈林的观点更为具体。他开始接受适用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纲领”是当时最强大的法宝时，他并没有像布哈林那样，放弃与民主革命相关的“最低纲领”。相反，列宁认为后者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时他坚持，“最低纲领”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正如我们在以上第十二章看到的，这也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思想。那么，列宁是在布哈林的影响下，成了另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吗？

## 5. 列宁和“不断革命论”

列宁的观点，在1914年后更接近于托洛茨基的观点，如我们在以上第十一章看到的，他这样做时，已经是从一个很接近于托洛茨基的立场出发。“普鲁士道路”把前资本主义形式和资本主义形式整合在一起，因此“综合发展”的概念已经隐含其中。虽然把自己限制在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措施中，但“民主专政”被认为能够与反对资产阶级的严厉措施相兼容。1917年，列宁走得更远，他进一步主张，任何有效的民主变革，都必须辅之以不断革命论一直坚持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个基础上，列宁增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种专政理论似乎否定了他自己的政党学说，而政党学说正是托洛茨基以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时集中批判的内容。革命本身是有国际目标的，但最初它必须只限于采取特定的集体主义手段，不包含直接的彻底的向社会主义转变，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毫不奇怪，列宁战争期间的著作中，有大量的段落带有不断革命论的味道。<sup>[86]</sup>当然，很多布尔什维克对列宁回到俄国后第一次表明他的新立场的“四

月提纲”<sup>[87]</sup>的反应，就是指责列宁的托洛茨基主义。<sup>[88]</sup>托洛茨基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即他与列宁之间存在的分歧是次要的。直到1940年去世，托洛茨基一直坚持这一立场，其他很多人也赞同他的观点。<sup>[89]</sup>列宁在1919年之前没有读过《结论与展望》的事实，可以被用来为他他对托洛茨基的学说存在明显的误解进行辩解。<sup>[90]</sup>

尽管如此，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仍然存在理论上的差异，其中有些差异在革命之后成为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最明显的是，列宁1917年的著作中表达的“两阶段”革命的观点，并不同于托洛茨基两个革命相嵌在一起的概念<sup>[91]</sup>。另外，列宁并不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整个1917年，他都认为通过军事专政落实“普鲁士”式的解决方法，仍然是极有可能的。<sup>[92]</sup>真正将两位理论家区分开来的，是两者对革命的原因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问题存在不同看法。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列宁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理解，而不是通过以托洛茨基的方式重新解释俄国的“落后”，开始接受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的。在列宁看来，认识到俄国社会形态内部的“综合发展”，无助于解释社会主义革命会成功的原因，“不平衡发展”的因果作用也仅限于国际冲突中。列宁的策略转变，包含了与俄国的内部条件相关的观点；它们与俄国工业化的“特殊性”无关，而与战争造成的影响息息相关。<sup>[93]</sup>

与托洛茨基一样，列宁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一个国际主义的理由，即如果它不能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它就可能失败。<sup>[94]</sup>然而，在这一点上，列宁与托洛茨基存在一个重大的区别：列宁逐渐认为，大部分农民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会保持合作，因为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所有被压迫者的新的团结，为自治和经济计划提供了手段，即使在俄国落后的条件下也是如此。<sup>[95]</sup>但是这也意味着俄国革命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外部，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内部制约因素。在这里，与托洛茨基存在的观点上的分歧，主导了1924年列宁去世后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参见以下第十五章）。列宁将世界革命看作一个长期的进程，其中有挫折也有进步，而且在不同的国家显示出很大的差异。1917年，列宁尽管坚信俄国革命不会在很长时间内孤立无援，<sup>[96]</sup>但他有时又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被继续孤立。<sup>[97]</sup>

正如苏联的编辑们主张的，<sup>[98]</sup>所有这些都不能证明列宁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家，但他的著作的确很容易作出这样的解释，托洛茨基的著作却不具有这一特征。20世纪20年代时，布哈林和斯大林提出，列宁对“一国社会主义”持支持态度，但他们并不像托洛茨基那么固执（参见以下第十五章）。列宁使用了国际主义术语证明十月革命的正当性，但是他也诉诸于国内形势，表明俄国可以在没



有外部援助和根本性的内部冲突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前进。

## 6. 对布尔什维克政治经济的评价

列宁对1917年俄国实际形势的评价极其准确。<sup>[99]</sup>二月革命呈现出一种旨在加强“防御主义”的“沙文主义革命”的特征，他早就认为这是可能的<sup>[100]</sup>；孟什维克的调和主义政策证明，把他们看作机会主义者是正确的<sup>[101]</sup>；而且由于群众及他们在政府中的领导人和苏维埃有不同的目标，如列宁预计的国内危机将进一步加剧。<sup>[102]</sup>在这种情形下，列宁主张，选择要么是右翼的军事专政，要么是为“和平、面包和土地”<sup>[103]</sup>进行进一步的革命。由于难以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进行合作，革命只能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继续推进（参见以上第八章）<sup>[104]</sup>。

早在1914年，列宁就提出，理解国际关系的宽广视角具有其合理的内核。正如以上第十一章所注意到的，存在着制约国际“秩序”形成的结构性难题；“大国”有其帝国主义目标，因此而导致的战争为革命性的变革提供了沃土。自1914年以来的30年，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自诞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们正确地找到了危机的根源，危机的根源在于世界经济的本质，世界经济不但融合为一体，而且发生了十分危险的分裂。

然而，尽管布尔什维克的结论基本上符合实情，但他们得出结论时使用的经济理论不太可靠。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表达的观点，招致了蜂拥而至的批评。考虑到列宁借鉴了希法亭的观点，另外他的结论与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有类似之处，所以，这些负面评价大部分也适用于他们的作品。当然，这四个理论家都存在重要的缺陷，但是，在许多批评者提出的所谓“缺陷”中，很多实际上是错误的。对列宁的批评尤为如此，批评家们往往要么没有将他有关帝国主义的著述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要么未能对这些著作中存有歧义的地方给予以足够的重视。与这些错误联系在一起的，通常是规范的学术实践被中止了，这种中止在评价一个存在较大争议的人物时是不能被宽恕的。<sup>[105]</sup>

由于对“政治学”的相对独立性、对民族主义没有给予以足够的重视，有人认为列宁在理解国际关系时的分析，是一种粗糙的经济主义。<sup>[106]</sup>此外，批评者还认为，19世纪后期，殖民化和资本输出是由不同国家各自的武力决定的。经济动机在领土兼并中往往不重要，而且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落后于对其他地区的资本输出。<sup>[107]</sup>还有人认为，消费不足不是资本国际化的推动力，垄断也不是，因为英国作为最庞大的帝国，它的垄断最不发达。<sup>[108]</sup>最后，有些批评者宣称，根据列宁

的观点，20世纪后半叶的去殖民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应当是灾难性的。<sup>[109]</sup>

所有这些批评，都没有对列宁实际阐述的内容给予足够重视，相反，将焦点集中在反驳被建构出来的对列宁思想的刻板印象上。列宁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接受，必然地证明了他在《帝国主义论》中表达的观点。尤其是，这意味着政治学 and 经济学在他的视角中是融合在一起的，这同布哈林是一样的。即便如此，列宁坚持认为，“政治”因素在理解帝国主义现象时是十分重要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列宁一直这么认为。<sup>[110]</sup>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倒是托洛茨基对当时事件的分析，由于忽略了与“政治”相关的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显得不足。<sup>[111]</sup>列宁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他从没有否认被压迫族群的“民族主义”战争的重要性；他的确认识到，1914年战争的直接原因在于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sup>[112]</sup>对布哈林低估了被征服民族的民族情绪重要性的指责，可能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这是一种列宁本人也多次作过的批评<sup>[113]</sup>。布哈林和列宁都指出了自由——民主规范在先进资本主义地区的减弱，而重新强调了前资本主义价值的重要性。<sup>[114]</sup>

列宁和布哈林都没有提出帝国主义兼并的一般理论，更不用说国际关系的一般理论。他们关注的是他们各自理解的资本主义特定的历史阶段，列宁明确地将其追溯至20世纪初。由于认识到“帝国”在历史上无处不在，<sup>[115]</sup>他们的理论中丝毫没有提到19世纪的殖民化能够单独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经济动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尽管不是很清楚，但无论如何还是在于资本的垄断化，而不在于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后一点是霍布森（而不是列宁）强调的。

<sup>[116]</sup>

列宁和布哈林都认识到，垄断资本主义寻求的控制，并不总是需要通过正式的殖民化来实现。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兼并目标和他们对国外的投资，也并不只限于欧洲以外的地区。<sup>[117]</sup>列宁批评考茨基和卢森堡将帝国主义的扩张等同于对外围地区的殖民化。<sup>[118]</sup>他专心于解释已经被“瓜分”完毕的世界可能产生的后果，而没有对世界是怎样被瓜分的进行说明。<sup>[119]</sup>列宁坚持认为，导致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在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而不是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历史牵涉到的力量，不同于在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占支配地位的力量。<sup>[120]</sup>在这一点上，他与布哈林有极大的不同，但是布哈林强调了现代资本主义下发展起来的、新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竞争形式。托洛茨基甚至没有明确地从事经济学研究；他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无法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参见以上第十二章）。这三个理论家视角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

具有希法亭著作中有的欧洲中心论的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它们与欧洲战争的联系，以及在列宁看来的欧洲民族运动在革命中的重要意义，都应该加以强调。<sup>[121]</sup>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才开始发展以强调外围为特征的后来的帝国主义理论。<sup>[122]</sup>

列宁和布哈林的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否认殖民地对城市中心的生存是绝对必要的。大国需要对全世界的开发区进行垄断控制；如果去殖民化没有威胁到这种控制，就没有理由期盼资本主义的消亡。而且正如已注意到的，列宁和布哈林都认识到经济控制是比正式的殖民统治更具一般性的范畴。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与《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的前面几章，都不怎么关注相对抽象的理论。正如后者被用于为经验研究提供指南一样，种种迹象表明，列宁是用类似的方式构思了他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理论。他使用世界经济的术语对帝国主义作了五个方面的定义，他对不平衡发展的接受，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可以在不同国家的集团中找到。比如，根据列宁的理论，德国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中处于领先地位，这恰恰是因为它缺少其它现代性的因素。<sup>[123]</sup>相反的主张似乎是：英国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存在，可能是因为帝国为它提供了更大的市场。

所有这些虽然都反映出不能轻易地接受对列宁政治经济学的批评，但它们也指出了列宁的理论本身存在的局限。列宁关注的帝国主义的各种因素，从理论上看似仅仅是被松散地联系在一起。明显的错误几乎没有，通常也很难找到错误的陈述。这一特征对托洛茨基而言更为真实，他的帝国主义经济学从未以任何形式被详细地阐述过。布哈林更是如此，但是正如我们已经在本章第2节看到的那样，这是以对经济发展的复杂性的忽视和经济管理的发达形式的夸大为代价的，列宁对这种缺陷作过批评。

尽管如此，依然可以对列宁和布哈林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提出具体的异议。最明显的是，他们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是极其肤浅的。布哈林的分析事实上是自相矛盾的：他相信世界市场使工资、价格和利润率发生均等化，与此同时声称，民族国家经济中的竞争已经被消除。列宁没有能将帝国主义的不同特征清晰地联系起来，对资本输出背后力量的分析尤其模糊。他们都没有考虑在把垄断与超额利润联系起来时明显存在的问题。他们从来没有问过，在给定的工资水平和技术变动率下，垄断是如何提高总的剩余价值的，更别说回答这一问题了。这一缺陷在布哈林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与列宁不同，将国家垄断视为完全的垄断，缺乏对利润从竞争性部门转出的理解。简言之，无论是列宁还是布哈

林，都没有提出一个适用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价格和工资理论。

这削弱了他们有关“工人贵族”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工人贵族”是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在经济方面的中坚力量。关于帝国主义剥削和议会参与有利于工人阶级融入资本主义的这种一般性观点，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断言只有少数工人运动受到了这种融入过程的深刻影响，对这种融入的机制也没有能够详细说明；假设无产阶级群众革命的完整性没有发生变化。事实上，列宁在分析俄国的现状时是自相矛盾的，他坚持认为高工资的钢铁工人最具抗争性，贫穷的纺织技工是最不具革命性的。<sup>[124]</sup>而且他从来没有解释过“工人贵族”的主题是如何与孟什维克的流亡者联系起来的，孟什维克的流亡者和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官僚主义者持类似的防御主义立场，他也从未解释过这一理论是如何与他早期的、与此不同的有关无产阶级的调和主义的言论联系起来。<sup>[125]</sup>

存在的问题还有，布尔什维克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带来的政治上的可能性的思想是存在矛盾的。无论是布哈林还是列宁，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实施的集权式的经济控制和无产阶级国家的分权概念之间的联系。“打碎”现有国家机器的观点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由直接的民主机构取代现有的国家机器和利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出来的等级控制机制，都是存在困难的。用官僚手段管理经济可能会受到地方选举机构的监督，但是把管理从属于大众的控制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它与官僚组织的本质相冲突。类似的矛盾也出现在1917年列宁对政党进行的分析中。后来，像1905年那样，列宁抛弃了《怎么办》中的模式，并且向在布尔什维克纲领后摇摆的革命群众敞开了党的大门。如何使“先锋主义”与这一实践活动相一致，列宁的任何著述中都没有正视这一问题。<sup>[126]</sup>

列宁也没有正视在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政治体制中，农村经济如何与城市中心的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在打碎现有的国家政权后，在消灭了地主和榨取农村的剩余价值并最终养活了城市的金融资本家后，列宁需要找到替代物。他认识到俄国的工业处于一种行将崩溃的状态，而且农村的生产者将会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实现对农业的经济控制，所以问题无疑是明显的。然而，总的来说，他太急于解释农民因客观条件产生的需要，他相信这种需要已经为所有被压迫的人奠定了新的利益共同体的基础。

托洛茨基至少一直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时代的差异。此外，他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概念，指出了布哈林和列宁的经济理论中存在的重要缺陷。同希法亭一样，他们把当时德国的资本主义作为他们分析的出发点。但德国“独特”的历史产生了一些在其他地方无法被复制的新特征，包括工业资本和银行资

本在一定基础上的融合，这种基础在布尔什维克理论家看来，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管理可以依靠的（参见以上第五章和第十二章）。列宁注意到，德国资本主义有着独特的特征，但他错误地以为，这些特征是更为“先进”的属性、而不具特定国家的属性。布哈林和列宁都认为，战时紧急状态下产生的集权式的经济控制，仅仅是在所有条件下都在有力地发挥作用的长期趋势的加速发展。<sup>[127]</sup>因此，他们过分地强调了国家资本主义普遍的重要性和持久性。

从他们的视角看，发生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是地方性的，这种特定的缺陷是无要紧要的，因为任何和平时期国家经济作用的下降都不过是短暂的插曲，当战争再次爆发时则相反。从布哈林和列宁对资本主义潜在适应性的正常感觉来看，这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出发点。像托洛茨基一样（参见以上第十二章），他们偶尔也关注“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单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支配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打破了其他的殖民帝国，从而削弱了垄断影响的领域；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sup>[128]</sup>但他们并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一点，而是继续强调一再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这样，他们就无法预测20世纪后半叶美国霸权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长期和平。当然，这本身也有可能只是暂时性的。民族资本主义继续在不平衡地发展，随着美国相对经济实力的下降和扮演全球警察角色的成本的上升，美国的支配地位被逐渐削弱。<sup>[129]</sup>只有在这种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列宁的观点才能被证明是经得住考验的。

---

### 第十三章注释：

[1]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

[2] 参见《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二国际的破产》，第223-277页；《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注释第41。

[3] 参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第12-19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大会》，第163-169页；《关注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第297-303页；《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危机》，《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5页；《几个要点》，第53-56页。《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268页。《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70页；《世界政治中的转变》，第341-349页；《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917年3月4日

(17日)的提纲草稿》，第1-7页。

[4] 参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第12-19页；《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第40-46页；《一个德国人对战争的评论》，第96-97页；《以后怎么办？》，第113-120页；《打着别人的旗帜》，第134-155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大会》，第163-169页；《第二国际的破产》，第223-277页；《关注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第297-303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状况》，第304-309页；《社会主义与战争》，第319-363页。《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给波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312页。

[5] N. K. Krupskaya. Reminiscences of Leni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0) p. 277.

[6] 参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9页；《第二国际的破产》，第223-277页。

[7] 参见《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6页；《死去的沙文主义和活着的社会主义》，第100-107页；《以后怎么办？》，第113-120页；《打着别人的旗帜》，第134-155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大会》，第163-169页；《第二国际的破产》，第223-277页；《左派社会民主党为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准备的决议草案》，第294-296页；《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2页；《用国际主义词句掩盖社会沙文主义政策》，第131-139页。《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

[8] R.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9]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10] 布哈林的重要著作是于1914年秋完成的《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1] Bukharin, Economic Theory, pp. 15-58.

[12]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 2nd edn, p. 37.

[13] Bukharin, Economic Theory, p. 31; M. C. Howard, Profits in Economic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83) pp. 103-10.

[14] R L. Meek, Econo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Chapman & Hall, 1967) pp. 51, 74; J. E. King, 'Marx as a Historian of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1, 1979, pp. 382-94.

- [15] Bukharin, *Economic Theory*, pp. 9-11.
- [16] N. I.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London: Merlin, 1972).
- [17] *Ibid.* pp. 18, 22, 25, 39, 40, 46; N. I. 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Stat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ottingham: Spokesman, 1982) p. 27. 这些选集, 包括布哈林1915年到1929年间的著作, 本章的参考书目主要是他1917年之前的文章。
- [18] Bukharin, *Imperialism*, pp. 36, 87, 88.
- [19] *Ibid.* pp. 27, 54; *Selected Writings*, p. 23.
- [20] Bukharin, *Imperialism*, pp. 104, 168, 169.
- [21] *Ibid.* pp. 29, 30, 33, 45, 84, 90, 96, 97, 102, 103.
- [22] *Ibid.* pp. 17- 28, 39, 40, 52, 53, 80.
- [23] 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pp. 18, 22, 27.
- [24] Rukharin, *Imperialism*, pp. 87, 100-4, 109, 122, 123.
- [25] 列宁将克劳塞维茨的格言视为是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实质。参见《社会主义与战争》, 《列宁全集》第26卷, 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327页。
- [26] Bukharin, *Imperialism*, pp. 73, 108, 118.
- [27] 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pp. 7, 16, 17, 27, 31.
- [28] Bukharin, *Imperialism*, pp. 144, 147, 149, 153; *Selected Writings*, p.19.
- [29] *Selected Writings*, pp 17, 25.
- [30] Bukharin, *Imperialism*, pp 110ff, 125-8, 153ff.
- [31] M. Haynes, *Nikolai Bukhari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5) p. 58.
- [32] *Ibid.* pp. 53-4; M. Sawyer, 'The Genesis of State and Revolution' *Socialism Register*, 1977, pp. 215-16; 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p. 30.
- [33] *Selected Writings*, pp. 19, 26.
- [34] Bukharm, *Imperialism*, pp. 161ff.
- [35] *Ibid.* pp.79. 161ff.
- [36] 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pp. 19, 16; *Imperialism*, pp. 158-9,161ff.
- [37] S.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6-7.
- [38] Bukharin, *Economic Theory*, p. 16; *Imperialism*, pp. 73, 133; *Selected Writings*, p. 32.
- [39] Bukharin, *Imperialism*, pp. 3, 60, 63, 74, 120, 134, 138, 142. 143.

[40] Bukharin, *Economic Theory*, pp. 46-7; *Imperialism*, pp. 19, 27, 39, 64, 74, 80. 132; Haynes, Nikolai Bukharin, pp. 50-3, 68-9.

[41] Bukharin, *Imperialism*, p. 27.

[42] Haynes, Nikolai Bukharin, p. 27.

[43] *Ibid.* pp. 15, 31-2.

[44] Sawyer, 'Genesis of State', pp. 209-14; D. A. Smart (ed.) *Pannekoek and Gorter's Marx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78).

[45] 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pp. 6-37.

[46] Bukharin, *Imperialism*, p. 10; Haynes, Nikolai Bukharin. pp. 50-3, 68-9; R. B Day, 'The New Leviathan' in 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pp. 1-1ii

[47] Bukharin, *Imperialism*, pp. 69, 76-9, 87, 113, 115, 128, 132, 137, 153; *Selected Writings*, p. 22; *Economic Theory*, p. 18.

[48] 《为尼·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写的序言》，《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145页。

[49]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

[50]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51]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Krupskaya, *Reminiscences*, p. 332; 也可参见 'Lenins Remarks' to N. I. Bukharin, *Econom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New York: Bergman. 1971) contained in that work on pp. 211-24.

[52]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3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203页。

[53] 《青年国际》，《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291页。Sawyer, 'Genesis of State' p. 215f; Cohen, Bukharin, pp. 39-41.

[54] 参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9-363页。《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107页；《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回答》，第108-114页；《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第115-170页。《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372页。H. Gankin and H.H. Fisher. *The Bolsheviks and the World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p. 213-56; Cohen, Bukharin, pp. 13, 15, 23-4, 35-8, 56; Haynes, Nikolai Bukharin, pp. 54-5; Sawyer, 'Genesis of State', pp. 214-15; N.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I (London: Macmillan, 1977), p. 298 *ibid* vol. II (London: Macmillan, 1981) p. 64; T. Cliff. Lenin (London: Pluto, 1976) vol. II, pp. 51-2.

[55] Harding, I, pp. 249-281.

[56]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也可参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277页。

[57] 参见《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3页和 Krupskaya, Reminiscences. pp. 322ff.

[58] J. A. Hobson, Imperi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38) (first published in 1902). For an outline of Hobson's views see J. E. King, Economic Exiles (London: Macmillan, 1988) ch. 6.

[59]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60] 也可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

[61]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

[62]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63]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也可参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277页。《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8页；《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第102-116页。

[64]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也可参见《以后怎么办？》，《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120页；《打着别人的旗帜》，第134-155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大会》，第163-169页；《第二国际的破产》，第223-277页；《社会主义与战争》，第319-363页；《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第10-18页；《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第102-116页。《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70页；《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第69-85页。《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2页。

[65]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

[66]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155页。

[67]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也可参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327页。

[68]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

[69]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

[70] Bukharin, Imperialism. pp. 108-9, 121, 141.

[71]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155页。《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372页。

[72]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7页。《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70页；《论单独媾和》，第192-200页；《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和平主义》，第223-226页；《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案》，第255-267页；《世界政治中的转变》，第341-349页；《保卫中立》，第361-632页；《远方来信(第四封信 如何实现和平?)》，《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52页。《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372页。

[73] 参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欧洲大战和国际社会主义》，第8-11页；《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第12-19页；《第二国际的破产》，第223-277页；《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85页。《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 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238页；《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第254-268页；《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第1-15页；《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第16-57页。《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5页；《论单独媾和》，第192-200页；《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论修改党纲》，第362页。

[74]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也可参见《以后怎么办?》，《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120页；《打着别人的旗帜》，第134-155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大会》，第163-169页；《第二国际的破产》，第223-277页；《社会主义与战争》，第319-363页；《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8页；《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第102-116页。《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一位法裔社会党人诚实的呼声》，第10-18页；《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第117-130页。《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70页；《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第69-85页。

[75] 在其他的作品中，列宁的评论中提出了更为完善的观点，参见以下第6节。

[76] A. Rabinowitch. 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the Revolution of 1917 in Petrograd (New York: Norton, 1978).

[77]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

[78] 比如参见参见《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

版社1990年版，第47-95页；《打着别人的旗帜》，第134-155页；《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103页。

[79] A. Gjllie, 'The State, the Market and the Plan', in J. Anderson (e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State* (Brighton: Wheatsheaf, 1986) pp 172-6.

[80]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对彼·基辅斯基(尤·皮达可夫)《无产阶级和金融资本时代的‘民族自决权’》一文的回答》，第108-114页；《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案》，第255-267页；《致拥护反战斗争及其共同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斗争的工人》，第278-286页；《保卫中立》，第361-632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446页；《修改党纲的材料》，第472-493页；《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100页；《经济破坏和无产阶级同它的斗争》，《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225页；《实施社会主义，还是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第286-288页；《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112页；《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第181-225页；《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6页；《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372页。

[81] 《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57页。《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文献》，第235-263页；《真诚的护国主义的内容表露出来了》，第314-316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文献》，第339-446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决议的引言》，第447-450页；《论坚强的革命政权》，《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29页；《经济破坏迫在眉睫》，第74-76页；《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消失了吗？》，第127-130页；《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第136-156页；《关于同经济破坏作斗争的几项经济措施的决议》，第163-165页；《资本家在嘲弄人民》，第201-204页。《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64页；《经济破坏和无产阶级同它的斗争》，第232-234页；《执政和负责的党》，第328-330页；《危机日益临近，经济破坏日益严重》，第370-372页；《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9-129页；《论妥协》，第130-136页；《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第181-225页；《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第158-165页；《寄语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122页；G. Garvy, 'The Origins of Lenin's Views on the Role of Banks in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 1972, pp. 252-64.

[82] 《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70页；《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第204-215页。《在全俄工

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64页；《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Cliff, Lenin, p56, 220ff; A. Brewer,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pp. 90, 97; A. G. Meyer, Leninism (New York: Praeger, 1962) pp. 29, 47, 115, 126-9; V. Kiernan, Marxism and Imperiali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4) pp 8-9, 46-8.

[83] This is traced by Sawyer, 'Genesis of State'. See also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II, pp. 92-141; Cohen, Bukharin, pp. 42-3; Haynes, Nikolai Bukharin, pp. 26-7.

[84]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6页。

[85]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6页。Garvy, 'Origins' .

[86]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9-363页。参见《不应当怎样写决议》，《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7-108页；《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稿》，第120-154页；《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第186-195页；《孟什维克的策略纲领》，第221-236页。《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70页；《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则》，第243-252页；《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第313-333页；《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57页；《告被俘同志书》，第77-83页；《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第84-93页。《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170页；《路易·勃朗主义》，第127-130页；《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第150-185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文献》，第235-263页；《一个根本问题(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是怎样谈论的)》，第298-302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文献》，第339-446页；《必将到来的灾难和不讲分寸的诺言》，《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109页；《资本家是怎样吓唬人民的?》，第120-122页；《论‘擅自夺取’土地(‘社会革命党人’的糟糕论据)》，第131-135页。《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264页；《谈谈实质性论战的好处》，第281-282页；《波拿巴主义的开始》，《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9页；《论妥协》，第130-136页；《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第181-225页；《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6页；《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372页；《布尔什维克能保住国家政权吗?》，第282-331页。 Krupskaya, Reminiscence, p.335.

[87]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

115-170页；

[88] I.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256-9; Cliff, *Lenin*, pp. 124, 132, 135.

[89] Meyer, *Leninism*, p 170; B Knei-Paz,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Lenin Trortsk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72; M. Lowy, *The Political of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London: Verso, 1981) pp. 61-4; D Hallas, *Trortsky 's Marxism* (London: Bookmarks, 1984) p. 17; E. Mande Trortsk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 20.

[90] 《论革命的两条路线》，《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99页。《齐赫泽党团及其作用》，《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300页。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II, p. 75; T. Cliff, *Lenin* (London: Pluto, 1975) vol. I, p. 207.

[91]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70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446页；《论策略书》，第135-149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197页。

[92] Rabinowitch, *The Bolsheviks*.

[93] 《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149页；《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第189-204页；《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100页；《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6页；

[94] 参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9-363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446页；也可参见《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7-96页。《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2月9日）》，《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0-348页。参见《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讲话》，《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在全俄服装工业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8-324页。《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6-7月）》，《列宁全集》第42卷，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全集》第43卷，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392页。

[95] 《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6页；《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第47-95页；《论革命的两条路线》，《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3-99页。《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 第一编美国的

资本主义和农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238页；《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185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文献》，第235-263页；《农民代表大会》，第268-271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临时政府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的照会引起的危机的决议》，第290-291页；《一个根本问题（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党人是怎样谈论的）》，第298-302页；《真诚的护国主义的内容表露出来了》，第314-316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文献》，第339-446页；《给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公开信》，《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5页；《我党在革命前就战争问题发表过哪些声明》，第71-72页；《战争与革命》，第77-100页；《论‘擅自夺取’土地（‘社会革命党人’的糟糕论据）》，第131-135页。《三次危机》，《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412页；《论立宪幻想》，《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2页；《政论家札记（农民和工人）》，第104-112页；《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第181-225页；《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6页；《革命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157页；《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第166-180页；《布尔什维克能保住国家政权吗？》，第282-331页；《论修改党纲》，第344-372页；《给同志们的信》，第390-410页；《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又一次欺骗》，第420-425页。Krupskaya, Reminiscences, pp.117-19, 390ff; Garvy, 'Origins'. 也可参见注释第82。

[96] 《危机成熟了》，《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78页；Krupskaya, Reminiscences, pp. 341ff.

[97] 《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368页；《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4-268页。《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70页；《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第86-97页；《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第313-333页。

[98]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

[99] 有关这个问题重点参考Rabinowitch, The Bolsheviks.

[100] 《几个要点（编辑部的话）》，《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56页；《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第57-63页。《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57页。《我党在革命前就战争问题发表过哪些声明》，《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1-72页。

[101] 《布尔什维克能保住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331页。M. Liebman, Leninism Under Lenin (London: Merlin, 1975) pp. 164, 173; O.

Radkey, *The Agrarian Foes of Bolshev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J. D. Basil, *The Mensheviks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7* (Columbus, Ohio: Slavica Publishers, 1983).

[102] 《1917年3月4日(17日)的提纲草稿?》，《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远方来信》，第9-57页。

[103] 《波拿巴主义的开始》，《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9页；《革命的教训》，第50-65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1917年10月16日(29日)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6-389页；Liebman, *Leninism*, pp. 167, 174.

[104] Rahinowitch, *The Bolsleviks*; Liebman, *Leninism*.

[105] L. G. Churchward研究了学术性不足的情况，参见L. G. Churchward,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Lenin's Imperial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V. 1959, pp. 76-83, and E. Stokes,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and the Attack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Historical Journa*, XII, 1969, pp. 285-301.

[106] J. A. Schurnpeter,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New York: Kelly, 1951); Kiernan, *Marxism*, pp. 17, 27, 54, 93.

[107] K. E. Boulding and T. Mukerjee (eds) *Economic Imperil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2); B.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0); D. K. Fieldhouse, *The Theory of capitalism imperialism* (London: Longrnans, 1967); 也可参见Stokes.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108] Boulding and Mukerjee, *Economic Imperialism*.

[109] G. Lichteirn, *Imperialism* (London: Allen Lane, 1971) p. 115.

[110] 参见注释第72和73; Churchward,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pp. 78 -9, 82; Stokes,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pp. 291ff, Lenin made clear that hi imperialism was confined to economic analysis; 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

[111] 尤其是参见L.Trotsky, *The Bolsheviks and World Peace* (Westport,Conn: Hyperion, 1973; written in 1941.

[112]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277页。《关于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 第一编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238页；《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15页。

[113] 参见注释第54。

[114] 参见注释第73和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pp. 6-37.

[115] 《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372页；Bukharin, *Imperialism*, pp. 112f, 119.

[116] 《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70页；Stokes,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pp. 288-9,

[117] 参见注释第71、72..

[118]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5页。J. P. Nettl, *Rosa Luxembur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vol. II, p. 533.

[119]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

[120]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372页；

[121] 参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12页；《打着别人的旗帜》，第134-155页；《论单独媾和》，《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200页；《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372页；Trotsky, *The Bolsheviks*: Stokes,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olonial Expansion’, pp. 299-300.

[122] L. Trotsky.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New York: Merit, 1969); S. Heitman, ‘Between Lenin and Stalin: Nikolai Bukharin’ in L. Lahedz (ed.) *Revisionn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62) pp. 77-90.

[123] 《战争与革命》，《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100页。

[124] 《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333页；

[125]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3页。《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4页；《走上直路》，《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41页；《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7-319页；《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第334-354页。《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7-339页；《问题的症结》，《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5页；《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



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3-277页。 Krupskaya, Reminiscences, p.11 Liebman, Leninism, pp. 30, 71.

[126.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pp. 230-45;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II, pp. 84-141; Cliff, Lenin vol. I, pp. 168ff, 232; Cliff, Lenin, vol. II, pp. 157-60; Liebman, Leninism, pp. 45, 85ff, 148, 191-209; R. Miliband, 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London: Verso, 1983) pp. 154- 66.

[12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四月代表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9-446页。

[128] Bukharin, Imperialism, pp. 13, 120, 139, 144-5;《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213页。《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案》，《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5-267页。

[129] B. Rowthorn, Capitalism, conflict and Inflation (London: Lawrence & hart, 1980) pp. 48-78; E. Mandel, Europe Versus America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E. A. Brett.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the War (London: Macmillan, 1985); P. Armstrong, A. Glyn. and J. Harrison, Capitalism Since World War 11 (London: Fontana, 1984); N. Harris,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6).

## 第三篇 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1917—1929

### 第十四章 修正主义的复兴

#### 1. 引言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本已岌岌可危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所有重要交战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热情支持他们各自国家的战争动员。比如，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夫·希法亭，理所当然地参加了奥地利军队，甚至没有考虑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行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爱国热情，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沙文主义诡辩，把霍亨索伦帝国的军事胜利视为迈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经之路。<sup>[1]</sup>最初，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只有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为核心的一个较小的、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团体，支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立场。但是，随着战争的拖延，和平主义趋势出现了，和平主义者反对好战的德国，却不愿公开呼吁推翻它。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作为对手已经很久了，在支持中间立场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然再次团结起来。<sup>[2]</sup>

战争结束时，俄国的十月革命、同盟国的失败以及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垮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形势。但是德国的革命也夭折了。尽管建立了正式的政治民主，进行了重大的社会改革，但是阶级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甚至没有对私有制形成有效的冲击。国家机器仍然是独裁的，先前的统治阶级的地位仍然十分稳固。事实上，这个社会民主政府镇压斯巴达克派起义，纵容1919年1月对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实施的谋杀，并使战后德国资本主义不受威胁。1918年德国共产党（KPD）成立后，区分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鸿沟，变得更加难以逾越了。现在，中间派的立场站不住脚了，1923年独立社会主义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考茨基和希法亭是其领导人——作为“第二半国际”的中坚力量，开始和大多数组织联合。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战线已经确立，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在改良主义者和属于第三国际革命者之间发生分裂。<sup>[3]</sup>

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也必然获得相应的发展。早在1914年前，政治争论就蔓延到了经济争论中，对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的冲突的分析，被用于为互相竞争的政治策略辩护。一方面苏联的资源增加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巨大的道德权威，产生了日益僵化（尽管是不断变化的）的正统，在斯大林获得权力后，这种正统变成了一种教条主义。与理论差不多完全来自俄国的共产主义者相对的，是德国和奥地利的主流社会民主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获得一定程度的尊重，有时候他们参与到政府中，鲁道夫·希法亭在20世纪20年代曾两度担任无可挑剔的保守的财政部长。<sup>[4]</sup>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前景逐渐暗淡，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坚定地致力于在现有的体制内进行渐进的改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爱德华·伯恩斯坦战前的异端邪说。只有少数离经叛道的人，仍然呆在两大阵营之外。

## 2.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新修正主义

世纪之交，伯恩斯坦主张以和平的、进化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取代革命的是导致渐进的社会转型的一系列有限度的改良。伯恩斯坦否定了巨大崩溃的必然性；他提出，随着生产受到资本家私人协会和国家的管理，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将会下降。他的观点已经受到社会民主党思想领导人的公开指责，但是他们的批评缺乏分析的基础（参见以上第四章）。在《金融资本》中，鲁道夫·希法亭断然否定了卡特尔可以阻止危机的观点，但他在作出如下的论断时，却逐渐向修正主义路线靠近。

金融资本的社会化职能，使战胜资本主义变得非常容易。一旦金融资本把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了获得对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直接支配权，只要社会通过执行机关——被无产阶级夺取的国家——占有金融资本就足够了。由于所有其它的生产部门都依赖于这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所以，即便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社会化，对大产业的控制就已经提供了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

甚至在今天，占有柏林六大银行就意味着占有了大产业的最重要的部门。

换句话说，由于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剥夺，放弃由国家采取的突然的剥夺，代之以通过社会提供的经济利益进行逐渐的社会化是可能的。<sup>[5]</sup>

然而，在当时，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精辟论述和其结论中富有战斗性的

语调令人振奋，使得人们无法认识这些段落中包含的潜在的修正主义的涵义（参见以上第五章）。

不过，希法亭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确与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的本质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在德国，从来不存在一个全面的自由放任时期，政府一直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竞争总是受到托拉斯、卡特尔和限价协定的限制。战争的全面爆发加速了这些发展，因为国家现在对大的经济部门负责，鼓励新的生产者形成联盟，并巩固业已存在的联盟。他们全心全意地参与战争的努力，为工会赢得了政府和雇主一定程度的认可，给日益强大的国家主义政权增添了一抹新的社团主义色彩。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莫不如此，战后德国仅仅是部分程度上“恢复正常”，战时的很多变化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sup>[6]</sup>

20世纪20年代初，在劳工运动和资本家的圈子里，对进一步的“合理化”的支持是普遍的。“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战后集权的趋势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罗伯特·布兰迪在1933年写道：“该国的背景最有利于继续发展，德国支持集权的态度，看起来在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动中都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样，在德国，“老曼彻斯特体制”没有未来可言，布兰迪断言，“有两个事实至关重要。首先，回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愿望，在德国几乎完全消失了；其次，这种回归的可能性，也几乎完全消除了”。甚至工会也支持合理化，他们将“合理化”视为“在技术和组织上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进化的表达”，这种有序的进化将在全面的经济计划中达到顶峰。他们期待，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将足以确保工人从合理化产生的收益中，获得一个大的而且不断增加的份额。<sup>[7]</sup>

希法亭在战争初期就认识到这些变化的含义，他强化了自己思想中的改良主义因素，这在《金融资本》中已有所体现。1915年，他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刊物《斗争》上发表文章，对他认为的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调整作了描述。在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自我意识增强，但是在改善自身地位时，工人阶级也克制了自己的革命冲动，因为他们现存的条件不再是完全无法忍受的。“这就落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工人运动的反对革命的影响削弱了资本主义的革命趋势。”其他的稳定因素，已经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最新阶段”。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萧条的时间缩短，长期的失业不再像以前那么严重。在德国和美国也不再传统意义上的失业后备军。金融资本使得整个体制不再那么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侵扰，“包含着从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转变的萌芽”。作为金融资本产物的国家权力

的增长，在同样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取代社会主义胜利可能出现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但它不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而是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组织起来的，顶层是资本主义垄断和国家的联合起来的权力，下面则是按等级划分的劳动群众作为生产的雇员在工作。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拥有的将是一个比过去更好地满足群众的直接物质需要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希法亭推断，对战争的体验只会加强这些趋势。那些后来被视为“战争社会主义”的东西，仅仅是战前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强化形式。<sup>[8]</sup>

影响更为深远的结论，是由后来成为奥地利共和国总统的法学理论家卡尔·伦纳得出的。在写于1916年的文章中，伦纳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资本主义结构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国家的经济职能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一个国家渗透进私有经济直到其基本细胞的问题，不是使少数工厂国有化，而是通过有意志和有意识的调节和指导，控制经济中全部的私有成分”。这种情况的出现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78年到大约1890年，国家进行干预，以保护弱者对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竞争。紧随其后的是“有组织的私人企业经济”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针对反对国家限制竞争的卡特尔组织。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国有经济”时期，国家权力通过用保护强者代替传统的“保护弱者”来为资本服务……国家权力和经济开始融合；国家统治的领域和国有经济的领域是一致的，国有经济被看作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国家权力则被看作是强化国有经济的一种手段，尽管它们公开宣称是相互分离的。

这一过程在第四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达到顶点，即“国家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私营部门“由国家来决定，并完全成为国家控制的组织”。从而“马克思曾经经历并加以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复存在……将这一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放在一起看，人们可能会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正处在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sup>[9]</sup>

在这一点上，伦纳比希法亭走得更远。1924~1926年，希法亭在他编辑的社会民主党的新的理论刊物《社会》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确实重新回到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战争及其后果使工业集中程度得到了实质性的进一步的提高。希法亭认为，新建立的世界经济的稳定，是基本结构长期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转瞬即逝或偶然情况下产生的——不会再有巨大的经济崩溃；资本主

义经济的不稳定性降低了，危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下降了——这是托拉斯计划投资的结果，是对它们支出上反周期时机准确把握的结果，是大银行联合货币当局进行信贷管制的结果。失业对无产阶级来说不再是威胁，社会保险的扩大降低了对其生存的威胁，而科学管理技术，既提高了劳动强度又分化了工人阶级。总的说来，改革在让工人们获得一定利益的同时，也使工人们变得更为保守，所以革命性变革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这一时期，奥托·鲍威尔、希法亭的同事埃米尔·莱德勒，甚至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sup>[10]</sup>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含义和国际关系有关。希法亭认为，不再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期待再度出现帝国主义的敌对行为，而布哈林和列宁提出来并把它作为战争根源的经济矛盾是虚构的（参见以上第十三章）。希法亭把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和平主义”视为战后外交政策的主流。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盎格鲁—撒克逊在全世界影响的扩大是以牺牲德国和法国为代价的。英国和美国有强烈的意愿阻止战争。英国需要喘息的空间，以便解决它的殖民地问题，并在亚洲和近东对抗民族解放运动，而美国成为商品和资本的主要输出国，需要和平的环境去获取收益。甚至法国也需要来自英国和美国的金融援助，它没有资格进行战争叫嚣。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民主的发展进一步削弱了军国主义，因为数以百万的工人和农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呼声日渐高涨。<sup>[11]</sup>

甚至是德国资本主义，似乎也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战了。希法亭提出，化工生产现在成了德国工业中的主导部门，已经超过俾斯麦时期主导经济的煤和钢铁产业。与老工业相比，工资在化工产业总成本中占的比例更低，因而资本家的利益不再和工人的利益存在剧烈的冲突。这改变了最有影响的资本家们对国际前景的看法。战前，老的重工业和大地主结盟，与军队和帝国主义官僚机构形成强大的同盟，支持侵略性的扩张。战争的失败打碎了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它仍然是第一流的经济大国。“因此，德国资本主义进行扩张的强烈愿望，必须寻找其他出路，它们在不同类型的国际资本主义利益共同体中找到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温和，是因为可察觉到的资本的利益已经发生了变化。德国实业家最终接受了英国资本家早在战前就已表现出来的世界主义的世界观。<sup>[12]</sup>虽然希法亭没有引述任何权威论述，而且非常谨慎地避免使用“超帝国主义”一词，但他现在赞同考茨基在1915年提出的和平的世界卡特尔的观点。<sup>[13]</sup>

最后，他指出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发生的重要变化。不再有哪个阶级能单独实施对国家的控制。无产阶级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真正的政治权力，而且意

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无产阶级不再将国家视为压迫者手中的工具，而是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国家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为自己谋求福利的工具。然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阶级斗争。事实上，越来越规范的生产和无组织的财产关系基础之间的矛盾比以往更为尖锐。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组织起来的经济必须转化为民主地组织起来的经济。<sup>[14]</sup>由于其自身的性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适合于通过渐进的立法改革实现和平过渡，改革将改善经济体制的机能。原子化的竞争是过去的事情，与它相伴的是非人性化的市场力量的暴政。卡特尔、托拉斯、资本家联盟、合作组织和工会对经济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对经济进行社会控制已经成为现实。当前期，少数公司资本家——《金融资本》中的“柏林六大银行”——享有其阶级利益。一旦无产阶级获得完全的政治权力，它就可以利用这些机构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希法亭否定了他以前的观点，不再只把国家视为资本家进行统治的一个执行机构，而将其视为整个社会的代理人。他认为，国家政策取决于争夺国家控制权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相对力量，在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将变得越来越强大。<sup>[15]</sup>

在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下<sup>[16]</sup>，像弗里茨·纳夫塔利那样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主张扩大经济民主，完善德国工人在1918年赢得的政治民主。弗里茨·纳夫塔利主张，工人阶级必须使用其新的政治力量，扩大自己的经济权力并挑战持续存在的经济独裁。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公共企业的扩展、争取工作环境法律保护的工人运动取得的重大（即使是有限的）胜利，这一切都表明“资本主义在折断之前可以弯曲。”<sup>[17]</sup>一些胜利将打击资本权贵的专制统治。这对德国工人阶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纳夫塔利写道：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目标没有改变，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调整。经济民主既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方法。可以在以下几个领域做出改进：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扩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这可以通过反垄断立法、反周期信贷和公共投资政策来实现；第二，增加工业领域的工会代表，这可以通过扩大建立于1918年的劳资协同经营制度的影响范围、加强集体谈判和培育工会企业来实现；第三，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险网络，以便将收入分配带出市场领域；最后，支持消费者合作，提倡建立更为民主的教育体系。<sup>[18]</sup>党的口号应该是“通过经济的民主化实现社会主义”。<sup>[19]</sup>

卡尔·考茨基把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完成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的百科全书式的阐释中，他打算把它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指南。考茨基否定了他自己1899年提出的用来反击伯恩施坦的主张，那时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经济限制。崩溃不是必然的趋势。经济危机已经变得更加温和，对资本利益的威胁变得更小，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提高。<sup>[20]</sup>国家正在丧失其作为压迫工具的特征，并向成为“解放被剥削者的工具”转变。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局势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普选权（俾斯麦会很震惊）已经成为德国无产阶级手中强大的武器一样，国际联盟不再是战胜国的工具，它正在转变为国际合作的平台。无论从国家还是从国际层面看，老式的阶级国家正在向“福利国家”转变。就这样，在与伯恩施坦断绝关系近30年后，考茨基接受了修正主义的许多重要观点。<sup>[21]</sup>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重要的理论家们，否认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断绝了联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鲁道夫·希法亭仍然将自己视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问题，而不只是狭隘的经济问题，进行着更加自由的创作。<sup>[22]</sup>希法亭丝毫没有放弃《金融资本》中的观点，当需要他表达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看法时，只是概述了这本书的一些重要观点。<sup>[23]</sup>考茨基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实现，虽然现在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品德、智力和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崩溃。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越成功、越发达，无产阶级就会越强大，社会主义也就会越来越接近。只要社会改革削弱了阶级对抗，改革就成为社会主义无望的原因。考茨基相信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尽管他承认存在着深刻的经济变革。危机的一再发生，带来了大规模的失业和随之而来的苦难，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远远落后于他们的剥削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sup>[24]</sup>从而，“资本家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强大，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强大。”<sup>[25]</sup>

### 3. 弗里茨·斯滕伯格论帝国主义

1929年之前，对新正统主义观点提出的挑战，是随着唯一严肃的非共产主义者弗里茨·斯滕伯格大部头《帝国主义》的出版出现的。<sup>[26]</sup>通过应用、扩充和改造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参见以上第六章），斯滕伯格认为，当前的繁荣只是暂时现象，资本主义经济不久就会遭到自身矛盾的报复。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修正主义，都仅仅是对暂时的经济稳定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革命性政治活动的必要性，不久就会重新显现。



## 弗里茨·斯滕伯格小传

斯滕伯格1895年出生于布雷斯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法兰克福求学。在成为一个独立作家和记者之前，他在法兰克福师从弗兰茨·奥本海默。20世纪30年代，他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D）成员，该党是从SPD中分裂出来的左翼派别。在流亡瑞士和法国之后，在法国和托洛茨基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把第四国际的组建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冒险），斯滕伯格1939年移居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战后返回欧洲，提倡介于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1963年逝世于慕尼黑。

像卢森堡一样，斯滕伯格的批判集中在马克思本人经常做出的一个简化假设上。该假设认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没有农民、工匠和其他小商品生产者的经济。斯滕伯格坚持认为，这个假设是一个最重要的错误，因为非资本主义生产自资本主义历史开始之初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罗莎·卢森堡已经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的推理中存在的这一缺陷，但她的批评还不够深入。马克思所有的著作都遵循了这一假设：工资理论、危机理论和革命理论，以及对再生产的分析。简言之，纯粹资本主义的假设消除了这个体系的真正本质。<sup>[27]</sup>

斯滕伯格指出，资本主义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对过剩人口的需要，他以此开始自己的批判：没有过剩人口，就没有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也无法被生产出来。马克思对失业后备军的解释集中在机械化造成失业的影响上，机械化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相对于死劳动而言对活劳动的需求。在斯滕伯格看来，技术进步既不必然也不足以保证过剩人口的产生。之所以不必然，是因为即使是不存在技术变化，非资本主义生产者构成劳动力的潜在来源。之所以不足以，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机器取代劳动的效果可能会因为海外市场的大规模扩张而得到“过度补偿”，这种扩张因机器的使用而变得可能。每单位产出可能要求更少的活劳动，但是世界非资本主义地区需求的增长会增加产出的数量，从而就业仍然会提高。<sup>[28]</sup>

更为正式的说法就是，斯滕伯格指出了过剩人口的六个方面来源。其中两个来源——人口的增长、机械化——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这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四个“外生”因素。在这四个来源中，马克思注意到了其中的两个：对工匠的剥夺和农民迁徙到城市。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另外两个过剩人口的“外源性”来源：从非资本主义地区来的移民，特别是对这些地区的资

本输出。同机械化一样，资本输出首先增加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内部的就业，因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生产生产资料。之后，随着殖民地开始与殖民母国进行生产竞争，就业下降了。<sup>[29]</sup>因此，在先前的非资本主义地区融入世界经济之前，过度补偿是帝国主义渗透的早期阶段的一个主要特征。“非资本主义地区资本化的进程越快（比如，印度依靠自己的工人进行工业建设），在起主动作用的帝国主义国家就越快越坚定地形成大量工人阶级，因为那时机器替代工人的步伐也越快。”<sup>[30]</sup>

这一结论包含在卢森堡的分析中，但是她可能没有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使得斯滕伯格能够依据过剩人口的主要来源，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期标准。在大致对应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阶段的第一个时期，头两个外生因素（当地工匠和农民）是最重要的。接着，机械化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最后，外源性来源开始占主导地位，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了。斯滕伯格进一步区分了早期和晚期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活动展开的初期，技术进步和资本输出的过度补偿效果仍然是强大的，与此同时，本土的非资本主义生产者迅速枯竭。从而，失业率处于它的最低点，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处于他们的最高点。<sup>[31]</sup>这是工人阶级的“蜜月期”。它以大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多数工人实际工资的真正的增长为特征。事实上，修正主义就是“蜜月期理论”。<sup>[32]</sup>

斯滕伯格坚持认为，蜜月期不会太久，因为实际工资持续不断地增加，会威胁到资本积累自身。从而，资本主义会从体制外面寻求解脱。蜜月期被资本的加速输出所终止，这赋予过剩人口国际上的含义。比如，英国工人的工资不再仅由英国决定，而是受到英国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和利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劳动力的可能性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如果不存在可能提高殖民地工人生活水平的有效的无产阶级的团结，欧洲的工资将被迫下降到亚洲的水平；第二，帝国主义不能被视为是一个偶然的或一个可以避免的政策选择。它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内在必然。<sup>[33]</sup>

斯滕伯格支持上述看法中的第二个观点，关注了帝国主义在实现剩余价值方面发挥的作用。罗莎·卢森堡早已经证明，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斯滕伯格坚持认为，它们必须被加以修改，以包含资本主义现实的两个重要特征：第Ⅰ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比第Ⅱ部类的高，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都在提高。无论是罗莎·卢森堡、奥托·鲍威尔还是布哈林，都没有能够以这种方式成功地扩展马克思的分析。假如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会发现第Ⅱ部类必然有无法销售的剩余产品，如此一来，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确实会在实现剩余价值

方面面临严重的困难，并被迫从海外寻找非资本主义的消费者。<sup>[34]</sup>罗莎·卢森堡在这方面对马克思的批评，是“正确的且在所有的要点上是合理的”。但是她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是所有积累的剩余价值都实现不了，只是其中一部分，即第Ⅱ部类生产的消费品的剩余无法实现。由此导致的危机的破坏性，比人们从卢森堡的分析中预计到的要小一些。<sup>[35]</sup>然而，这些危机足够真实，它们“最终的决定性原因”，是“建立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基础之上的生产的增长与的消费的增长之间必然的比例失调”，而这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以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产业投资支出的比例失调表现出来。”<sup>[36]</sup>

斯滕伯格指出，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总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加剧是错误的。直到1914年，在帝国主义早期，过度补偿的影响意味着与此相反的事实是正确的：实际工资已经提高，社会改革已经实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敌对已经弱化。但是，帝国主义仅仅是为阶级战争提供了暂时的缓解，就如同它只是代表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有限度的解决方法一样。通过同化越来越大的领土，它越来越难获得新的非资本主义市场，从而开始自掘坟墓。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危机周期，为进入正在萎缩的市场而产生的国际竞争加剧，实际工资下降的压力不断增加。这一点在英国最明显（斯滕伯格在总罢工那年正在进行此文的写作）<sup>[37]</sup>。只有在美国，工人阶级继续受益。这儿的“蜜月期”比欧洲的来得晚，修正主义者从美国经验中概括的一般结论是错误的。斯滕伯格断言，由于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绝对化，他们犯下了资产阶级科学中最大的错误。帝国主义晚期的修正主义没有未来，因为它是危机深化、生活水平下降和帝国主义战争继续的阶段。<sup>[38]</sup>

#### 4. 对斯滕伯格的评论

斯滕伯格的《帝国主义》是一部质量参差不齐的著作，它在结构和范围上令人印象深刻，而在实质性分析方面较为薄弱。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逻辑历史的说明，将这些不同阶段经济和政治思想上的变化联系起来的尝试，使得斯滕伯格的著作比这一时期任何其他著作都更接近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此外，他的过剩人口来源理论，触及到半个世纪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面对的“去工业化”背景下重新出现的明显问题。<sup>[39]</sup>斯滕伯格自己并未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分析，支持其有关“蜜月期”和帝国主义晚期生活水平下降的武断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争论说，国际工资的差异引起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富国对剩余价值的榨

取阻碍了贫穷国家的工业发展。其他人用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大的生产率差距来解释工资差异，这种生产率差距制约了后者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sup>[40]</sup>斯滕伯格的著作忽略了所有这些问题。

他的经济危机理论更难令人满意。正如亨利克·格罗斯曼很快注意到的那样，他的经济危机理论建立在“一个未加分析的用图表表示的数字例子”上。<sup>[41]</sup>斯滕伯格对卢森堡和奥托·鲍威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和他们不同，他并没有尝试通过一个典型的再生产图式去证明他关于无法销售的剩余产品的论断的真实性。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在以上第六章对罗莎·卢森堡的分析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斯滕伯格的危机理论。奥托·鲍威尔的妻子海琳，在奥地利社会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对《帝国主义》的评论中，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她指责斯滕伯格忽视了信贷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流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海琳认为，信贷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的扩展，可以克服比例失调。斯滕伯格的观点，如果可以应用的话，也仅仅适用于信贷尚未出现的、相对原始的资本主义阶段。<sup>[42]</sup>

海琳的评论，在对任何狭隘的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批判上，具有独特的意义。她坚持认为，国际贸易是劳动的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是经济矛盾明确无误的迹象。由于进口必须用它们的收入支付，出口的增长并没有提供任何实现问题的解决方法，比如英国事实上是个净进口国。在理解帝国主义斗争问题上，政治因素非常重要：<sup>[43]</sup>

世界战争源自军事集团的罪行和轻率行为，源自哈布斯堡的王朝利益和罗曼诺夫王朝的政治威望这一事实——所有这一切都很难与通常的研究经济利益而不是社会经济状态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形式相调和。在与封建主义结盟时，资本主义可以好战，可以寻求战争并通过战争提高其利润率。但是它同样也可以是爱好和平的。

它可以通过国际卡特尔，通过国家对出口信贷担保的保护，获得比通过军事庇护能够得到的更多的利润。总之，帝国主义既无法提供治愈经济危机的良药，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会衰落到一种不可避免的野蛮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帝国主义的对抗是个十分便利的骗人把戏，其背后隐藏的是统治阶级向工人隐瞒国内阶级斗争的现实的意图。<sup>[44]</sup>

## 5. 一个评价

海琳·鲍威尔对斯滕伯格批评的主要一击让人无法反驳：斯滕伯格的经济论证不足以证明他的预言式的结论。但是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其他修正主义者，都无法通过有力的分析来支持她的论断。<sup>[45]</sup>揭示斯滕伯格和卢森堡的含糊不清和不足之处，表明在不存在帝国主义或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造成的危机的情况下，信用提供了实现剩余价值的可能是一回事；证明信用可能在长期带来平稳、持续和有利的增长是另一回事。指出侵略性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缺陷，揭示盎格鲁—萨克逊（甚至某些德国人）实业家和政治家中存在的和平主义倾向是毫不困难的。表明战争的经济动机已经逐渐消失就是一件更艰难的任务。希法亭、考茨基和海琳·鲍威尔都无法对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对抗和战争之间必然联系的观点，提供令人信服的反驳（参见以上第十三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修正主义走得还不够远。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某些品性，使得修正主义具有这样一个肤浅的基础。现在看来，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强调的那些资本主义的特征，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在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业化造成的：而不是代表一个作为后发的产物的“发展的更高阶段”。<sup>[46]</sup>因此，斯滕伯格指责修正主义把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绝对化是正确的。但是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到目前为止，甚至是最为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都接受单向的历史理论，这就很难从特定的暂时的形式辨识出普遍的发展模式。<sup>[47]</sup>

布哈林认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无政府性的。他认为，竞争仅仅是从国家的层面转移到了国际领域，这使得世界经济并不比以前更加统一，和谐、和平的资本积累依然像以前一样遥远（参见以上第十三章）。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著述者持类似的批判意见。<sup>[48]</sup>但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为否定有组织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什么根据。马克思在他主要的经济学著作中，将资本主义的分类抽象成相互分离、相互竞争的领土国家：他提出的是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而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模式。他的国家理论仅提到国内统治，忽略了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为国家体系的国际关系提供任何分析。强化这一疏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主义的阶级利益的信念。“所有国家的工人团结起来”，这一口号断言无产阶级沙文主义已成为过去，意在声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样的古老。如果这是个非常普遍的想法，它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通过与更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比较,可以知道新修正主义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持特别和谐的观点。他们的政治策略仍然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认为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向社会主义进化的可能。的确,希法亭几乎将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描绘成一个具有双重政权的国家,这显然是错误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相信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已建立的民主机构的框架和平地实现。马克思本人倾向于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最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直到1917年列宁的“四月提纲”发表时,布尔什维克甚至还这么认为,并把他们反对俄国专制主义的整个政治策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参见以上第八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sup>[49]</sup>

20世纪20年代修正主义的错误很快暴露出来:大萧条、纳粹对政权的夺取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的再次爆发,成为对它们最有效的批判。但是它们的错误深深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材中,而不是德国或社会民主党特有的过失。确实,在某些方面,修正主义的分析比正统马克思主义更有说服力。海琳·鲍威尔的新熊彼特主义式的认识,即返祖性的前资本主义思想应当为帝国主义侵略负主要责任,现在已被广泛地接受。<sup>[50]</sup>修正主义者的错误在于,认为1918年后欧洲的政治重建已经消除了帝国主义侵略,并且夸大了战后经济稳定的持久性。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和平的和零敲碎打的改革渐进地实现。正如19世纪90年代的伯恩斯坦和他的同事一样,20世纪20年代的修正主义已经成了一种痴心妄想。

---

## 第十四章注释:

[1] 为了反对这种在库诺和连施的著作中集中体现出来的趋势,考茨基发表了《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Zwei Schriften zum Umlernen’, Die Neue Zeit. 33, 1915), 33-42, 71-84, 107-116, 138-146, (参见以上第六章)。

[2] C. F.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New York: Wiley, 1955) part 5; Anderson 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供了一个极具可读性的历史描述,参见 E. Anderson, Hammer or Anvil: the Story of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Movement (London: Gollancz/Left Book Club, 1945)。

[3] Ben Fowkes, Communism in Germany under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Macmillan, 1983)。

[4] H. James, ‘Rudolf Hilferd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Journal*, 24, 1981, pp. 847-69; W. Darity and B. L. Horn, 'Rudolf Hilferding: The Dominion of Capitalism and the Dominion of Gol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985 (Papers and Proceedings) pp. 363-8; cf. W. S. Woytinsky, *Stormy Passage*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61) pp. 467-8, 470-2; and D. Abraham,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rt 5.

[5] R.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首版于1910年) pp. 367-8.

[6] G. Stolper, *German Economy 1870-1940* (London: Allen & Unwin, 1940) parts II and IV.

[7] R. A. Brady, *The Rationalization Movement in German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3) pp. 63, 398, 355; cf. J. Kocka,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oder Staatsmonopolistischer Kapitalismus? Begriffliche Vorbemerkungen', pp. 19-35 of H. A. Winkler (ed.)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Voraussetzungen und Anfäng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4).

[8] R. Hilferding,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Klassen?' *Der Kampf*, 8, October 1915, p.22

[9] K. Renner, 'Problems of Marxism'. in T. Bottomore and P. Goode (eds) *Austro-Marx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 91-101.

[10] R. Hilferding, 'Probleme der Zeit', *Die Gesellschaft*, 1, 1924, pp. 1-3; cf. W. Gottschalch, *Strukturveränderungen der Gesellschaft und Polhisches Handeln in der Lehre von Rudolf Hilferding*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2), pp.191-4. Compare Bottomore and Goode, *Austro-Marxism*, p. 210 (for Bauer); E. Lederer, 'Konjunktur und Krisen', *Grundriss der Socialökonomik*, 4, 1925, p.384; and A. Gramsci, 'Americanism and Fordism', pp. 279-318 of G. Nowell Smith and Q. Hoare (ed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11] 'Probleme der Zeit', pp. 13-15; cf. Hilferding. 'Die Weltpolitik, des Reparationsproblem und die Konferenz von Genoa', *Schmollers Jahrbuch*, 46, 1922-3, pp. 623-50; and 'Realistischer Pazifismus', *Die Gesellschaft*, I, 1924, pp 97-111; also Gottschalch, *Strukturveränderungen* pp. 196-8.

[12] R. Hilferding, 'Politische Probleme', *Die Gesellschaft*, 3, 1926, pp. 289-

96;cf. Hilferding , 'Die Eigengesetzlichkeit der Kapitalistischen Entwicklung', in B. Harms (ed.) Kapital und Kapitalismus (Berlin: Reimar Hobing. 1931) pp. 34-7.

[13] K. Kautsky, 'Zwei Schriften'.

[14] Hilferding , 'Probleme der Zeit', pp. 3-4, 11-13.

[15] Gottschalch, Strukturveränderungen, p. 199.

[16] G. D. H. Cole's 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 (Gottschalch, Strukturveränderungen. p. 268). 希法亭为该书的德文版撰写了前言, 德文版1921年在柏林出版。

[17] F. Naphtali, Wirtschaftsdeinokratie: Ihr Wesen. Weg und Ziel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77; first published in 1928) p. 28; stress in original.

[18] Ibid; Naphtali's 'shopping list' of reforms is on pp. 194-6.

[19] Ibid, p.29.

[20]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erlin: Dietz, 1929) vol.II pp. 545-6, 591.

[21] Ibid. pp. 598-9, 606-7, 610-13

[22] 参见希法亭1941年去世前写的两篇文章: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pp. 125-37 of T. Bottomore (ed)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Marx (Oxford: Blackwell; 1981): and 'State Capitalism or Totalitarian State Economy', Modern Review, June 1947. pp. 266-7, reprinted in C. Wright Mills (ed.) The Marxist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3) pp .323- 8.

[23] Hilferding, 'Die Eigengesetzlichkeit', pp. 20-34.

[24]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pp. 545-6, 562-3, 566-9, 591.

[25] Ibid. p. 578.

[26] F. Sternberg, Der Imper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Neuc Krit 1971; first published 1926).像卢森堡一样, 斯滕伯格在他的《反批判》的第一部分为自己的论证提供了更简明的版本: F. Sternberg , 'Der Imperialismus' und Seine Kritiker (Berlin: Soziologische. Verlagsanstalt, 1929) pp. 1-109.

[27] Der imperialismus, pp. 7-9.

[28] Ibid. pp. 23-30.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对马克思进行的批判: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章。 M.C. Howard and J. E.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 2nd edn. pp. 226-7.



[29] Der Imperialismus, pp. 33-40.

[30] Ibid, p. 41.

[31] Ibid. pp.45-6.

[32] Ibid. p. 68.

[33] Ibid. pp. 49, 83.

[34] Ibid. pp. 94-107.

[35] Ibid. pp. 87,102, 106-7; cf. 'Der Imperialismus' und Seine Kritiker, pp. 17-29]

[36] Der Imperialismus, p 114.

[37] Ibid. pp. 234-6.

[38] Ibid, pp. 246-51.

[39] 关于这个问题的大胆预见参见J. A. Hobson, 'Can England Keep her Trade?' National Review, 18, 1891, pp. 1-11. Marx's own 'logical-historical' method is discussed by R. L. Meek Econo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Chapman & Hall, 1967) pp. 93-112, and in Howard and King, Political Economy. pp. 54-9.

[40] A. Emmanuel,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M. Kidron, 'Black Reformism: The Theory of Unequal Exchange', pp. 95-123 of Kidron, Capitalism and Theory (London: Pluto Press. 1974).

[41] H. Grossman, 'Eine Neue Theorie über Imperialismus und die Soziale Revoludon', Grünberg's Archive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nius und der Arheirerhewegung. 13, 1928, p. 192. See also L. Laurat, L'Accumulation du Capital d'après Rosa Luxemburg (Paris: Marcel Rivière, 1930) pp. 182-6, and H. Neisser, 'Zur Theorie des Wirtschaftlichen Gleichgewichts'. Kölner Sozialpolitik Viergel jahrschrift. 6, 1927, pp. 105-24.

[42] H. Bauer. 'Der Imperialismus', Der Kampf, January 1927, pp. 7-12 and 'Akkumulation, Kredit und Imperialismus', Der Karnpf ,April 1927, pp. 173-8. 然而,在对斯滕伯格的著作进行的十分苛刻的评论中,斯滕伯格以前的老师弗兰茨·奥本海姆对他的“卢森堡主义”持相对支持的态度。

(F. Oppenheimer, 'Fritz Sternberg's "Imperialismus"', Archly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57, 1927. pp. 496-526.

[43] Bauer, 'Akkumulation', p. 11.

[44] Ibid, p. 178.

[45] 我们将在第15章看到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并没有成型。

[46] A.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47] 比如, 比较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全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1-562页。以及H. Friedmann, ‘World Market, State, and Family Farm: Social Base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in the Era of Wage Labour’,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1978. pp. 54-86.

[48] N. Bukharin, ‘Die Widersprüch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Die internationale*, 7, 1924. pp. 560-3; cf. E. Varga, ‘Der Überimperialismus und das Gesetz der Ungleichmässigen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 October 1926. pp. 245-50, and H.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 (Leipzig: Hirschfeld, 1926) pp. 602-22. 论格罗斯曼参见以下第十六章。

[49] G. Lichtheim,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1). 也可参见P.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Verso, 1976) pp. 176-7 and N.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83).

[50] R. Dahrendorf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6); A. Maye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Pantheon, 1981). 参见以上第十二章。

## 第十五章 向社会主义过渡：1917—1929年的共产主义经济学

### 1.引言

十月革命翻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篇章。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为一个实践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无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还是在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的指南，布尔什维克思想家们不得不开创一种能够指明如何实现这种过渡的经济学。因为夺取政权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外围，任何的创新都是必需的。由于俄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反《资本论》的革命”，<sup>[1]</sup>对俄国来说，马克思有关过渡问题的仅有遗产的相关性极其有限。当然，很多革命者完全意识到了这些难题，他们用他们所处时代的新的解释，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参见以上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托洛茨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直截了当地重申：“如果世界资本主义……能够找到一种新的动态平衡……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基本历史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还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而且（帝国主义）还不构成资本主义崩溃的一个阶段。”因此，俄国革命应当被视为一场“早熟”的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注定要失败。<sup>[2]</sup>

面对1917年以后的困难，布尔什维克完全可能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式的解决方法，这也许是我们理解共产主义经济学具有的理论上不稳定和冲突的特征时，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革命政权继承了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1914年后成年男性人口中的三分之一，被动员起来参与到战争中，落后的俄国经济已经极其脆弱，很难承受一场全面的战争。革命和内战更是毁灭性的。假设1913年工业产出指数为100，1917年下降到75，1921年为31，而农业生产在1917年下降为90，四年后下降到60。在俄国内战期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下，俄国的对外贸易事实上几乎完全中止。随后的复苏十分迅速，工业和农业指数在1928年分别上升到133和125。然而，将1913~1928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俄国仍然远远落后于西方。与1870年至1913年2.5%的年增长率相比，这一时期的年产出增长率只有极低的0.8%，前一个时期人口的年增长率为0.9%，但在1913年后下降到0.3%。<sup>[3]</sup>

1929年之前，苏联的经济史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都产生了

各自的过渡理论。革命后的头八个月，以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经济关系的鸿沟不断扩大为特征。农民夺取了土地，并根据传统的公社原则进行重新分配，使得新政府颁布的正式的土地国有化法令成为多余，并减弱了先前农民内部分化程度和减低了生产率。屈指可数的工业的国有化，大多是自发的地方行为的结果。此外，实行了“工人控制”，其中私人资本家受工厂委员会和当地布尔什维克官员的监督。列宁顶着左翼的批评，捍卫了这种制度，将其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相当含糊的一个术语，尤其是考虑到革命成功之前对它的使用），并把它视为至少在早期阶段的主要的过渡模式。

1918年6月以后，内战的爆发激起了一股国有化的浪潮，并强制实行紧缩经济。试图征用全部的农业剩余，农民留下的仅够播种和勉强生存。工业品的配置不是通过货币中介完成，而是进行直接的配置，工资以实物发放，把军事纪律强加给城市劳动力。最终取消了对公用事业、住房、铁路交通和基本食物配给的收费。经济管理的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呈现出侵占、恐怖和独断的特征。布尔什维克理论家明确地将其视为是向社会主义的适当的过渡。

1921年初，对农民的余粮征收，被一种新的农业产出税取代，这是第三个阶段的标志，即新经济政策（NEP）阶段的来临。恢复了农民留下农业剩余进行交易的权利，以及雇佣劳工的权利。他们只为购买工业品而出售粮食，因此新经济政策预示着恢复了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市场交易。富裕的农民——臭名昭著的富农——从这一制度中获益颇多，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耐普曼——开始利用这一机会从事有利可图的零售贸易。而经济的“制高点”——银行业、大规模工业和对外贸易——仍然归国家所有，并受政府直接管理支配，用货币购买投入，为货币出售产品，私人企业再次获准雇佣技工和拥有小作坊。新经济政策在相当大的范围上允许中央计划和市场的同时存在。列宁将其视为“过渡性的混合体制”。说它是“混合的”，是因为其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有简单的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说它是“过渡性”的，是因为它固有的不稳定性：它要么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复辟，要么终结于完全社会化经济的实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普遍认为，过渡将随着国有部门经济比重的增加，通过逐步对市场形式的超越而实现。但是，在如何完成这种过渡上，理论家们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新经济政策下的根本难题是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农民，工业的扩张要求将大部分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地区。随着战时共产主义的结束，这只能通过引导农民为市场提供充足的粮食而自发地实现，而这又要求农民可以有吸引力的价格获得工业领域生产的商品。但是工业领域的“商品荒”是整个

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的重要特征，农业品和工业品的相对价格一再成为尖锐冲突的源泉，就像在1923年的“剪刀差危机”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当时工业品价格急剧上升，农民不愿意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出现了“对粮食严重短缺的恐慌”。不久之后，价格的“剪刀差”消失了，但在这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新经济政策的问题变得更为明显了。1928年的“粮食危机”，当时农产品的销售数量远远低于对它的需求数量，成为压垮新经济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后，开始实施让人联想起战时共产主义的措施，1929年后，它们在斯大林“自上而下的革命”中达到了顶峰。<sup>[4]</sup>

本章重点研究这些时期产生的过渡理论。尽管布尔什维克执掌政权的第一个十年，是与更为广泛的富有成果的理论发展联系在一起。在新成立的由大卫·梁赞诺夫管理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推动下<sup>[5]</sup>，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蓬勃发展；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数理经济学的萌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认真地对计划问题进行了分析；<sup>[6]</sup>依附理论的萌芽——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焦点向东方转移的过程的一部分——开始出现。<sup>[7]</sup>苏联的历史学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亚洲的应用；<sup>[8]</sup>像康德拉季耶夫这样的统计学家，对资本主义增长周期的本质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sup>[9]</sup>甚至新民粹主义都试图在解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作出自己的贡献。<sup>[10]</sup>尽管如此，过渡问题还是主要思想家关注的重点。

过渡理论多种多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功能，通过把逻辑归因于历史，产生了一种把过渡问题看作是一个受到高度约束的社会工程问题的倾向。人们认为，无产阶级一旦作为统治阶级掌握政权，必然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换言之，过渡具有法则般的特征。因此，理论可能会落后于实践，而没有成为纯粹被动的理论或者是对不怎么令人满意的现实的辩解。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像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样的理论家，为了使他们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形式发生的根本变化相一致，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坚持明显存在差异的观点，在他们打算接受的经济形式发生根本变化时可能更是如此，而且他们既不会陷入怀疑论中，也不缺乏忠实的追随者。理论著作同历史转变一样，具有了辩证的特征。

然而，革命之后精神生活的复杂性，不仅仅体现在理论家们立场的急剧变化上。激烈的争论，成为每个阶段的特点。现成的过渡经济学的缺乏与此有关，因为事实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从来没有被清晰地界定过。<sup>[11]</sup>从而，在是什么构成最终目标这一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不同的观点，最终目标的萌芽特征在过渡时期应该是可能被观察到的。布尔什维克既简单化又复杂化了这个问题。随着将党视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它的支配地位成了健康发展的判断标

准。事实上，早在20世纪20年代，保持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垄断地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存在的长期信仰的主要支柱。托洛茨基在1904年宣称的，布尔什维克的逻辑使得党“取代”了阶级这一断言已得到证明，尽管托洛茨基本人现在也否认了这种指责。<sup>[12]</sup>

几乎所有的党员都赞同保持布尔什维克专政的重要性，但是革命的孤立和农民对它进行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增加了对压制反革命力量的可能性的疑虑。然而，这些焦虑被一些事件改变了。一旦在激烈而艰苦的内战中，政权获得胜利并保存了它的力量，由军事失败而丧失政权的可能性就消失了（虽然这种担心在1926年后又卷土重来）。相反，党内的每一派别都对其他派别持怀疑态度。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是有其充分的理由的：可能表达利益的其他方式都被否定了，非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也只能由布尔什维克政党来代表。托洛茨基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情绪，他写道：“无论是阶级还是政党，都不能通过他们所说的进行评判……这也完全适用于政党中的不同群体。”<sup>[13]</sup>“在手握共产主义旗帜的情况下倒退到热月的状态。在这里存在着恶魔般的历史欺骗”<sup>[14]</sup>是可能的。这样，理论的分歧呈现出一种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对抗的恐怖特征。

因党内每一派别都认识到党的专政实际上是不稳固的，这一特征得以加强。尽管很少有布尔什维克相信当前的形势将完全无法持续下去，但主要的理论家认为他们的生存的确是岌岌可危的。策略选择的空间非常有限，而其他派别的计划似乎对成功过渡的可能性产生了威胁。在这样的情形下，占统治地位的派别对党的纪律的合法界限作了更为严格的解释，一系列的反对派别感受到压力更大的限制。<sup>[15]</sup>

1924年1月列宁的去世（加之他在去世前生病的18个月中影响有限），加剧了这一冲突，因为这一冲突开始与争取继承权的斗争融合在一起。这导致对列宁的神化和将其作品提升到类似于犹太法典《塔木德经》的地位，这都使得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这样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家难以适应。然而，它的确反映出布尔什维克党转变为一个大的官僚机构，它有能力管理一个现代国家，但同时也能接受更为粗俗的意识形态。<sup>[16]</sup>

## 2. 作为过渡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公社国家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试图立即实施列宁在1917年就已经形成的思想（参见以上第十三章）。苏维埃政权发布法令，承认农民夺取土地是合法的，准许工人对工业的控制，并对那些被认为能够使国家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sup>城市经济</sup>

因素进行国有化。开启了与德国政府的和平谈判，拒绝偿付沙皇俄国的债务，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初步工作。

列宁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可以从“国家资本主义”组织和公社国家的结合开始。私人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专家，仍然像以前一样工作，但现在要置于无产阶级政治权力的指导和监察之下。列宁认为，这足以重建生产和分配，直到国际革命能够提供向社会主义建设更有系统进展的环境。<sup>[17]</sup>这里有几个假设，没有这些假设，上述主张就毫无意义。列宁在1917年早期就坚持认为，依据革命大众广为接受的纲领明确地夺取权力，可以消除内战扩大的可能性。同时，他坚持认为，民主化将振兴经济和武装力量，足以抵御德国帝国主义和进行一场必要的革命战争。

这些信念很快被一些事件证明是错误的，由这些想法决定的过渡形式同时遭到破坏。革命进一步瓦解了经济和武装力量。在食物供给不足的压力下，在从被剥夺的大地主那里获得土地的期望下，城市人口减少，士兵逃离军队。布尔什维克政府被迫在惩罚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下向德国投降。这种混乱导致无法通过批准地方行使主动权，来扭转工人控制的局面。这破坏了整体和谐，超越了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视为权宜之计的措施，扩大了对私人资本家的压制，从而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模式产生了直接的和不利的影晌。到1918年3月，列宁很快背弃诺言，以经济上的必要性为名义，将工人阶级组织的自治从属于等级制的控制，并以此取代了在《国家与革命》中被明确阐明的理论。<sup>[18]</sup>

政权力量的薄弱，也使其无力确保私人资本家和现有官僚们的合作。1918年，反革命力量的增长，导致列宁的方案所依靠的人员逃离了无产阶级的大本营。随着1918年中期内战的爆发，布尔什维克被迫将大规模的国有化当作一种安全措施。<sup>[19]</sup>同时，随着求助于强制措施为城市居民和红军征集食物供应（没有足够的现实的资源通过自愿交换来获得它们），政权与农民之间的联盟变得紧张起来。<sup>[20]</sup>

所有这些都表明，列宁1917年革命策略中存在严重的误判和内在矛盾（参见以上第十三章）。特别是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模式，被证明无法与阶级斗争的动力学相协调。列宁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遭到党内批评。包括布哈林在内的左派，在这一阶段呼吁采取更多激进的措施，并热情支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发展。他们认为，这一系列的行动是一些事件强加给政权的。但是，由于革命发展的内在逻辑，左派将1918年经济政策的激进化看作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不可避免的特征。布哈林的思想被证实是有感染力的。到1920年时，他将这些思想在《过渡

时期经济学》中系统化了，所有重要的布尔什维克似乎都接受了这些思想的普遍效力。<sup>[21]</sup>然而，布哈林作了太多的妥协（其他的左派难以接受）：将迄今为止他一直坚持的完全民主化的“公社国家”的主张，让位于一个中央集权的党的专制的概念，尽管这个概念是以无产阶级“自治”的面目进行了伪装的。<sup>[22]</sup>

### 3. 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时共产主义

起始于1918年中期、实施了几乎三年的政策，以战时共产主义的名称而广为人知，它代表了一种形式简陋的指令经济。几乎所有的工业都被国有化了，资源通过行政机关而非市场进行配置，私人贸易受到压制，而货币关系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契卡（肃反委员会或安全警察）和红军将农产品从农民那儿夺走，自行分配给工业，并作为消费配额分配给指定的群体。苏维埃内部的民主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党内的纪律大大加强，对反革命分子实施“红色恐怖”，这些反革命分子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曾经支持十月革命、却抵制布尔什维克党专政的社会革命团体。<sup>[23]</sup>

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是对战时共产主义作出的最为成熟的理论表述。它最核心的论点就是独裁是必要的，因而也是普遍适用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范式。<sup>[24]</sup>它既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代表了国家社会主义形式，是“翻过来”的现代资本主义。<sup>[25]</sup>国家资本主义的结构——布哈林认为它带来了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控制下将会被重组。由于这代表了一种新的阶级专政，针对敌对群体不可避免地存在强迫和恐怖行为。根据布哈林的论点，无产阶级的民主组织同样是不适合的。集中虽然随着往后国家的消亡，最终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但在无产阶级专政期间，为了胜利地结束内战，集中是必要的。在布哈林看来，过渡时期的政治结构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在党的领导下，无产阶级自愿的自律是其阶级统治最完美的表现。<sup>[26]</sup>

布哈林重申了在《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以及《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中（参见以上第十三章）的立场，并创造了“消极的扩大再生产”一词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他认为，经济生活中的国有化、军国主义和战争，使得扩大再生产朝向紧缩的方向发展。对资源的非生产性利用，达到了阻碍经济积极增长的程度，带来了革命并导致世界范围内出现崩溃。但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将使得消极的再生产延长到后资本主义时代。作为经济崩溃的产物，随着反革命力量被粉碎，革命会使其得到深化。<sup>[27]</sup>



布哈林进一步认为，建立在国家控制和强制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摆脱了经济法则的宰制。从马克思主义的特定意义上理解，政治经济学只适用于商品生产体系。推翻资本主义之日，也是无产阶级经济学终结之时。布哈林这时认为，“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还没有实现。决定论而非唯意志论仍然居统治地位，但它代表了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自觉追求。这毕竟是由社会主义革命所代表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过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事实是，纪律严明的组织和强制是最重要的。<sup>[28]</sup>

布哈林设想，随着内战的成功结束，战时共产主义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但他没有看到根本性重建的需要。在党的先锋队的领导下，中央集权的无产阶级国家会坚持一种行政性地组织在一起的城乡间的交易体系，随着工业生产能力的恢复，以替代强制性的征用。<sup>[29]</sup>这是因为消极的再生产，必然集中于联系更为紧密的城市经济中，也因为农业生产的小资产阶级结构阻碍了有效的国有化，因此，最初对农民的剩余进行强制性的剥夺是必需的。<sup>[30]</sup>最终农村经济被社会化，阶级差别逐渐消失，不平等减少，国家随着参与式民主和和谐的计划经济的建立而消亡，虽然布哈林从未确切地详细说明所有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sup>[31]</sup>

正如对其存在的必要性出色地加以合理化一样，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有其政治目标：它力求反驳西方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对党的专政及其统治方法进行的批评。在反驳中，《过渡时期经济学》把党的专政及其统治方法提升到任何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中都必然出现的现象的高度。<sup>[32]</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布哈林的书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及托洛茨基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sup>[34]</sup>是互补的。它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重要的布尔什维克从未完全否定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理论。随后的几年，在新经济政策建立起来后，他们仍承认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是权宜之举，而且将它们视为整个过渡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托洛茨基甚至声称，如果革命扩大到了国际范围，1921年的“退却”将是不必要的（虽然他并不总是坚持这一点）。<sup>[35]</sup>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承认，战时共产主义措施为新经济政策的过渡途径提供了基础。至于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二次革命”，可以说已经有了一个较早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奠定了这个基础。此外，很多著作中的主要思想在继续提出20世纪20年代完全不同的过渡范式。至高无上的国家、各种不同形式经济结构的统一、党的主导作用、对工人阶级“自律”的需要，以及完全取代市场关系的最终目标，所有这些都体现在布哈林随后的著作中。

在战时共产主义为什么最终被证明不可持续这个问题上，布哈林和其他理论

家都相当的坦率。<sup>[36]</sup>战时共产主义的矛盾是破坏了列宁“国家资本主义”计划的矛盾的反作用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屈从于阶级斗争的压力，而战时共产主义的崩溃是因为它忽视了阶级合作的需要。内战期间，当恢复“旧体制”仍然是一种明显的可能时，对农民的强制没有引起他们一致的抵抗，因为布尔什维克的失败意味着地主的回归。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对白军的胜利变得越来越稳固，农民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日益明显。然而，内战结束时，并没有立即放弃战时共产主义，这表明领导阶层非常专注于这种过渡模式。直到1921年3月，列宁最后得出结论：要么是经济政策的根本改变，要么是他的政府被暴力推翻。

#### 4.工农联盟的政治经济学：布哈林的间接过渡理论

俄国1914年至1921年间的社会经济崩溃，在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对1921年的印象是：它是“无法修复的断裂”之一。除了产出的缩减，俄国的城市人口大量减少，俄国的战时伤亡很可能是所有交战国中最大的，同时，大范围的饥荒迫在眉睫。党外的无产阶级机构已经丧失实权，工人阶级在战胜反革命的过程中几乎毁灭殆尽。<sup>[37]</sup>

1921年3月，列宁得出结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继续存在和经济的复苏，需从战时共产主义的过渡道路上“退却”。<sup>[38]</sup>但是，他希望新经济政策能把改进了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让人联想到革命刚刚结束的时期——纳入其中。他竭力（不是很成功）鼓励外国资本进入苏维埃国家的合资企业中，他还力求（较为成功）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同时敦促共产主义者“学会贸易”。<sup>[39]</sup>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為了物质经济的恢复，不能代表一个连贯一致的模式。它还具有党内左派指出的具有明显的复辟主义危险性的特征。此外，在1922年末和1923年，列宁对政权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具有沙皇专制特色的行政权力滥用，越来越感到不安。在持续的孤立和“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中，他逐渐认识到，理想的社会主义的前途，主要希望在于保持党的精英们对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忠诚。<sup>[40]</sup>同时，他认为真正迈向社会主义的经济进步，是有可能在新经济政策下实现的，“退却”通过稳固“工农联盟”而成为一种进步，在这个联盟中，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工业的进步恢复活力，农民通过合作社的发展得以改造。<sup>[41]</sup>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1923年后，布哈林提出了他的第二种过渡模式。<sup>[42]</sup>与他1920年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相比，布哈林现在提倡通过迂回的途径，依靠非社

会主义形式的增长实现社会主义。<sup>[43]</sup>结果，他的新方案遭到左翼反对派的强烈批评，但是，在1923年后的几年里，它如正统的列宁主义一样对占统治地位的党的派别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然而，布哈林的新经济政策模式，并不表明与《过渡时期经济学》的完全决裂。两者都建立在接受过渡时期布尔什维克先锋主义的基础之上；每一个模式都得到相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辩护，在这种解释中，辩证法实际上等同于现代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均衡论；布哈林1920年提出的许多具有实质意义的观点，在他改进过的过渡思想中有了新的表述。<sup>[44]</sup>长期目标没有改变：包括农业在内的完全社会化的经济，以及市场关系的消除。从现代意义上讲，布哈林从来就不是一个“市场社会主义者”。<sup>[45]</sup>因此，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他早期的方案，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它是一种适当的政策。在布哈林看来，主要的不同是情况发生了变化。<sup>[46]</sup>

布哈林认为，在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的进步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大工业的扩张和合作社的发展。<sup>[47]</sup>这些主张相对而言争议较少。这时候，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假定，国有部门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扩大具有相同的含义；没有人否认合作社既能削弱农民的个人主义，又可以从贸易活动中挤出私人资本。<sup>[48]</sup>在工业如何扩张和合作社为什么是实现农业社会化足够强大的力量问题上，布哈林受到最严厉的批评。

布哈林声称，国有工业取决于农民需求的增长，这些需求最终为消费品提供了市场。<sup>[49]</sup>在这种联系中，布哈林批评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在杜冈的分析中，消费需求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布哈林也呈现出他在《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参见以上第五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第7节）中予以抨击的奥地利边际主义对他的影响。<sup>[50]</sup>布哈林承认，合作社在过去被正确地解释为一种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改变它们的性质。正如小资产阶级农业通过帝国主义国家融入现代资本主义一样，无产阶级国家将把俄国农业关系整合进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综合体中。这将有助于对合作社的进一步的激励，不管这些合作社是涵盖了生产活动还是仅限于流通。因此，对布哈林而言，就像在《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以及《过渡时期经济学》中那样，政治仍然是一个关键变量。<sup>[51]</sup>

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存在长期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但工农联盟是个微妙的问题。任何人为地加速工业增长的尝试都会扰乱经济的比例，造成国有部门的“销售危机”，同时，由于要求农业部门提供更多的资源，会威胁到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政治联盟。现实要求党承认苏维埃社会主义是“落后”的，进

一步的发展可能不得不以“蜗牛般的速度”进行（参见本章以下第7节）。

然而，在布哈林看来，这不是俄国例外论的问题。国内的情形反映了全球经济整体结构。小资产阶级在整个世界的阶级构成中占据主体地位，尽管如此，基于与《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参见以上第十三章）中概括的相同的原因，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时机已经成熟。布哈林认为，随着革命的传播，俄国的情形将会在其它国家出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工农联盟将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sup>[52]</sup>而且，与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性的内战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消极的再生产，将会产生类似于俄国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出现的那种经济崩溃。因此，甚至对发达国家来说，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必然是间接式的。<sup>[53]</sup>布哈林继续指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形式上类似于资产阶级革命是错误的。与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是被剥夺的阶级；它只能在推翻资本主义后才能开始自己的文化发展。<sup>[54]</sup>这进一步强化了共产主义政党按照列宁主义高度集中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必要性，这一点已经在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中被证明了。然后，布哈林再一次在新经济政策具有的范式意义的基础上，就如同《过渡时期经济学》在内战的条件下仍具有普遍意义一样，给出了他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解。<sup>[55]</sup>

## 5. 苏维埃关于西方和过渡问题的观点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偏离主题，考察一下苏维埃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前景的看法。对过渡的争论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因为西方持续存在的不稳定使得革命的希望和潜在的危机同时存在。存在希望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不稳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会很小；存在对革命而言潜在的危险是因为，经济上的灾难和帝国主义国家敌对的增强，唤醒了苏维埃国家重新进行军事侵略的幽灵。有时候，对西方的看法包含一个更为复杂的视角，我们会在本章以下第8节看到，但这是问题的实质。然而，事实上，共产主义者对这些问题进行的分析，并不怎么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点令人感到奇怪，这不仅是因为这些问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大量的知识精英当时正聚集在莫斯科。除了本章关注的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和某个时期的列宁，还有很多如康德拉季耶夫、福克纳和恰亚诺夫这样才华横溢的孟什维克和新民粹主义者，他们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仍然可以自由地工作和出版著作。<sup>[56]</sup>

似乎有两个原因，使他们未能对世界资本主义进行充分的评价。首先，他们都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问题。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精力都集中在社会过渡、

经济增长和社会主义计划等这些令人兴奋的新问题上，而不是放在被认为最终注定要灭亡的社会秩序内部矛盾的研究上；第二，20世纪20年代列宁主义正统的重要影响力不断增加，阻碍了与官方布尔什维克主张的列宁思想有冲突的任何原创性思想的出现。因此，康德拉季耶夫著名的长波理论，被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派别和左翼反对派视为异端邪说。<sup>[57]</sup>

类似的因素也使得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者，压制了原创性思想的发展。例如，德国政党教条式的独裁主义，反对而不是赞同像弗里茨·斯滕伯格和亨利克·格罗斯曼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参见以上第十四章和以下第十六章），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都不存在相对高水平的共产主义运动。英国的政党较为幸运，拥有一位年轻且极具才华的成员——莫里斯·多布。但是，多布同样也着迷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内部的经济问题，把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详细剖析的任务留给了像英籍印裔人拉贾尼·帕尔姆·杜德这样天分稍逊的同志。<sup>[58]</sup>

当时，对20世纪20年代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最有影响的研究的非俄国经济学家，是流亡在莫斯科的匈牙利人尤金·瓦尔加，即使他算不上是一位敏锐的思想家，也该是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重要地位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默然获得的。<sup>[59]</sup>20世纪20年代早期，瓦尔加重视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问题，这在实际上相当于只是承认世界经济已经从1920年至1921年的深度萧条中复苏了，而且道威斯计划正在限制赔款危机带来的破坏。瓦尔加后来认为，复苏将是短暂的，因为工业合理化正在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减少就业和工人的消费，并无情地导致进一步的危机。<sup>[60]</sup>鉴于1929年后发生的一切，可以说这一观点是极具先见之明的。但是，它只得到了并不严密的论证，从而很容易受到对消费不足持有反对意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总之，共产主义者对待消费不足的态度是以明显的不安为特征的，这一点可由党的教科书在这一问题上的前后不一致看出来。<sup>[61]</sup>然而，在缺乏任何一种利润率下降模型时（参见以下第十六章），布尔什维克经济学家无法提出更好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回到布哈林，他是唯一一位认真地对待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的可能性的重要共产主义理论家，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的确是在新经济政策下实现渐进主义的苏维埃工业化的必要的前提条件。<sup>[62]</sup>但布哈林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立场，<sup>[63]</sup>他的观点来源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既因与像希法亭和考茨基这样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敌人的联系而受到妖魔化，而且也存在分析上的缺陷（参见以上第十四章）。1929年后，布哈林的党内的敌人很容易就这两点败坏他的名声。到那时，布哈林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因为国内的原因被斯大林主义者

放弃了（参见本章以下第9节）。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存在国际上的原因。1926年后，当苏维埃的外交和第三国际的政策遭到几次重大挫折后，俄国不久之后将遭到军事进攻的担心进一步增强。因此，更大的力量被放在进行更为迅速的工业化的需要上，理论家们在调整对西方的看法方面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sup>[64]</sup>

1926年后，斯大林偏离了布哈林的思想，尤其是在1928年同布哈林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分歧，这常常被描绘为“向左转”——这是适当的，因为斯大林的思想更加接近于左翼反对派持有的某些思想，其主要理论家是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 6.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二元经济过渡理论

左翼反对派将布哈林的新过渡理论（本章第4节对该理论已作概述），看作是修正主义的形式，认为它在经济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托洛茨基对左翼反对派对布哈林的整体批判作了最佳阐述（参见本章以下第8节），但是，左翼反对派最具原创性的经济学家是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sup>[65]</sup>

###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小传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886年生于奥廖尔省一个神职人员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同年在党的分裂中与列宁结成同盟。尽管在革命运动中非常活跃并在党内居于重要地位，还遭到逮捕和国内流放，但直到1919年作为《共产主义ABC》的合著者（与布哈林）才在知识领域脱颖而出。20世纪20年代，他成为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的重要经济理论家。1927年与其他左翼反对派一起被开除出党，1928年在国内流放。1929年恢复党籍，1931年再次被开除出党，最后，在斯大林肃反运动中，在1937年未经审判被处决。

像布哈林一样，在革命之后最初的几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战时共产主义的热情支持者。20世纪20年代初，他也承认战时共产主义终究不是过渡的长期模式。<sup>[66]</sup>不亚于布哈林，他也致力于支持新经济政策（同时也不否定战时共产主义的必要性），相信它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范式。然而，他的理论关注的焦点与布哈林的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他更多关注革命后经济中的具体情况。

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来，国有部门的扩张是社会主义增长的主要变量，最为重要的是国有部门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关系占支配地位的非国有经济相比时的增长率。<sup>[67]</sup>1917年十月是一场二元革命，正如托洛茨基所言：

为了建立苏维埃国家，需要把两个历史性质完全不同的因素接合起来并相互渗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发展的曙光期所特有的运动——和无产阶级暴动，标志着资产阶级衰落的运动。这就是1917年的本质。<sup>[68]</sup>

尽管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承认，无产阶级和贫穷农民之间结成联盟是可能的，但他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和限制富农与“耐普曼”的影响，这种联盟才是成功的。双方在激烈争夺对农民群众的领导权。它不只是一个国内力量为复辟俄国资本主义效力的问题。世界经济也有着严重的危害。苏维埃工业是无效率的，只能通过外贸垄断来保持运营，而且面临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持续压力。外部资产阶级力量和俄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一起形成与农民的联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sup>[69]</sup>

因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主张，国有工业必须在经济增长中占支配地位。这会直接增强社会主义关系的力量。同时，通过向农业集体化（没有大规模的机械化是不可能的）提供资源，可以间接地产生同样的效果。合作社有助于这一过程，但它并不是对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真正的替代：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sup>[70]</sup>这里产生了一个关键的经济问题，布哈林理解的社会主义积累——也就是，依靠国有部门内部产生的剩余进行积累<sup>[71]</sup>——不可能为工业按要求的比例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相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概念。扩大社会主义积累所需的资源，还必须从非社会主义经济中榨取。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它们主要来自农业部门。<sup>[72]</sup>因此，工业和农业的交换不可能遵循价值规律，就如同苏维埃经济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贸易无法遵循该规律一样。从内部看，为了国有部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利益，必然会存在不等价交换。<sup>[73]</sup>外部经济关系不得不通过外贸垄断来开辟，这同样是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服务。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经常使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这一术语，因为他认为俄国革命如果要持续下去，不存在能够替代这一增长策略的其它选择。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两大规律事实上是对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的抽象表达，内部和外部的资本主义力量迫切要求进行等价交换和自

由的国际贸易，而社会主义的存活必然要求中止这两点。<sup>[74]</sup>在这种冲突中，苏维埃工业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尽管在当时它不如资本主义现代工业有效率，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相信它具有组织上的优势。现有的社会主义关系使得对国有经济的不同部门和社会主义工业、国内私营经济与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有计划的协调成为可能。经济计划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王牌；如果正确地使用了它，俄国社会主义原则上没有理由不继续前进。<sup>[75]</sup>

随后，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开始考察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的具体情况时——正如他所说的，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代数学提供算术例子<sup>[76]</sup>——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变得极为悲观。他在这里证明，无论与布哈林，还是与托洛茨基相比，他自己都是更为优秀的经济学家，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倾向于把他们的辩论局限于理论概括的层面。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他的经验研究和对马克思再生产图式进行的卓越的概念扩展结合在一起。<sup>[77]</sup>对罗莎·卢森堡对再生产图式纯粹的抽象所作的批判印象深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正式地改造了它们，以便于对单一社会形态中存在多种生产方式的情形进行分析，他认为这种情形是最为典型的。<sup>[78]</sup>对于苏联来说，跨部门交换是在不同的经济体系中进行的，每一种经济体系都有各自的部门。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经验分析要求适当地关注分配原理，以及那些与非生产性消费和流通活动中私人资本的重要性相联系的原理。通过条理清晰的推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推断，在俄国持续孤立的状况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将革命扩展到国际范围；“一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sup>[79]</sup>

## 7. 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比较

1924~1928年，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他们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分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也是左翼反对派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占统治地位的派别之间发生的更广泛的冲突的一部分。不同群体坚持的一般的理论立场，将在本章以下第8节和第9节考察。这里，我们集中关注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经济理论方面发生的冲突。

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围绕如何发展工业展开的。在布哈林看来，工业的扩张取决于农民需求的增长，特别是消费品市场上农民的需求。布哈林反对罗莎·卢森堡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他将卢森堡的长期消费不足视为一派胡言，认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相信工业可以独立于消费需求而发展同样也是错误的。<sup>[80]</sup>



布哈林对卢森堡的批评远比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评严厉（参见以上第五章和第十章）：事实上，布哈林严重歪曲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有关第Ⅱ部类发生收缩的可能性的观点。作为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进行攻击的基础，布哈林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经济学的抨击无论如何都不十分中肯。苏联经济不是一种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被设想为只是国有部门相对迅速地增长，而不是消费的绝对下降，更不是农民消费的绝对下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坚定地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作为无产阶级恢复活力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必然会上升。<sup>[81]</sup>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强调比例协调对均衡增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意是“比例协调铁律”限制了国家积累。<sup>[82]</sup>的确，确保比例失调被限制在可管理的范围之内的问题，困扰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正确地认识到主要的困难在于“商品荒”。与战前的情况相比，革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生产的工业品的供求关系。从总体上看，需求增加了，供给减少了。<sup>[83]</sup>因此，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存在对国有部门产出的过度需求，而不是像布哈林想象的那样，存在潜在的购买力不足。1925年，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识到未来的增长要求大量的固定投资时，他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迄今为止，工业的复苏建立在恢复对现有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的基础之上，想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必须迅速地提高现有的生产能力。<sup>[84]</sup>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看来，短期内，与商品荒相联系的问题将会加剧，但长期地看，投资不足会使这些问题变得难以解决，并迫使工农联盟破裂。<sup>[85]</sup>

布哈林没有能预见到这一问题，而且他的经济分析就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来说，设计得也不好，因为处理这个问题要求缩减农民需求的增长。<sup>[86]</sup>无论如何，布哈林强调的与此完全相反。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有一个必然的特定的顺序。农业产出的增加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进而推动了轻工业的发展，相应地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布哈林坚持认为，他不仅仅概括了过去的经验联系，而且指出了—个必然的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原则。<sup>[87]</sup>布哈林倾向于将其他任何一种增长方案贬斥为“应用杜冈主义”。<sup>[88]</sup>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把扩大生产能力的投资作为工业复苏的手段的认识，与布哈林的分析完全相反：重工业的扩张必将快于轻工业的扩张。只有到那时，意义重大的长期扩张才能在工业消费品产出方面出现，这种扩张对消除商品荒来说是必要的。然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只是将对不平衡增长的呼吁视为一个技术经济学问题。只有到了20世纪30年代，重工业在苏联经济中获得特权地位才成为一个原则性问题。<sup>[89]</sup>

考虑到这些差别，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强调总计划的迫切必要性了。<sup>[90]</sup>总计划对过渡来说，而不仅仅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使得比例失调引致危机之前，可以被预测并加以纠正。由于布哈林对苏维埃经济问题的真正本质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更倾向于支持市场的自治。这事实上是他反对工业与农业之间不等价交换的经济根源。布哈林好像完全误解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有关限制价值规律的影响是现实需要的理论观点。<sup>[91]</sup>他也不理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增加工业品批发价格，并不意味着新的“剪刀差危机”的开始，在这种危机中贸易条件会不利于农民，减少他们在市场上交易粮食的激励。<sup>[92]</sup>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来说，整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务实的问题。<sup>[93]</sup>保持较低的工业品批发价格（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官方政策），意味着流通中的私人资本以工业和农业为代价积累自身，但是，商品荒却持续存在：受益者是“耐普曼”（中间商），他们从工业中购买到便宜的商品，并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农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最终需要降低所有工业品的价格，以避免来自世界市场的压力，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的。<sup>[94]</sup>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展开的论战，因每个理论家不时地使用情绪化的语言而使矛盾加剧。1924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到了“剥削”农民的需要，在苏维埃经济结构中对农民的“剥削”的地位类似于“殖民地”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的地位。<sup>[95]</sup>另一方面，布哈林谈到工业化会因被号召“使自己发财吧”的“农民的抱怨”，而以“蜗牛般的速度”爬行。<sup>[96]</sup>每个人都抓住其它人用语上的不当，这不只是因为缺少了同志般的友善。布哈林学派、占统治地位的党的派别中的斯大林主义者和左翼反对派，都相信他们抨击的那些表达形式揭示了他们对手的学说中隐藏的内容。这些怀疑有一定的正确之处。斯大林和布哈林有充分的理由主张“非正统”的不断革命论涉及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断革命论与他们对列宁主义的解释存在冲突。他们的反对者，在官方的思想和政策中看到了可能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的经济危机的萌芽，同样是正确的。

## 8. 一国社会主义或不断革命

作为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远比布哈林优秀，并且他也是一个较为专业的思想家，依赖于托洛茨基的思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供了有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整体观点。这是一种合理的劳动分工。如我们在以上第十二章已看到的那样，托洛茨基进行严格的经济分析的能力非常有限。然而，作为一个创新型的

马克思主义者，能与之匹敌的人几乎没有。托洛茨基比包括列宁在内的其他任何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都更有条件对革命后的俄国的情形进行具有思想上的连贯性的解释。不断革命论正确地分析了十月革命的阶级动力学。同时，它最小化了对可能的社会主义收益的预期，这种收益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可能实现的。不断革命论也依赖于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这一更具一般性的概念，后者突出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形势中存在的矛盾（参见以上第十二章）。

然而，托洛茨基的独创性思想，在一个关键之处误入歧途，布哈林和斯大林很快察觉到这一错误（以及其他一些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的想像虚构出来的错误）。最显而易见的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在革命孤立的条件下存活了下来。1924年，斯大林用列宁帝国主义对抗背后不平衡发展的概念解释了这一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分歧，阻碍了它们对苏联进行统一的持续的军事进攻。虽然托洛茨基承认这是事实，但他不承认他的错误源于他自己有关帝国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自相矛盾地）低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参见以上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因此，斯大林声称，托洛茨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持续存在的分歧，可以被俄国的外交和第三国际消除军事威胁加以利用。扩大革命尽管很重要，但不是生存所必需的。<sup>[97]</sup>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托洛茨基低估农民的重要性的指责。经常用荒谬的语言来表述的这种指责，主要建立在布哈林工农联盟的理论基础之上，使用这种理论的术语，布哈林和斯大林指出，即使是在革命仍然保持孤立的情况下，内部的冲突并不必然毁灭革命。革命的国际主义没有被忽视，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很大程度上夸大了它的重要性。<sup>[98]</sup>

布哈林和斯大林也指出列宁的著作中存在类似的主体，他们注意到列宁的俄国革命进程的思想与托洛茨基的不同（参见第十三章）。布哈林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他将1917年革命看成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革命，而不是像托洛茨基一直认为的那样，是两种革命的融合。<sup>[99]</sup>此外，布哈林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和谐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种新的国家形式，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阶级关系，苏维埃社会代表了真正的、新的统一体。<sup>[100]</sup>布哈林甚至承认民粹主义思想在这个时候在一定程度上看来是正确的。<sup>[101]</sup>他的涵义是清晰的：托洛茨基未能详细说明俄国革命的性质，左翼反对派将农民视为恢复资本主义的力量的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同时，这时的布哈林认为，一国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内在于布尔什维克的努力中。

布哈林通过重新评价国际革命的经济含义强化了这种认识，先前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包括托洛茨基，都以一种草率的态度对待国际革命问题。正如在本章第4节提到的，布哈林强调小资产阶级关系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坚持认为不可避免的革命的经济成本，将很大程度上减少任何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继承的物质遗产。联系他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剥夺本质的新观点，布哈林得出结论：国际革命不可能为苏联提供多少经济帮助。<sup>[102]</sup>在所有这些观点中，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修正，尤其是当它和布尔什维克先锋主义结合时，并且其大部分内容也被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接受。<sup>[103]</sup>

布哈林和斯大林都没有忽视，根据国际革命的可能性以及它最可能采取的形式，来重新组织他们的观点。欧洲资本主义仍然是在战后已经“稳定”下来的有组织的实体。<sup>[104]</sup>这一观点意味着西方不存在即将来临的革命，而且对苏联的武装干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不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布哈林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在外围的发展已经停止了；帝国主义剥削现在具有了十足的寄生性。<sup>[105]</sup>这为殖民地地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不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基础。以列宁的著作中关于民族自决权（布哈林在这个观点上与列宁和解了）的观点为基础，布哈林认为，甚至殖民地的资产阶级都可能具备了进步的作用。因此，布哈林得出结论，第三国际不可能切实支持托洛茨基把不断革命论推广到所有落后的资本主义地区的企图（参见以上第十二章）。<sup>[106]</sup>

所有这些被布哈林派所坚持（到1927年时也被斯大林派所坚持）的思想，被托洛茨基认为是脱离了真正的列宁主义（他越来越把它等同于自己的思想）；是革命发生了退化的征兆，是为铺平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热月反动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1926年后，托洛茨基把其反对者的思想的核心，视为是一国社会主义的教条。这有一定的合理性。20世纪20年代中期，布哈林和斯大林低估了苏维埃经济结构中固有的内部矛盾，对其发展前景过分乐观。此外，不应该太在乎斯大林学说的字面含义：他和布哈林都没有精确地定义社会主义，甚至到那时他们也从没有宣称“完全的”社会主义可以单独在俄国实现。<sup>[107]</sup>相反“一国社会主义”学说充当的是击败左翼反对派这一党派的辩论工具，是拒绝托洛茨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提议的象征。

这些提议，必然包含改变战争爆发前的立场，因为事实明显地未能完全证明托洛茨基早期的思想。托洛茨基开始重新评价国际资本主义的状况。尽管国际资本主义比托洛茨基在1917年预计的更富弹性，但它仍处在衰退过程中；问题只是比他原来预想的复杂了一点。“资本主义发展曲线”具有二元结构：既有长期

趋势，又有周期性波动。后者的表现和以前很相像，前者明显地变得平缓或者是开始下降。托洛茨基认为，任何资本主义的稳定都将是非常短暂的。资产阶级社会不再是欧洲的进步力量，可以预计革命的情形会频繁再现。<sup>[108]</sup>只有在外围地区，资本主义明显地处于上升期，美国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sup>[109]</sup>

托洛茨基认为，这为苏联结束政治上的孤立提供了机会，而且这意味着为东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落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无产阶级可以复制俄国工人阶级的成就，因为经济结构有助于已经扩展到俄国之外的不断革命（参见以上第十二章）。只要“十月的教训”体现在第三国际的政策中，只要抛弃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孟什维主义”，成功就是必然的。<sup>[110]</sup>

托洛茨基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处于下降期的思想，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中固有困难的明显的方法。他认为政治上的孤立，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孤立。资本主义对市场的需求，可以被用于把俄国经济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中。这必然通过计划来实现——当然不能放弃对外贸的垄断，这可以提供暂时的和永久的利益。对消费品的进口可以被用来克服“商品荒”，根据比较优势形成的专业化，将极大地提高国有工业的效率。<sup>[111]</sup>

融入世界市场的想法，也构成托洛茨基反对一国社会主义可能性的重要经济思想，因为他正确地理解了这一学说，认为它意味着在苏联自有资源的基础上进行自力更生式的发展。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样，他强调苏联的工业无法在遵循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参与国际竞争，这对于缩小效率上的差距来说是必须的。如果不能做到或不能迅速做到这一点，苏联经济会愈加难以抵御内部和外部资本主义要求在非管制的基础之上开放经济的压力。国有部门将难逃一劫，苏联社会主义也将遭遇同样的命运。更为抽象的是，托洛茨基将“历史的基本规律”描述为“胜利最终属于能为人类社会提供更高的经济水平的经济制度”。<sup>[112]</sup>社会主义革命向其它国家的扩展，将有利于生产力比单纯依赖国内环境时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没有这种革命的扩展，就没有一个国家，更不要说落后的苏联，有望超越国际资本主义取得的经济成就。因此，托洛茨基能够坚持其最初主张中的要点：如果资本主义的稳定被证明是持久的，那么俄国的革命注定要消亡。<sup>[113]</sup>

在托洛茨基看来，解决苏联现实情况中存在的矛盾的关键是政治改革。布尔什维克放弃对权力的垄断是不可能的，甚至将党内的派系合法化（自从1921年“退却”到新经济政策后就被禁止了）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托洛茨基认为，通过承认批评是合法的，并把组织置于普通党员的控制之下，重新恢复党的无产阶级特征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巩固无产阶级力量的关键因素，类似的措施也可以

有效地、普遍地扩大到国家制度中。总之，对托洛茨基来说，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他似乎认为，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他的思想就会明显地获得胜利，因为它们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因而也代表了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结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就将在经济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第三国际的资源就将被正确地动员起来终结政治上的孤立。<sup>[114]</sup>

正如托洛茨基清晰地表明的那样，他的整个立场建立在他将国际资本主义视为正在衰落的体系基础之上。然而，缺乏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失灵确切原因分析这一缺陷，一直存在于托洛茨基革命之后的著作中。他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分析是深入的，但却不够严谨。此外，尽管他相信资本主义无法保持长期的稳定与他的经济融合主义和政治上的不妥协是吻合的。但是，他是以几乎无法相互兼容的不同的方式来表述后两种观点的。在托洛茨基看来，苏联经济必将和平地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中，同时，共产党也将为通过作为革命序幕的罢工展示自己做好准备。<sup>[115]</sup>

1927年底，托洛茨基相信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挽救革命了：“热月式的危险即将来临”。<sup>[116]</sup>这反映出他认为苏联的内部矛盾激化了。确实如此。这时，当斯大林将左翼反对派成员开除出党并将他们在国内流放时，“商品荒”以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的形式显露出来。1928年期间，这打破了布哈林派和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联盟，使得斯大林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被其击败了的对手的语言。<sup>[117]</sup>

## 9. 斯大林主义的解决方法

“斯大林个人的不幸……在于（他的）理论才能和集中在他手中的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sup>[118]</sup>这是托洛茨基在1927年9月写下的内容，这恰当地描绘了斯大林的情况。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展作出的贡献的确非常少。然而到1928年时，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派对党进行了有效的控制，而且党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国家。此外，构成斯大林追随者的核心的官员们，越来越处于其个人统治之下。正是这种权力，而不是斯大林的理论深度，为他提供了在这个十年结束时突破困境的能力。

自1928年初开始，让人联想起战时共产主义的粮食征用被用以克服农民粮食销售的不足；1929年至1933年之间，这些措施被扩大为实行强制的集体化。这通过毁灭一切农民独立性的残余，缓解了快速工业化中来自农村的制约；早已存在的来自苏联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水平在1929年后大幅下降）的抵制变得不再

可能。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党的专政就变成了个人极权主义。整个社会被迫成为“生产前线”，生铁的产出被官方视为是向社会主义前进正确无误的象征。

左翼反对派和布哈林派都将斯大林的解决方法，看作是证明了他们对对方的批判。在布哈林看来，粮食危机的爆发是因为左翼反对派的“超工业化”政策造成的，这种政策在1926年后，对斯大林派和计划部门的经济学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布哈林长期以来坚持认为，左翼纲领将导致“二次革命”和完全官僚化的警察国家。<sup>[119]</sup>另一方面，很多反对派，包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斯大林“向左转”后与他达成了心神不安的和解。对他们而言，他们对建立在布哈林理论观点基础之上的过去的政策的后果的预言被证实了。<sup>[120]</sup>斯大林主义的令人畏惧的工业化的含义，将在本书第二卷中加以讨论。

#### J.V.斯大林小传

J.V.斯大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的笔名）1879年生于格鲁吉亚哥里城。他父亲曾经是农奴，后来成了村子里的鞋匠。斯大林受到的大部分正规教育是在神学院接受牧师培训期间获得的。1901年加入格鲁吉亚的社会民主党，1904年党分裂后他站在列宁一边，1917年前作为党的积极分子主要从事地下工作。他多次被捕并在国内流放。由于其组织能力，列宁在1912年推荐他进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十月革命后他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22年，他成为党的总书记，负责所有的人事任命，并以此职位为基础踏上权力崛起之路。在他的领导下，1929年后实施了农业集体化和迅速工业化。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大清洗”运动有效地消灭了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建立了极权统治。二战期间，他任军事总指挥，战争胜利后，用红军把东欧变成苏联的翻版。他死于1953年3月。

### 第十五章注释：

Stalin's Works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3-55) 中的引文用 Works 表示，卷数放在其后。由 R.B. Day 编辑的 'N.I. Bukhari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Stat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Nottingham: Spokesman, 1982) 中的引文用 SW 表示（这部著作包括布哈林在1915至1929年间完成的论文）。

[1] A.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olitical Writings, 1910-20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7) pp.34-7.

[2] L. Trotsky,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6-27)*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80) p. 375; L. Trotsky, *Europe and America* (Colombo: Lanka Samasamaja, 1951) p. 66.也可参见 L. Trotsky,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Monad Press, 1972) vol.2, pp.4, 254.

[3] A. Maddison, *Economic Growth in Japan and the USSR* (London: Allen & Unwin, 1969), pp. 92, 95-6.A.

[4] M. H. Dobb, *Soviet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1917*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66) chs. 4-9; A.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chs. 3-6; M. Lewin, *Political LInderrurre*, in *Soviet Economic Debates* (London: Pluto Press, 1975) ch. 4; P. R. Gregory and R. C. Stuart, *Soviet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pp.51-96.

[5] E.J. Hobsbawm, 'The Fortunes of Marx's and Engels's Writings' in E. J. Hobsbawm (e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Hassocks: Harvester Press, 1982), vol. 1. pp. 332-7.

[6] N. Spulber (ed.) *Foundations of Soviet Strategies or Economic Growth: Selected Soviet Essays. 1924-1930*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N. Jasny, *Soviet Economists of the 192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7] B. Warren, *Imperialism Pioneer of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0) pp. 84-109.

[8] M. Sawer, *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7).

[9] E. Mandel, *Long Wav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E. Mandel, *Late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G. Garvey, 'Kondratieff's Theory of Long Cycles',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XXV, 1943, pp. 203-20.

[10] A. V. Chayanov, *The Theory of the Peasant Econom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first published in 1924-5); T.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11] 比如参见 K. Marx, *Selected Writings in Sociology and Social philosophy*, T. B. Bottomore and M. Rubel (ed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3) pp. 249-63; K. Marx in R. Freedman (ed.) *Marx on Economics* (Harm & Penguin, 1962) pp. 229-41.



[12] L. Trotsky, *Our Political Tasks*(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s. n.d.) pp. 72-9.

[13] L. Trotsky, *The Challenge of the Left Opposition (1923-25)*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5) p.390; see also SW, pp. 120-1.

[14] Trotsky, *Challenge (1926-27)* p. 259.

[15] R. V. 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9)

[16] T. Cliff, *Lenin* (London: Pluto Press, 1978) vol.3. pp.179-94.

[17] 《经济破坏和无产阶级同它的斗争》，《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225页；《实施社会主义，还是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第286-288页；《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225页；《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国家与革命》，第1-116页；《论修改党纲》，《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372页；《布尔什维克能保住国家政权吗？》，第282-331页。《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工人部的会议上关于彼得格勒工人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任务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145页；《〈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383页；《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第192-233页。《新的时代和新形势的旧错误》，《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16页；《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第180-201页；《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第216-239页；《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288页；《论合作社》，第361-368页。Nove, *Economic History*, pp. 52-4; Lewin,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pp. 74-7; G. Garvey, *Origins of Lenin's Views on the Role of Banks in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 1972, pp. 252-64.

[18] N.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81) vol. 2, pp. 168-231; M. Brinton, *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 1917-21* (London: Solidarity, 1970).

[19] L.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2, pp. 188-9, 226-9, 265-6, 269.

[20] Nove, *Economic History*. pp. 54-6.

[21] N. I. Bukharin, *Economics of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New York: Bergman, 1971; first published in 1920);《俄共(布)纲领草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114页。《致国防委员会各委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114页；《在第七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第98-118页。《给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和南方面军司令部的电报》，《列宁全集》第

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页。《党内危机》,《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243页。《同日本记者、《大阪朝日新闻》代表中平良的谈话》,《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123页。L. Trotsky. The Defence of Terrorism (London: Allen & Unwin, 1935) pp. 94-5; L.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pp. 23-7, 109, 120-1; Nove, Economic History, pp.46-82; R. B. Day, Lenon Trotsk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Isol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ch. 2.

[22] Bukharin, Economics, pp. 118, 127ff, 151ff, 159-60.

[23] E. H. Carr,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6) vol. 1, pp. 160-237; vol.2, pp. 151-268; P. Avrich, The Russian Anarchis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24] Bukharin, Economics, p. 9; N. I. Bukharin and E. Preobrazhensky, The ABC of Communi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9; first published in 1919) pp. 61, 66, 83, 85, 95-6, 193, 208ff.

[25] Bukharin, Economics, pp. 71ff, 79, 90ff, 117ff.

[26] Ibid, pp. 78, 118, 124ff;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ABC, pp.41- 3, 61-2, 129, 136, 218-19.

[27] Bukharin, Economics. pp. 12ff, 23ff. 33ff, 42ff, 72;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48C, pp. 138-84, 393.

[28] Bukharin, Economics, pp. 11, 132ff, 172-3;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ABC, pp. 332, 339.

[29] Bukharin. Economics, pp. 92-3, 96. 论述列宁与此类观点,参见A. Nove. 'Lenin an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B. W. Eissenstat (ed.) Lenin and Leninism (Lexington: Heath, 1971) pp. 155-71.

[30] Ibid, pp.83-4, 88ff;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ABC, pp.311, 315, 348-76

[31] Bukharin. Economics, pp.20, 33, 54, 58, 65, 69ff, 79, 88ff, 111-12, 119, 131;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ABC, pp. 45-6, 332.

[32] Bukharin, Economics, pp. 105-13, 148ff, 159-60, 164ff, 172-3.

[33]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0月9日)》,《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111页;《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第229-327页。Trotsky, Terrorism.

[34]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2, pp. 188-90, 193, 224, 228, 266-7, 273-4; L. Trotsky,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ondon: Pluto, 1977) p. 1242.

[35] E. A. Preobrazhensky, *The Crisis of Soviet industrialis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80, 由首次出版于1920年代的文章构成) 编辑 D. A. Filtzer, pp. 168ff, 175.

[36] 《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233页。 SW, pp. 99ff, 186ff; 259;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pp. 283-4; vol.2, p. 228ff; *Challenge* (1923-5), pp.63,82, 104-5, 108-9, 329; Preobrazhensky, *Crisis*, p. 168ff; E. Preobrazhensky, *The New Econom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first published in 1926) pp. 193ff, 215.

[37] *Nove. Economic History*, pp. 67-8; Cliff, *Lenin*, pp. 161-94; Carr, *Bolshevik Revolution*.

[38] 《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233页。

[39]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的提纲》，《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262页。《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4页；《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支部书记及支部负责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第238-152页；《〈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第374-383页；《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第192-233页。《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4页；《新的时代和新形势的旧错误》，《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116页；《十月革命四周年》，第169-177页；《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第180-201页；《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第216-239页；《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第244-252页；《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第320-362页；《关于公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第365-376页；《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第379-380页；《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在全俄五金工人代表大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第67-133页；《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第272-288页；《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第294-302页；《论合作社》，第361-368页。 SW, pp. 190-4; *Nove, Economic History*, p. 89.

[40]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3-377页；《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第378-392页。 M.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London: Pluto, 1975).

[41] 《论合作社》，《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1-368页。这时候，列宁再次表示出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作的兴趣，该著作把合作社看作是在农民中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因素；参见Nove, 'Lenin and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p.166.

[42] SW, pp.99-294.

[43] SW, pp. 103-4.

[44] N. I.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 System of Sociology*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5; written in 1920); S. Cohen, 'Marxist Theory and Bolshevik Policy: The Case of Bukharin'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5, 1970, pp. 40-60; N. Kozlov, 'N. I. Bukharin: Reconsideration of a 《Neo-Narodnik litterateur》',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17, 1985, pp.28-50. Also see R. B. Day, 'Dialectical Method i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Lenin and Bukhari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IX, 1976, pp. 244-60.

[45] SW, pp. 189ff. 260-1.也可参见 SW, pp. 331-51.

[46] SW, p. 151.

[47] SW, pp. 102, 115, 121, 142, 147, 184.

[48] Preobrazhensky, *New Economic*, p. 237;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2, p. 271; *Challenge* (1926-7) pp. 328-30

[49] SW. pp. 116-21.

[50] N. I.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first published in 1924) pp. 206-37.

[51] SW, pp.110ff, 117-19, 161, 194, 200ff, 234ff, 265; Bukharin, *Economics*, pp. 81ff, 90-6; Bukharin and Preobrahensky, *ABC*, pp. 122-3, 330, 359ff, 383; also see Chapter 13 above.

[52] SW, pp. 280ff, 294.

[53] SW, pp. 292ff.

[54] SW. pp. 267ff; S. 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41-2, 也可参见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 2, pp. 222ff, 253ff, 275ff.

[55] SW. p. 144; Bukharin, *Economic*, p. 202; Cohen, Bukharin. pp. 167-73, 252-8; S. Heitman, 'Between Lenin and Stalin: Nikolai Bukharin' in L. Labedz, (ed.) *Revision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62), pp. 77-90.

[56] Jasny, *Soviet Economists*.

[57] R B. Day, *The 'Crisis and the 'Crash': Soviet Studies of the West (1917-1939)*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p. 87-94; Jasny, *Soviet Economists*, pp.158-63.

[58] M. H. Dobb,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29); R. Palme Dutt, *Socialism and the living Wage*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

[59] Day, *The 'Crisis'*, chs. 2-5.

[60] E. Varga, *The Decline of capitalism: the Economics of the Decline of Capitalism After Stabilisation* (London: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8); 是否如Day在《危机》中提出的那样瓦尔加是一个“新卢森堡主义者”，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瓦尔加那里非资本主义领域只发挥了次要的作用。

[61] I. Lapidus and K. Ostrovityanov, *An Outlin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Martin Lawrence, 1929) pp. 371-9; Dull, *Socialism*, pp. 139-54, 171-87.

[62] Cohen, Bukharin. pp. 254-7; Day, Leon Trotsky, pp. 94-7, 103-4, 118-19, 158.

[63] N. Bukharin, 'Die Widersprüch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Die Internationale*, 7, 1924, pp. 560-3.

[64] I. Deutscher, *Stali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6) pp. 296-342; E. H. Carr and R. W. Davies, *Foundations of a Planned Econom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and 1976); Day, *Crisis*; Cohen, Bukharin, pp. 233-4, 262-9, 275, 284, 291ff, 304, 318-19; Day, Leon Trotsky, pp. 108-11, 124, 133, 166-7, 178; A. Erlich, *The Soviet Industrialisation Debate, 1924-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167-9

[65] 托洛茨基接受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过渡理论，虽然1925年以后托洛茨基也强调与世界市场融合的重要性；参见下文第 VIII 部分。不清楚的是托洛茨基对这一点的强调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自己的想法。R. B. Day, 'Trotsky and Preobrazhensky: The Troubled Unity of the Left Opposition'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X, 1977, pp. 69-86, argues that it represented a real divide. Also see Day, Leon Trotsky, pp. 144-8, 181; Erlich,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pp. 45-52, 141-5; Trotsky, *Challenge* (1926-27), pp. 56-60; I. Deutscher, *The Prophet Unarm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13-14, 234-9, 415-17, 421-4, and R. B. Day, 'Leon Trotsky on the Problems of the Smychka and Forced Collectivization', *Critique*, 13, 1981, pp. 55-68.

[66] E. A. Preobrazhensky, *From NEP to Socialism* (London: New Park Publications, 1973, first published in 1922); *Crisis*. pp. 3ff. 129n.

[67] Preobrazhensky. *Crisis*, p.27; *New Economics*, pp. 102, 162; 3. R. Millar, 'A Note o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Marx and Preobrazhensky', *Soviet Studies*, XXX, 1978, pp. 384-93.

- [68] Trotsky, *History*, p. 72.
- [69]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62ff; *New Economics*, pp. 78, 103ff, 127, 232, 238, 289; Day, Leon Trotsky, pp. 93-6; Erlich,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pp. 13-14, 51.
- [70] Preobrazhensky, *New Economics*, pp. 17, 132, 218-23, 238ff.
- [71] *Ibid*, pp. 84ff.
- [72] *Ibid*, pp. 88-91; Millar, 'Note on Primitive Accumulation'.
- [73] *Ibid*, p. 271.
- [74] *Ibid*, pp. 3-4, 24, 54, 57ff, 64, 70, 77ff, 110, 139, 142-7, 195, 208, 262;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5, 62ff, 196.
- [75] Preobrazhensky, *New Economics*, p. 73.
- [76] *Ibid*, pp. 35-7, 267, 295.
- [77]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77ff.
- [78] Preobrazhensky, *New Economics*, p. 92ff.
- [79]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210-12, 229-30.
- [80] Bukharin, *Imperialism*.
- [81] Preobrazhensky, *New Economics*, pp. 255-7; *Crisis*, pp. 67-73, 222-4.
- [82] 1094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137, 162-3, 192, 195-7.
- [83] *Ibid*, p. 33ff.
- [84] *Ibid*, pp. 67, 137, 162-3.
- [85] *Ibid*, pp. 69, 192, 194; *New Economics*, pp. 176ff, 281.
- [86] SW, pp. 243-5, 292. 1926年后布哈林的确修改了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主张, 但并没有修改他自己的经济理论; 参见 Erlich,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pp. 78-89, 102-4; Cohen, Bukharin, pp. 242-52, 290; Lewin,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pp. 19, 35, 49-51; M. Haynes, *Bukhari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85), pp. 111-12.
- [87] SW, p. 160
- [88] SW, pp. 125, 141, 160ff; Cohen, Bukharin, pp. 160-212.
- [89]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48, 50, 109.
- [90] *Ibid*, pp. 72ff.
- [91] *Ibid*, pp. 77ff.
- [92] SW, pp. 129ff.
- [93]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43, 46, 66; *New Economics*, p. 117.

- [94]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224-7; New Economics, pp. 250ff.
- [95] 9SW. pp. 154ff.
- [96] SW, pp. 196ff.
- [97] Works, VI, pp. 374-420; Trotsky, Challenge (1923-25), p. 192; (1926-27) pp. 152ff, 179ff; Cohen, Bukharin, pp. 147-9.
- [98] Works, VI. pp. 374-420.
- [99] SW, pp. 212-17; Trotsky. History, pp.72, 419
- [100] SW, pp. 110-13, 162; Bukhar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nomics, pp. 50, 56; Trotsky, Challenge (1923-25), p. 42; Haynes, Bukharin, pp. 85-7. 101. 102.
- [101] SW, pp. 162, 200-8, 283; Cohen, Bukharin, pp. 143-74, 192-201; Lewin,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pp. 44-6.
- [102] SW, p. 144.
- [103]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pp. 57, 72-3. 272; vol. 2. pp. 246-50, 165ff; Preobrazhensky, New Economics, pp. 20-1, 25, 79, 128, 133.
- [104] SW, pp. 183-4, 297, 333ff.
- [105] SW, pp. 157, 171.
- [106] Bukharin, Imperialism, pp. 269-70; Trotsky, Challenge (1923-25) p.43; (1925-27) pp. 225ff, 368; History, pp. 908ff; Cohen, Bukharin, pp. 257-69.
- [107] Works, VI, pp. 374-420.
- [108] L. Trotsky, Problems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Monad Press. 1973: 写于1920年代早期的一系列论文) pp. 273-180;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1, pp.6, 21-3, 48, 108, 120, 176-81, 192ff, 206, 212, 229, 241ff, 255, 260,298; vol.2, pp.4, 61-3, 70, 77ff, 199-201, 306-7; challenge (1923-5) pp.345, 348; (1926-27) pp. 131, 134, 161, 193, 218, 404; History, pp. 1025, 1219. 也可参见Preobrazhensky Crisis, pp 134-59, 2 17-18; New Economics, p.
- [109]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p. 196; vol.2, pp. 317, 341, Europe and America, pp. 33, 67-8, 70-1; challenge (1923-25) p. 332; (1926- 27) p. 256.
- [110] Ibid, pp.20-2; Trotsky, History, pp. 1194, 1219ff.
- [111]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pp. 284-9, 305-6; vol. 2. pp. 269-70, 330; Challenge (1923-25) pp. 61, 119, 159, 342, 347ff, 353, 358ff, 366, 388;

(1926-27) pp. 53, 156, 182ff, 334ff. 365.也可参见 Preobrazhensky, *Economics*, pp.41, 120-4, 134-6, 139ff, 158-60, 163. 165-6, 254n, 276, 289; *Crisis*, 20,41,43,48, 59, 61ff, 71, 176, 195, 200-1, 203, 207; Day, Leon Trotsky chs6 and 7.

[112] *Challenge* (1923-25) p. 334.

[113]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1, p. 199; vol.2, p. 186; *Challenge* (1926-27) pp. 57ff, 145ff, 152ff, 179ff. 198, 261,270ff, 277ff, 374. 434,495;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After Leni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0; 写于1928年): *Historical*, pp. 1219-66; Day, Leon Trotsky, chs 6, 7, and 8.

[114] 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2. p. 331; *Challenge* (1923-25) pp. 15, 17, 28-9, 31-2, 55, 60, 64, 70, 78, 84, 93, 157, 161, 168ff, 200ff; (1925-27) pp. 31-2, 59, 62ff, 74ff, 83ff, 93, 102, 127, 232, 340-1, 349ff, 401,411,441, 452.

[115] 有关这个问题参见Trotsk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vol. I, pp.225, 247, 254,284-7, 305-6; vol.2, pp. 17, 71-2; *Challenge* (1923-25), p. 344; (1926-27) p.385; Harding, *Lenin's Political Thought*, vol.2, pp. 251-2; Bukharin and Preobrazhensky, *ABC*, pp. 49-50, 180ff.

[116] Trotsky, *Challenge* (1926-27) p. 464.

[117] 《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29-330页；《论粮食收购和农业发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10页；《收购运动的初步总结和今后党的任务》，第11-18页；《联共(布)中央全会(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至十二日)》，第123-170页；《关于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的总结(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三日在联共(布)列宁格勒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第171-188页；《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第212-249页；《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一九二九年一月底和二月初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节录(简要记录)》》，第274-279页。A. Erlich, 'Stalin's View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 J. Simmons (e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ussian and Soviet Thought*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1955) pp.81-99;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pp. 172-5; Cohen, Bukharin, pp. 270-336; Deutscher, *Stalin*,401ff.

[118] Trotsky, *Challenge* (1926-27) pp. 410, 413-14, 494,499.

[119] SW, pp. 127, 135, 164, 175,199, 301-51; Cohen, Bukharin, pp.142-4.

[120] Preobrazhensky, *Crisis*, pp.14f; *New Economics*, p.67; Erlich, *Soviet Industrialisation*, p.170.



## 第十六章 亨利克·格罗斯曼和资本主义的崩溃

### 1.引言

在以上第十四章，我们看到，重新恢复活力而且明显处于稳定状态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给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分析带来了影响。一些正统的社会民主党人，比如考茨基和希法亭，披上了早期修正主义者的外衣，认为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已不大可能。一些新卢森堡主义者（最著名的是弗里茨·斯滕伯格）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坚持认为，由实现问题产生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则不合时宜地坚持，必然发生的规模更大的帝国主义战争迫在眉睫（参见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一个共同的线索把这些迥然不同的思想流派统一在了一起，那就是他们几乎完全忽视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特别是其中加以阐述的利润率下降趋势。从这一点看，现代马克思主义危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几乎被完全忽视了。<sup>[1]</sup>本章将关注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的——对《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分析作出发展，并把它应用于危机理论——第一次认真尝试。尽管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这种分析造成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却是极其深远的。

1929年，在华尔街大崩盘发生前夕，一本622页的著作出版了，它是由一位迄今为止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经济史学家和统计学家的波兰学者亨利克·格罗斯曼撰写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和崩溃（包括危机理论）》中，格罗斯曼提出了一种崩溃理论，他自称这是第一个和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分析精神实质相一致的崩溃理论。在格罗斯曼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取决于生产方式辩证转变的理论。格罗斯曼认为，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有其无法超越的，绝对的经济限度”。对于格罗斯曼来说，任何能够称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必须说明这些限度的本质。不要期望新古典理论能做哪怕是一丁点这样的事情，新古典经济学把自己限制在只关注个人动机而忽略了造成过度储蓄的客观条件的陈词滥调中。但是，马克思自己也未能对资本主义崩溃趋势作出清晰的说明，格罗斯曼认为，后来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著述家都明确地否定了这种趋势的存在。只有罗莎·卢森堡可以免于遭到这种批评，然而她的理论却是错误的。<sup>[2]</sup>

格罗斯曼对自己的分析方法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声称这种方法是马克思

本人的。经济崩溃的趋势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本质，而不是从商品流通和交换的外在表现来推断。因此，他的著作致力于表明：

概括经验上可观察的世界经济的趋势，这些趋势被视为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在各种各样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中被阐明的：垄断组织、资本输出、瓜分原材料生产区的斗争，等等），是如何成为次要的表面现象的，这些现象是由作为资本主义基本根源的资本积累的本质引起的。<sup>[3]</sup>

#### 亨利克·格罗斯曼小传

格罗斯曼1881年出生在克拉科夫，是加里西亚一个犹太矿主的儿子。先后在克拉科和维也纳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出版了论述奥地利经济史的著作。1918年成为波兰公民，并在华沙为中央统计办公室和自由波兰大学工作。格罗斯曼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使得他在1925年移居法兰克福后，加入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虽然他是波兰共产党的一员，但格罗斯曼从没有加入德国党，因为他认为该组织不仅无能而且过于官僚化。希特勒掌权后，他被迫流亡，1937年和研究所一起迁到纽约之前，先后流亡巴黎（1933—1935）和伦敦（1935—1937）。由于格罗斯曼支持苏联并强调以忽视政治和文化问题为代价的狭义的经济学，导致他和研究领导成员的关系日渐疏远。1949年，他返回欧洲，任莱比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1950年在那里逝世。

这使得对诸如价格波动等经济危机的症状和存在于生产过程本身的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区分成为可能。基于方法论的理由，格罗斯曼假设所有市场都保持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价格（假定等于劳动价值）和货币价值不变。他有意回避了对这种背景下的信贷和竞争的考察。经济危机必须由“资本的内在本质”来解释。<sup>[4]</sup>

这本著作以一个冗长的文献综述作为开篇，它占据了整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六节。在第二章的其余部分，格罗斯曼提出了他自己的经济崩溃理论，这种理论建立在对利润率下降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之上，并被用于建立一个周期性危机的模型。第三章评价了起“反作用的趋势”，首先是在假定的封闭经济中讨论这些趋势，然后在世界市场中讨论。后者构成了格罗斯曼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在结论一章中，格罗斯曼阐明了他的分析对阶级斗争和革命性变革的前景具有的意义。

## 2. 格罗斯曼的崩溃和危机模型

奥托·鲍威尔1913年出版的著作的第六章，在对卢森堡《资本积累论》进行的评论中，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4年期资本积累的数字例子，格罗斯曼通过对这部分内容的回顾，把鲍威尔的模型扩展到36年，并且证明这一积累过程无法无限期的持续下去。最终资本主义体系将不能生产足够的剩余价值，以满足（1）模型所要求的积累率，和（2）资本家的消费。当后者下降到零时，崩溃就发生了；在这一点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格罗斯曼的模型可以用表16.1加以概括。<sup>[5]</sup>和鲍威尔一样，假定不变资本以每年10%的比率增长，可变资本以每年5%的比率增长。剥削率始终保持在100%，这样，每一年的剩余价值等于使用的可变资本。格罗斯曼假设劳动力价值为单位变量，从而每单位可变资本代表一名工人。假设劳动力以每年5%的比率增长，必须积累足够的剩余价值作为追加的不变资本（ $a_c$ ），以保证其10%的年增长率，必须留出足够的剩余价值作为追加的可变资本（ $a_v$ ），以保证其5%的年增长率。资本家的消费是一个剩余量：一旦保证了积累，他们可以消费掉剩下的一切。正如鲍威尔已经发现的那样，均衡增长要求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持续地上升，用于消费的比例稳定地下降。到第35年时，消费量几乎接近于0，如果此时生产继续到下一年，消费量就有可能降为负值。实际上，格罗斯曼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并且“这一体系必然崩溃……[因为]资本家们遇到了麻烦，并且担心继续运转的生产体系产生的成果会全部落入工人阶级手中。”所以即使“忍饥挨饿”，资本家阶级也不愿再继续进行积累。<sup>[6]</sup>

根据格罗斯曼的理论，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第35年结束时的情形，经济崩溃的涵义就变得非常清晰了。假定追加的不变资本是对剩余价值的第一项扣除，在第36年， $c=5616200$ （与前一年相比增加了10%）。由于资本家的消费事实上不可能为负，所以设它为0。所有在第35年生产的余下的剩余价值( $525319-510563=14756$ )被用作追加的可变资本的积累，使其从525319升到540075；与上一年相比，增长了2.81%。由于劳动力增长了5%，达到551584，现在就有11509个失业的工人。不变资本的剩余也出现了。第36年要求的（虽然格罗斯曼没有明确地加以说明，但是根据技术条件可以推断）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是：

$$(5616200) \div (551584) = 10.187^{[7]}$$

但是只有540075单位的可变资本可供使用。给定10.18的资本有机构成，能够被使用的不变资本为：

$$(540075) \times (10.18) = 5499015$$

这产生了117185单位的过剩生产能力。这种情况正好符合《资本论》第三卷中以“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为标题的那一节中说明的情况。这也意味着，在利润率尽管在下降、但仍然等于8.7%时，产生了“资本的过度积累”<sup>[8]</sup>

表16.1 格罗斯曼的积累模型

年份	不变资本 (a)	可变资本 (v)	资本家的消费 (k)	增加的不变资本 (Ac)	增加的可变资本 (Av)	总价值	消费的剩余价值的比例 (%)	积累的剩余价值的比例 (%)	利润率 [(k+Ac+Av)/(c+v)]%
1	200000+	100000+	75000+	20000+	5000	=400000	75	25	33.3
2	220000+	105000+	77750+	22000+	5250	=430000	74.05	25.95	32.6
3	242000+	110250+	80539+	24200+	5511	=462500	73.04	26.96	31.2
4	266000+	115762+	83374+	26600+	5788	=497524	72.02	27.98	30.3
5	292600+	121550+	86213+	29260+	6077	=535700	70.93	29.07	29.3
6	321860+	127627+	89060+	32186+	6381	=577114	69.7	30.3	28.4
7	354046+	134008+	91904+	35404+	6700	=612062	68.58	31.42	27.4
8	389450+	140708+	94728+	36945+	7035	=670866	67.32	32.68	26.4
9	428395+	147743+	97517+	42839+	7387	=723881	66	34	25.6
10	471234+	155130+	100251+	47123+	7756	=781494	64.63	35.37	24.7
11	518357+	162886+	102907+	51835+	8144	=844129	63.1	36.9	23.9
15	758925+	197988+	112197+	75892+	9899	=1154901	56.67	44.33	20.6
19	1111139+	240654+	117509+	111113+	12032	=1572447	49.66	50.34	17.8
20	1222252+	265325+	117612+	122225+	12634	=1727634	46.63	53.37	17.1
21	1344477+	265325+	117612+	134447+	13266	=1875127	44.33	55.67	16.4
25	1968446+	322503+	109534+	196844+	16125	=2613452	33.96	66.04	14
27	2381819+	355559+	99601+	238181+	17777	=3092937	25.2	74.9	12.9
30	3170200+	411602+	73882+	317200+	20580	=3993404	17.97	82.03	11.5
31	3487220+	432182+	61851+	378722+	21609	=4351584	14.31	85.69	11
33	4219536+	476480+	30703+	421953+	23824	=5172496	4.2	95.8	10.1
34	4641489+	500304+	11141+	464148+	25015	=5642097	0.45	99.55	9.7
35	5105637+	525319+	0+	510563+	14756	=6150275	0	104.61	9.3
36	可用: 5616200	劳动力 551584			需求: 26265 短缺: 11509				
	使用: 5616200+	使用: 54075+	0+	540075+	0+	=6696350	0	109.35	8.7
	过剩: 117185	失业: 11509		需求: 561620 短缺: 21545	需求: 27003 短缺: 27003				
				总短缺: 48548					

当然，这个数字例子只是说明性的。在一般意义上，哪一年发生崩溃，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变和可变资本的增长率，以及剥削率的大小。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最初的有机构成是8而不是2，积累早在第5年就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如果不变资本的增长率是20%而不是假定的10%，崩溃将发生在第8年。一个大于100%的剥削率将把崩溃发生的时间推迟到35年之后。可变资本增长率的下降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这取决于它们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如果由于实际工资的下降，可变资本的增长不那么迅速，资本积累就会从中受益。然而，如果可变资本增长的减速是因更低的人口增长率引起的，崩溃就会提前来临（这些结论的代数形式在本章附录中进行讨论）。格罗斯曼指出，资本家会通过削减工资或资本输出对过度积累做出反应。如果这两种增加剩余价值的方法都不足以避免崩溃的威胁，资本家就会降低积累率；他们会早至第21年时就这样做，因为在这一年他们的消费开始绝对地下降。随后，在任何情况下，独立于技术进步的劳动替代效应的失业都会随之发生。<sup>[9]</sup>

格罗斯曼预计，资本主义体系不会一次性彻底地崩溃，而是会发生一系列一次比一次更为严重的危机。只有当起反作用的趋势（以下将要讨论）不再起作用时，“最终的危机”才会爆发。<sup>[10]</sup>危机起到一种“修复过程”的作用，恢复了继续积累的前提条件。<sup>[11]</sup>商业循环的周期性，无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还未能加以解释，它只能“以一种纯粹演绎的方式……并作为已经形成的再生产机制中基本要素的必然结果”加以解释。从而，它取决于有机构成、剥削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增长率的大小。<sup>[12]</sup>

格罗斯曼没有明确地说明怎样从他的数字例子中推出周期性波动。然而，他的确从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危机模型，这种视角包含放松积累率和劳动力增长率保持平衡这一最初的条件。现在，假定资本家每年增加5%而不是10%的不变资本，同时，相应地减少对可变资本的积累，他们剩余的储蓄被留下来为未来的积累提供资金。这将对劳动力和货币市场产生影响。失业将会因积累率的下降而上升。这将迫使实际工资下降并提高剥削率，从而导致积累率的重新上升。此外，由于资本家把他们过剩储蓄作为“借贷资本”借出，贷款的利率就会下降，这再一次成为积累的促进因素。与此同时，利润率继续下降。伴随着资本积累率的升高，资本家的净金融资产的价值会下降。当它降至零的时候，就会发生过度积累的危机。整体的效应是提高了周期的幅度，结果产出和失业的波动越来越猛烈。<sup>[13]</sup>

表16.2和16.3概括了这个过程。在这里，资本有机构成的初始值为8。表16.2

忽略了工资和利率变化对积累率的影响,表16.3考察了这个问题。<sup>[14]</sup>在表16.2中,不变资本以每年5%的稳定比率增加,由第一年的200 000上升到第二年的210 000;可变资本增加的更为缓慢,从25000上升到25056。这保证了有机构成处于如果不变资本每年增加10%,可变资本每年增加5%时能够达到的水平:

$$(220000) \div (26250) = (210000) \div (25056) = 8.3$$

表16.2格罗斯曼的危机模型(简单的)

年份	不变资本(c)	可变资本(v)	剩余价值(s)	资本家的消费(k)	增加的不变资本(ac)	增加的可变资本(av)	潜在的借贷资本(L)	失业*
1 1	200000	25000	25000	2500	10000	+56	12444	0
2 2	210000	25056	25056	2505	10500	+57	11994	1194
3 3	220000	25113	25113	2511	11025	+61	11516	2449
4 4	231000	25174	25174	2517	11576	+72	11009	3766
5 5	243101	25246	25246	2524	12515	+57	10510	5141
6 6	255256	25303	25303	2530	12762	-461	10011	6603
7 7	260018	24842	24842	2484	13201	+38	9211	7974
8 8	281219	24880	24880	2488	14060	-154	8386	9576

\*任一年的失业的增加都等于上一年的v的5%减去上一年的av。

表16.3格罗斯曼的危机模型(复杂的)

年份	不变资本(c)	可变资本(v)	剩余价值(s)	资本家的消费(k)	增加的不便资本(ac)	增加的可变资本(av)	借贷资本(L)	资本家积累的财富*	失业
1 1	200000	25000	25000	2500	10000	56	+12444	+12444	0
2 2	210000	25056	25056	2505	14700	535	+ 7316	+19760	1194
3 3	224700	25591	25591	2559	20223	1056	+ 1753	+21513	1971
4 4	244923	26647	26647	2664	26941	1565	-4523	+16990	2193
5 5	271864	28812	28812	2881	35320	2238	-12167	+ 4823	2175
6 6	307184	30451	30450	3045	44077	2477	-19249	-14426	1456
7 7	(253361)	(32927)	(32927)	0					74

\*通过加总(正的或负的)当年和以前年份储蓄的借贷资本量计算。

随后几年的数据以此类推: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意味着负的可变资本的积累。假定资本家每年消费他们剩余价值的十分之一。由于剥削率稳定在100%,第一年生产的剩余价值为25000,其中2500被消费了,10056被用于积累。剩下12444单位的剩余价值被留作潜在的借贷资本(此时它们还没有被借出)。从表16.2可以看到资本家每年可以留出的新的借贷资本量稳步下降。(尽管如此,到第8年结束时,资本家已经拥有了高达85 081的资金储备)。由于劳动力继续以每年5%的比率增长,而可变资本的积累(从而就业增加)变得相当缓慢,失业持续地增加。

第一年的时候为0，第二年就达到了1194，因为在增加的1250名工人中只有56个找到了工作。（回想格罗斯曼设定劳动力的价值为单位价值，因此每单位可变资本代表每年只有一名工人就业）。到第8年结束时，24880名工人有工作，9576名工人失业了，此时的失业率为：

$$(9576) \div (9576 + 24\ 880) = 27.8\%。^{[15]}$$

如果资本家的确借出了他们的过剩储蓄，利率将下降；并且，随着失业的上升，真实工资将下降。两个因素都将鼓励进行更快的积累。表16.3说明了它们对模型的影响，如果第一年不变资本以5%的比率积累，那么在接下来的四年中将分别为6%、8%、9%和9.5%。可变资本积累的决定，正如表16.2中表明的那样，由保证有机构成处于假定不变资本始终以10%，可变资本始终以5%的速度增长时的有机构成水平的需要决定。失业水平的计算同以前一样。该体系将在第6年结束之前耗尽其剩余价值。在第4年要求收回贷款的资本家，最终将成为净债务人；积累停止；经济则进入严重的萧条期。这可以被解释为暂时的崩溃<sup>[16]</sup>，或新的高涨的前奏（然而，格罗斯曼并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导致积累重新恢复）。

格罗斯曼在结束他对危机理论的讨论时，重新回到了他在开始时讨论的方法论主题。格罗斯曼的周期模型源于生产过程，在这种模型中，劳动力和货币市场发生的事件依据积累的效果来推断。价格、工资和利率的变化是过度生产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危机的产生是因为剩余价值生产的不足，这是“支配马克思整个概念框架的基本法则”。<sup>[17]</sup>格罗斯曼指出，这一点不仅被把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价格波动和个别资本家的计算错误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忽视，<sup>[18]</sup>也被格罗斯曼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所忽视。鲍威尔、考茨基和希法亭都受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比例失调论的影响，这使得他们认为，通过对经济活动实施中央调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可以克服危机。他们在最好的意义上可以被称为“新和谐主义者”，后来，考茨基则干脆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sup>[19]</sup>作为一名革命者，罗莎·卢森堡错误地把流通而不是把生产作为崩溃的根源，并且把这种困难的根源归因于剩余价值的过剩而不是不足。布哈林在从战争中推出崩溃趋势之前，只是简单地罗列了一系列所谓的经济矛盾，但它们都是外生的、非经济的因素。即使是列宁，格罗斯曼相当赞同列宁，对他进行的严厉批评也最少，也没有能够对他自己资本主义“成熟过度”的重要概念进行解释。因此，列宁的分析同其它人的一样，在资本过度积累问题上存在缺陷。<sup>[20]</sup>

### 3. 崩溃理论的政治学

在所有这一切中,有很多内容需要进行批判。然而,首先要谈的是格罗斯曼对反作用趋势的讨论和崩溃理论的政治学。他将反作用趋势解释为在周期下降阶段发挥了增加利润率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通过提高利润率,提供了经济反弹的机会,而不是造成该体系的最终崩溃。它们或者通过降低不变资本的价值,或者通过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达到这样的目的,它们既可以内在于、也可以外在于资本主义机制。格罗斯曼的分析建立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分析基础之上,<sup>[21]</sup>但是,格罗斯曼的分析更为详尽,更加强调“世界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崩溃趋势越来越接近于绝对崩溃点”。<sup>[22]</sup>

在国内市场起反作用的趋势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利于增加资本有机构成的力量。这些力量包括生产产品的第 I 部类产业的技术进步,它通过使已有的和新生产的生产资料的贬值,降低构成不变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包括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这削减了不变资本处于流通过程中的时间,从而减少了资本的使用年限。<sup>[23]</sup>第二类指的是导致剩余价值生产增加的因素。包括第 II 部类生产工资品的产业的技术进步,这降低了构成可变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包括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和把工资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的方法降低实际工资。<sup>[24]</sup>这是格罗斯曼首次提到剥削率的上升;它出现在本书的中间,只占据了一页内容,而且完全没有对格罗斯曼的任何一个数字例子产生影响。最后,也就是第三类,指的是作为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的租金和商业利润的下降,这相应地增加产业利润。但是,这种利润的增加在部分程度上因为对非生产性工人构成的“新中间阶层”进行支持的成本的增加而被抵消。<sup>[25]</sup>

格罗斯曼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世界市场上起反作用的趋势及其对帝国主义理论的意义。他严厉地批评了以前所有的帝国主义理论,因为他们都忽视了资本主义扩张推动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它与剩余价值实现方面的困难无关,这种困难是深层次功能失调的后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种困难是由格罗斯曼分析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匮乏引起的。罗莎·卢森堡是这种错误最著名的受害者,紧随其后的是弗里茨·斯滕伯格(参见以上第十四章)。<sup>[26]</sup>鲁道夫·希法亭错把资本主义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银行暂时支配了产业资本,当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所具有的一般性历史趋势。格罗斯曼认为,积累越来越倾向于自我融资,而且“在最终的意义上,更多的是产业控制银行而不是相反”。希法亭的资本输出理论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无法解释在国际范围利润率差异一



直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资本输出是一个近期才出现的现象。<sup>[27]</sup>即便是列宁，也错把抵消利润率下降的特殊手段（即垄断的增长）当成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并且没有能明确地把过度积累视为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sup>[28]</sup>

格罗斯曼的分析指出了可能会提高利润率的进入世界市场的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和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有关。格罗斯曼观察到，存在国际意义上的劳动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马克思曾提及这一点，但后来，除了奥托·鲍威尔，所有的人都忽视了这一点，但鲍威尔并没有把它和积累理论联系起来。<sup>[29]</sup>格罗斯曼利用一个数字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在他的例子中，欧洲的有机构成和剥削率高于亚洲，利润率低于亚洲：

$$\text{亚洲 } 16c (\text{不变资本}) + 84v (\text{可变资本}) + 21s (\text{剩余价值}) = 121$$

$$\text{欧洲 } 84c (\text{不变资本}) + 16v (\text{可变资本}) + 16s (\text{剩余价值}) = 116$$

在这里，欧洲的资本有机构成是4，亚洲的是0.25，欧洲的剥削率为100%，亚洲的为25%；利润率分别是15%和21%。如果欧洲向亚洲输出资本，利润率就会在全球范围出现均等化，两组商品都以118.5的价格出售，共同的利润率为18.5%。欧洲的利润率上升，亚洲的利润率下降，价值从亚洲转移到欧洲。从而“技术上和经济上更加发达的国家以落后国家为代价占有了超额剩余价值。”<sup>[30]</sup>这些利润的获得与亚洲国家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关系。这在世界市场上产生了持续的、激烈的竞争，并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激烈的对抗，因为一个国家的所得是另一个国家的所失：从而，经济民族主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永恒特征，而不（像考茨基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过渡阶段。<sup>[31]</sup>

帝国主义帮助提高利润率的第二种方式，是围绕原材料的垄断控制展开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资本家在新重商主义潮流中，把国家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这又是一场零和游戏，其中每个国家都企图以其它国家为代价，来避免自己的崩溃趋势（通过使不变资本贬值），其它国家被迫向它“纳贡”。因此，试图对商品市场进行国际调节是不现实的。<sup>[32]</sup>最后是资本输出问题。如前所述，格罗斯曼对所有先前的马克思主义资本输出理论提出了异议。先前的著述家的资本输出理论依赖于发达和落后国家之间利润率的差异。因此，他们既忽视了利润率国际均等化的趋势，也忽视了由于最新技术的使用，殖民地的资本有机构成实际上可能更高。<sup>[33]</sup>对格罗斯曼而言，过度积累再次成为决定性因素：“不是国外的利润率更高，而是国内投资机会的匮乏才是资本输出的根本原因。”<sup>[34]</sup>

帝国主义不仅因为危机的全球化而加剧，而且还会酿成战争：“为投资渠道而战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sup>[35]</sup>因此，格罗斯曼认为，国际关系日趋和谐的观

念是荒谬的。单个国家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格罗斯曼坚持认为，鲁道夫·希法亭提出的“总卡特尔”仅仅是一种幻想，因为希法亭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消除竞争和商品交换将意味着消灭资本主义自身。因此，鲁道夫·希法亭的“总卡特尔”完全不可能成为一个资本家的协会。<sup>[36]</sup>另一方面，任何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都是充满危机的。从而，受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在理论上是是不可能的”。<sup>[37]</sup>

格罗斯曼推断说，由于工资水平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日益严重的社会紧张是不可避免的。19世纪后期实际工资能够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而上升——这已经变得不再可能了，因为过度积累要求资本家迫使工资下降。伯恩斯坦和修正主义者认为，绝对贫困只是历史上某一特定时期的现象，仅限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在格罗斯曼看来，这与真实情况恰恰相反。他认为，贫困化发生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晚期阶段，发生在“过度积累为工会活动设定了客观的限制”时。<sup>[38]</sup>这将加剧阶级斗争。在格罗斯曼看来，崩溃理论和经常归咎于它的宿命论不是一回事。经济崩溃“虽然是一种客观必然，发生的时间也可以准确地推算”，但它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只能被动地等待着它的到来的过程。如果不是对它的抵制，贫困化将延长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而工会的抵制将加速它的崩溃。正如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表明的那样，工业中的冲突从根本上看是政治性的。罢工和裁员正在为资本主义的生死闹得不可开交。格罗斯曼的结论呼应了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和《阶级斗争》中的思想（参见以上第四章）。格罗斯曼宣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不是一个从外部带给工人阶级的理想，而是日常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sup>[39]</sup>

#### 4. 格罗斯曼的批评者

格罗斯曼的著作在分析方面存在的缺陷被相关评论无情地揭露出来，在所有的评论中，只有两篇对格罗斯曼的观点表示完全赞同（其中一篇是由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撰写的）。<sup>[40]</sup>一个又一个的评论家反对奥托·鲍威尔最初的假定条件，认为这种假定条件过于严格，以至于事实上无法用它来构筑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的模型。第一，为什么不变资本应当以每年10%的比率，可变资本以每年5%的比率持续增长，而不考虑这种类型的增长对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问题造成的影响？<sup>[41]</sup>资本有机构成不是由技术给定，而是取决于投资决策的利润率。在面对格罗斯曼认为资本家们将要面临的继续发展的后果时，他们将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以避免毁灭，比如降低资本积累的整体速度或者降低有机构成的增长率。<sup>[42]</sup>从而，格罗斯曼对鲍威尔的例子的使用，在海琳·鲍威尔看来，“只是在玩数字游戏”。<sup>[43]</sup>

第二个问题与剥削率有关，格罗斯曼认为剥削率将保持不变，而且只有在降低实际工资的情况下剥削率才会上升（他在危机模型中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格罗斯曼的模型中，正是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技术进步，同时提高了生产工资品或者为生产工资品的产业提供投入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如果实际工资保持不变或下降，剥削率必然提高，否则实际工资将以和劳动生产率相同的速度稳步提高。因此，格罗斯曼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剩余价值概念，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即使是剥削率能够上升，仍可能会因剩余价值生产增加得太慢而无法避免崩溃；但是格罗斯曼的分析中没有对为什么会必然如此进行哪怕是一丁点的证明。<sup>[44]</sup>

与这些问题相联系的，是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批判。格罗斯曼把技术变迁降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要素价值的影响看作是次要的因素，它们只对导致经济崩溃的基本力量产生“校正”的作用。但是，这些影响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固有的一部分。它们应当被纳入格罗斯曼的正式模型中，而不是仅仅附在最后面。<sup>[45]</sup>

有人进一步反对说，格罗斯曼应该运用更具一般性的代数形式，而不是依赖于数字例子提出他自己的观点；而且格罗斯曼的确使用了的那点儿代数，也并不是特别有帮助。<sup>[46]</sup>格罗斯曼还应该解释为什么单个资本家在利润率仍然为正时就停止了投资：“从整个资本主义的视角看，无知（在积累问题上的）……不是它崩溃的基础”。<sup>[47]</sup>此外，格罗斯曼的模型是一个总体模型，这掩盖了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差异，在这方面，他的模型不如奥托·鲍威尔的成熟。<sup>[48]</sup>格罗斯曼假定所有商品都按其劳动价值出售，忽视了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然而，这并不能使他的分析不受损害，这是不言自明的。<sup>[49]</sup>格罗斯曼很快便开始抨击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价值和价格的差异，而没有认识到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他自己的著作。<sup>[50]</sup>

格罗斯曼受到的另外的批评指出，他误解了马克思，错误地赋予马克思一个崩溃理论而不是经常性危机的理论，从而贬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sup>[51]</sup>格罗斯曼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危机理论中的消费不足和比例失调的线索，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绝对过剩”的概念，当失业后备军下降到零时，这种过剩就会发生，从而进一步的积累无法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格罗斯曼的理论是一种相对积累过剩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剩余价值量可以持续地增加，因此这种理论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理论。<sup>[52]</sup>

最后，批评转向了格罗斯曼的分析的经验有效性问题。格罗斯曼的理论不能解释19世纪初发生的危机，那时过度积累还远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格罗斯曼的理论也不能解释拥有不同程度过度积累的国家同时波动的现象。格罗斯曼也没有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即危机总是发生在特定部门，而不是发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整个经济中。<sup>[53]</sup>

## 5. 评价

在所有这些批评中，有很多实质性的内容。格罗斯曼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积累理论，也就是说，在他的著作中，完全没有解释为什么资本家会以指定的比率增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一批评，公正地说，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和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著述家）。格罗斯曼还低估了技术变迁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要素价值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既降低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又提高了剥削率。从而，利润率可能会增加：事实上，如果技术进步的同时，实际工资不变或下降，那么利润率必然会增加。<sup>[54]</sup>这两个缺陷破坏了格罗斯曼提出的崩溃理论的整个基础：如果资本家需要比格罗斯曼假设的更少的剩余价值（相对于他们的资本而言），如果资本家能够生产出比格罗斯曼允许的更多的剩余价值，那么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不能同时积累和消费。最后，表16.2和16.3展示的危机模型包含了一个矛盾。格罗斯曼假定实现所有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不存在困难。但是，那部分留作借贷资本的剩余价值并不能被任何相应的投资所抵消。因此，有效需求不足以实现全部剩余价值；超额储蓄使得商品无法售出，并减少了利润。对这个问题的忽视，暴露出格罗斯曼成了萨伊定律的俘虏，同样地格罗斯曼也成了“古典和谐论”和他自己严厉批评了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受害者。<sup>[55]</sup>

因此，格罗斯曼完全未能建立资本主义崩溃必然性的理论。然而，很难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格罗斯曼的许多敌意大都出于政治动机。作为一个独立马克思主义者，格罗斯曼无疑处于更加暴露的位置，因为他同样地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者的社会民主主义，反对在其它方面和他有很多共同点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对议会制的抵制。因此，他没有什么盟友。正统列宁主义者警告说，他的理论有消极论和宿命论的危险。左派共产主义者，如安东·潘涅库克和卡尔·柯尔施也以同样的理由攻击他，与此同时，法兰克福研究所的重要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对格罗斯曼坚持经济学的首要性和无情的积累规律的存在提出了异议。格罗斯

曼的著作出版后，他和法兰克福研究所的关系明显地冷淡了。<sup>[56]</sup>唯一的全心全意的支持格罗斯曼的是保罗·马蒂克，保罗·马蒂克是一名定居在美国的德国议会共产党人，同时也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分支中的一员。但在，至少是在20世纪30年代，保罗·马蒂克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sup>[57]</sup>

因此，格罗斯曼的直接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很快就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格罗斯曼在经济思想史领域虽然仍在继续着他高产的工作，但是，他重新修订自己的著作并完成另外两卷的计划却没有实现，他计划在这两卷中论述简单再生产和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sup>[58]</sup>计划中的著作的英文和法文翻译工作也没有成为现实，而日文版对当时出现的特殊的宇野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sup>[59]</sup>在格罗斯曼逝世后，和他的观点类似的观点才开始广泛传播，首先是在德国，而后——当保罗·马蒂克终于赢得公众时——是美国。今天，那种认为“资本的逻辑”阻止剩余价值生产并以此达到避免自发危机的积累的观念，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支的基本教义。本书第二卷将对这种情况出现的背景进行描述。

## 6. 格罗斯曼崩溃模型的代数公式

格罗斯曼的代数公式是含糊的，而且存在印刷错误。这里提供的代数公式引自瑞士经济学家马丁·卓特曼的著作，是一个修订和简化版。<sup>[60]</sup> $c$ 代表不变资本， $v$ 代表可变资本， $s$ 代表剩余价值量， $e$ 代表剥削率（剩余价值率）， $\Omega$ 代表资本有机构成。除 $e$ 外，所有的变量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有时间下标。不变和可变资本的增长率由 $g_c$ 和 $g_v$ 表示。<sup>[61]</sup>它们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现在，我们可以得到：

$$c_t = c_0(1 + g_c)^t \quad (16.1)$$

和

$$v_t = v_0(1 + g_v)^t \quad (16.2)$$

资本家的消费 $k$ 定义为总剩余价值和用于增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用作积累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值。

$$\begin{aligned} k_t &= s_t - c_t \cdot g_c - v_t \cdot g_v \\ &= v_t(e - g_v) - c_t \cdot g_c \end{aligned} \quad (16.3)$$

当 $k$ 降为0时崩溃就发生了（在格罗斯曼的模型中）。假设这发生在第 $t$ 年，

那么:

$$k_t = 0 \quad (16.4)$$

使用 (16.3), 这要求:

$$v_0(1+g_v)^t(e-g_v) = c_0(1+g_c)^t \cdot g_c \quad (16.5)$$

因此,

$$\frac{(1+g_c)^t}{(1+g_v)^t} = \frac{v_0(e-g_v)}{c_0 \cdot g_c} \quad (16.6)$$

用  $\Omega_0$  替代  $(c_0/l)$ , 重新整理, 得到:

$$\left[ \frac{1+g_c}{1+g_v} \right]^t = \frac{e-g_v}{\Omega_0 \cdot g_c} \quad (16.7)$$

因此,

$$t = \frac{\log \left[ \frac{e-g_v}{\Omega_0 \cdot g_c} \right]}{\log \left[ \frac{1+g_c}{1+g_v} \right]} \quad (16.8)$$

这就是 Grosman 的方程式。<sup>[62]</sup> (16.8) 表明:

$$\frac{\sigma}{\sigma \Omega_0} < 0, \frac{\sigma}{\sigma g_c} < 0, \frac{\sigma}{\sigma e} > 0, \text{ and } \frac{\sigma}{\sigma g_v} > 0.$$

也就是说, 崩溃会因  $\Omega_0$  或  $g_c$  的下降, 或者因  $e$  或  $g_v$  的上升被推迟。<sup>[63]</sup>

## 第十六章注释:

[1] 关于学术上的贡献, 参见普雷泽1924年论文, 《Erich Preiser, 'Das Wesen der Marx'schen Krisentheorie', reprinted in Preiser, Politische Oekonomie un 20. Jahrhundert: Probleme und Gesralten (Munich: C. H. Beck, 1970) pp. 47-75. 1910年, 希法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 但在对危机的讨论上, 并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参见以上第五章)。

[2] H.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 (Leipzig: C. L. Hirschfeld, 1929; reprinted 1970, Verlag Neue Kritik, Frankfurt am Main), pp. 1-23.

[3] Ibid. p. x (original stress); ci. Grossmann, 'Die Änderung der Ursprünge

Aufbauplans des Marxschen Kapitals und Ihre Ursache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14. 1929, pp. 305-38, reprinted in Grossmann, Aufsätze zur Krisen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Neue Kritik, 1973) pp. 9-42.

[4] Das Akkumulations, pp. 79-98.

[5] Ibid. derived from table II, p. 119. 同上,由表II推导出,但格罗斯曼的计算中一直(通常很小)有数字上的错误,例如,  $c=5109531$ 和 $v=525335$ 要高于表16.1中给出的数值,但这些错误并不会影响结论。

[6] Ibid, pp. 121-2.

[7] 因为  $200\ 000 (1.10)^{35} \div 100000 (1.05)^{35} = 10.18$ 。

[8] Das Akkumulations, pp. 125-6; cf. K. Marx, Capital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2) vol. 111. pp. 246-51 (ch.15. S. 3).

[9] Das Akkumulations, pp. 184-7, 216-25, 128, 133, 136-7.

[10] Ibid, pp. 140-1.

[11] Ibid, pp. 139, 187.

[12] Ibid, p.215.

[13] Ibid, pp.230-9.

[14] Ibid. 来自表8, p. 233 和表9, p. 237.

[15] 从第三年开始,格罗斯曼对不变资本的计算有误...因为 $(210000) (1.05)^{35} = 220500$  而不是220000,这个错误对其它数据产生的错误影响较小。

[16] Ibid, 格罗斯曼的图3 (p. 238) 描述了这种情况; 参看他的图2, *ibid*, p.141.

[17] Ibid, pp. 243, 285, 306.

[18] Ibid. pp. 142-8.

[19] Ibid. pp.99-104, 173-3 (Otto Bauer); 60-77, 272 (Kautsky); 55-8, 211,n.40 (Hilferding).

[20] Ibid, pp.20-2, 116,n. 76, 281-2 (Luxemburg); 44-50 (Bukharin); 519-20 (Lenin).

[21] Capital. vol. III, ch. 14.

[22] Das Akkumulaiions, p. 296.

[23] Ibid, pp.308-15, 317-22, 368.

[24] Ibid. pp. 308, 316.

[25] Ibid, pp.345, 354-6, 358-61.

[26] Ibid. pp. 306, 426, 528-9; ci. F. Sternberg. *Der Imperi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Neue Kritik, 1971; 首版于1926年)以下引用标为Sternberg (1926): 我们对斯滕伯格的讨论在以上第十四章; 以及格罗斯曼1932年的文章 ‘Die Goldproduktion im Reproduktionsschema von Marx und Rosa Luxemburg’. reprinted in Grossmann, *Aufsätze*, pp. depicted 77-109.

[27] Ibid. pp. 503-5; 575-8. 后来, 格罗斯曼赦免了列宁那里存在的许多希法亭的错误, 参见Grossmann to Paul Mattick. 21 June 1931, in Grossman, *Marx, die Klassische Nationalökono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9) p. 89.

[28] *Das Akkumulations*, p. 527.

[29] 格罗斯曼注意到在《资本论》第一卷和《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第三册中提及的不等价交换, 但是他只强调了《资本论》第一卷第15章和第20章中的讨论。(Das Akkumulations, pp. 429-430, 432-435)。奥托·鲍威尔的讨论参见Die Nationalitätsfrage(Vienna: Wiener Volksbuchhandlung, 1924) 2nd edn, pp.246-7 (cited ibid, pp.440, n.331, 433, n.337)

[30] *Das Akkumulations*, p. 438.

[31] Ibid, pp. 431-40.

[32] Ibid. pp. 454, 458, 460, 488.

[33] Ibid, pp. 505-8.

[34] Ibid. p. 561.

[35] Ibid, pp. 570-2.

[36] Ibid, pp. 602-22.

[37] Ibid, p. 623.

[38] Ibid, pp. 188-9, 588-9: ci. Sternberg (1926) and the discussion in Chapter 14 above.

[39] Ibid. pp. 601-3.

[40] A. Gurland, ‘Abstaz und Verwertung im Kapitalismus: zur Neusten Diskussion des Zusammenbruchsproblems’, *Der Klassenkampf*, 4, 1930, pp. 75-83; Tazerout. ‘La Théorie Economique d’Henryk Grossmann’, *Revue Internarionale de Sociologie*. May-June 1930, pp. 308-15.

[41] 认为年劳动力增长率为5%是不切实际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参见E.Varga, ‘Akkumulation und Zusammenbruch des Kapitalismus’.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4, 1930, pp.74-6; cf. P. M. Sweezy,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first published 1942) pp. 211-2.时期的选择是随意的,比如可以很容易地用一年代表十年(那么崩溃也将相应地延迟)。

[42] O. Benedikt,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bei Wachsender Organischer Zusammensetzung'. Unter Dem Banner Des Marxismus. 3, 1929, p. 882; A. Caspray, review of Grossman,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lv, 32, 1930, p. 81; K. Muhs, 'Das Gesetz der Fallenden Profitrate und die Zusammenbruchstendenz des Kapitalismu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35, 1931, pp. 16-18; H. Neisser, 'Das Gesetz der Fallenden Profitrate als Krisen-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ie Gesellschaft, 8. 1931. p. 83; F. Sternberg, 'Der Imperialismus' und seine Kritiker (Berlin: Soziologische Verlagsanstalt, 1929) pp. 26-7, hereafter cited as Sternberg (1929); cf. Sweezy,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斯威齐把格罗斯曼的有机构成增加的假设视为试图脱离人类控制的科学怪人的奇谈妙想(a Frankenstein monster)。

[43] H. Bauer, 'Ein Neuer Zusammenbruchstheoretiker', Der Kampf, 22, 1929, p. 274.

[44] Benedikt, 'Die Akkumulation', p. 884; Muhs, 'Das Gesetz', pp. 14-15; Varga, 'Akkumulation' pp. 72-3.

[45] H. Bauer, 'Ein Neuer Zusammenbruchstheoretiker', p. 274; Muhs, p. 9; Neisser, p. 80; L. Miksch, 'Zusammenbruch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Liberaturblatt der Frankfurter Zeitung, 17 August 1930, p. 7.

[46] Benedikt, 'Die Akkumulation', pp. 871-2.

[47] Neisser, 'Das Gesetz', p. 85.

[48] Benedikt, 'Die Akkumulation', p. 828; Sternberg (1929) pp. 34, 37.

[49] Neisser, 'Das Gesetz', pp. 80-2; C. Schmidt, review of Grossmann,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69, 1929, pp. 638-41.

[50] H. Grosman, 'Die Wert-Preis Transformation bei Marx und das Krisenproblem',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 1932, pp. 55-84, reprinted in Aufsätze, pp.45-74.

[51] H. Bauer. 'Ein Neuer Zusammenbruchstheoretiker', p.280.

[52] Muhs, 'Das Gesetz', pp. 23-4; Sweezy,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Varga, 'Akkumulation', pp. 70- 1, 76-84.

[53] Benedikt, 'Die Akkumulation', pp.871-2; Varga, 'Akkumulation', pp. 76-84.

[54] 参见J. E. Roemer.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Cam.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s4-5; for a less technical treatment see S. Bowles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Profit Rate: a Simple Proof the Okishio Theorem',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5, 1981. Pp. 183-6, and M. C. Howard and J. E.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 2nd edn. pp. 200-5.

[55] M. Trottmann. Zur Interpretation und Kritik der Zusammenbruchstheorie von Henryk Grossmann (Basel: A. Fricker, 1956) pp. 45-7.

[56] Benedikt, 'Akkumulation', p. 887; Varga, 'Akkumulation', p. 95; cf. F. R. Hansen, The Breakdown of Capi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p. 142; R. Jacoby, 'The Politics of the Crisis Theory: Towards the Critique of Automatic Marxism II', Telos 23, 1975, pp. 38-40; and G. Marrao, '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tical Theory', Telos, 24, 1975, pp. 56-80 and 'Theory of the Crisis and the Problem of Constitution', Telos. 26, 1975-6, pp. 143-64.

[57] 参见下书中格罗斯曼和马蒂克之间的通信Grossman, Marx, pp. 85-223, and Jacoby, 'Politics of Crisis Theory', pp. 40-3.

[58] 尤其是参见 Grossmann, 'Die Wert-Preis Transformation'; 'The Evolutionist, Revolt Against Class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1, 1943, pp. 381-96 and 506-22; and Marx. 一个未发表的手稿, 'Marx Ricar diensis', 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 手稿现存于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W. Bauer, 'Henryk Grossmann als Nationalökonom', Arbeit und Wirtschaft, 8, 1954, p. 150).

[59] 关于宇野学派, 参见S. Mawatari, 'The Uno School: a Marxian Approach in Japa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7. W85, pp. 403-18, and T. T. Sekinel 'A Uno School Seminar on the Theory of Value', Science and Society, 48, 1984-5, pp. 419-32.

[60] Trottmann, pp. 18-20, 32-3.

[61] 格罗斯曼用 $a_0$ 和 $a_1$ 表示它们, 考虑到早期时, 他用这些符号表示增加的不变和可变资本的数量, 这里存在着容易模糊的地方(参见表16.1)。我们对Trottmann的代数式的解释与他本人的相比有些微的变化, 我们用下标0而不是1表示第一期。

[62] Das Akkumulations, pp. 184-5.

[63] 对于用数学工具重新进行的现代表述, 参见M. Bronfenbrenner and M. Wolfson, 'Marxian Macrodynamics and the Harrod Growth Mode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6, 1984, pp. 175-86.

## 结束语

1883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似乎相对简单一些。其实质内容包含在少量的基本文献中，事实上，这些文献包括《资本论》第一卷以及作为补充的《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这些著作，只能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来解释，他们对他们的追随者在知识上的支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集中关注的一些问题虽然很重要，但却相当狭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有关价值和剥削、资本和剩余价值、积累和危机，以及资本主义产生和即将来临的对它的超越的理论构成的，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基于对当时英国领先地位的考察而形成的。

到1929年，这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使人产生误解的简单，被深刻而且明显的复杂性所取代。首先，可以被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大量增加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以及随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出版，使得马克思的大量的成熟的著作可供他的追随者们使用，这些著作提供了一些新的洞见和新的问题。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也可以看到了，这些著作在经济学问题上提供了非常不同的视角。相关的文献，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现在还包括许多其他作者的著作。世纪之交之前，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已经建立起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正统——根据他们个人的观点——后来被希法亭、卢森堡、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列宁的贡献加以丰富或提出挑战。1917年后，列宁的著作在共产主义者中享有经典的地位，甚至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地位还高。列宁的理论是依据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地区的情况形成的——这一事实很重要。1917年后，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运动，而不是一种几乎完全集中在欧洲的运动。同时，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外围地区而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地带取得了成功，在运动内部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解释的质疑。

这表明了复杂性的第二个维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一种政治运动，马克思主义成为多中心的。早在19世纪90年代，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受到了德国和俄国修正主义者的抨击，政治经济学问题是他们批判的中心。随后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接着是1905年后德国党的激进派和中间派之间发生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的破产，最后，是由布尔什维

克革命引起的决裂。经济学越来越多地被作为粗糙的政治武器，其它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资产阶级通常被视为自己的敌人。经济学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更具个人化特征和论战性，甚至在争论中（正如1920年代的斯滕伯格和格罗斯曼一样）的主要参与者既不为修正主义者的也不为革命党的路线进行辩护。

然而，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917年之后“崩溃了”或“消亡了”是不正确的。就政治经济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在1929年依然是充满活力的。这可以从其日趋复杂的第三个原因中推知：争论的问题的范围扩大了。在马克思逝世后的12年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出版，激起了有关价格和利润分析以及危机理论的新争论。就危机理论而言，在大萧条前夕，资本主义经济崩溃的问题仍悬而未决。在随后的10年间，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推动了德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金融资本、垄断、国家支出、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还就不同类型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问题进行了争论。1917年后，俄国的理论家不得不正视一个巨大的困难，即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加以改造，以使其适应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境况，而曾经是他们的同志的德国和奥地利的理论家们（现在大多数被视为自己的敌人），则困扰于西欧和美国的国家管制或“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问题。

尽管存在着许多重大的缺陷，但到1929年时，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在“退化”。相反，它继续进入新的领域、提出新的思想、面对新的对手，遭遇新的问题，它的多样性、它的分裂、它的不和谐是它巨大力量的来源。不再有（也尚未有）单一的认为马克思主义者都要遵循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在西方，自诩为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经济科学已经被抛弃了。甚至是在苏联，在斯大林已经开始投下其长期的不祥的阴影时，20世纪20年代仍然存在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程度令人印象深刻。然而，人类却站在深渊的边缘。接下来的10年将见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崩溃、苏联新经济秩序的建立，以及希特勒和斯大林控制的广大地区对批判性思想的镇压。这一恢宏的世界历史剧，赋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的根本问题以新的紧迫性。如何解释国家经济权力明显的无法阻挡的增长？它预示着什么？如何理解法西斯主义，如何描述苏联生产方式的特征，它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景是什么，外围地区的社会主义希望又是什么？

1929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在本书第二卷中，我们将看到这些任务是如何成功地完成的。

## 附录：中英文人名对照表

### A

阿德勒，麦克斯  
阿奎那，托马斯  
艾威林，爱德华  
A.V. 恰亚诺夫

Adler, Max  
Aquinas, Thomas  
Aveling, Edward  
A. V. Chayanov

### B

巴枯宁，米哈伊尔  
鲍威尔，海琳  
鲍威尔，奥托  
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  
倍倍尔，奥古斯特  
伯恩施坦，爱德华  
俾斯麦，奥托  
布洛赫，约瑟夫  
庞巴维克，欧根·冯  
博纳，詹姆斯  
博特凯维兹，拉迪斯劳斯·冯  
鲍丁，路易斯  
布雷迪，罗伯特  
布雷克福德，亨利·诺埃尔  
布伦坦诺，卢约  
布赫，利奥·冯  
布哈林，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布尔加柯夫 S·N

Bakunin, Michael  
Bauer, Helene  
Bauer, Otto  
Bax, E. Belfort  
Bebel August  
Bernstein, Eduard  
Bismarck, Otto  
Bloch, Joseph  
Bohm-Bawerk Eugen von  
Bonar, James  
Bortkiewicz. Ladislaus von  
Boudin, Louis  
Brady, Robert  
Brailsford, Henry Noel  
Brentano, Lujo  
Buch, Leo von  
Bukharin, Nikolai Ivanovich  
Bulgakov, S. N.

### C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 Chernyshevsky. Nikolai Gavrilovich

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  
库诺, 亨利希

Clausewitz, Karl von  
Cunow, Heinrich

## D

丹尼尔逊 N.F ( 也被称为尼古拉 )  
达尔文, 查尔斯  
大卫, 爱德华  
德维尔, 加布里埃尔  
德米特里耶夫 V.K.  
多布, 莫里斯·赫伯特  
多马, 埃弗塞·S  
杜林, 欧根  
杜德, R·帕姆

Danielson, N. F. (also known as Nikolai-on)  
Darwin, Charles  
David, Eduard  
Deville, Gabriel  
Dmitriev, V. K.  
Dobb, Maurice Herbert  
Domar, Evsey S.  
Duhring, Eugen  
Dutt, R. Palme

## E

恩格斯  
叶夫根尼,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Engels, Friedrich  
Evgeny Preobrazhensky

## F

福克纳, S.A  
法约曼, P  
富拉顿, 约翰  
弗里德里希, 波洛克  
弗里茨, 斯滕伯格

Falkner, S. A.  
Fireman, P.  
Fullarton, John  
Friedrich Pollock  
Fritz Sternberg

## G

乔治, 亨利  
格申克龙, 亚历山大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  
葛兰西, 安东尼奥  
格罗斯曼, 亨利克

George, Henry  
Gerschenkron, Alexander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Gramsci, Antonio  
Grossmann, Henryk

## H

哈尼, 朱利安

哈罗德, 罗伊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格尔方德 亚历山大 I (参见帕尔乌斯)

亨德森, 奥托

赫尔岑, 亚历山大

希法亭, 鲁道夫

霍布森, 约翰 阿特金森

Harney, Julian

Harrod, Roy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lphand, Alexander I see Parvus

Henderson, Otto

Herzen, Alexander

Hilferding, Rudolf

Hobson, John Atkinson

## I

伊凡三世, 俄国沙皇

Ivan III, Tsar of Russia

## J

约翰森, 雷弗

Johansen, Leif

## K

加米涅夫, 列甫·波里索维奇

康德, 伊曼努尔

考茨基, 卡尔

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

康德拉季耶夫,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

柯尔施, 卡尔

Kamenev, Lev Borisovitch

Kant, Immanuel

Kautsky, Karl

Keynes, John Maynard

Kondratiev, Nikolai Dmitrievich

Korsch, Karl

## L

拉萨尔, 费迪南德

莱德勒, 埃米尔

莱尔, J

列宁

伦施, 保尔

里昂惕夫, 瓦西里·W

莱克希斯, 威尔赫姆

Lassalle, Ferdinand

Lederer, Emil

Lehr, J.

Lenin Vladimir Ilyich

Lensch, Paul

Leontief, Wassily W.

Lexis, Wilhelm

李卜克内西, 卡尔  
洛里亚, 阿基尔  
卢卡奇, 乔治  
卢森堡, 罗莎

Liebknecht, Karl  
Loria, Archille  
Luk á cs, Georgy  
Luxemburg Rosa

M

马尔萨斯, 托马斯·罗伯特  
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  
马尔托夫, 尤利·奥西波维奇  
马克思, 埃莉诺  
马克思  
马斯洛夫, P.P.  
马蒂克, 保罗  
米克, 罗纳德·L.  
门格尔, 卡尔  
迈耶, 鲁道夫  
米哈伊洛夫斯基,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

Malthus, Thomas Robert  
Marshall, Alfred  
Martov, Iulii Osipovich  
Marx, Eleanor  
Marx, Karl  
Maslov, P.P.  
Mattick, Paul  
Meek, Ronald L.  
Menger, Carl  
Meyer, Rudolf  
Mikhailovsky, Nikolai

Konstantinovich

穆尔, 塞缪尔  
摩尔根, 路易斯·亨利  
森岛通夫  
米尔普福特, 沃尔夫冈

Moore, Samuel  
Morgan, Lewis Henry  
Morishima Michio  
M ü hlpfort, Wolfgang

N

纳夫塔利, 弗里茨  
拿破仑, 波拿巴  
诺伊曼, 约翰·冯  
尼古拉一世, 俄国沙皇  
尼古拉 (参见丹尼尔逊N.F.)

Naphtali, Fritz  
Napoleon Bonaparte  
Neumann, John Von  
Nicholas I, Tsar of Russia  
Nikolai—on see Danielson, N.F.

O

置盐信雄

Okishio, Nobuo



奥本海姆, 弗兰茨

Oppenheimer, Franz

## P

帕默斯顿, 勋爵

Palmerston, Lord

潘涅库克, 安东

Pannekoek, Anton

帕尔乌斯(也被称为格尔方德, 亚历山大·I) Parvus (Helphand Alexander I)

彼得大帝, 俄国沙皇

Peter the Great, Tsar of Russia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Plekhanov, Georgy Ventinovich

波洛克, 弗里德里希

Poflock, Friedrich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 Preobrazhensky, Evgeny Alexeyevich

蒲鲁东, 皮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 R

伦纳, 卡尔

Renner, Karl

罗得斯, 塞西尔

Rhodes, Cecil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洛贝尔图斯, 约翰·卡尔

Rodbertus, Johann Karl

吕贝尔, 马克西米里安·

Rubel, Maximilien

拉斯金, 约翰

Ruskin, John

梁赞诺夫, 大卫

Ryazanov, David

## S

施米特, 康德拉

Schmidt, Conrad

施穆勒, 古斯塔夫·冯

Schmoller, Gustav von

施拉姆, 卡尔·奥古斯特

Schramm, Carl August

熊彼特, 约瑟夫·阿洛伊斯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e de

斯科沃尔特索夫, P.N.

Skvortsov, P. N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桑巴特, 威纳尔,

Sombart, Werner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斯宾诺莎, 别涅狄克特·德  
斯拉法, 皮罗  
斯大林  
斯滕伯格, 弗里茨  
斯蒂贝林, 乔治·C  
斯托雷平, 彼得  
司徒卢威, 彼得·B  
斯威齐, 保罗·M.

Sorge, Friedrich Adolph  
Spinoza, Benedictus de  
Sraffa, Piero  
Stalin, Josef Vissarionovich  
Sternberg, Fritz  
Stiebeling, George C.  
Stolypin, Pyotr  
Struve, Peter B.  
Sweezy, Paul M.

T

图克, 托马斯  
托洛茨基, 列夫·达维多维奇  
卓特曼, 马丁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米哈伊尔·I

Tooke, Thomas  
Trotsky, Lev Davidovich  
Trottmann, Martin  
Tugan-Barariovsky Mikhail I

V

瓦尔加, 尤金  
福尔马尔, 格奥尔格·冯

Varga, Eugen  
Vollmar, Georg von

W

瓦格纳, 阿道夫  
瓦尔拉斯, 里昂  
韦伯, 悉尼  
威尔斯, H.G.  
维塞尔, 弗里德里希·冯  
威尔逊, 埃德蒙  
沃尔弗, 尤里乌斯

Wagner, Adolph  
Walras, Leon  
Webb, Sidney  
Wells, H. G.  
Wieser, Friedrich von  
Wilson, Edmund  
Wolf, Julius

Z

查苏利奇, 维拉

Zasulich, Vera